

密秘交外強四

MG
D819
13
2

四強外交秘密

著 斯納爾貝 美國新
譯 環君陽歐

新開天地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



3 1798 8656 3

序

假使我們能先知道我們是在何處，往何處去，

我們當更能判斷應做何事與如何做。

亞伯拉罕 林肯

許多朋友都勸我把這個内幕故事寫出來。他們的理由是：趁着我記憶中的那些事件還清新，趁着我還能讀出我速記的札錄，我若坦白地說出來，將是對大眾的一種貢獻。

我曾為促進一個人民的和平而努力了一些時候，一向認為：除非我們把應該的事實告知人民，對於和平，決不能有睿智的貢獻，明乎此，你當能明瞭我如何便會輕易地確信：假如我能幫助那些有意造成和平的人民瞭解目前處境，他們也許能更正確地判斷做什麼與怎樣做。

過去四月間，當我化費冗長的時間寫述此原稿之時，我寬恕了那些朋友，雖則我並未將他們忘却。同時我體驗到寫作是種職業，但却不是我的職業。我不想成爲一個職業作家，創立一種文藝風格，只想用隨便的語錄的方式，將我們爲和平而盡的努力說出來。

脫稿後一看，我驚詫並煩惱，其間的「我」字竟會如此之多。現在已太晚，無能爲力了。只是我希望你能記得，這是紀述作者親身參與的事件與商談的，「我」字的常用是難以避免的事——只能以此解嘲了。

本書不敘述戰後我國之外交關係，而僅限於為和平所盡之努力以及因該項努力而產生之事件。例如，本書並未述及對南美諸聯邦的關係。這是因為在敘說和平的成就時，尚無論及對南美政府或對加拿大政府關係之必要。

在本書中，我曾提到許多在列次會議中與我接觸的人。還有許多，名字雖未被提起，而使能的達成，實有賴他們的協助。我深深地稱頌並欽敬他們的貢獻。

我並要感謝列次會議的秘書處人員。他們審慎整理出來的紀錄，供給了許多形成和談圖案的線條，價值無比。我有許多自己的摘記，但是僅祇在雅爾達會議上，能記下了一份完整的速記的筆錄，因那時我是顧問，無庸參予辯論。

書中有許多談話實錄。有的採自我的摘記，有的採自秘書處的記載，或會議後的備忘錄。

記憶轉述之誤，當然還是難免的，尤其像蘇聯或法國代表的語錄或演說辭。在若干場合中，與其說是發言者的語句，還不如說是譯述者的官辭。達到稍有懷疑的地方，我便不引述原句，而只圖反映出演辭的含義，事件的實況及當時的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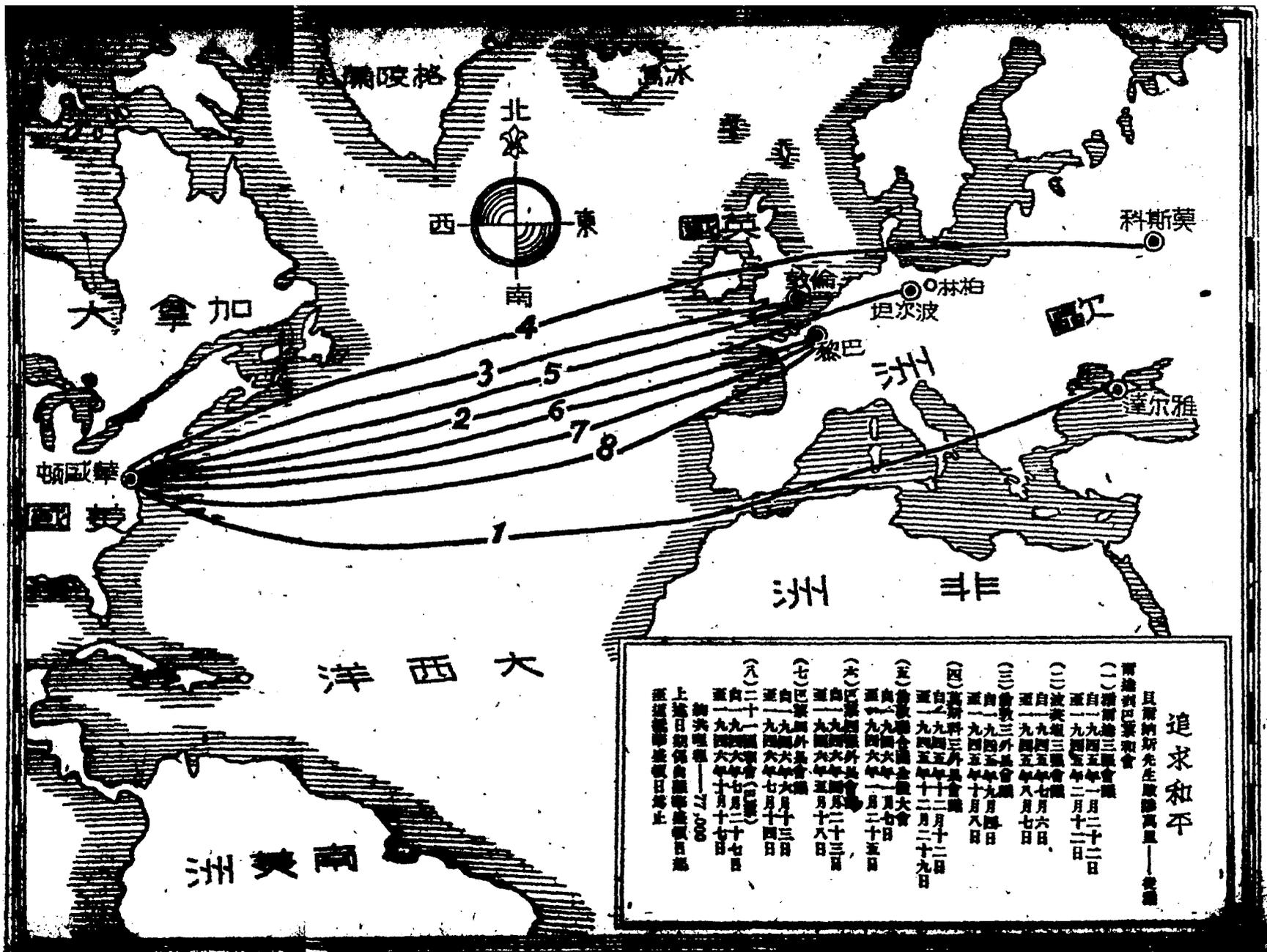
總括一句，我是想在會議桌旁給讀者一席之地。若干批評家也許會說這些史實洩露得太早。我的答覆是，假若列次商討和平的會議情形能老實告訴這世界上的人民，那麼目前緊扼著我們心靈的恐懼與憂慮，也許便會消逝了。

詹姆斯 P 貝爾納斯 斯巴登堡，S·C·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

目次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	一
第二章	雅爾達——三強團結的高潮	一四
第三章	局勢開始轉變	三七
第四章	波茨坦——失敗了的成功	五七
第五章	在倫敦遭遇的挫折	八一
第六章	莫斯科會議打開了一個僵局	九八
第七章	再至倫敦·重遊巴黎	一一五
第八章	巴黎和會與它的紐約結局	一三〇
第九章	中歐——嚴厲的試煉	一五〇

第十章	一個行動的路線問題·····	一六九
第十一章	向亞洲和平邁進·····	一九五
第十二章	確立國民外交政策·····	二一八
第十三章	原子能的管制·····	二三五
第十四章	俄國人以後如何·····	二五五
第十五章	我們往何處去·····	二八一



追求和平

貝爾納斯先生歐戰萬里一覽

- (一) 羅倫斯三國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至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 (二) 波茨坦三國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
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 (三) 倫敦三外長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
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 (四) 莫斯科三外長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五) 倫敦聯合國全體大會
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六) 巴黎聯合國全體大會
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
 - (七) 巴黎聯合國全體大會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 (八) 二十國會議(倫敦)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 倫敦電報——1946
- 上述日期係自歐戰爆發後起
至歐戰結束後日止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



(南)

千萬個聲音使我警覺到危機的到來。我面前好像軟地上站滿了德國人，列成整齊的隊伍，歌頌着武裝力量及其說教者希特勒。這不是噩夢。這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德國紐倫堡。跟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會近乎漠不相關地看着這個希特勒的崛起，但是這一幕情景畢竟是難于漠視的。

那年我偕夫人赴巴塞出席會議，順便想看看歐洲對失業問題的處置。我們原不想到紐倫堡去，但在慕尼黑，一個在船上相識的德國外交部官員勸我們，若要正確估計德國的經濟復興計劃，非一看納粹黨年會不可。

但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個武裝侵略計劃。一萬二千名兵士和幾十輛坦克車輛經過台前，天空中飛過四百五十架飛機。檢閱式到最高潮，希特勒站在一輛敞車上駛過，有手高舉，行着納粹禮。四面立即捲起一陣歡呼聲。我驚懼——深深為這戰時景象驚懼。

我們在德國旅行，行經漢堡及勃萊門海文時，又見到從紐倫堡回來的軍隊所受的熱烈歡迎。人民對這支急速成長的新軍頗為自傲，幾乎一致贊助武裝力量的恢復。無論在鄉間或都市中，到處都在談論着戰爭。

這些印象與我們在法國所見的，是個強烈的對比。勞資糾紛給法國帶來經濟危機，工廠商店每逢週六中午起至週二的早晨是停業的。工人却還在要求更短的工作時間，然而在德國，工作時間却在盡力增加。他們的口號是「從工作中尋樂趣」。德國忙着增加生產，法國在忙着減低。

我們到了倫敦。由於在德國所見的一切，我便問英國官員，在武力方面有何準備，他們也已驚覺到這一點，但只少數人有反應。那些少數份子已在數月前完成了一個軍備計劃。嗣後英防備伯明罕時，的確看見有幾個工廠已在日夜趕製軍器。

即使是如此有限的二個軍備計劃，在英國也引起了和平主義者強烈的反對，週末回到倫敦，見有一個盛大的和平遊行。他們都是些善良人民——願國內任何一州的人民一樣——呼籲和平，憎恨戰爭。但當這些誠實善良的各式人等經過街上時，我又想起了紐倫堡所見，希特勒那幾萬群眾的趨步而進的軍隊。這種和平遊行顯然是徒勞心力而已。

德國武力所給我的印象，與二年前我在太平洋上遊歷時所聽到的拚合起來，我所疑慮的變成了解斷。副總統赫納那時率領國會代表團往馬尼刺參加奎松就任第一任總統典禮。在那裏我們聽說日本的侵略意向有增加的現象。所以我們到達日本之時，我對日本海軍預算以及它的造船情況作了一番調查。根據日本一九三六年決算，至少有半數是供給陸海軍的。我們的使館人員相信，公布的決算表僅僅包括了海軍經費的一部份。但是這個公開的數字也已足夠嚇人了。回國後，我敦促總統設法獲得日本海軍力量的更正確估計。

同樣使人不安的是日本政治經濟的構造。我調查日本紡織工業是因為它與南加羅林那州的主要工業有競爭關係。結果發現工業金融及造船事業，事實上日本整個經濟政治命脈，全被集中操縱在少數人手中。整個國家可以隨着這少數人的意向採取任何路線。

明顯地，無論在德國或日本，廣大人民是毫無機會參加意見的。統治一切的是領導份子的命令而非人民的願望。

一九三七年十月從歐洲歸來，我立即向羅斯福總統報告這一切。我的結論是，我們必須立刻對國防加以嚴重的考慮。

總統說，我證實了他所接獲的報告。他爲了歐洲的發展大大煩惱。尤其使他煩惱的，是不容易使人民覺到當前真正局勢的危急。

國會所反映的人民情緒，使我們難以替陸海軍增加經費。但是他決定盡他所有的力量使人民明瞭增加預算的必要。我答應幫助他。

那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總統發表了有名的芝加哥奎倫丁演說。這是一次強有力的演說，因爲有種種原因必須如此。我們一貫希望不要涉於歐洲的糾爭中。同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參予歐洲政治所得到的幻滅猶未消失。站在人民立場，我們憎恨戰爭，珍視我們的孤立主義。

政府在平時本不敢過於支持陸海軍的。到了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輿論更催促着國家稅收應該用於救濟事業。此外，參議院軍火委員會也在鼓勵和平主義者，因此造成了那種單純的邏輯，說

戰爭是軍火商人渴求利潤的產物。

每次我在參院提出海軍預算書，總得受盡和平主義份子的指摘。他們呼籲民間廣大的支援。參院旁聽席上坐滿了婦女與學生佔極高比數的聽衆。

羅斯福就任總統以來，曾屢次爲了要求強化國防設施而遭遇到反對。但他還是設法撥付海軍建設計劃的經費，又曾獲准將陸軍現役人數從十一萬五千擴增到十六萬五千人。

總統在芝加哥演說後，因人民並無反響而大感失望。他等到次年年初便熱誠發動去喚醒國會與人民大眾。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九日，他告訴國會：「全世界人口至少有四分之一陷在殘酷的戰爭中」。

嗣後他要求將海軍建造經費增加百分之廿，造戰鬥艦兩艘，巡洋艦兩艘，試造小型艦隻，發一千萬元供陸軍購備器材。那時我們的陸軍在世界上是第十八位。

但是人民的情緒使我們增加陸海軍預算運動遭遇無比的困難。

一九三八年三月與國的合併，慕尼黑協定，與九月間捷克的解體震驚美國人民。但是陸海軍預算還是難獲國會的通過。總統爲引起大眾注意，在一九三九年歲首又遞送了一紙關於國防的諮文給國會。這次他要求經費五萬萬元，主要是用來購買陸海空軍的武器。

五月廿七，國務卿赫爾向衆院要求廢棄禁運軍火法案。他解釋稱：如此，則萬一戰事在歐洲發生，也許美國還可以倖免。此後不久，在白宮談話時，羅斯福總統告訴我，他很担心希特勒會

在秋間發動戰爭。因此，當七月十一日，參院外交委員會以十二票對十一票議決延緩討論禁運法案時，對總統與國務卿實在是個痛心的失望。三天之後，總統送了件諮文向國會表示遺憾，並附了封赫爾的信，呼籲立即行動。他一再指明，禁運法案若不撤銷，我們保衛和平的力量將被削弱。但該項請求終於未被接受。

●國會遲延不決，希特勒卻並不這樣。他與他的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忙著跟蘇聯協商那個在八月廿八日成立的互不侵犯條約。兩天之後納粹大軍侵入波蘭，字彙中多了「閃電戰」這一個名詞。

總統按照當時法律，宣布了中立，並發表了禁運令。同時他於九月廿一日召開國會臨時會議，討論撤銷禁運問題。十一月四日，國會終於通過。

戰爭剛爆發，總統便理解到當前局勢的危急，有兩黨共同行動的必要。爲了要提出此項請求，他在國會前一日，召集了一個會議，出席者有兩黨代表，其間有副總統勃納、國務卿赫爾、蘭登、諾克斯、發言人彭柯亨，參院領袖巴克萊與麥克納萊，參議員辟特曼，貝爾納斯，蘭登與奧斯汀，衆議員勃羅姆，雷朋，馬丁與梅漢斯。

這是一個嚴重的會議，對總統所提出的兩大政黨合作的請求，各出席人都有坦白的發言。蘭登認爲國會應照常繼續會議。他認爲國會的決定比總統個人所作的決定來得妥善。共和黨代表方面，諾克斯的說話給人印象最深。他說戰事必然擴大，吾人不欲置身其中，然亦無法置身事外，

並宣稱應忘却黨派之爭，一致保衛國家。總統事後對我表示，頗嘉許他的演說。因此當總統最後決定邀請兩共和黨黨員入閣，任命諾克斯為海軍部長，史汀生為陸軍部長；我並不覺得驚異了。諾克斯的任命很容易地獲得了各方同意，甚至民主黨領導人物芝加哥市長凱索也無異言。這就可見政黨的關係已成爲次要的考慮了。

當其時，納粹軍隊在波蘭節節勝利，但是一大部份美國人民還是不能警覺到當前的危機。因爲那時德軍在西線尙無行動，人民便以爲情勢不致嚴重。此種思想流行極廣，並在國會上反映出來。從參議院同僚的談話中，我覺得若在此時將海軍預算案提出討論，勢必被大加修削，我就盡力設法延緩參院的討論。雖則海軍極需要該項經費，但我要保證該項預算毫無修正地通過。根據情報人員及軍事長官的報告，都相信納粹必於次年春季進攻西線。結果，果然如此。當此時機，我在參院提出了海軍預算案。在三小時內，它便獲得了預算委員會的通過。

我們的困難不僅限於物質方面。陸軍的許多高級官員雖多是優秀份子，但據馬歇爾將軍的意見，以爲太老了，恐不能勝任當前異常重大的任務。

一九四〇年八月，馬歇爾將軍於出席某次參院預算委員會後向我說，他的最大困難是無法擢升有特殊才幹的青年將校。他說，有了這種權力，他方能正式改組陸軍。他告訴我，在數月前，他曾請衆議院軍政委員會主席梅氏，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但未獲成功。

由於他需要之迫切，我請他命屬下的專家擬一足以達成此一目的之修正案。我答應幫助他。

根據參院規則，預算案是不附加修正案的，但當預算案提出時，我畢竟建議了一個修正案，「在總統認為發生戰爭或國家遭逢危機之時，現役軍人中任何官員，得受暫時性之更高級任命，並不喪失其永久職務」。毫無反對，便被採用了。

九月九日，條文變成法律，軍政部開始擢升後來率領軍隊獲致勝利的那些青年軍人。未到年終，被擢升者共達四千零八十八人。其中特出份子有艾森豪威爾、開道、史巴資、克拉克與已故的巴頓將軍等。

最後，英軍在鄧扣克的慘敗終於驚醒了美國人民，但他們的反響異常分歧。一面是對戰爭的憎厭，一面逐漸認清戰火已日益迫近。心與腦掙扎的結果，產生了個執中的辦法，建設國防，但決不牽入漩渦。

人民分歧的意見在政黨年會上反映出來。

共和黨於六月廿四日在費拉達爾菲舉行大會時，當場通過了一個宣言：「共和黨堅決反對國家參予國外的戰爭」。

民主黨的政黨領導者們明瞭這樣一個宣言對有選舉權的母親們將有何等的誘力，極力想使民主黨大會能勝過他。

總統請我代表他出席年會。政策委員會商時，我知道將有一番戰鬥了。參議員韋勒要求發表「不參予戰事」的宣言。參議員華爾許及麥卡倫以及其餘諸人亦是如此。我請主席華格納參議員

展緩討論外交部份，等我與三參議員商洽一個滿意的宜實。

三參議員堅持下述文告：「吾人將不參加國外戰爭，亦不派遣陸軍海軍或空軍至美洲以外異國土地上作戰」。他們向我警告，若不能獲得諸如此類的保證，若干代表恐將有所行動。最後我告訴他們，假若能同意附加「除非被攻擊」數字，我當將此提呈總統與國務卿。他們同意了。我便與總統等討論。我指出，假使我們在世界任何地方被攻擊，我們便得派遣軍隊出去作戰。無論如何，不宜戰是不能派遣部隊去作戰的，而宣戰却是國會的任務。於是總統與國務卿也同意了。

此項宣言為政策委員會及大會一致通過。我並不喜歡這個施政綱領，怕它會使希特勒誤作我們決不會作戰，以致使他更爲猖獗。但是默觀政策委員會各委員的意見，這已是我們所能得到的最佳結果了。否則勢必在年會上引起一場惡鬥，招致執政黨之嚴重分裂。

法國淪亡，英國遭受猛烈轟炸，總統積極行動。他將步槍及其他軍火售與英國，補充喪失在法國海灘上的軍械。同時協商以五十艘艦船已滿的驅逐艦交換海軍根據地。一般人對此大爲反對，認爲總統並無處置此項驅逐艦的權力。總統自有法律根據。但據我觀察，他更注意的是民間輿論是否支持此一行動。他已決定冒一冒險，即使離大選已僅幾個月了。

大約即在此時，國會開始討論歷史上第一次平時征兵問題。共和黨眾議員沃齊華斯與民主黨參議員登克聯合主持此一法案。剛好在大選之前獲得通過。

人民之接受征兵可以看出對歐陸戰局的發展已有反響。從那時起，人民便常常趕在總統與國會的前面了。他們看到了遍及全世界的戰事，認清亟需援助我們的友人，以便獲得充分準備的時間。

一九四〇年聖誕節前一次新聞例會上，總統宣佈擬以金錢以外之其他方式援助對希特勒作戰的國家。一九四一年一月八日，總統進一步向新國會提出。一方面，便命柯克斯起草法案，將計劃付之實現。一月十日，該項法案在參眾兩院同時提出。這便是以後的租借法案。

新國會改組時，我被選任為參院外交委員會委員。我那時的任務是通過此一法案。柯克斯則協助我向參眾議員及其他各委員會解釋。對反對者，我們不得不承認戰時所租借出去的，來日償還時為數必不多。但是這樣可使他人權獲對敵作戰，而我們趁此便可訓練並配備自己的軍隊了。該法案於二月十七日在參院提出討論，由外交委員會的傑出委員主持辯論。最後以六十票對卅一票獲得通過。

立法完成後，論爭移到了預算委員會。第一批租借物資批准七十億元。

六月廿二日，蘇聯被侵，世界上只剩了一個大國未被戰爭波及，而這最後一個國家亦將難免。三艘輪船相繼被擊沉。國會將中立法案重加修改，並通過更多的國防經費。總統與國務卿雖爾同時也極關切軸心的東端。日本進駐法屬越南所顯露的侵略野心，並未能被來檳大使的「和平使命」所遮蔽。總統最後於十二月六日，星期六，直接向日皇致送敦促和平的呼籲。次日他接到

了答覆，日本人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了。

珍珠港被襲後的第二天（星期二），最高法院審理一家造船公司與政府的訴訟。我是法官之一，但是我已無心於此。珍珠港戰報不斷傳來，我們俱已理解到事態的嚴重。

星期三清晨，我去見總統。他還在床上，上面堆滿了戰報等等紙張。地板上也是。他已醒了幾個鐘頭，在研究各方情報，計劃未來。我剛走進房，他便告訴我損失的詳情。到此時方始知道我方艦隻所受損害之慘重。總統頗為悲心，他不明白他如此引以自傲的海軍如何竟會如此不堪。

政府為適應突然爆發的戰爭，各方面都急激需要改組。幾乎每一部門都在請求緊急立法。若個別處理，則勢將耗費不少寶貴的時日。我們會商結果，一致認為這些事情最好能成立一個總括一切的法案一併處理。如此，每逢通過一個提案，其餘同類提案，便可毫不費爭執地一併獲得通過了。

這種意見，獲得了發言人雷明與政黨領袖巴克萊的贊助。他們與有關各委員會主席商討後，便由參眾兩院的司法委員會主席提出了二次大戰權力法案。在參院中，僅歷八天便獲得核准。到二月底，在眾院也通過了。

戰時生產機構是另一個緊急問題。勞資兩方固然都已允予合作，但我們生產機構的規模却遠比不上同時供應盟軍與本國軍隊的需要。權力分散後所引起的爭執是延滯生產的主因。並且因為辦法機構繁多，意見多於決定。

霍金斯是當時軍械委員會主席。一月二日，他在電話中徵詢我對於生產問題的意見。那天下午，我寫了一份備忘錄供他參考。我說，與其成立軍需部，徒然因為轉移陸海軍的管理機關而引起磨擦，不如請總統委派一個推動並監督的人。那個人可以有any方式的機關，但當發生爭執時，他必須有決斷的力量。

一月十二日星期一，華生來說，總統要見我。幾分鐘後，霍金斯打電話給我，請我在往見總統之前一談。他告訴我，我已將問題大致向總統談過，但未將備忘錄提示。我便要了那份備忘錄帶去見總統。

總統頗為同意。當我催促他付之行動時，他說：「我將選派納爾遜」。

次晨我又去見總統，他已在命人草擬命令，將以備忘錄的意見付之實現。霍金斯到來，即與我們一同準備新聞公報，預備宣佈成立戰時生產局，委派納爾遜為局長的事情。

當天午後六點鐘，總統在按例通知副總統華萊士之後，命令便公佈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國會通過經濟穩定法案。我應總統之請，辭去最高法院法官之職，受命為經濟平衡局局長，管制物價與工資。從十月十五日開始工作，至翌年四月，物價指數增加百分之四·三。於是總統又發佈了所謂限價令，賦予更大管制物價及工資的權力。

不久，我為總統籌劃成立戰事動員處。同時，總統接受我的建議，任命文森擔任我的職務。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起，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辭職，物價指數僅升百分之三·二。他辭職後二

十二個月中，由於限價令的撤銷，物價跳起百分之二十。二。

一天復一天，戰事動員處所臨到的問題，顯示出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世界的命運有着直接並且時常是休戚相關的關係。電量的多少影響着歐亞上空飛機的數量。石油生產與輸送的緩速影響到軍隊進展的速度。用來造船造廠的鋼鐵遠得顧到萊茵河可能需要用來建造橋樑。每樣農產品的數字必須詳盡審核，因為這不祇決定我們所能供應的兵額，也決定了我們盟國萬千人民的生死數字。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總統從德黑蘭拍來的電報，便是個證明。他急迫地要知道我們最多能製造若干登陸船隻，最快能何時交出。我知道這必然與三國元首在德黑蘭所討論的開闢第二戰線有關，立即召集各有關機關商討。

十一月廿四日，我覆電總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即六個月後——我們能在本國海港交付各式大小登陸艦艇二萬三千二百四十九艘。不過，必須予以優先趕造，非但供給蘇聯戰線的軍火物資的生產將延緩，本國軍用卡車，海軍艦隻及高庚汽油的產量也將一併減少。

此項緊要的資料，幫助德黑蘭的元首們完成了一九四四年夏季進攻歐洲本土的計劃。這是美國生產力使登陸戰畢竟得以如期成功。史達林在某次宴會上曾舉杯盛讚：「若無美國的生產，聯合國永難贏得此次戰爭的勝利。」

即使如此，我們的生產能力是在跟時間賽跑。一九四四年十月我訪問歐洲戰線，見到情勢的

危急。瑟堡附近，有個德國飛彈的發射陣地。那裏是個舊的石窟，偽裝掩護得甚為週密。當德軍炸潰時，他們還未築好鋼骨水泥的頂。假若我們遲幾個月進攻，德軍便能從此類陣地猛烈轟擊英國，我們也許永遠無法集中進攻軍力了。

由於這種種印象，遂使我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七日在全國記者俱樂部午餐席上說：

「美國的這一代可以崇高。獲致或卑微地喪失這世界的希望。假使美國能在平時運用他的生產力，如它在戰事一樣，我們必能崇高地獲得那希望。若美國不善在平時運用它的生產力量，美國與整個世界俱將喪失……這不是留待爭執的理論而是留待應付的實際情勢」。

第二章 雅爾達——三強團結的高潮

在一九四四年聖誕節前後的一週中，有一天我到總統的書房中晉謁總統，和他會商運輸問題。他接過了我送給他的備忘錄，看了一會，忽然抬起頭來說：

「傑美，我要你伴我到克里米亞去」。

這真是完全出于我的意外。他曾經和我談起過好多次關於他將和史達林、邱吉爾會晤的事情，但是他從來沒有提起要我也參加這次商談。他因為我是動員部長，對於國內的情形比較熟悉，而這次商談中是一定會談到經濟問題的，所以要我參加，以便隨時提供資料。我就告訴他，國內正也頗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我還是留下處理這些事情，比較妥當。但是他堅持一定要我去，我也終於答應了，可是我心裏實在還是不大高興。

到決定要動身的那天下午，我先和動員部長裏的同人們會商了一下我走後的各種安排。會商的結果，更使我相信，我實在有留在國內的需要。我在會後再去晉謁總統，總統正在叫那個在白宮工作了三十六年的黑人理髮師梅士理髮。梅士還是在塔虎脫總統任內到白宮的，頗得各位總統和白宮人士的信任，他不但謙恭有禮，而且也很懂得大體。

梅士一面和總統通變，我就一面再向總統請求留駐國內。我列舉了他走後亟應處理的許多問題。可是他還是專心致志于國際事務，把內政擱在一邊，還是要叫我去。

當夜，我們就動身到諾福克，在一月廿三日平旦，我們登上了美國重巡洋艦崑山號向瑪爾太進發。

我們離開華府的時候，總統正在重傷風，上船後他傷風更利害了，多半的時間都是消磨在船艙裏的。我們在海上度過了總統的生日（一月三十日），他的女兒鮑諦甘夫人特為總統祝壽，大家趕着在船上出賣零星東西的地方購辦禮物，總統的忠心的菲律賓廚子堅持說，他一定要送一尊蛋糕，可是文武隨員大家都要送蛋糕，結果一共送了五尊蛋糕。

總統雖然也很高興，但是我一看他的臉色，却覺得有些耽心。我覺得他的病似乎不止是普通的傷風，我就把這意思告訴了鮑諦甘夫人，但是以為實際上並不嚴重，我也就不再介入了。

我們到瑪爾太的時候，他的健康已大有進步。當崑山號進港的時候，邱吉爾首相乘在英艦蘇立斯號上，身穿海軍戎服，在海峽的那一面揮手示意。過了一會，她帶了他的女兒薩拉，到崑山號上來應總統邀宴，與宴者十人，對即將舉行的會議是很籠統的談了一談，但是總統却曾告訴邱吉爾，回程中預備和伊本沙特王會晤，討論巴勒斯坦問題。他希望能使阿拉伯和猶太二族釋嫌修好，邱吉爾口頭上祝他能順利成功，可是似乎並不認為總統有成功之望。

果然，他失敗了。

那一夜，總統第一次乘坐了他的專機「聖牛」號。幾月以前，我就會屢次勸他坐這只備有特製電梯設備的飛機，可以使他在上下機的時候方便一些。他却總是說他不愛飛行，說是不喜歡看天邊那些單調的雲彩。他還有一個反對的理由，却有些出人意外，他說，爲了他個人專門置備一只飛機，實在是太浪費了。他說，這次置備專機，事前並未得到他的同意，他覺得不妥當。誰知道這樣一個人，倒有人還要稱他爲美國大總統中最浪費的一個！

據我看來，總統對於雅爾達會議並沒有充份準備。在船上，總統，李海軍上將和我，曾舉行過四五次會議，商討在開會時的提案，尤其着重于關於聯合國機構的建議。後來我才知道，船上裝着一份很詳備的國務院提供的資料，可是當時實在並未仔細研究，我想一半也因為是總統政躬不豫之故。但是，我也相信除了羅斯福總統以外，恐怕誰也沒有這種不經準備就可以好整以暇的本領——實在他對於國際情勢太熟悉了。

國務卿史退了紐斯已先我們飛抵瑪爾太。霍浦金也來迎接了，他剛訪問了倫敦、巴黎和羅馬回來。他有病，會期中大半的時間他都是在牀上休息，但是他的勇氣使他竟硬撐着出席了每一次會議。

蘇聯方面爲了表示地主之誼起見，對於這次雅爾達會議的種種設備，的確是費盡了心機。我們在沙基機場降落的時候，跑道上的雪花已經打掃得乾乾淨淨。從機場到雅爾達的八十英里一段路上，蘇軍一躍守衛得沒有一絲空隙。蘇軍中有許多是持槍的少女。我們的宿處裏凡提亞宮更是

布置得無懈可擊，海軍上將金氏所住的房間，就是以前俄後的閨房。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雅爾達會議正式開幕的一天，正是盟軍在前線節節勝利時候。德軍的大反攻已在亞丹納森林中遭遇挫折，我軍正準備進撲萊茵區域。蘇軍也已發動東線總攻勢，三個月後就佔領了柏林。捷報傳來，大家情緒都極高，有一天總統就和史達林元帥開玩笑，想賭一個東道，賭一賭到底還是蘇軍先入柏林，還是美軍先克復馬尼刺。

這次會議主要的目的，本來是討論設立世界和平機構的問題，但是因為盟軍各線急進的結果，歐洲局勢有急轉直下之勢，會議中自然就談到了歐洲問題。於是，在開始會議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得到了各國代表的同意，就提出了討論「我們在德國怎樣辦」的建議。

史達林立刻聲明，他願意討論一下德國投降的條件，德國未來的政體，賠償和劃定法國佔區的問題，

羅斯福和邱吉爾向史達林建議法國也應參加佔領德國的時候，史達林是同意的。但他的居然同意，顯然是因為法國不過是從英、美佔區中分了一部出去而已。他堅決反對法國參加對德管制委員會。他認為法國參加後反而增添麻煩。他以為法國也許會得寸進尺，甚至要求戴高樂也參加一強會議。他說：「我不能忘記，這次大戰開始的時候，法國是打開了大門讓德國長驅直入的」。

邱吉爾竭力主張應讓法國加入管制委會，他說，德國問題和法國的關係如此之深切，如果不

許法國參加，英國的人民將覺得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而且准許法國參加之後，也不一定就會引起戴高樂參加三強會議的要求。

但是史達林終是不能釋然。他說戴高樂是一個非常「不現實」的人，而且「法國雖沒有打多少仗，戴高樂却也許要求和我們那些打了仗的國家（即蘇聯、英國和美國）享受同等的權利」。羅斯福並沒有參加關於戴高樂的意見，他對於法國人民是欽佩的，可是並不欽佩戴高樂。他有幾次曾提起過他在卡薩白朗加和戴高樂的談話，戴高樂自比為聖女貞德，稱自己為法國精神上的領袖，又曾自比為克里孟梭，說是法國的政治領袖。最初，總統對法國是否必須參加管轄會，是並不堅持的，可是討論到相當程度時，他說他希望多考慮一下再說，主張暫緩討論。一天，霍浦金，美駐蘇大使哈里曼和我都勸總統，主張准許法國派遣代表參加管轄會，因為如果一定不准法國加入，那末也許他們連佔區都不願接受，未免太使法國下不去。總統後來也表示同意了，而且終于說服了史達林，達到了協議。

關於德國問題的另一液結在德黑蘭會議中的一個非正式建議，主張把德國分割為若干獨立小邦，會議中對這點討論得並不很久，可是三巨頭對原則上都同意了使德國分割為若干小邦。史達林主張德國投降時就把這個計劃告訴德國人，邱吉爾却說這問題牽涉頗廣，要從長計議。總統終于建議將此點交外長會議討論，並限在三十天內提供報告。

外長會議中對這點終于未獲協議。霍浦金于五月間訪問史達林的時候，史達林的态度有些不

同了，他說這是英美故意反對德國分割的原則。他主張這件事到波茨坦三強會議時再談，可是到波茨坦會議時，三強的注意力已經集中在別的地方，這件事情還是沒有討論。

在雅爾達會議中，蘇聯代表團對於德國問題中最關切是賠償。開會時，史達林坐在莫洛托夫和曾任駐英大使十一年的蘇外次邁斯基之間。邁斯基在這次會中不但担任史達林的顧問，也還兼充翻譯。蘇聯方面對賠償問題的建議，就是邁斯基提出的。他們提出兩點主張：一是德國除保留百分之二十的工業設備，以供維持國內消費之外，其餘的百分之八十都應該拆卸供盟國賠償，二是德國在十年內應向盟國繳納「歲幣」。他主張德國的賠償總額應以二百億美元為準，其中蘇聯至少須得一百億。

邱吉爾是第一個發表意見的人，第一，他認為蘇聯的要求太奢，因為英國和其他國家在戰時的損失也很慘重。第二，他說，德國人民繳納不起那麼重的賠償，勢將發生饑饉。他說：「若要馬兒跑，你就得餵他一些珍珠米，至少也得讓他吃點草」。

邁斯基反對。他說：「你餵飽了那匹馬，那匹馬却要踢你」。

邱吉爾換了一種說法：「如果你買了一部汽車，你就得給它加上汽油。我建議成立一個賠償顧問委員會，擬具一個中肯可行的計劃」。

羅斯福總統說明了美國的立場，他強調說在第一次大戰後，美國會成千成萬的貸款給德國，「我們決不讓這種事情再度發生了」。

他說：「我們並不需要德國的人力，我們也不要德國的機器、工具、工廠。德國在美國有一點財產，也許可以抵償一點德國該償還美國的款項，不過這些財產的數目是極小的」。會後，我告訴總統，德國在美的資產，大概祇有一億五千萬元，至多也決不會超過二億。後來，總統就把這數字向會議中提了出來。他聲明，美國並不要使德國人餓死，不過決不能讓德國倒享受一種高度的生活水準。他強調此次戰後，美國經濟狀況未必會好，也許沒有錢可以送給德國，使德國人得以買食物，衣服和重建房屋。結論時，他說無論如何，美國是一定願意盡力幫忙的，最後，他附和設置賠償委員會的建議。

史達林在這時參加了討論。他說：「上一次引起種種麻煩的根由，是因為大家要求以錢為賠償，於是引起了馬克折合外幣的問題。結果是賠償終于因這一問題而完全失敗」。他堅持這次實際作戰的國家應有取得賠償的優先權。他強調法國與三強相比，這次戰事中的犧牲實在是微乎其微。

史達林在結論中建議，三強就這次賠償的標準究因基于各國在作戰中的功績或所蒙受的損失，或者應二者兼顧的一點，應當有所決定。

羅斯福總統在這一階段的討論中，發表了一個至今成爲美、蘇案訟紛紜的聲明。他說：「賠償委員會在初步會商中，應以蘇聯的建議作爲討論的基礎，即賠償的總額應爲二百億，而其中之半數應歸蘇聯」。

這些話當時確曾列入會議紀錄，紀錄中還有一點，即賠償委員會得考慮以「人力之運用」作為賠償之一種。其實這一句話在會議中並未經過討論，祇是總統曾說過：美國「不能像蘇聯一樣的取去人力」。後來我知道這句話是邁斯基加添進去而經過各國代表團同意的。在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話，我一定要勸總統反對這種准許以大量的人民作為奴役的紀錄，賠償委員會以後草擬的計劃中，終於並未列入「人力賠償」的一條，但是，至今竟還有德國人和日本人留在盟國服勞役，我實在覺得遺憾。

雅爾達會議中也討論了波蘭的國境問題。羅斯福和邱吉爾都大體上支持所謂「寇松界線」，而准許蘇聯取得產油區路域。史達林說：「寇松線是寇松和克里孟梭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訂立的，蘇聯人既未參加，甚至亦未嘗被邀參加討論。列甯是不贊成寇松線的，你們簡直是要我塌台。試想：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人民將會怎麼說？他們會說，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還不如寇松和克里孟梭倒會保障蘇聯人民的利益！我不能這樣老着脸回莫斯科」。

說到這裏，史達林激動地立起身來。他說：「我甯可這次戰事延長幾天，以我們的鮮血來作為波蘭擴展西陲的代價。我堅持這一點，我請求所有的朋友們支持我這一點……我贊成把波蘭的西陲延長至尼塞河」。

邱吉爾表示懷疑。他贊成波蘭擴展西陲，可是：「如果那隻波蘭鵝吃了那麼多的德國食料，萬一漲死了怎麼辦？」

討論得很長久，史達林終于接受了寇松線，協議的紀錄中說：「三強以爲波蘭的東部國線應以寇松線爲準，在若干地區，得由波蘭多得五公里至八公里。波蘭在西部及北部領土，自亦應有所獲得，留交和會中再議」。

波蘭本身的問題，嚴重性也不在它的疆界問題之下。會議中關於這一點的討論，較對任何別的問題爲長久。辯論極爲緊張，羅斯福總統雖然和邱吉爾一樣，主張在華沙設立一個新波蘭政府，可是在討論中的地位却有些像是一個仲裁人。蘇聯是支持盧布林政府的，史達林同意可以增添幾個人，可是不能影響蘇聯對這個流亡政府的控制權。

總統的意思，是要成立一個包括各黨各派的全國統一的波蘭政府，這個政府可能是過渡性質的，其主要的任務在建立一個永久的政權。他說，波蘭政府應與蘇聯樹立友好關係。又說，這次會議中如果能就這一點獲得解決辦法，那末世界和平之前途，大可樂觀。

邱吉爾說：「英國對德宣戰，目的就在使波蘭成爲自由獨立的國家，我們冒了絕大的危險，帝國的地位，甚至民族的生存，都岌岌可危。我們對波蘭的關切，是因爲有關英國的榮譽。爲了阻止希特勒對波蘭殘酷地攻擊，英國才拔刀相助，今天任何解決波蘭問題的辦法，如果不能使波蘭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英國不願接受」。

史達林答覆的時候，流露出極誠懇的態度。他說：「就蘇聯人民而言，波蘭問題不止是一個有關榮譽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安全的問題。從古以來，波蘭一向是敵國侵入蘇聯的一條走廊。最

近三十年中，德國的軍隊就會兩度經過了波蘭，進入蘇境。蘇聯祇希望波蘭成爲堅強有力的國家，能用她自己的力量，關閉這條走廊的門戶。當然，波蘭必須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但是爲了獲得自由和獨立，她必須要有實力。所以，對蘇聯而論，波蘭問題不但是個涉及榮譽的問題，它還是一個有關蘇聯生死存亡的問題」。

以後每逢討論的時候，蘇聯政府總是用這一套理論來解釋他們在波蘭的一切的作爲。他們之所謂友好的國家，意思就是一個完全被他們控制的國家。盧布林政府正吻合這個條件，於是蘇聯就不敢試一試別的政黨的代表了。

在第一次討論之後，羅斯福總統曾寫了一封信給史達林，建議由華沙和倫敦兩個波蘭政府派遣代表，加入未參加這兩個政府的各政黨的代表，舉行會議，協商建立一個新的波蘭政府。這封信就成爲以後討論的基礎。

參加會議的各代表經過幾天辯論之後，發表了一個文告，內稱：「現在波蘭境內的臨時政府應擴大基礎，容納國內外的波蘭民主人士，改組爲波蘭全國統一臨時政府」。並設立委員會，由莫洛托夫，哈里曼，寇爾爵士等任委員，與各有關波蘭民主領袖進行協商。

在討論將獲協議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問：「要多少時候才能舉行自由選舉呢？」

「一個月以內」，莫洛托夫回答。

可是這選舉一直要到廿三個月之後，才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舉行，而且若照我們的標準

來衡量，是一點也不自由的。

我們到達雅爾達的那天，我聽說國務院草擬了一個對各解放區的文告。最初，總統對文告的措辭不甚贊同，但是我對此事倒頗為關切，于是就根據了總統的意思，和國務卿史退了紐斯及其他國務院人員會商後，重新草擬了一份，得到了總統的同意。以後，艾登外相和莫洛托夫外長也添加了不少修改，于是這宣言就送呈三巨頭。

這宣言提起了大西洋憲草的原則，「任何一國的人民，均有自由選擇其政體之權，凡被侵略之國家，應恢復其人民之主權」。接着說：「三強願意聯合協助各被解放及前軸心附庸國家處理下列各項亟待解決之問題：（一）促成國內和平，（二）施行緊急救濟，（三）建立包括各民主份子之過渡政府，由該政府協商組織永久政府，（四）必要時促成舉行普選」。

三巨頭迅即一致表示同意。我們想，至少在這一點上，總算大家是一致了，誰知道以後蘇聯和我們對於這個宣言的正確解釋，却又意見紛歧，直至于今呢？

對於這個宣言的討論是很簡短的。史達林開始就表示：「大體說來，我贊成這個宣言」。羅斯福請他注意關於促成普選的條文，史達林立即回答：「我接受這一條」。

羅斯福說：「波蘭就應當是第一個適用這一條文的例子……我希望波蘭的選舉要毫無問題，像凱撒的妻子一樣。我不曉得凱撒的妻子究竟如何，可是大家總說她是完全純潔的」。

史達林微笑着說：「的確，人家是這樣的批評凱撒的妻子，但是，事實上，她恐怕也有些毛

病」。

我們的確以為這宣言是向前走了一步，但這一步走得太軟弱了。

美國的羣衆們對這個宣言加以熱烈歡迎。各報社論一致稱頌。自從雅爾達會議閉幕迄今，這宣言一向是蘇聯和我們爭執的根由。但是根據了這一個宣言，我們可以昭告世人，蘇聯在東歐的一切行動，是違反了他們自己的誓言的。就這一點而論，這宣言還是有些用處。

一九四三年十月，美國國務卿赫爾首次帶了一個聯合國機構的計劃到莫斯科。一九四四年秋天鄧巴頓橡樹會議結束時，這計劃大體已獲決定，留待商討的主要之點祇有安全理事會表決的方式問題。蘇聯代表團堅持安理會的一切決議都應經各大國的一致同意，我們也贊成有關需要美軍行動的議案，必須先經我國贊同，可是始終沒有想到否決權竟可以在隨便什麼事情上都能應用的。

羅斯福擬訂了一個折衷方案，這方案一方面由他私人函告史達林，一方面由國務院備就詳細說明，送交英、蘇二國外交部。方案的內容是：安理會在調處二國間爭端，而其中一邊係安理會常任理事之一者，則此常任理事國應無投票權。

雅爾達會議的第二天，史退了紐斯國務卿正式提出了這個建議，羅斯福總統隨即要求即予討論。到一九四七年春天，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到原子能管制時，英、蘇代表對否決權之使用頗有爭執。否決權既已成為聯合國機構中的爭執最烈的一點，我想也許可以把當年雅爾達會議討論這問

題時的速記紀錄的要點，在此地記述一下。

當時，美方在提出建議時已說明了立場，故關於本案的討論主要是英、蘇雙方發表的意見。

邱吉爾和史達林的話大致如下：

邱吉爾：「世界和平繫于三強之永久合作。但是我們以為，三強也應當在某種限度之內，接受全世界的意見。譬如說，假定中國提出了香港問題，我們英國當然應當有權陳述我們自己的立場。假使我們以為把香港交還中國是一件不對的事情，當然我們不該把香港還給中國。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不給中國以充份陳述他們那一方面的理由的機會，我覺得那是不對的。我們贊成美國的建議。三強不自居于世界統治者的地位，而肯讓世界其他各國的人民也有發言的機會，我們覺得很好」。

史達林：「我還想把這個建議仔細研究一下，剛才祇是聽見讀一遍，一時不易下結論。我以為根。鄧巴頓橡樹會議的決議，不但決定每一個國家都有發言之權，而且也規定了凡是一國提出了一項重要問題之後，即應就該問題成立某種決定。我相信，在座各代表，一定沒有一個還會懷疑到聯合國大會的每一代表是否都有發言權。邱吉爾先生以為中國如果提起香港問題，中國祇要能發表意見，便已滿足。邱吉爾先生也許錯了。中國是會要求就這一問題獲致某種決議的。埃及亦然。埃及不會空是表示意見，要求辭讓蘇彝士運河，她也會要求成立決議。所以，這問題是很嚴重的，不止轉述意見而已。我也想問邱吉爾先生，難道

做世界統治者，我要他提出名字來。我確信英國是不願做世界統治者的。三國之中有一國已經洗刷了嫌疑。我知道美國也是不願統治世界的，所以在蓄意統治世界的國家中又除去了一國」。

邱吉爾：「我可以答覆嗎？」

史達林：「等一等。強國應在何時接受關於可以洗刷他們蓄意統治世界罪嫌的條文？我要研究一下這個文件。在目前，我還覺得不大明瞭。我覺得這一點比歷各國發表意見之類要嚴重得多」。

邱吉爾：「我知道三強國在今天出席代表它們的領袖之下，我們是可以認為安全的。但是這些領袖未必都能永久長生。十年過後，我們也許已經不在了，接着來的是新的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可怕的戰事，他們也許會忘了我們這一代所遭受到的一切。我們至少要確保和平五十年。我們已經建立了這樣一個格局，擬具了這樣一個計劃，我相信後一代的爭執，可以由我們自己來盡量代為解決了」。

史達林：「目前的任務就是要確保我們將來能永久團結一致，爲了這個目的，我們現在必須獲致就這一點的協議。未來的危險就在于我們自己之中會不會發生衝突。如果我們能團結一致，德國將來的威脅是不足慮的。現在我們該開創一個局面，包括我們此地代表的三強，還有中國——」。

邱吉爾：「——還有法國」。

史達林：「對，我們該結成一條聯合陣線，我應該對與會諸君道歉。我近來因為別的事情極爲忙碌，所以沒有功夫對這一個問題仔細研究，我對美國這個建議的看法，它的意思是要求把一切國際爭執分成二類——一種是需要軍事制裁的爭執，一種是可以不經軍事制裁而用和平方法解決的爭執。據我所了解，在考慮到第一種即需要軍事制裁的爭執時，爭執兩造之一方如爲永久會員國，仍應有投票權。而處理第二類即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爭執時，爭執兩造之一是無權投票的。我們把投票的程序看得太重了。誠然，一切問題都是靠投票決定的。我們所關心的是決議而非討論，如果中國是永久會員國，要求歸還香港。我可以確切告訴邱吉爾先生，中國是不會孤獨的。在大會之中他們會發現許多朋友，埃及的情形亦復如此」。

邱吉爾：「到那個時候，我可以說『不成』。我應當有權宣布：在未經我們同意前，世界安全機構不得有不利我們的行動」。

史達林：「這又是一個危險之點，在莫斯科，我的同事們總不會忘記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的時候，英法利用了國際聯盟來反抗我們，最後是把它們排除了出來，使我們孤立」。

羅斯福：「史達林元帥如果需要充分的時間研究這個建議，當然是可以的」。

史達林對於安理會表決程序的建議，竟然連讀都不肯讀一過，實在使我深感困惑。這個建議

還是十二月五日航空寄給他的，而討論的時候已經是二月六日了。我不禁想：如果在這六十三天中他還沒有把這個問題弄清楚，那麼他對聯合國機構之不感興趣也就可想而知。

到一天，莫洛托夫宣布蘇聯已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是我的疑慮迄未消釋。

接着討論的是那些國家可以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史達林說：「我有一張對德宣戰國家的名單。他們應當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其中有十國是和蘇聯沒有外交關係的。」作者按：此十國大多為「南美國家」。我們將來聚首一堂，原是想建立國際安全，如果他們和我們根本上連外交關係都沒有，試問又怎樣談得到國際安全呢？今天的會議中，這一件倒可以討論一下」。

總統說：「我想這些國家之中，多數是願意和蘇聯訂立國交的，他們祇是一時遲來不及先這樣做而已。而且，我們這一點也要認清，從勃里頓森林會議起許多次會議中，很多至今還沒有承認蘇聯的國家，也會和蘇聯的代表坐在一起商討」。

史達林說：「誠然，但是要談到國際安全的時候，這就有些困難了」。

羅斯福說：「要建立完好的外交關係，我看最好的辦法就是邀請他們一同來，我會函告拉丁美洲六個國家的總統，如果要加入聯合國，便應當對德宣戰。厄瓜多就這樣做了，巴拉圭在一星期或十天之內宣戰，祕魯和烏拉圭不久也要這樣做，如果他們宣戰後還不許他們加入，我看不大妥當。而且，在作戰時他們也給我們不少幫助，我們製造軍火的許多原料，都是他們供給的。所以，我很覺得為難。除此之外，還有少數會和我們合作的國家，他們會對德斷絕邦交，但是沒有

宣戰」。

史達林問：「阿根廷如何？」

羅斯福說：「阿根廷是不在其列的」。

史達林說：「但阿根廷也曾和德國絕交呀」。

羅斯福說：「但是我們並不認爲是和我們聯合在一起的」。

史達林說：「我並不是幫阿根廷說話。我不喜歡他們。我不過是怕自相矛盾而已。如果我們邀請宣戰的國家，同時也邀請沒有宣戰的國家，那末阿根廷一類國家的地位，就發生了問題。土耳其等國也會來罷」。

羅斯福說：「那末我們就邀請那些準備宣戰的國家」。

史達林問：「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宣戰呢？」

羅斯福說：「馬上宣戰。你定一個時限罷」。

史達林說：「那麼，三月一日如何？」

羅斯福說：「好。就是三月一日」。

邱吉爾也贊成這個決定，他提起了土耳其，他說土耳其之至今中立，是我們鼓勵他們這樣的。史達林雖然有些不願，終于也表示同意了。

一等到蘇聯正式宣布接受羅斯福總統關於安理會表決程序的建議之後，莫洛托夫立即宣佈：

希望白俄羅斯、烏克蘭、萊多尼亞能加入聯合國。他說無論如何至少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總要加入的。史達林也為此發出了有力的呼籲。

邱吉爾支持蘇聯這個請求，他說：「我嚮往白俄羅斯，他們浴血打倒了暴君」。

羅斯福總統不願同意，但是不便反對史達林和邱吉爾的意思，他於是建議這問題交外交會議或大會中繼續討論，大家並無異議。可是在下一天下午，總統在會議中宣讀了外長會議的一份報告。其中有一條是有關聯合國的會籍問題的，報告中說，「英美代表願支持准許兩個蘇維埃國家入會的建議」。

這個報告也通過了。

我後來知道，艾登外相爲了想把所有不列顛帝國各自治領都列入會籍，包括尙未成爲自治領的印度在內，所以支持蘇聯的建議。史達丁紐斯國務卿因之也表示同意了。

我覺得這辦法很不好。會後就極力向總統進諫。我提醒他，在我們離開華府之前，他曾告訴許多國會議員，如果蘇聯要叫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加入聯合國，他就一定要堅持美國的四十八個州每一州都成爲聯合國的會員，因爲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我們的州比較起來，不見得有更大的自主權。

我回想到當年國際聯盟的情形。當時，英國和他的各自治領得一票，一總有五票之多，美國如果加入國聯就祇有一票。這是反對美國加入國聯的最堅強的理由之一。現在，蘇聯一舉手已變

得三票。所以我力勸總統要求，至少美國應擁有和蘇聯相等的票數。總統說恐怕已經太遲了，但他願意加以考慮。

霍浦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也勸總統堅持美國應得三票，否則蓋撒爾對這兩個蘇維埃國家入會的同意。總統終於告訴我們，他將這件事通知史達林。二月十日，我在捷爾達的最後一天，總統寫了一封信給他，要求票數均等。第二天，史達林告訴總統說，「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加入聯合國後，蘇聯的票數已有三票，所以美國要求增加票數，是非常合理的。美國也可以有三票。必要時，我可以在討論時正式支持美國這個建議」，他完全表示同意。

羅斯福總統也徵求邱吉爾的意見，邱吉爾說，關於美國要求和別的國家平等的任何建議，他無不竭力擁護。

我回到華盛頓時，桌子上有一封霍浦金給我的電報：

「票數問題，總統獲英相及史達林元帥極滿意之答覆，此事擬不予公開發表，總統願足下嚴守機密，即對親信亦勿透露」。

我想這件事的守秘密一定有原因，就遵從這個要求。

到舊金山會時，總統和他的顧問們決定，票數問題不向大會提出。這件事他沒有和我討論過，所以我不知道他何以忽然又改變初衷。不過雖然蘇聯有三票而我們祇有一票，輿論的反對倒的確並沒有我當初想像中之劇烈。可是這件事造成了先例。蘇聯集團的代表們得寸進尺，在二十

一國會議中堅持一切提案均需以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他們祇要八票就可以推翻任何提案，而他們本身就先有了三票。

後來，我又突然碰到了雅爾達會議的另一協議，這就是所謂雅爾達密約。爲了要蘇聯加入對日本作戰，要把千島羣島「移交」給蘇聯。還有，「俄國因一九〇四年遭日本卑鄙之襲擊而損失的權利，應當予以恢復」，還列舉了這些權利，如庫頁島南部歸還蘇聯，大連港之國際化，旅順應借租給蘇聯作爲海軍基地，中蘇共管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等等。有關中國領土的部份，美國應運用其對中國的勢力，使中國政府同意。

我以前不曉得有這一個密約，我不知道這密約的原因是大家可以了解的。那時的國務卿是史邁丁紐斯先生，不是我。

那時，因爲華府的公務待理，總統叫我和金氏上將於二月十日先回去。我們以爲會議在那天晚上就可以結束，總統自己大概過一天也就可以回華府。可是那天下午，史達林留總統多耽擱一天，他說還有要事亟待商量，總統答應了，關於千島羣島的事，是由三巨頭私人會商決定的，並沒有正式開會討論。在二月十一日，他們簽訂了包括這一協議的全部密約，如果那一天我還在雅爾達，我也許會知道這件事。

總統回來後也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那份密約也就鎖在白宮中他的保險箱裏面，到那一年的初夏，我知道羅斯福總統會勸導中國對旅順，大連及鐵路等項作種種讓步。一直到我做了國務

辦，才從一條莫斯科發出的新聞中略知風聲，我立即從事調查，于是知道了全部密約的內容。我把這件事告訴杜魯門總統，總統就通知李海上將，把白宮中一切有關外交的文件全都移交國務院。我想查一查我們到底對別的國家簽出了多少借據。

在衡量羅斯福總統當年簽訂這些有關太平洋局勢的文件時，我們必需明瞭當時的局勢，才能知道羅斯福總統的做法是否明智。那時正是德軍在西線發動大反攻之後的六個星期，雖然我們在東西兩線都有進展，但德軍究竟還能堅守多少時候，我們在德軍投降前還需要多少傷亡，那時是誰也不能預知的。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的時候，盟軍聯合參謀本部的首長都在總統左右，他們是瞭解當時的局勢的。

很清楚的，這個協議大體是一種軍事上的決定，各軍事領袖對日本登陸戰的計劃已在進行之中，總統無疑的一定從這計劃中獲悉蘇聯之是否參戰，對我們軍力的損失能發生何種影響，他們當然希望蘇聯參戰，在北戰場牽制日本的兵力。但是，史達林一聽說日本登陸戰的計劃已在進行草擬，他立刻就知道我們一定要借重他的軍隊，可以提條件了，史達林討起價來是從來不會吝嗇的。

羅斯福總統把這個協定嚴守秘密，也並無可議之處，那時蘇聯還是和日本有條約關係的，我們自然不好宣布蘇聯準備對日作戰。而且，那時蘇軍的主力集中在德國戰場，如果這個協議略有走漏，日本軍隊立刻就會侵入蘇聯邊境，所以爲了大家的利益，我們同意讓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九

十天內，把德國戰場上的軍隊調至遠東。所以，史達林和羅斯福一定要把這黨議保守秘密，是應當的。

會議結束的時候，史達林大宴賓客，據當時報紙記載，有一個細心的美國客人曾數了一下，從始至終，一總乾杯了四十五次！我有些相信這個話，不過我覺得需要說明，否則大家一定以為我們都醉得人事不省了。事實是，「乾杯」的時候，大家祇把嘴唇碰一碰杯子，有時也稍為喝一小口。這一頓飯吃了四個鐘頭。四小時內喝四十四小口酒，同時還有以維持二十四小時不致飢餓的茶，大概誰也不大會醉。我就一點酒也沒有喝。

當我們喝湯的時候，我看見維辛斯基先生把開水倒在伏特加酒杯裏。伏特加的顏色是和水的顏色一樣的，我就想，他既能以水充酒，我為什麼就不可以。等到大家立起來乾杯的時候，我就乘機倒開水到酒杯裏去。報上說很有幾個蘇聯官員喝得大醉，但是我倒要說一句，我所碰到的幾位都非常清醒。在任何宴會中，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蘇聯的代表喝醉了酒。

大家紛紛致祝辭時，史達林有一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戰時是大家容易團結在一起的，因為我們有同一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真正困難的工作是在戰後，各人的利害關係，可能使盟國間發生裂痕。我們之間的關係，在戰後要與戰時同樣的親密。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可證明他預言的準確性，關於我們責任的那一點，我是贊同他的見解的。

雅爾達會議的經過，是在二月十二日下午，在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同時公布的。所有盟國一致稱頌，美國的輿論尤其熱烈。費城「紀錄報」說，這是「聯合國最大的勝利」。紐約「先驅論壇報」說，這一件事是「盟國團結一致的又一個證據，它表示了盟國的壓倒的力量」。「時代」雜誌稱：「三強能否在和平的時候像戰時一樣的合作無間，至今已令人深信不疑了」。

我當時的感想也是如此，毫無疑問的；英、蘇、美三國的交誼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但是，當羅斯福總統剛剛回到了美國的土地的時候，這個高潮已經在開始慢慢地低落了。

第三章 局勢開始轉變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回到了美國以後，有許多繁重的工作要幹。當時人力至感缺乏，所提出的「全國服役法案」，是有關各方面爭辯的主題。鑒於歐洲戰事快要結束，我們全部的生產計劃，都得重加審查。歐洲勝利後的租借計劃，剩餘物資的處置，及緊急救濟計劃，都在擬訂中，全國工業從戰時轉變到平時的政策也在計劃中。

在我出國時期，由於局內同人的努力，這些計劃已大有進展。由克萊將軍(Travis D. Clegg)主其事，紐約的一位工業家希爾斯(Hedberg)予以襄助。

在前一年六月，國會討論將「戰時動員局」擴充為「戰時動員及復員局」法案時，我就聲明我將不參加戰後的工作。當時我們認為，在歐洲戰事結束以前，關於復員工作沒有甚麼可做的。但是，當我們從雅爾達回來以後，我們立即決定工作的重心，應該從動員轉移到復員。

所以，我必須考慮到辭職的問題。因為將來執行復員工作的人，應該參加草擬復員的計劃。至於提出辭呈的時間，頗傷腦筋。我們知道歐洲的勝利，為時不遠；不過華盛頓方面所清楚的事情，歐洲的士兵也許還不太瞭解，他們還須打通萊茵河呢。我不願意為了國內的便利，而

給前方將士一種誤解，而認為負責國內工作的人，缺乏努力和熱情。

到了三月中，我們已經在萊茵河東岸獲得據點，而德軍當局建議在瑞士聯談，商量義大利境內德軍投降的問題。到了三月二十三日，美軍開始渡萊茵河，我覺得再不能拖延辭職的日期了，於是我向總統提出辭呈，要求自四月二日起辭職。

羅斯福總統勸我繼續幹下去，我提醒他說，去年秋天他曾經答應我，歐洲戰爭結束以後，我可以歇手。我告訴他說，我離開最高法院，僅是擔任戰時的工作，我不願意擔任平時的局處首長。將來負責指揮復員工作的人，應該參加草擬該項計劃。所以現在必須換一個人來幹。

我們討論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德國佔領工作計劃。羅斯福總統知道陸軍部計劃派陸軍次長麥克勞埃，(John J. McCloy)到德國去主持佔領工作。我告訴他麥克勞埃決定和史汀生部長同留國內，陸軍部已另選我的副局長克萊將軍。出乎我的意外，他並不知道克萊將軍。我告訴他，克萊將軍是陸軍官員中，對於一般人民觀點最瞭解，最明白的一位。羅斯福總統叫我陪他來談。當日總統要去海德公園，不過下星期去溫泉時，將在華盛頓耽擱一天，我們就決定在那一天三個人會面。總統到海德公園不久，就打電話給我，請我重行再考慮辭職的事。但我仍舊決定不幹，他叫我推薦一個繼任的人，我介紹文森法官(Fred M. Vinson)，他曾接替我，繼任經濟平衡局局長。總統表示同意，並且說，等他回華盛頓以後，我們再討論。

總統回來的那天，非常煩躁不安。我們談話的時候總統說，他很高興成派克萊到德國去，因為

克萊是位工程師，總統問他，對於在中歐建立一個 T. V. A.，發展電力，解除煤荒，有甚麼意見？總統告訴我他將任命文森擔任我的工作，因為他在離華盛頓赴溫泉以前，還有一些事，叫我先告訴文森，他等一些時，再打電話給文森。

在等候文森法官的正式任命期間，我和總統通了幾次電話，（我有一條直接通到溫泉的電話線），他說身體好些了。

四月八日，我回到斯巴坦堡。四天以後，無線電中傳出了消息，羅斯福總統逝世了。

海軍部長爾萊斯特打電話給我，他派他的飛機到斯巴坦堡來接我回華盛頓，因為他想，在那幾天中，也許我可以盡一點力，並且他知道，我要參加總統的葬儀。

次日清晨，我去見杜魯門總統，他因突然落到肩頭的重任而感到困惑，但很快的就龍飛鳳舞他的處境。當天下午，我又回到白宮，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和他同車去接故羅斯福總統的遺體，運往海德公園。

在回華盛頓的火車上，杜魯門總統和我談論了很多事情。因為我辭職不過數天，所以我還能夠告訴他許多國內國外重大的問題。在這次談話中，他希望我能代表他出席將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

我告訴他，我雖然非常高興擔任他的代表，不過這樣做是不合式的。因為當時代表團已任命了，其中有若干非常能幹的人物。根據以往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再加派一個總統個人的代

裏，往往要引起代表團極大的不滿。杜魯門總統同意了我的意見。

次日，他告訴我，他想任命我爲國務卿。我不願意在和平時期，擔任從事復員工作的首長，不過，我却願意參加促成和平的工作。我說願意接受這種任命，我們同意等舊金山會議結束以後再宣佈。

也許沒有任何一位新的總統，像杜魯門那樣，在最初上任的暴風期，遭遇到那些大事變。德國的崩潰與投降，舊金山會議的召開，都是世界矚目，全世界都爲勝利所震動，對於未來充滿了無窮的希望。

不過，參加雅爾達會議以後，我們這些熟悉蘇聯活動內幕的人，在希望中混雜着重大的心事。

在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前，事實上，在他從雅達爾回來之後，和蘇聯方面就發生了一些困難，兩大主要難題是波蘭和羅馬尼亞。

在「被解放的歐洲宣言」中，美英蘇三國同意「在被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的時期中，三國政府採取一致政策，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舊軸心附庸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並更進一步，說明三國政府「將聯合協助該區人民」成立臨時政府，容納民衆中一切的民主份子，並確保儘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舉，建立充份代表民意的政府」。最後並稱：「當三國政府認爲歐洲任何被解放國家或前軸心附庸國

的情況，有採取這類行動的必要時，當即履行本宣言中所列舉的共同責任。」

不過，在二月二十四日，離雅達爾會議不過兩星期，羅馬尼亞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美英代表，要求召開一次會議，被蘇聯主席拒絕。同一天，哈里曼大使受命通知蘇聯政府，美國希望羅馬尼亞的局勢，能够在盟國管制委員會或由三國更高當局咨商，獲得有秩序的進展。

三天以後，蘇聯的答覆到了。莫洛托夫的副手維辛斯基到達羅馬尼亞京城，要求取消當時的拉第斯古（Radean）政府，成立新羅馬尼亞政府。同時，莫洛托夫通知美國大使稱，拉第斯古政府不能維持治安及履行停戰協定，盟國管制委員會應採取適當措置，並通知各盟國。

哈里曼大使奉命立即通知蘇聯政府，美國不能同意由一黨代表組成的羅馬尼亞臨時政府。訓令中並稱：應該採取措施支持現政府維持治安，並應根據停戰協議，予以新聞自由；所有政黨全應解除武裝，對於主要政治問題，應由盟國管制委員會三國協商。

莫洛托夫回答哈里曼稱：維辛斯基現在羅馬尼亞京城，三強可以協商。

三月五日，美國大使以照會一份交莫洛托夫，說明拉第斯古政府是三國政府直接協商所議定。他通知莫洛托夫稱，盟國管制委員會的蘇聯代表沒有以情報供給美國代表，同時蘇聯的軍事當局削減了拉第斯古政府維持治安的力量。

當美國大使和蘇聯外長在莫斯科交換意見的時候，維辛斯基於二月廿七日到達羅爾，要求當晚會見羅王。羅馬尼亞國王和外相接見了他。維辛斯基稱，拉第斯古將軍不能維持治安，蘇聯政

府並不願意干涉羅馬尼亞內政，但是有責任使後方安寧，所以要求立即撤消拉第斯古政府，而以真正代表該國民主勢力的政府代之。羅王表示對於他的要求將予以考慮。

美國在羅京的政治代表拜里 (Pharon Y. Berry) 會見不到維辛斯基。於是他以書面把美國的意見通知維辛斯基：在三國協商之前，不能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根據拜里的報告，維辛斯基次日要求謁見羅王，詢問羅王對於前晚建議的決定。羅王答稱：已將此事通知拉第斯古將軍，並徵詢各政黨領袖意見，以便另選內閣總理。維辛斯基認為這種答覆不滿意。他看了看他的手錶，向羅王說，他只有二小時另五分鐘就得公佈拉第斯古將軍免職。到了八點鐘，維辛斯基加重地說，羅王必須公佈繼任繼閣的人選。

羅馬尼亞外長告訴維辛斯基說，羅王是立意君主，必須根據憲法行事；他必須和各政黨領袖商談，根據他們的建議，挑選組閣的人物。維辛斯基說，拉第斯古包庇法西斯份子，利用勅令使十名將官退休，對蘇聯政府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爲。該項勅令必須撤消，羅王在這一點上表示讓步。維辛斯基離去時，他狠命的把門關上，門樑上的灰泥都震裂了。這要責一直沒有補好，可以作為維辛斯基情緒和手勁表現的例證。

羅王宣佈，他請斯特貝王子 (Prince Serbey) 組織新政府。斯特貝王子想接受，但他無法使共產黨參加。不久，維辛斯基告訴羅王稱：蘇聯政府認為共產黨領袖羅榮 (Peter G. R) 是適當的繼任人選。不過，羅王仍在繼續和政黨領袖會商。到了三月一日晚，維辛斯基又往見羅王，

重中蘇聯政府希望任命葛羅榮組閣。於是羅王決定命葛羅榮組織新政府。

因為葛羅榮第一次所提出的內閣人選不能代表人民，羅王加以拒絕。維辛斯基又警告羅王，說是取消葛羅榮所挑的人選，是對蘇聯的一種敵對行爲。維辛斯基說：假使在第二天下午，羅王仍不接受葛羅榮政府人選，蘇聯對羅馬尼亞的獨立將不負責。

同時，葛羅榮宣佈：蘇聯答應大大改進蘇羅兩國關係，交還羅馬尼亞交通控制權，自匈牙利騷擾外錫爾凡尼亞，減輕停戰條款等。結果，羅王於星期一召集各政黨領袖，請他們不必做政治上的考慮。支持他接受葛羅榮政府。

各政黨領袖表示不能同意，有人勸羅王禪位。羅王表示他將爲人民服務，不擬離去。到了星期二晚（三月六日），葛羅榮政府宣誓就職，而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也隨即到達羅京，他和維辛斯基同時謁見羅王，表示如果後方不安定，他們無法集中力量在前線作戰。羅馬尼亞政府過去沒有能够維持治安，以後，不能再如此了。

在三月七日，葛羅榮政府成立以後，莫洛托夫通知莫斯科的美國大使，說是他三月五日照會中的問題，已不成立，羅馬尼亞的危機，已因新政府的成立而消除了。

到了九月裏，我在倫敦的時候，莫洛托夫敦促美國承認羅馬尼亞政府。我告訴他說，美國不承認葛羅榮政府，因為它是由維辛斯基向羅王提出，限二小時半答覆的莫的美救國會成立的。莫洛托夫那時承認維辛斯基「幫助新政府的組成」，但稱蘇聯政府必須這樣做，「因為有發生嚴重

混亂和內戰的危險」。

這些發展情形，當然全都有報告給羅斯福總統。結果，總統調令哈里曼大使，向莫洛托夫建議，在羅京成立聯合委員會，保障「被解放歐洲宣言」中各原則的實施。莫洛托夫斷然拒絕這種建議。在三月十七日的照會中，他說沒有採取行動的必要，美國的建議將削弱盟國管制委員會。並稱：委員會中美國代表從未徵詢意見一點，並非事實。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盟軍將迫近柏林的時候，羅斯福總統不願以公然分裂的姿態，給敵軍一種幫助和快慰。總統告訴我說，對於未來，他抱着極大的隱憂。他決定仍由哈里曼大使向蘇方提出抗議，等到一切方法都無效以後，再由他直接和史達林交涉。

一九四四年秋，邱吉爾首相曾借外相艾登訪問莫斯科，當時並沒有正式的協議，不過雙方有一種非正式的諒解，如果英國認為必須採取軍事行動壓平希臘的內亂，蘇聯將不予干涉。另一方面，英國承認蘇聯在維持羅馬尼亞治安方面，有領導權。

英國極不贊成蘇聯在羅馬尼亞的行動，但他們不願意首先向史達林提出抗議。羅斯福總統認為羅馬尼亞的情形，並不是美蘇關係最好的試驗。英國和美國，在羅馬尼亞並沒有武裝部隊，它完全是在紅軍控制之下。蘇聯必須保持一條交通線，從它本國，經過羅馬尼亞，直達德國境內的紅軍，總統知道，蘇聯將指這種行動是保護紅軍所必需的。而且蘇聯也知道美國無法獲得其他情報，來駁斥蘇聯的說法，因為羅馬尼亞完全在紅軍控制之下。羅斯福總統覺得蘇聯在波蘭的行動

動，更明顯的違反雅爾達協定。

雅爾達協定中，關於波蘭的決議是這樣的：

「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卡爾，受命以一個委員會的資格，首先在莫斯科和現在的臨時政府委員，與波蘭國內外其他波蘭民主領袖進行會商，以便根據上述方針，改組現政府。」

三月二日，羅斯福總統在國會聯合會議發表了樂觀的報告以後，接到了哈里曼大使的來電。他報告說：莫洛托夫堅持只有波蘭臨時政府（盧布林政府）推荐的波蘭人，才有資格和委員會協商。莫洛托夫的名單中，從倫敦波蘭流亡政府邀請到莫斯科會談的，只有一個人是和美國所開的名單相同。他斷然拒絕邀請波蘭農民黨領袖米柯拉葉齊克（Michalczak）。米氏參加倫敦波蘭流亡政府，曾由羅斯福總統推薦給史達林。

莫洛托夫堅持盧布林政府應該是全國統一臨時政府的「核心」。委員會中的美英代表，否認這種解說符合雅爾達協定的。他們指出雅爾達協定中所規模的，是一個「新」政府，並不是擴充盧布林政府。這種僵局的後果，是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不得和史達林元帥直接商談。

三月下旬，邱吉爾向羅斯福表示，雅爾達協定已被破壞，如不改變這種局勢，難免有嚴重的後果。三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覆稱：自雅爾達會議以來，他也以「焦慮和關切的心情，注意蘇聯態度的發展」。他並說他「非常明白目前情勢的危險，不僅是當前的爭執，還有舊金山會議以及未來世界合作等問題」。在這份覆文中，還附有一份羅斯福總統給史達林元帥的電文草稿。

羅斯福總統於四月一日致電給史達林元帥，邱吉爾首相也致電史達林，支持羅斯福。

羅斯福總統的電文開頭，說明自雅爾達會議以來，對局勢發展的關切；對於未能實施雅爾達協定，表示遺憾。特別是關於波蘭問題。並且說：他「不了解蘇聯的「毫不關心的態度」。他覺得事情的根源，起於蘇聯對雅爾達協定的解釋，認為新的臨時政府，無論如何總是現在華沙政府的繼續發展。但不論根據協定條文，或是簽訂協定以前的討論，這種解釋都是不符事實的。總統並說，他必須向史達林元帥解說明白：「任何一種解決辦法，倘結果僅是一種現政府的繼續，根本不能接受，且將使美國人民認為雅爾達協定失敗」。如果委員會挑選波蘭人到莫斯科的權力受到限制，則雅爾達協定的基礎已被破壞。羅斯福總統說，他決不否決莫洛托夫提名參加協商的波蘭人，因此美國大使所提名的人，也不應受到反對。他告訴史達林：波蘭應該有最大的政治均勢，各派停止鬥爭。他並且主張：由於責任的重大，委員會中的美英兩國代表，可以到波蘭去訪問。

羅斯福總統指出，解決波蘭問題，對於國際合作的成敗，關係重大。否則在雅爾達所考慮到的，那些妨礙盟國統一的困難和危機，將更趨嚴重。

關於羅馬尼亞，羅斯福總統說，他不懂為甚麼那一方面情勢的發展，未能和雅爾達協定中「被解放歐洲宣言」所規定的條款相符。他請史達林親自查閱兩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往來照會。

到了四月七日，史達林的覆文到了，承認波蘭問題已成僵局。但稱，這是因為美英兩國大使

背棄了雅爾達協定。他說，他們認為目前已存在的臨時政府，應該根本解散，另外組織一個全新的政府。哈里曼大使並在委員會中說，在波蘭全國統一政府中，可能連一個波蘭臨時政府份子也不包括在內——哈里曼否認他說過這種話。

史達林認為三強在雅達爾同意自波蘭邀請五人，倫敦邀請三人參加協商，但英美兩國大使則主張，可以無限制地自倫敦和波蘭邀請參加的人。史達林說，被邀請的波蘭領袖，必須承認雅爾達協定，包括寇松界線，並「真正努力建立波蘭和蘇聯的友好關係」。只要懂得史達林所謂「友好關係」的解釋，就可以知道這是指一個領袖，肯建立一個聽命於蘇聯的政府。

史達林給邱吉爾的覆文中說，他可以撤消反對邀請米柯拉萊齊克，不過米柯拉萊齊克必須公開聲明承認雅爾達決議，並擁護建立蘇波友好關係。對於美蘇觀察家訪問波蘭，史達林則加以拒絕，說這足以損壞波蘭國家的尊嚴。

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決定聯合致覆史達林，但在國務院和英外交部準備聯合覆文時，羅斯福總統逝世了。

在 月十一日，義大利方面的盟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元帥，自戰略局方面獲悉，凱塞林將軍和若干其他德國將領願意在瑞士商談，義大利境內德軍投降問題。聯合參謀部核准亞歷山大的計劃，派遣他的副參謀長到白恩去，但必須在通知了蘇聯以後。哈里曼大使把這事告訴了莫洛托夫後，莫氏稱：蘇聯政府願意參加這種商談，將派三名紅軍軍官參加。於是，蘇聯參謀總部通知蘇

聯政府，說明在白恩並沒有甚麼特別任務，不過是安排在義大利卡賽他（Cassino）盟軍總部舉行的會議，歡迎蘇聯代表到卡賽他來。並說明亞歷山大為該方面的最高指揮官，如果德國要求投降，而帥將負責談判，並作必要的決定。

蘇聯政府答覆稱：因為他們的將領不能參加討論，所以不派代表到卡賽他了。覆文中並堅持談判必須停止。

數天之後，史達林致文羅斯福總統，聲稱：如果在蘇聯戰線上發生同樣情形，他決不致反對英美派代表參加討論。他說，他了解這種談判的重要性，因為它會影響到東線的軍事情況。

羅斯福總統答稱：並沒有進行任何談判，並保證隨時將消息通知史達林。史達林的下一封覆文，大大地觸怒了羅斯福總統。

史達林在文中指稱：所謂商談並沒有進行，顯然是因為總統沒有得到自己將領的報告。史達林並說，根據紅軍顧問給他的情報，商談已經完成，凱塞林將開放德軍陣地，讓美軍前進。爲了報答這種軍事協助，英美雙方同意給予德國較優的和平條件。史達林並指責稱：由於這種協議，德軍已自義大利前線抽出三師的兵力，調到蘇聯方面。而美軍得以在德國境內順利推進。

羅斯福總統不願他個人的反感，發出一封嚴正的答覆。總統指出，德軍從義大利前線抽出三師兵力到蘇聯方面，是在亞歷山大元帥接到德國意欲商談投降一事的好幾星期以前就開始了的。所以此項商談與德軍的調動，根本沒有關係。總統稱：史達林應該信任他的忠誠。艾森豪威爾將

軍決不會在沒有報告他以前，進行和平商談，事實上，並沒有如史達林所說的那種商談。在最初接得德軍要求商談和平時，就已下令，必須隨時把全部消息通知蘇聯。

總統在覆文的最後一段，流露出個人的觀感。他說，對於蘇聯情報員的「可惡的謊言」，他深表憤慨。並稱：蘇聯情報員意圖破壞美蘇兩國的友誼。在盟國勝利即將來臨時，這種破壞統一的機會之存在，無疑的，將造成一幕悲劇。

史達林覆文稱：對於總統的忠誠，他決無懷疑。但仍稱：他相信自紅軍顧問方面所得的情報正確可靠。他說，他有理由相信這種情報正確，因為不久以前，馬歇爾將軍和英軍司令曾好意地通知蘇聯指揮官，說是德軍在某一點集中，準備向蘇聯進攻。但蘇聯將領知道這個情報是錯誤的，德軍的攻擊，將在另外一點上發動。紅軍把兵力集中在他們認為正確的據點上，阻擋了德軍的攻勢。他說美英將領受德軍之騙，但這也正證明蘇聯將領情報的正確。不過，他們感謝美國人的協助。就全文而論，史達林的這次覆文，語氣已大為和緩。四月十一日，羅斯福總統致電史達林稱：這次不幸事件平安過去，他頗快慰。

這時，因為其他的原因，對德商談延期了。同時盟軍聯合參謀總部建議，三強對於各戰線上的投降商談，都應參加，但任何戰線的投降商談，不能因有一強代表缺席而延展。蘇聯軍事領袖對於這種建議表示同意。

史達林的指責，和他顯然相信我們正在秘密和德國商談和平，以及文件中所使用的令人難堪

的文句，深深地激怒了羅斯福。杜魯門總統繼任後，讀到這些文件時，對於羅斯福總統的觀點和所取的態度完全贊同。

就在羅斯福總統接到史達林最後一封函件的那天，他也接到一封邱吉爾的來信。內稱：在最近幾天內，他將在上院中發表關於波蘭問題的文告，而其中不免要討論到對蘇關係。他深盼在此緊急關頭，所發表的言論，不要影響到軍事方面。他徵求羅斯福總統的意見。

雖然當時總統對於蘇聯的態度已大失所望，但他仍保持一種冷靜的態度。他得到一種結論：和蘇聯相處，並沒有一簡單的公式可以遵循。

在四月十二日，他逝世前一小時，羅斯福總統致覆邱吉爾首相稱：「我對於一般的蘇聯問題，總是極可能的予以縮小，因為這些問題差不多每天都在發生，結果多數祇是自生自滅。我們的態度必須堅定，我們所採的方針，是正確的。」

從這一個文件中，我們可以明白，所謂「美蘇關係是自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後而趨惡化」的說法，並非事實。

在雅爾達會議中，羅斯福總統以最大的才智，促進三強會議的和諧。但蘇聯領袖過份估計了總統謙讓的限度，而且無視總統是根據條約而取得和諧，以致擴張的野心，日益顯露。

使美蘇關係惡化的還有兩個原因：在戰時，三強所處理的問題，多是軍事上的。到了戰爭的末期，政治上的問題，日見重要，而政治上的爭執是勝利國間的爭執。羅斯福總統已感覺到這一

點。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他就警告說：「我們消滅敵人的日期越近，勝利國之間的分歧越多」。這就是羅斯福主張在戰事還沒結束時就建立聯合國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和上面這個原因聯帶關係的。由於戰事結束，新聞檢查取消，使得大家都知道了強國間意見的爭執。

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後不久，有一個短暫的時期，大家對美蘇關係又抱樂觀。那是由於哈里曼大使謁見史達林元帥時，要求蘇聯派莫洛托夫出席舊金山會議，獲得史氏的允准。

同時，國務院正在準備關於波蘭的聯合文件，答覆史達林四月七日的來函。這個文件是羅斯福總統逝世前，命國務院準備的，在四月十八日，由杜魯門總統和邱吉爾聯合具名發出。文中否認史達林所稱美英兩國大使要求無限制地邀請波蘭人士到莫斯科參加協商。他們重述羅斯福總統四月一日所發的函件，內稱：「爲遵守協議，委員會應先挑選少數足以代表波蘭人民的領袖，由他們提名，交委員會考慮」。杜魯門和邱吉爾稱：「我們之間爭執的焦點，是華沙政府到底有沒有權利否決參加協商的人選」。在雅爾達協定中，並沒有規定這一點。

莫洛托夫到達華盛頓的時候，杜魯門總統已研究過雅爾達協定，並閱讀了很多羅斯福和史達林往來的信函，特別是那些關於羅馬尼亞、波蘭和白恩事件的花信。他深感到許多所謂協議都被破壞。因此，他召集國務卿，陸軍部部長，海軍部部長，參謀總長和李海軍大將，討論美蘇關係問題。在莫洛托夫訪問白宮時，杜魯門總統對於某一些問題，特別是波蘭的情形，非常坦白的

發表意見。結果，這次會議頗不和諧，而且草草結束。

舊金山會議，從第一天開會的主席問題開始，差不多每一個問題，都得不到協議。十六名波蘭領袖被捕的消息公佈以後，杜魯門總統覺得必須採取行動，制止美蘇關係的繼續惡化。他於是向史達林元帥建議，派霍浦金到莫斯科商談。當時，哈里曼大使正返國向杜魯門總統請示波蘭問題，於是陪同霍浦金回蘇聯，共同參加談判。

他們和史達林元帥的談話報告，是坦白交換意見，同時也充份表現出蘇聯的思想。

史達林稱，他感覺到當德國的戰敗已趨明顯，不再需要蘇聯的助力時，美國對蘇的友誼漸漸冷淡。他舉了一些例子，證明他的這種意見。

他說，美國同意阿根廷參加聯合國，違背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所發的聲明。並稱，他不得不懷疑主要強國間協議的價值，如果這種決定可以受到像洪都拉斯這類國家投票的影響。

他又說，美國支持法國參加賠償委員會是一種侮辱，並企圖輕視蘇聯，因為法國會單獨和德國簽訂和約，准許德軍開入法國。

他堅持：根據雅爾達協定，盧布林政府應該是新波蘭政府的基礎，其他辦法都不合理。並說：「雖然蘇聯人都是單純的，但人們往往誤認為蘇聯人都是傻子」。

對於歐洲戰事結束以後，停運租借物資，他尤感不快。他說，這是極大的錯誤，美國應該了解，只有在友誼的基礎上，美國才能得到蘇聯的合作。

對於德國的海軍和商船，他曾致電給杜魯門和邱吉爾，要求以三分之一分給蘇聯。他說，這一要求不僅沒有得到答覆，而且聽說這建議已被否決。

這些抱怨，是頗使美國當局驚異的。它們表現出極度的敏感，和一種幾乎是直覺的憤慨。

霍浦金對於美國的處境，加以解說。關於德國的船艦，美國認為應該由三強平均分配，所以美國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在將來的三強會議中獲得解決。至於取消租借物資是根據法律，因為租借法案僅適用於戰時。對德戰爭結束，而蘇聯又沒有參加對日作戰，當然必需停止運租借物資。

史達林當即同意霍浦金的解釋。他說，如果能夠先通知蘇聯，就不會有誤會了。因為蘇聯是採取計劃經濟的，事前通知非常重要。

霍浦金告訴斯達林說：最使他奇異的是，蘇聯認為美國政府把租借物資當作一種施用壓力的武器。美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決不需要採用這種方法。對於這點，史達林稱他對於美國的解釋非常滿意。

哈里曼大使對於阿根廷問題，也加以解釋。他說：斯退丁紐斯國務卿，對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得到南美各國家的同意，而莫洛托夫又提議邀請現波蘭政府參加聯合國，在雅爾達協定中當然沒有規定邀請波蘭政府，莫洛托夫這種行動，使南美各國堅持准許阿根廷參加。美國不僅履行諾言，支持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參加聯合國，並拉到南美各國的支持。所以斯退丁紐斯覺得，既然南美各國幫助美國支持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美國也應該在道義上幫助他們支持

阿提廷入會。

史達林僅稱：已做過的事無法改變，這一切都屬於過去。

這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就實歸正傳——波蘭問題，這是霍浦金防蘇的主要原因。

在全部談話中，霍浦金一再強調，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波蘭問題是美國有沒有能力和蘇聯解決共同問題的象徵；如果波蘭問題不能解決，將影響到美國和蘇聯盟國的關係。霍浦金說，美國人民深為驚奇，因為蘇聯對於應該共同處理的問題，獨行其事。他強調稱：美國在波蘭並沒有甚麼利益，僅希望能成立一個真正獨立的波蘭政府，保障基本自由，對蘇友善。

史達林元帥重申他在雅爾達的聲明，蘇聯政府在波蘭擁有重大的利益。他認為在二次大戰以前，歐洲各國的政策，是使波蘭敵視蘇聯，現在不能再容忍這種態度；波蘭必須對蘇友善，必須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他請霍浦金考慮，蘇軍駐在波蘭，必須能保持交通線，必須能行使權力。

在這一項討論中，史達林稱：不論美國願意與否，因為美國是一個世界強國，必須擔負全責的責任。

關於國內外的波蘭人士，那一些應該邀請到莫斯科來參加協商的事，討論很多。並考慮建立一個能執行雅爾達諾言，實施自由選舉的臨時政府。

在歷次的會談中，史達林表示，他認為美國秘密支持敵視蘇聯的波蘭人，或與該派有關係的

人物。霍浦金堅決保證，美國並沒有這種意思，如果名單中有這兩類波蘭人，將即予剔出，不加考慮。

史達林同意邀請米柯拉葉齊克，於是，波蘭委員會的人選乃得協議。結果，組成了一個新政府，保證採取自由選舉。根據新政府的諾言，通過波蘭加入聯合國。

當哈里曼和霍浦金與史達林會談的時候，舊金山會議中，正在爭論議事秩序問題。蘇聯代表堅持：倘沒有五個永久會員國的一致投票，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議的問題，不得加以討論。這就是說，連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也受否決權的拘束。會議中大多數國家，認為已陷僵局。

有一次，美國前駐蘇大使台維斯和我與杜魯門總統會談。台維斯報告與他赴英倫有關的一切事情。總統稱：他對舊金山會議中的僵局，頗感焦慮。我說，不妨利用霍浦金在莫斯科的便利，直接告訴史達林元帥，美國認為否決權不應該用到議事程序上。

結果，史達林通知莫洛托夫，說這件事無關宏旨，應該接受美國的意見。

霍浦金談話所得的協議，解決了以前九天會議中的僵局。

美國所焦慮的，不僅是波蘭和羅馬尼亞問題，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四月十八日，蘇聯邀請其他盟國遣派代表到維也納。但又稱，在歐洲諮詢委員會對於維也納佔領區劃分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他們不能啓程。英國支持美國的意見，說是在各國代表沒有到維也納之前，劃區問題無法解決。最後，在五月十九日，史達林同意英美代表可以赴維也納，觀察當地情況，不過關於劃區

問題，由歐洲諮詢委員會解決。等到我們的代表到了維也納以後，蘇方不准他們出市區一步，而且沒有多久，就下令他們在六月十日或十一日離開維也納。

我們仍擔心舊金山會議中的爭執，莫斯科賠償委員會所遭到的難題，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的意見分歧，狄托元帥在特里斯特區置張行爲，以及伊朗、希臘、土耳其等國的緊張局勢。

舊金山會議的圓滿閉幕，是召開未來三強會議的一大樂觀因素。在臺灣金訪問莫斯科期間，蘇聯同意於七月十五日在柏林召開三強會議。

星期二（七月三日），在我終身好友惠利審判長監誓下，我就任國務卿。

三天以後，我乘總統專車往新港紐斯，奧格斯特號戰鬥艦停泊在那裏，預備載我們到歐洲，到波茨坦——走向和平大道的第一步。

第四章 波茨坦——失敗了的成功

在奧格斯特船上，我們工作很緊張。一切會議中可能會討論到的問題，國務院已預備好一個節略。行程中，每天早上，彭柯亨，弗里門（道克）·瑪西斯·奧查理（契普）·鮑倫都到我船中，和我會同研究這些節略。對於一個新的國務卿，他們真是再好沒有的三個顧問了。

生性寧靜而靦腆的彭柯亨，在羅斯福當政的初期起，便會參與各種重要問題。當我在白宮的一段時間中，他一直與我共事。我對他除深有友誼外，還覺得他有着一個十分了不起的頭腦。道克，是國務院歐洲司司長，一位老資格外交官，不但對國際問題有廣大深切的認識，且有敏銳的政治感覺和健全的判斷。他是職業外交家中最好的榜樣之一，我很倚仗他的協助。說到契普，他也是這一種人。他在蘇聯住過幾年，為國務院中蘇聯問題的專家。他曾隨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參與歷次的三巨頭會議，担任翻譯兼顧問。

我們四個人，對國務院中所預備的節略詳盡討論研究。在許多問題上，杜魯門的參謀長李澤上將也來參加。在這些會議中，我們準備好了建議，呈送給杜魯門總統。行程中，每日至少一次，總統和我共同研究這些建議，俟總統批准某一項後，我們就把它準備起來，以便提交大會。

這樣地，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我們抵達安特衛普時，我們對於各種問題已經成竹在胸，各項依據的文件也都充分準備好了。

我們希望會議中能解決下列四事：一、議定媾和及步驟，以便及早起軍並完成和約；二、佔領德國工作中的政治及經濟原則；三、實現雅爾達宣言的計劃，以終止克里米亞會議以來蘇聯在東歐國家所實施的那種敵對政策；四、重行討論賠償問題，因為賠償委員會對此並未討論出結果。

此外，還有幾件事情。一是我們希望儘速設法讓義大利加入聯合國，因為義大利人民在對德戰爭末期中頗有貢獻，而且它會對日宣戰。還有，我們擬有計劃，開放一切歐洲國家的內陸河流，供自由航行。

我們到達柏林郊外巴貝斯堡的「小白宮」以後，知道史達林元帥將過一天才能到。因此，我們得有時間，可以在柏林城內觀光一下。總統，李海少將，和我同車前往柏林市區。街上人來人往，塵屑接踵，大部分都是老頭子和小孩。他們個個都把行李雜物背在肩上。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要到那裏去，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要離開。我們雖在美國時已聽說柏林破壞甚烈。但一見到市區被破到如此程度，也不禁大為震驚。全面戰爭不單是使軍人死傷，而是也使後方的老頭子，老婦人和小孩子同樣遭劫。

七月十七日，史達林元帥抵達柏林，不久即來拜訪總統。（我們得記住別他爲史達林元帥

了，因為紅軍的巨大成功，他們政府已頒給了他這個頭銜。頗為愉快地談了一會以後，總統非正式地邀史達林，莫洛托夫和那位能幹的蘇聯翻譯員巴夫洛夫跟他同進午餐。他們接受了。席上談話皆屬普通酬應，空氣甚為和洽。在談到我們的柏林之行時，我問史達林，他覺得希特勒是怎麼死的。他的回答使我頗吃一驚，他說，他相信希特勒並沒有死，現在可能躲在西班牙或是阿根廷。十天以後，我又問他對此事有未改變看法，他說：沒有。

午餐席上，史達林談笑風生。他在這種場合中一向都是如此的。他向總統盛讚席上的酒好。總統謝謝他的讚許時，史達林叫那個菲列賓侍者把酒瓶上的牌子讓他看看。我很高興，因為這是加里福尼亞州造的酒。

午餐後不久，我們就駕車到三哩外的波茨坦賽西林霍夫宮開會。俄國人把會場佈置得很好。賽西林霍夫宮本是前威廉太子的別墅，地方甚寬大。這是一座棕色三層樓的石建築，矗立於格羅尼茲湖畔，風光絕麗。庭院中，紅軍用葵菊植成了一個二十四呎寬的大紅星。每一國家的領袖都有一套房間備用，其代表團則另有房間，備會商之用。

會議廳本身寬敞明亮。一頭是落地長窗，光線充足，並且憑窗而望，即可見下面一片萬紫千紅的花園。

七月十七日下午五時十分，大家在那張大橡木長桌前坐了下來，出席者，美國代表團為杜魯門總統，我，前駐蘇大使台維斯，李海上將，鮑倫。英國代表團為邱吉爾首相，艾登外相，艾德

禮，賈德幹爵士，及譯員一人。蘇聯代表團則爲史達林元帥，莫洛托夫外長，維辛斯基，當時的蘇駐美大使葛羅米柯，哥賽夫，和譯員巴夫洛夫。

每一代表團背後都坐有一大羣專家顧問，幸而房間甚大，可無問題。這批專家顧問，視當日所討論的議程不同而時時變換。我記得第一次會中我們後面坐着的顧問們爲：哈里曼大使，副國務卿克萊頓，賠償委員會專員鮑萊，參事柯亨，助理國務卿鄧恩，和道克，瑪西斯。

由史達林提議，杜魯門總統担任了會議主席。他立刻提出了幾件我們在奧格斯特艦上所準備好了的提案。

第一件是建議設立外長會議。在雅爾達會議中，原已商定各國外長應規定時間集會，以討論戰後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我們當時並沒有準備把和約也放到外長會議中去討論。在雅爾達時，和平似乎還很遙遠，據我所知，這些問題是並未會討論過的。所以，設立締造和平的機構這一問題，乃是波茨坦會議中首要的問題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我爲國會議員，曾參與和約進行諸事。這次，我覺得我們必須另換一種方式進行。如果我們等到和約結束，再合併起來開一個和平會議，所有參戰的國家全來參加，而並無一個草案可爲和約討論的依據，則結果一定弄得七嘴八舌，一無結果。有的在吹在捧，有的侮我訐，加以各國利害不相同，鈎心鬥角，我相信一定會開了一年也還是毫無結果可言。即使凡爾賽會議時，最後也只好指定了幾個大國負責起草和約。不參與起草的那些小國，對

於和約內容，幾乎莫明其妙，結果，大國互相同意了以後，小國就和戰敗的德國一樣，毫無機會可以提議修改了。

我們現在希望能想一種方法，可使各主要國家於各問題上取得協議，而同時，小國亦可有充分機會參加意見。

很幸運的，赫爾國務卿所計劃，斯退丁紐斯國務卿所實現的聯合國組織，其中的議事步驟規程，可作和會範本。而敦巴頓橡樹會議及雅爾達會議決議案之提付舊金山會議討論，亦可作為大國協商後提付全體討論之前例。

彭柯亨與我準備好了設立外長會議的計劃。但不出我等所料，蘇聯對於德國和約，不欲立時進行。但我們覺得此時應先行開始商討。而將來我們於對義和約及對巴爾幹國家和約進程中的經驗，當可有助於對德問題的取得協議。

我向杜魯門總統敘述的外長會議的工作大要是如此的：外長會議先討論對義大利和對巴爾幹國家的和約，因為這些和約中爭執點最少。各國外長先商定若干原則，再交外次根據各原一起草和約。然後，各外長再商討德國問題，就各重要問題如疆界，地方政府等獲得協議，再交外次起草對德和約。這些和約，最後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並修改正，如敦巴頓橡樹會議決議案之提交舊金山會議一樣的。對日和約的進行，步驟也是如此。

總統考慮了一下以後，接受了這個計劃。這是在我接任國務卿不久前的事。總統把這個計劃

提交國務院研究。國務院也同意了。

在這理論上當然是很好的。但在有一個假設上我們想錯了。我們原先以為，戰事終了以後，參戰的國家一定都渴望和平，所以各國間意見的不同當可設法解決，並無多大困難的。

但是不然。的確的，雅爾達會議以後，我們頗有點失望。蘇聯的違反對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協定，給了我們一個警告：在將來我們還有困難重重，而且將碰到根深蒂固的猜忌之心。不過我們總還記得羅斯福總統最後跟邱吉爾首相說過的話，他說，憑他和俄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一切困難到最後自會解決的。

現在，大家來批評羅斯福總統的話和我們的假設認為太無先見之明，當然是很容易的。俗語說得好：「向後看易，向前看難」。但是，假使大家想一想在德國投降以後美國人民對蘇聯的態度是如何的好，同時，由於大家都是並肩作戰，同甘共苦過來的，蘇聯在美國一般人民心中，留存着一種極大的好感。但不料，蘇聯在最後的兩年半中，却如此的負義蠻幹，把美國人民心中的一點好感全都抽回去了。

設立外長會議的計劃，在會議桌上很快地通過了，使我們對前途頗為樂觀。邱吉爾和史達林都對我們的把中國包括在外長會議內一點，表示疑問。蘇聯代表一直反對把法國列為強國。當邱吉爾建議考慮外長會議應包括四國還是五國時，史達林立刻接上去說「還是三國」。

三國外長第二天會晤時，決定了，中國應只參與與遠東或與整個世界有關的各問題。莫洛托

夫主張法國應只限於對義及對德和約之起草。最後我們大家同意了：每一和約應由於敵國降書上簽字的國家共同起草，以義大利的情形而論，法國應屬於義大利降書簽字國之一。

那天下午，我們把這個議案送達三國領袖。立刻，他們通過了這個議案，設置外長會議，負責準備和約。這是波茨坦會議中第一個通過的案子。

七月二十四日午餐席上，我和莫洛托夫作了一次談話，使我對會議成功的希望大為加增。我們討論到將於九月間在倫敦召開的第一次外長會議的計劃。我說，我們應該組織起這個機構，並決定幾點大原則，並令我們的外次及助理人員們據此準備和約草案。我並說，外長們應於十天內完成此一工作。莫洛托夫似乎很贊同這個意見。我們也討論到如何選擇起草人員，討論到外長會議與聯合國的關係，以及我們回國以後的即應準備對義和約。在這種種問題上，莫洛托夫意見似乎和我十分一致。

我們再去參加三國領袖的會議。會議席上的激辯也許會削減了我的希望，但是我並不會。這回討論的是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另一個提案，——如何實現雅爾達會議宣言中對歐洲被解放國家處置的條款。

我們的提案中坦白述說，雅爾達宣言中的責任迄今並未履行。這種情形如果繼續下去，將使世人認為我們強國無合作一致之誠意，而大大削弱我們所揭櫫的目標的信心。我們提議，由三國共同一致，改組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政府，使一切民主份子皆得參加在內。同時，我們也建

議，由三國政府協助目前的過渡政府辦理「自由而不受束縛的大選」。

這個提案引起會議席上的冗長激辯，值得一記。

史達林對這議案的第一個答覆就是：蘇聯對此問題已另有提案。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果然在外會議席上提出來了。其中主要的是對希臘大肆攻擊。艾登憤然發言，說這個提案簡直是「有意開玩笑」。他說，希臘大選時，外國觀察家，包括蘇聯的在內，都會被邀前往參加。很不幸，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却就辦不到。他最後說，對於蘇聯提案中的攻擊，英國認為自己「最屬例外」，此事只能報告首相。

莫洛托夫回答說，他們攻擊的只是希臘政府，不涉他人。他舉出事實，說英國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代表們，比蘇聯的還要多，同時並引英美報紙的記載以爲例證，說，希臘情形比羅保兩國更糟。

對於這場辯論，我所說的就是我常常說過的一段話。對於這段話，我恐怕莫洛托夫是從來沒有了解或相信過的。我對他說：「美國政府真誠樂見蘇聯具有對它友善的鄰邦，不過，我們覺得，他們應獲取全體人民的友誼，而勿僅獲取一個政府的友誼。所以，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政府能真正代表人民。假如這種大選舉行之時，非但報紙和無線電受統制束縛，甚至我們政府派去的代表亦受束縛，那末，這樣的大選所產生的政府，我們美國人民是決不能信任的。我們並不欲干涉任何國家的選舉，但，鑒於戰後世界的情勢，我們願意和其他國家共同，觀察義大利，希臘，

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大選。」

這個討論中的癡癡之點，在以後的好幾個月中都時時聽到。俄國人只要一碰到一個使自己不快的議案，或使自己居於劣勢的議案，他們就總是老法子，提出一大堆英美報紙上所載的希臘通訊，作為反攻的依據。莫洛托夫似乎隨時都在利用我們的新聞報導自由，而獲得便宜。

幾天以後，我們的提案又提出討論。結果，蘇聯表現了一次很有趣的討價還價手段。

莫洛托夫發言道：「蘇聯不能同意監督選舉一事。但我可以瞭解，其他盟國希望他們的代表們在這些國家中能有更多的便利。現在戰爭業已終了，我們本已有理由，可以給代表和記者們以更多的自由。所以關於選舉各事，當可隨時儘量告訴他們。」

提出了他的反對和諾言以後，繼之就抱怨說，蘇聯代表在義大利的盟國管制委員會中未受適當注意。他攻擊和威嚇了一陣子，然後再提出條件，說，如果我們承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政府，蘇聯能願意考慮我們關於兩國大選的提案。

艾登說，照英國憲法，和約訂定前，正式承認是辦不到的。我對莫洛托夫說：我們承認一個政府，當根據我們自己對它的估價與判斷，而不能作為一種討價還價的工具。不過莫洛托夫是個很難說服的人，這件討價還價的「生意」，他一直在提出着。

蘇聯的討價還價，大部分是集中在義大利問題上。我們曾提出修改義大利的停戰協定條款，以圖答其協助對德作戰及對日宣戰之功。我們也建議，對義和約之草擬應列為外長會議的第一重

任務。

但史達和莫洛托夫都堅持：匈、羅、保三國所未得的恩惠，義大利也皆不應有。但我們指出了一相根本的不同：一切外國代表在義大利皆可自由行動，自由報導所見。在辯論中，邱吉爾說，英國在羅馬尼亞的代表團「遭受束縛，幾同監禁」。史達林立刻反問說，他有什麼證據？

邱吉爾臉微紅了一下；他說，史達林元帥如果聽見了英國代表團在那邊所遭逢的種種困難，亦定必將大為震驚。「他們四周已有鐵幕圍着」。

「全是胡說，」史達林喊說。他接下去說，在羅馬尼亞的英國代表們所受到的待遇，可和蘇聯代表們在義大利所受到的完全一樣。

一直到波茨坦會議將告結束，我們把這問題與賠償問題合併討論後，才獲得了蘇聯的協議，而成爲宣言中的第十節。該節聲明：第一，訂定和約並與此五國恢復正常關係之需要。第二，三強將對義和約之準備列爲新成立之外長會議的首要工作。第三，至於其他四國的和約，如果方便，將同時進行準備。至於承認的問題，則聲明「三國一致同意在最近將來根據當時之環境，在可能限度以內，可以分別放慮與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等國建立外交關係。」

關於新聞報導問題，宣言中有這樣一段：「三國政府由於歐戰結束後環境已有改變，無疑認爲盟國之新聞記者，可以享受充分之自由，向世界報導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等國事實之發展。」

對此事我們的確仍頗懷疑，不過這是他們討論數小時後，所可能使他們同意的最大的限度了。

同時，蘇聯曾提出許多攻擊希臘的議案，其意思顯然是報復英國對南斯拉夫的攻擊的。宜實中上面這一節商定以後，貝文指出：議程中攻擊希臘者二件，攻擊南斯拉夫者一件。他提議把這三件全部取消不議。史達林立刻回答說：「好，歡迎。」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們所提出的攻擊其嚴重性不過是如此的。

會議中還有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就是英美在羅馬尼亞的工業設備，現在已被蘇聯擄佔的。蘇聯把這些都認爲是自己的應得之物，這，使我們感覺，將來討論到賠償問題時，一定將大有麻煩。在戰前，英美的公司在羅馬尼亞的石油工業中頗占相當財產，其中包括非常值錢的機器設備。德國人佔羅馬尼亞，當然就把這些財產凍結了。我們都以爲，羅馬尼亞既經解放，這些財產當然都必物歸舊主。但不料，紅軍都已把其中許多機器搬走，作爲戰利品，並把留着的一些也認爲大部分他們應有權處置。我們不能承認蘇聯可以把盟國人民的財產視作戰利品。史達林，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都堅決認爲這些不是英美人的財產，而是德國的財產，所以他們有權搬走。這些機器，其中有一部分是英美人的公司在戰前向德國廠家訂製的。於是蘇聯堅持說，這些機器從前既是德國做的，那就不是我們的。

維辛斯基說了一大篇理由。他是個能幹而強橫的律師。當他坐在桌子對面，用他那雙冷灰深

銳的眼睛望着你，以強力的精警滔滔辯難時，你就可以了解，爲什麼上次蘇聯大清洗黨閥時，是由他來担任首席檢察官的了。

機器設備所有權問題的研究，有許多是純屬技術方面的。經過了長長的反覆辯論之後，才算決定指定專家組織一個美蘇小組委員會和英蘇小組委員會來研究各項設備的所有權問題。

在會議開始之日，史達林曾提出希望討論託治問題，說：「蘇聯希望自戰敗國獲得若干土地。」後來蘇聯代表團就送進提案，主張義國殖民地之一交由蘇聯託治。大西洋憲章全部被拋在腦後了。他現在要求領土了——這就是他所謂的託治。

提案列入議程時，邱吉爾表示不願討論。杜魯門總統立即聲明：這是應屬於和會或聯合國大會中解決的問題，但此時交換意見，並無不可。至此，邱吉爾發表了一篇很動人的聲明。

「我們英國，」他說，「並不希望從戰爭中獲得任何好處。我們所受的損失，慘重之至。在人的傷亡上，我們固然不如英勇的蘇聯盟邦所喪失的那樣多，但戰爭結果，我們負債最巨。我們現在和美國保持海軍均勢，已絕無可能。我們在戰時只造了一艘主力艦，但損失的有十一二艘。雖然損失如此慘重，但我們毫無領土野心，——不要柯尼斯堡，不要巴爾幹，什麼都不要。所以對於殖民地問題，我們態度可以完全正直無私。」

「當然，」他接下去說，「英國與地中海利害相關，任何現狀的改變必須經過長期審慎之考慮。」至此，他問史達林元帥，蘇聯所要的究竟是那一塊地方。

「我們先要知道本會議是否預備放慮義大利應否放棄其殖民地，」史達林回答說。「如果是的，我們才能決定何者應交付託洽。」

「我沒有放慮到蘇聯對非洲海岸的要求，」邱吉爾聲明說。「假如蘇聯有些要求，應與其他問題一併討論。」他解釋說，這問題應屬於和會的範圍，殖民地行政問題的最後決定應屬蘇聯大會。

杜魯門總統乃發表意見，建議把本問題交付外長們繼續討論。這個建議被接受以後，席上的緊張空氣就立刻鬆弛了不少。

外長們集會討論此事時，莫洛托夫立刻提出：此時應明白決定這些殖民地將來的處置辦法。我提醒他杜魯門總統在會議席上的聲明，這個問題只能在和約中解決。當我指出和約的準備在一個月內就要開始時，他才答允等待。

蘇聯的圖謀染指地中海，在討論到韃靼尼爾海峽的控制問題時，亦顯露了出來，不過態度較為平和些罷了。這問題是邱吉爾首先提出的。他已和史達林討論過此事，現在，他再表示願意共同商討修改協定，使蘇聯商用或軍用船艦於平時及戰時能自由通航穿過海峽。但他認為此事必須預先通知土耳其。同時他聲稱，對蘇聯的要求卡斯省及亞達罕省，與要求在海峽邊取得基地兩事表示關心。

他說：「此事將使土耳其恐懼國家主權受損，且將無法防衛君士坦丁堡。」

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解釋說：制省的要求，是由土耳其提出與蘇聯訂結同盟一事而來的。他們說，這兩省在沙皇時代本屬俄國領土，而且，如果同盟訂立，則為防衛這些土地起見，邊境自當確定。史達林認為，蒙德婁公約對蘇聯「極不友善」，因為它給予俄國的權利，是和給日本的一樣的。他認為，土耳其國力太弱，不足確保海峽的自由航行，所以，自然應由蘇聯來保衛海峽。

杜魯門總統回答說：「美國政府不同意修改蒙德婁公約。但我們認為，韃靼尼爾海峽應供全世界各國自由航行，並由我們全體來共同防衛。」

事情就是如此。蘇聯要求自由航行，但由蘇聯防衛，或蘇土共同防衛。這意思就是說，他們的武裝軍隊可以駐紮在土耳其的領土上。我們則要求由聯合國來確保自由航行。

蘇聯領袖們對於韃靼尼爾的想法，實在是復不實際的。百餘年來，俄國都曾指望着他們隣國的這塊土地。在一百年前，他們所要的那些要塞堡壘或者還大有軍事價值。但是今日，如果沒有完全的制空權，則他們在海峽的這些堡壘其實是並沒有多大用處的。

對於這問題，杜魯門總統聲明，他相信如果對物資及船舶自由航行的壁壘能够去除，則對於歐洲將來戰爭的避免，將大有用處。所以他提出了我們預先準備好了的提案，主張一切內陸河流皆得自由航行。

史達林說，對於這個提案他不預備討論，因為這是議程表上所未列入的。總統和我雖費盡唇

舌，最後也不過使他同意，把此問題交由外長們繼續商討。後來，當我們起草會議的公報時，史達林堅持此事不應提及，並無其他理由，只說：這並不需要，而且公報已經長太了。

七月廿五日，會議暫時休會，因為數星期前英國所舉行的大選投票次日就要揭曉。邱吉爾是同了反對黨（工黨）領袖艾德禮同來參加會議的，所以不論大選結果如何，對於會議的進行，都並無影響。

他們兩人啓程返國聽取大選結果的前一天，我問邱吉爾，他自己覺得繼續在位的可能性如何？我說他不知道，不過許多明瞭大選情形的人們都賭東道說保守黨必可於下院獲得大部席次。他相信保守黨必可勝利。而艾德禮，我問到他時，覺得他是認為工黨可能有相當好的表現，但失敗還是失敗的。

這是很有趣味的，當我們在會議中討論着被解放國家的大選當如何進行時，英國的這兩位領袖，却一點也不知道在自己國內，情勢已把工黨擁上了台，這結果，使我們都大吃一驚。

新首相艾德禮回到波茨坦時，他帶了貝文來，代替艾登。就人物而論，艾德禮與貝文和邱吉爾與艾登真是天南地北，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在外表和舉止上，艾德禮給人的印象極似乎一個大學教授。說話時，他毫不需要外交辭令，而只是把自己的意思清楚而審慎地說出。他非常謙和，絕不做作。這樣一位熱切而嚴肅的人物，如何能對廣大羣衆有如此吸引力，真是使人難於想像的。

他們到後不久，艾德禮和貝文聯袂來訪杜魯門總統，我們四個人就討論起會議的進程來。總

統提起，蘇聯要求割讓東普魯士，並在地圖上指出了德國和波蘭邊境線上因此將發生的變動。貝文立刻強力地聲明反對。他的態度極為強硬，使總統和我都暗忖跟這位新外相將來如何弄法。後來，我曾告訴貝文他在首次會面中所給我的印象，並說，不久我們即欽佩了他的爽快和直截。他似乎很得意。真的，我不久即十分景仰他那細密的頭腦，他的爽快，他的坦白，和他的守信。我不單欽佩他的才能，而且極喜愛他的為人。

艾德禮代替了邱吉爾，貝文代替了艾登以後，英國在會議席上的立場，可謂毫無改變。英國這種外交的一貫性使我發生印象。

他們兩個到了以後，會議又恢復了，我們開始來商討最棘手的一個問題：——德國。

就德波邊境而論，我們到波茨坦來所碰到的是個事實的問題。雅爾達會議時，三強曾同意把德國分成四個佔領區，並在雅爾達宣言第六節中明白聲明，波蘭西陲的疆界應俟和會中作最後確定。雖然宣言中是說得明明白白，似乎毫無誤會之可能，但我們從美國出發來德國之前，已知道了蘇聯未和英美兩國商議，即已把納賽河以東的土地劃給波蘭管轄了。

那時杜魯門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曾立刻要求蘇聯解釋，這種不合法的另立一區的行動，其理由何在。總統說，此事不但違反協定，而且將使甚多重要事項如賠償問題之類無法解決。

蘇聯方面提出的理由是說：蘇軍開入該區時，德國人已經逃走了，因為那裏總得有相當政府維持秩序，所以他們允許波蘭來管轄了。史達林承認無一國家可以有權力從德國領土中新劃出一

區來，但說，蘇聯政府當然應採取措施，使紅軍後方得能確保安全。他也承認，波蘭已自該區移走大量的煤。這，我們認為當然是應屬於賠償的一部分的。

總統問他，如果賠償問題尚未協議，而德國的領土已有一部分去掉，則此事如何還能談下去。

史達林回答說，總統所說都是和此問題並不相關的，因為「克里米亞會議中未有任何領土讓與的討論，但曾協定，波蘭可以得到領土。」

「所以，此事蘇聯不能負責，」史達林說。

總統追問一句：「不能負責？」

「不能，」史達林回答說。

我們也很關心由於該區的被併入波蘭而將引起的人口的遷移問題。雖然史達林說，「劃歸波蘭的該區內已無一德人留着」，但該區戰前有近九百萬德國人，我們的情報是，現在還至少有二百萬德人留在那裏。後來，波蘭政府的代表也承認說，大約還有一百五十萬人留着，但說，如果該區劃歸波蘭，其中大部德國人都可自動離去。

波蘭的俾魯脫總統，列席七月廿四日的外長會議，為波蘭對德國東部的領土要求作辯護，說：即使這一區劃歸了波蘭，波蘭的領土也還是比戰前要小，因為依照克里米亞會議中的決定，他們東部十八萬平方哩的地要劃歸蘇聯。但他說，如果德國東部地區劃給他們，則波蘭經濟上較

可好轉，人種亦較齊一。

邱吉爾當時曾指出：這個蘇聯支持的計劃，將使德國四分之一的可耕地皆告喪失。如此，非但德國的糧食生產要被割斷，而且，百萬以上的德國人將被迫逃往西區，「帶了他們吃飯的嘴巴來。」

對於波蘭的要求及承認該區波蘭行政權的問題討論又討論。總統屢次聲明：關於領土的改變問題，只能付諸和會討論。而且：我們也小心絕不預諾他們在對德和會中支持他們任何關於波蘭西方邊境的建議。所以，宣言中曾有一節說：「三國領袖重新聲明，波蘭西部邊境線之解決，應俟和會中決定。」

雖然如此，就實情說，我們必須接受蘇聯佔領區內的這個波蘭行政組織。因為這是一個既成的事實，我們無法能強迫俄國人重行負起那他們已自動放棄了的責任。但在賠償問題提出之前，我們對這個暫時的行政組織未作任何協議。

自雅爾達會議以來，在賠償問題上，蘇聯和我們的意見都是大相逕庭。我們會同意賠償應用「物資」，不應用「通貨」。但自雅爾達會議以後直至波茨坦會議間，賠償委員會的歷次商討，都絲毫未有什麼結果。

第一，就是所謂賠款二百億，半數歸蘇聯的問題。邁斯基曾於雅爾達會議中提出這個數字，羅斯福總統曾接受以此作為賠償委員會中「討論的基礎」。當後來賠償委員會在莫斯科開會時，

我們的代表鮑萊屢次要求邁斯基提出關於這個數目的根據材料，但邁斯基始終提不出。在波茨坦會議席上，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逼着我們要決定一個確實數目。最後，我們才使他們接受了，不再規定錢或物資噸位的確實數目。

莫斯科賠償委員會中的主要爭執點是：我們堅持德國不能以現行的生產品作賠償，除非到它已有足夠的出口物資能換取重要進口原料的時候。這也是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得來的經驗，那時我們美國借錢給德國購買原料，而原料製成的物資，却被別國拿了去做賠償。這次，我們決心不再來代替德國還債了。

我們要把賠償問題作為整個經濟計劃的一環，是有實際理由的。我們希望，除戰利品外，任何德國的財產，佔領軍均不得隨便移走，除非先嚴密計算好其數量價值，以便將來賠償總數分配停當後，可將此數扣除。但在會議以前，我們早接到報告，說蘇聯把許多絕不能算是戰利品的物資亦皆自動搬走。其中有許多報告，其情形簡直使我們不敢置信。但我們到達柏林後，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因為我們不但接到目擊者的報告，而且自己也親身碰到了。

總統和美國代表團所住的房子，從前是個德國電影製片廠的老闆住的，這個人據說已被帶往蘇聯，他的太太則留在這屋子裏為代表團做幫傭。這個「小白宮」已空餘四壁，陳設全無，我們來住時，傢具都是從別的屋子裏去搬來的。

副國務卿克萊頓和鮑萊曾到美蘇佔領區邊境去看過一個地方，那裏，在界線未劃定前，蘇聯

就把美方佔領區內工廠的機器都搬走了。柏林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機器全部被搬走，幾成空屋。其他製冰廠、眼鏡廠等情形也都是如此。

鮑萊會和邁斯基討論此事。邁斯基也承認，除戰利品外，佔領軍不應把其他的物資搬走。但他却下了一個「戰利品」的定義，竟至可把傢俱，浴盆，銀器，煤等等也皆可列為戰利品。鮑萊覺得這就簡直無話可說了。

後來，在七月二十三日的長會議席上，我問莫洛托夫，蘇聯當局是否已把大量機器及物資搬走，甚至傢俱用品等也在內。

「是的，是有這事。」莫洛托夫回答說。他然後說，如果我們計較及此，則他可以同意把他們所要求的賠償數字中減去三億，以作補償。當我反對時，他就連忙說，那末他們可以把賠償要求從二百億減為一百億或九十億，如此，他說，「我們就算這問題解決了。」

但一九四七年春天，在巴黎，在紐約，在莫斯科討論時，莫洛托夫又再要求一百億了。

這個問題討論了很久，不得要領。我們知道，如果賠償問題要以德國為整體來作全盤解決，那我們就必須要蘇聯提出一張所搬走的物資的清單來。但這個一定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知道，他們連自己也估計不出究竟已搬走了多少東西。如果我們一定要他估計出數量來，則結果不過是無窮盡的磨擦及訐而已。

克萊頓、鮑萊和我三人商量過後，覺得惟一的解決辦法是各國從各自的佔領區中去取得賠

債。我們把這個意思報告給總統，總統核准了。七月二十三日，我和莫洛托夫單獨會面，討論此事。

我說，美國對於賠償問題十分「關心」。我們一直會希望三強能採取一種政策，把德國視作一個整體來作為賠償問題的對象。但鑒於目前蘇聯對戰利品定義的如此與整體賠償計劃不能相符，所以，如果勉強要如此做，必將弄成無窮盡的爭執與磨擦。因此，在這種情勢下，我們相信不如考慮各國從各自的佔領區中去取得賠償。

德國「平時經濟中不需要」的工業設備中，約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在蘇區。我們建議，西部區域中的這種工業設備，再給百分之十給蘇聯。假如蘇聯還要從英美區中獲取機器，那末，我們可以以西部德國人民所急需的糧食和煤來作為交換。

莫洛托夫答允把此事轉呈史達林元帥考慮。

艾德禮和貝文到達的前一日，莫洛托夫來說了，他責備我們不應違反雅爾達的決議，不接受二百億賠款這個數目字。我用各種方法試着使他了解，羅斯福總統所謂的「作為討論的基礎」，並不就是說敲定了。

我對他說：「如果你要向我借一百萬塊錢，我說我來考慮一下，這意思並不是說我就要開支票了。」我然後說，我們不但是答允了以此作為討論的基礎，而且鮑萊在莫斯科就和你們討論了三十五天，你們到柏林後，我們又討論下去，但鑒於上述的種種理由，我們決定，這個數字是不

合實際的。

艾德禮和貝文回來以後，我去看他們，商談數小時後，他們在原則上也同意了這個辦法。第二天，總統和我約史達林及莫洛托夫會晤。但史達林身體有點不舒服，莫洛托夫一個人來了。

我們先說出：我們已同意他們的要求，把德國的艦隊和商船由三強平均分配，這點是會議開始以來，他們所催逼得很緊的。然後，我們促他接受我們的賠償計劃。他說，在「原則上」蘇聯準備接受，不過尚有若干「細節」希望解決。主要的「細節」就是將由魯爾區移往蘇聯機器價值的數目問題，而他主張，應定為二十億元！

我們解釋說，用錢來作為機器設備的估計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同意以機器設備總數的百分之幾來作為賠償。但莫洛托夫在這點上十分堅持，一定要定出一個錢的數目來，因為否則，他說，「這個百分比數是沒有意義的。」

七月三十一日，我對莫洛托夫說，現在有三件事情須待解決：一、賠償問題；二、蘇佔領區的波蘭行政機構問題；三、我們所提出的關於義大利及巴爾幹諸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我給他一個文件，敘明我們在此三問題上所能作的最大限度的讓步，請莫洛托夫把這個轉呈史達林元帥，以便於下午的會議中討論。我並聲明：我們需要三個全同意，否則就全不同意。並告訴他，總統和我準備於次日即離德返國。

下午開會時，總統立刻開席討論這三個問題，並叫我提出來。我提了出來，並強調說，這是

一價權提案。

史達林表示，他反對「貝爾納斯先生這種詭計」，逼他們一定要三個問題同時考慮。我解釋說，我們一併考慮此數問題已達三星期之久，現在，我們特一併讓步，意思就是希望會議能順利結束。所以，我們堅持必須三事共同考慮。史達林繼續抗議，然後就開始討價還價了。首先，他提出把賠償數目大大增加。這個不成，他就提出，西部區域運往蘇區交換糧食、煤、木料等的磅數，自百分之十二增至百分之十五。我說，如果他肯放棄別的要求，並同意其餘的兩個問題，則我們可以同意百分之十五。他答允了，於是會議就順利結束。

莫洛托夫暫時地放棄了共管魯爾區的要求，這是蘇聯對西部區域的主要目標之一。別的事實，如佔領德國的經濟原則，修正盟國管制委員會對羅、保、匈等問題的處置方案等等，也都很快地獲得了通過。這都是我們以前所提出的。

因為史達林於會議中討論賠償問題時曾表示，他「反對貝爾納斯先生這種詭計」，我想他對我一定很不高興。但在波茨坦會議即將結束宣告散會前，使我很出意外的，史達林却請總統讓他說幾句話，關於「貝爾納斯先生，他比我們中任何一個皆更努力。」

他並說：「他使我們於許多事情上獲得了協議。」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俄國人是欽佩態度強硬的對方的。

總統表示，希望下次的三巨頭會議能在華盛頓舉行。

「讓上帝安排，」史達林回答說。

會議在愉快情緒中閉幕。但美國代表團却並未過分樂觀，因為事實表現，會議中同意了的事實，實行起來還有着困難重重。但我們感覺，我們已建立了一個基礎，來維持戰時所結成的聯合一致。我們於東歐問題的努力上沒有理想的那麼成功。我們未能使義大利豁免賠償。但在奧地利問題上，我們覺得頗為成功。在對德問題的協議上，情形也頗有進步，但是我們深知，要蘇聯開始實行協定，這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當然，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到，最初的幾個和約竟要連續商討了六個月之久才能訂立。我們認為這個會議是成功的。我們堅決相信，會議中所得的協議，將為歐洲的早日恢復安定立下一個基礎。

協議是使會議成功的。但這些協議的被破壞，却使成功變成了失敗。

第五章 在倫敦遭遇的挫折

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我出席參院外交委員會，參與對義，對保，對羅和對匈和約的討論，當時該委會正遭遇着相當大的壓力，因為有一部份人，主要的是義大利系美國人的團體，主張暫緩批准。這種主張的真正目的，乃欲推翻這些和約。我在說明美國在過去十六個月的困難談判中，一直掌握着主動權之後，力促該委會考慮遲不批准和約的後果。令人感到歡喜的是：該委會終於一致批准了上述諸和約，而參院則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以七十九票對十票的多數核准了對義和約，並以口頭表決批准了其他的幾種。

良好的政治是在尋求最大限度的相互同意，在地方上的法院中是如此，在國際間的會議中亦然。這裏，我要把草擬歐洲四國和約的經過，加以敘述，因為此事不僅本身具有極大的興趣和重要性，並且可以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一種借鑑。

當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乘坐「伊麗沙白皇后」號前往倫敦參加第一屆外長會議時，適在我受任國務卿後兩個月。我們在船上開始專心研究國務院各專家所擬就的各種建議及其變通辦法。共和黨方面重要外交發言人社勒斯也被邀參加代表團。我們每天和國務院的顧問人員會晤兩

次，計劃美國在會議中對各項問題應該採取的立場。

當時談話中，引起我們特殊關切的各點之一，就是蘇聯擴張的企圖已有非常肯定的證據。在白宮地圖室中，我獲悉雅爾達協定中有關千島列島，庫頁島，大連和旅順各款。在波茨坦，我們遭遇了蘇聯的種種要求：她要求以德國東部的大塊土地給予波蘭，藉以補償寇松線以東被蘇聯取去的波蘭土地；她要求柯尼斯堡，參與管理魯爾區以及控制韃靼尼爾海峽。她企圖控制巴爾幹的決心已經成爲很明顯，而在波茨坦她還提出了控制義屬北非殖民地之一的要求——最好的莫波里奈尼亞。最後一樁要求特別令人感覺不安，因爲種種事實已經使我們相信蘇聯對這塊土地的興趣，主要是屬於軍事方面的。

我們最後決定我們的政策應該是促進這些殖民地的獨立。但爲準備獨立起見，應該在聯合國憲章範圍之內成立託管制度，先行加以管理。問題乃是那一國應該負責託管的工作？由於種種困難，我就叫我的助手之一草擬一個在聯合國之下實行集體託管的建議。

我們到倫敦來起草和平條約，此點使我感到欣慰。會議於九月十一日召開，但是對於會議的組織和程序，我們立刻遭遇了嚴重的異見。使我感到驚奇的，就是莫洛托夫甚至提出過討論管轄日本的要求。直到兩天之後，我們才能開始討論對義條約。

當時各國同意用英國的草案作爲我們討論的基礎。以後時常碰到的許多難題，如義南疆界，多得喀尼斯羣島和義大利殖民地的處置問題，立即隨之出現。莫洛托夫不願討論疆界問題，除非

南斯拉夫參與其事；他不願討論多得喀尼斯問題，除非我們把義國殖民地問題談妥。所以我就提議邀請南斯拉夫和義大利出席陳述意見，並將我們處置義國殖民地的建議提出。

我們的建議主張由聯合國安理會任命一個行政長官（蘇聯爲安理會永久會員國之一）。這個行政長官是一個國際公務人員，由任何會員國中的一國人士担任。他應該有一個顧問委員會，由英、法、蘇、美以及義大利各派代表一名和當地人民代表一名組織之。假如行政長官執行職務時，委員會中各國有一國表示不能滿意，那麼任何一國可以向託管理事會提出，促請注意。我們的計劃並主張在十年之後結束託管。

皮杜爾主張由義大利担任託管，其主要原因乃是爲了託管理事會尙未成立，而集體託管也恐難行得通。王世杰立即表示中國代表團完全支持我們的建議。貝文說這是一種新的建議，他必須加以研究。他希望知道其他建議能否考慮，因爲他要讓各自治領有表示意見的機會。至此，就輪到莫洛托夫說話了。

他說蘇聯代表團所建議託管原則，應適用於若干義國殖民地，由個別國家担任每一個殖民地的託管。他對於共同選出一個行政長官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他還說他並不隱瞞蘇聯希望獲得個別託管一個殖民地的願望，提出這種要求的根據就是義大利黑衫軍十師三旅侵略蘇聯時所造成的損害。他還指出蘇聯政府和各種不同的民族「建立友好關係」具有「廣泛的經驗」，並建議把這種經驗應用到的黎波里泰尼亞方面去，此外還保證十年的時間足夠著遣塊土地作獨立的準備了。

在一次私人談話中，莫洛托夫向我建議一點，就是美國，聯合王國和蘇聯三國應該大家管理一個殖民地。我告訴他我們不能同意這個辦法。

我告訴他我們的代表團認為指定個別政府管理遠較指定一個行政長官爲難，因爲行政長官是不能利用殖民地來爭取商業上和軍事上的便宜的。這些地方必須當做一種委託的東西，一定不能當做戰利品或者戰時損失的賠償看待。把這三個殖民地分給三國，而在軍事開發上不加限制，結果對和平不能有所助益，反將播下糾紛的種子。

那天下午，貝文陳述英國的立場。他直截爽快他說英國不能同意蘇聯對的塞波里泰尼亞個別託管的要求。由於蘇聯的要求是以義國軍隊所造成的損害做根據的，他於是被迫指出英國及其自治領和義國作戰，還在義蘇開戰之前。他繼續說英國承認蘇聯在東歐的利益，所以曾經支持蘇聯的要求，他奇怪蘇聯爲什麼不承認英國在地中海區域類似的利益。貝文繼即聲明支持我們的建議，但附有若干修正。

皮杜爾的意見依然保留。他說在詳細辦法更形確定之前，「就是在原則上」也不能接受我們的建議。他指出里比亞和法國聯邦的一部份接壤，顯然他在恐懼對的塞波里泰尼亞獨立的諾言，將對這塊法國領土發生影響。

莫洛托夫極肯定，他要求討論的塞波里泰尼亞問題。他說蘇聯在北方有一個海口，鑒於地輿土之廣大，在南方也應該有一個，「尤其爲了我們在遠東方面已經有權使用大連和旅順的原故」。

他說「蘇聯應該得到她應得的地位，所以在地中海方面應該有商船隊的根據地。我們並不主張把蘇維埃制度介紹到那裏去，除了當地人民所需要的民主秩序」。

以上是辯論開頭。在以後十六個月中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一再提及，直到認明這個題目前無法解決爲止。

我們對於多得喀尼斯羣島也不能獲致任何建議。外長會中四個會員國相信它們應該歸併給希臘，但是莫洛托夫堅持這些島嶼究應屬誰的問題必須和義國殖民地的處置問題，連帶決定。

至於義南疆界問題，參加外長會議各國在初步聲明中大致同意特里斯特應該成爲一個自由港。主要的難題是莫洛托夫單獨堅持該城應該置於南斯拉夫主權範圍之內，雖然當地地的民衆以義大利人居絕大多數。九月十八日，南斯拉夫，義大利，南非，澳洲和紐西蘭各國代表陳述意見，但是外長會議各會員國的立場並未因此而顯著的變更。在聽取各該國的意見之後，我當即提出建議，主張選派專家前往實地調查，以便以人種問題爲主要根據，決定一界線，而對經濟諸因素亦予以考慮。莫洛托夫接受此項建議，其後復表示反悔，因爲他手下的專家所建議的界線，並不和指令相符合。

莫洛托夫遭遇其他四國一致反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賠償問題。蘇聯建議義國應該付出賠償共達六億美元，其中一億美元應歸蘇聯。其他幾國則認爲義國在償付預支的救濟費用之後，付出賠償的能力已極有限了。

雖然在我來出席會議的時候認爲各國外長可能就一般原則達成協議，以便各國外長的代表在以後的十天或兩星期之內可以根據此等原則詳細檢討各項和約。但在開會一星期之後，這種希望竟告落空的感覺已頗明顯。我們曾經費了許多時間討論程序問題。法國希望討論管制德國問題。莫洛托夫希望討論德國賠償問題。他還提出了對日管制委員會的問題。我們對於對義和約未獲進展，而蘇聯代表團還堅持英美兩國應該在外交上承認東歐的傀儡政府。

在我看來，最後這個爲求乃是會議的主要障礙。星期日早晨，我決定必須使莫洛托夫明瞭爲何我們拒絕承認由蘇聯所扶植和維持的政府。這天蘇聯官員日間到鄉間去遊玩，於是約定下午五時半在蘇聯大使館會晤。

我在開始談話時開頭就說，「爲了世界的將來，我們幾個國家應該繼續合作，並且應該努力調整異見，藉以保持目的的一致」。我於是力言「美國對於旁的事情都不發生興趣，但願鄰近蘇聯各國的政府是對蘇友好的」。

莫洛托夫回答說，「我必須告訴你我對於這點表示懷疑，而把這種懷疑掩飾起來是不足爲謂的」。他繼續說此種懷疑，係由美國對羅馬尼亞的態度所引起。他說，以前的拉第斯古政府「是對蘇聯仇視的，但是獲得英美的支持，但是當對蘇友好的葛羅架政府成立之後，英美兩國都不予支持了」。

我告訴他說，「雅爾達協定中有關解放國家的部份曾受美國民衆熱烈歡迎。我相信你記得甚

羅契政府是在羅斯福總統時代成立的。我們知道這個政府是在維辛斯基向羅玉提出限於二小時半內答覆的哀的美教誓之後而產生。自從那時候起，我們的新聞記者不准入境，我國官方代表所受的待遇以及其他行動，已經證實我們對該政府的性質所存懷疑，是有根據的。」

我說，「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該國成立一個既對蘇聯友好又能代表一切民主份子的政府。」我指出在雅爾達會議以後對波蘭問題所發生的種種誤會，終於獲得消釋，我建議我們應該設法對羅馬尼亞政府的組成成份獲致協議，猶如對波蘭問題一樣。

莫洛托夫拒絕接受以波蘭作為先例。他說在羅馬尼亞，這種辦法將引起內戰。他堅持一點，就是祇有在選舉舉行之後，方始可以考慮政府的改組。

我指出那時候的政府將不是臨時政府而是民選政府了。假如我們先來建立一個臨時代表政府，那麼由這樣一個政府舉辦的選舉，其結果可為我國人民所接受。

莫洛托夫發問說，「在英美政府中是否各黨均有代表參加的？」

我回答說，「不，但是關係羅馬尼亞，我們是在講臨時政府而不是講民選政府。由於葛羅契政府成立的經過情形以及其後該政府所採取的種種行動，假如讓這個政府來舉辦選舉，在美國人民的中心目中是可疑的。」

莫洛托夫於是就攻擊希臘，並且還詢問我們對一國和另一國的態度，為何迥然不同。

我告訴他說，「這是一個事實問題。在希臘新聞記者准許入境，可以自由行動，並且可以報

告所見所聞，不受檢查。因此美國人民明瞭希臘的情形，而且感覺到當地的情形並不和你描摹的相同。此在羅馬尼亞，新聞記者並未獲得此類便利，而葛羅柴政府的種種行動，使我們相信這個政府是不能代表人民的。」

莫洛托夫說，「顯然的，在希臘新聞記者是快樂的但是人民並不快樂，而在羅馬尼亞，人民是快樂的但新聞記者並不快樂。蘇聯政府對於人民的感覺更爲重視。」

雖然我們的代表相信羅馬尼亞的人民絕大多數是反對葛羅柴政權的，但是我決定不再和他爭辯，而情願努力去找尋消弭異見的辦法。可是他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以爲我們拒絕承認葛羅柴的用意，無非希望一個對蘇仇視的政府成立起來。我在屢次聲明此說不確而一切獲致瞭解的努力均告失敗後，最後還是放棄討論，回返寓所。

這個星期日的晚上，美國代表團人員的情緒極爲沉悶。我們就這一次晤談以及當時提出的許多問題討論了很久。蘇聯似乎有控制歐洲的決心。我們找不到解決各項問題的任何辦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繼續尋求解決之道。

次日的發展未能給予我們任何鼓勵。我們建議各和約中應嚴格規定軍隊數額，並主張設置監督委員會，藉以保證此種限制的嚴格執行。當時正在考慮對羅和約，莫洛托夫立即宣布反對我們的建議。

我說，「全世界都厭倦戰爭。在每一個國家中，兵士都想回家去。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外長會

議能够有所行動，以謀樹立持久和平。這些國家都很貧苦，希望我們能够善施「解除軍備的負擔，這將是我們對這些國家最大的恩惠。我們已經經由聯合國提供保證，決心防止對任何國家的侵略，那麼爲什麼這些國家還需要大量的軍隊呢？」

但是我們未獲任何進展，因此進而討論條約的其他各款，同樣未獲任何結果。

我對於史達林，莫洛托夫和其他人士屢作蘇聯尋求安全的聲明，印象頗深。自從雅達會議時史達林指出波蘭如何在廿五年之內兩次被用作侵略俄國的走廊以來，這種恐懼一直對蘇聯的政策發生深刻的影響。此點可以在莫洛托夫要求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維持完全順服蘇聯的政府一點見之。所以我想假如我們能在這方面提供一種保證，或許阻撓會議進展的障礙可以消除。至少，我們可以消除關於這方面的爭論。所以在次日早晨，我再約蘇聯外長作一次私人的談話。

我重新提起我在雅爾達和史達林所作的談話，並且說我對於他所說波蘭在廿五年之內兩次被用作侵略蘇聯的走廊以及他對德國軍事力量恢復的恐懼，印象深刻。我繼續說，「猶如你所知道的，美國在歷史上向來是不大願意參加政治條約的，但是我想問你蘇聯政府對於四強簽訂解除德國軍備廿五年條約是否認爲可取。假如蘇聯政府以爲好的，我準備向總統提出，並且和總統會同提交國會。細則我們以後可以草擬，但是我們希望知道你的意見，就是這樣一個條約對於消除德國侵略再起的恐懼心理，能否真正有所貢獻。最後我說，「假如你以爲好的，我們可再向英法兩

國提出。」

他說他不能提供蘇聯政府的確切意見，但是他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極有趣的見解」。他將向莫斯科提出報告，數日之後我們可以再行討論。其後他回轉到羅馬尼亞問題上去，並且告訴我除非我們撤回我們的照會，他將不得不提出答覆，因為實際上這是針對蘇聯的一種挑釁。

我告訴他說他有發表聲明的每一種權利，但是他可以相信我是會答覆他的。

次日，共舉行會議兩次，情形都很緊張，因為莫洛托夫和我私下的爭論，終於加以公開化了。

莫洛托夫說，「在羅馬尼亞，有著獲得絕大多數民衆支持的政府，沒有人能否認這一點，我要問：美國政府反對這個政府的理由，是不是爲了它對蘇聯友好的原故？」

他說，我們認爲羅馬尼亞政府是不民主的這種想法，「與事實不符」，並且說：「羅馬尼亞政府爲羅馬尼亞人民所喜歡，但不爲了美國政府所喜歡。那麼應該怎樣辦呢？我們是不是應該爲了美國政府不喜歡而加以推翻，而再來成立一個對蘇聯不友好的政府？假如要這樣做法，蘇聯代表團是不能協助美國代表團的。」

我向莫洛托夫指出，在雅爾達會議中，各國政府首長會同意成立臨時政府，後者應該有各黨各派參與其間，並設法早日舉行選舉。我指出我國在承認波蘭，芬蘭和匈牙利方面所採取的步驟，並且說明這些行動切實證明「莫洛托夫關於美國政府動機的一種聲明，是既不公平又不確實

約」。

上面的一段辯論，可以代表那天早晨整個辯論的情形。那天下午貝文宣佈支持美國的立場。莫洛托夫當然起來加以責難，但是我發覺再討論下去適足以增加惡感，所以不願再就羅馬尼亞問題有所聲明。莫洛托夫於是在結束討論的時候，指責外長會議中其他各國正就蘇俄問題向他「發動政變」。

翌日，九月廿二日這一天，倫敦會議遭遇致命的打擊。

適在上午十時之前，莫洛托夫的秘書來說蘇聯代表團不能出席預定於十一時舉行的會議，但問我能不能在十一時半和莫洛托夫會晤。我準時前往，發覺他希望討論日本問題。他說明他所接到的莫斯科訓令，無疑是在莫斯科收到他有關我所建議的不侵略條約的報告之前發出的。他的政府已經通知他說，現在應該是建立一個防止日本再起侵略的條約的時候了，鑒於目前在日本執行投降條件的情形，此點尤屬需要。他力促成立一個管制日本委員會。

這一次並不是莫洛托夫第一次提出管制日本問題，也不是最後一次。我想這不過是他反政行動中的一個成份，但是我們遭遇了一個相當窘的處境。

英國先前也建議要成立一個管制日本委員會。澳洲對於決定佔領日本的政策也迫切要求更大的權利。日本問題並不在倫敦會議的議程上。我首先要獲悉佔領軍的見解，所以不準備加以討論。我說參加波茨坦會議各國政府首長訓令我們集中全力草擬歐洲五國和約。我保證莫洛托夫一俟我

這國之前，將立即提出日本問題，並和他交換意見。

當我們正在談話之際，貝文走過來了。顯然莫洛托夫是叫他中午來的，他來得太早了一些。莫洛托夫說明他要繼續和我談話，貝文就暫時退出。當他中午再參加我們談話的時候，莫洛托夫立刻說他希望提出改組外長會議的建議，理由是外長會議的工作正爲了開會以來辦法上的錯誤而遲延，因爲這種辦法是違背柏林會議的決議的。他說這種錯誤是在九月十一日開會的那天造成的，因爲當時決定法國和中國可以參與對芬，對羅，對保和對匈和約的討論。他認爲法國和中國應該完全退席，唯有在討論在停戰協定上她們曾經簽字的國家的和約時，始能參加，因爲柏林宣言是這樣規定的。這樣，中國就不能參與討論一切的歐洲和約，法國也祇能參與對德和對義和約的討論，其他就不得參加了。

貝文和我都說根據我們的意見，柏林會議的決議顯然規定，法國和中國對於任何建議不能投票，但是當然可以參加討論，現在要她們退出，乃是一種不必要的侮辱。我在向總統請示之後，就草擬一個電報，建議由總統發給史達林，其中說明莫洛托夫的立場將在全世界造成一種惡劣的印象。

當日下午開會，莫洛托夫提出他的建議，這當然使其他各會員國非常震驚。我們極誠懇地勸告莫洛托夫，請他改變初衷，結果完全無效。史達林的答覆證實莫洛托夫的立場，就是反對法國和中國參加。會議已進入僵局。

我們已經到了十字路口。我們發覺除非我們對蘇聯的要求讓步，就無法獲致協議了。我們決定不再退讓，但是我們不願意爭取和平的第一次嘗試結果完全失敗。

民衆切望和平。國內的人民對於蘇聯的野心並沒有清楚的概念。第一屆外長會議勢將完全失敗，我知道人家將以失敗的責任歸咎於我。

莫洛托夫說我對蘇聯不友好，他說自從羅斯福總統死後我們的政策已經改變。在我講，我願爲再對蘇聯讓步，將造成協約國以及我們所持原則的失敗，祇有拒絕對蘇聯低頭才能建立將來健全的關係。當戰爭剛結束的時候，蘇聯獲得我國大多數人民的讚美和好感。蘇聯領袖知道我國人民對於和平的強烈願望，他們以爲我們不敢使會議失敗的。我們在倫敦所採取的立場使他們不得不重作估計，這使他們明瞭不能強迫我們接受他們的立場。

在會議結束之前，我們設法擬就一個議定書，列舉業已獲致協議的各項問題，但是莫洛托夫拒絕簽署法國和中國曾經參加討論而得到的任何決議。在有關議定書的若干次激烈辯論中，有一次員文提到莫洛托夫推翻他先前自己的行動時，曾經說「這是我所聽到的最接近希特勒理論的東西了。」

這句話的影響彷彿像電一樣。莫洛托夫從座位上站起來，開始憤然地向門那邊走去。他走近門時腳步慢了一點下來，因此給予英國人叫他回來的機會，並且撤銷了這句話——他是回來的。

其後再舉行過五次會議，都沒有進展。事實上，好幾天來我們早已瞭解要獲致協議是不可能

的了。但是王世杰力促我們繼續再努力一些時候。會議的最後一天是王世杰當主席。我們大家都感覺到蘇聯方面正在企圖使會議停止。這種企圖的唯一可以想像的理由乃是因爲下一天是預定我担任主席的日子，莫洛托夫似乎希望在美國人担任主席的一天使會議破裂。在一個休息的期間中，我把這意見告訴王世杰。他就說既然會議是由於他的要求而延長的，那麼他也願意負責來主持會議破裂的一幕。

會議毫無結果地延長到深晚，最後王世杰拿起主席用的小槌，並且宣佈說：「我正巧是把會議延長到今天的這個人。現在既然沒有人要求再開會，我就宣佈會議至此休會。我誠懇地希望有關各國政府將設法在今後再召開一次外長會議。」

這是王世杰的勇敢行動。這是最能代表中國外交家的政治家風度的。中國的困難一定不能歸咎於中國國外代表的作爲。根據我的經驗，在國際會議中沒有一國的代表比中國的代表更出色。會議破裂之後，我重返美國，深知我必將遭遇到批評。大眾的失望情緒是很容易體會到的。我一回國之後，立即向人民廣播了一篇報告，儘可能說明會議的全貌，而諷刺激民衆，使他們發生幻滅的感覺，因爲這將使我們將來的對蘇關係發生不良的影響。民衆方面的反響頗堪告慰。我從此決定假如我們要在國際事務方面採取堅定的立場而能獲得大眾的支持，今後民衆應該得到更多的消息。

同時我決定要把僵局打開；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因懈怠而加以丟棄。

困難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爲了我們未能同意承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所以我就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確定我們對於這幾個國內情形的見解並不是根據錯誤或偏倚的消息的，所以就設法選派著名自由份子路易斯維爾城「柯里安日報」編輯埃斯里奇去訪問巴爾幹各國。我囑咐國務院官員不要給他我國在上述兩國的代表所發來的消息，因爲我希望他用坦白的頭腦去進行調查。

同時我們設法使蘇聯相信凡是力求符合雅爾達協定精神的國家，我們決不吝嗇給予外交上的承認。所以在十月廿日，我們和其他三國會同承認奧地利臨時政府。在十一月二日，我們承認了匈牙利臨時政府。

根據波茨坦協定，我們開始發動討論蒙德蘇條約的修正，十一月七日，我們向該約各簽字國發出了一個有關管理羅尼爾海峽的建議，其中我們說明我們願意參加互相保證自由通過海峽，但反對由黑海各國單獨加以解決。

此外，我接受了紐約「先鋒論壇報」的邀請，於十月卅一日發表演說，演說的大部份是向克里姆林宮講的。我力言我們承認蘇聯應有友好的鄰國的重要性。我說明「美國將永不參加這些國家中具有仇視蘇聯陰謀的任何團體」，但是我繼續說：「善鄰政策和婚姻制度不同，這不是有我就沒有你的事情。最好的那以決不否認它的那國和別人做朋友的權利。」

演說中力言聯合國在促進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並且說，「在一個劃分成勢力範圍和特權的世界中，就不能有維護和平所必要的合作。」我在結束演說時希望克里姆林方面考慮一點，就是：

「我們必須有一個世界，不然就沒有世界」。

同時我叫哈里曼大使要求和史達林會晤，當時史氏正在克里米亞度假。我要他直接向史達林提出一個有關召開和會的修正建議，說明應該邀請的各國，並且說明應該用相互合作的態度來討論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局勢。

結果是一種啓示。當大使開始提出我們關於歐洲問題的見解時，史達林突然要求聽取我們關於管制日本的見解。哈里曼感覺驚奇，猶如他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準備一樣，而我所感覺的驚奇甚至更大些。

當莫洛托夫在倫敦提出日本問題的時候，我們以為這祇不過是他的神經戰中的一部份。是時哈里曼也在倫敦，他和我一致認為巴爾幹問題最關緊要。現在我們突然發覺我們錯誤了。原來倫敦會議的破裂是由於蘇聯認為我們在對日管制問題上沒有充份徵詢他們的意見。蘇聯駐日軍事代表特萊夫揚柯將軍當時已返歸莫斯科，這點也可以證明蘇聯態度的一斑。

在接獲哈里曼大使的驚人報告不久之後，艾德禮首相和金氏首相到華盛頓來和總統商討管制原子能的程序。這次會議中所獲得的協議，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極複雜的問題中，又注入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幾天之後，滿蓬感謝節，我獨自坐在辦公室中，利用假日來靜靜思考若干問題。突然間我想起在雅爾達曾經同意三國外長每三個月應該會晤一次。三國外長會議可能使製造和平的機構再度

發動。我想這是值得嘗試的。所以在次日朝晨我就打一個電報給莫洛托夫，說明在雅爾達會議時曾經同意三國外長應該經常會晤，並且指出他們在舊金山，波茨坦和倫敦已經非正式地會晤過，但還沒有在莫斯科會晤過。所以我建議在蘇京舉行會議。我確信蘇聯政府一定高興發出邀請，並且相信假如我們在莫斯科會晤，使我有和史達林直接談話的機會，我們可能把和約的障礙消除。

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建議召開會議是違背外交上的慣例的。許多外交家和評論家都提醒我這一點，並且說在未決定應該討論什麼問題之前，這種會議是不應該召開的。但是鑒於已往的經過情形，我知道要靠通信或經由大使來獲致協議是不可能的。世界的和平太重要了，使我們不能不願意再作一次嘗試。此外，第一屆聯合國全體大會即將於一月間揭幕，這是我們親自去促請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參加我們所擬就的管制原子能計劃的唯一機會了。

所以我不顧外交家和評論家的勸告，決定到莫斯科去。

第六章 莫斯科會議打開了一個僵局

飛往莫斯科的途中很緊張。沒有蘇聯的領航員，我們是不能飛過蘇聯的上空的，十二月十四日，在柏林一個蓋滿厚雪的機場上，他們和我們會齊了。柏林和莫斯科之間還沒有可用的機場，飛機就帶足了一旦發生事情可以折回原地的汽油。大約距離莫斯科還有六十英里的時候，領航員告訴鮑倫，我們迷失了航路。他們正在想法辨明積雪深掩的村舍，在任何情形之下，這是艱難費事的，在這冰天雪地的時候，簡直就不可能。飛機飛得好低，我擔心着我們要撞上那迎面而來的小山了。

「這一帶沒有山，」鮑倫告訴我。

「我願意接受你的保證，」我說，「只要你能告訴我這一帶是甚麼地方。」

領航員和駕駛員要求准許另外再作十分鐘的低飛盤旋，駕駛員說汽油除了足夠盤旋外，飛回柏林也仍然綽有餘裕。我答應了，並且說，拿破崙和希特勒想到莫斯科來，都失敗了，我，自然不會反對立即撤退的。

當十分鐘快要過去的時候，領航員發現了一座熟悉的建築物。他們知道了方位，幾分鐘內就

飛回了通向莫斯科的航路。我們雖然沒有降落在預定的機場上，我却覺得從沒有一個機場比它可愛。

蘇聯的接待，並不弱於氣候的挑戰。外交部官員預料我們可能降落在另外一個機場，早就分別準備好了歡迎人員。莫洛托夫雖然並不在場，我們照樣受到了合式的接待。

汽車開往美國大使住宅的史巴索宮的時候，風雪妨害了我對這座城市作更多的巡禮。很失望，因為我像到了許多難得遊歷的地方一樣，急於想認識莫斯科呢。我安慰着自己，以後還可以看到。像平常一樣，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懷疑如果別人化費了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時間的一小部分，是不是也只看到這個城市的這麼一點點，除了我們工作和晚上睡幾點鐘覺的史巴索宮；會議地點的斯普利多諾夫卡宮；和我們會見史達林的克里姆林宮之外，唯一我所見過的地方，只有蘇聯政府招待外交使節的大歌劇院。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五時，會議開始。莫洛托夫在我的提議之下，担任主席。由於了解史達林委員長對於遠東情勢的關切，我提議在議程上包含下面幾個議案：在華盛頓設立遠東委員會和在東京設立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建立朝鮮統一政府，作為朝鮮成立獨立政府的初步；檢討美國對華政策，並包括華北日軍解除武裝及遣歸問題在內。同時，我們同意非正式的討論蘇軍佔領東北；印度和希臘英軍的撤退；蘇軍撤出伊朗等問題。議程上原有的議題，依據我原先的提議，承有：設立聯合國原子能管理委員會；再度召開外長會議並恢復外長代表的工作；情形許可時，承

羅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現政府。在莫洛托夫的要求下，議程上的第一項，原子能問題，改爲最後一項。這不啻告訴我，他把這個問題看得並不重要。

我們對於歐洲和平會議程序的提案是根據我們上次在倫敦會議的主張。在那裏，我們曾經贊成蘇聯所主張的和約草案由外長會議草擬，但堅持草案必須送經和會討論，唯一的改變，是在最後一段，它規定了和會討論和約草案並提出建議之後，最後的決定必須歸屬簽訂停戰協定的各個簽字國家。換句話說，英、蘇、美、法四國決定對義大利和約；英、蘇、美三國決定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三國的和約；英、蘇兩國決定對芬蘭和約。

這最後一段的修改，是按照史達林在休假期間接見哈里曼大使所提出的建議，我們莫可奈何地接受了它，因爲我們知道，這是唯一使蘇聯同意召開和會的辦法。

莫洛托夫當天提出一個對案，依然沒有改變蘇聯代表在倫敦會議的主張，規定在和會之中，每一種和約，只能由與某一國實際作戰過的國家討論。實際上，這就是說，需要一種不相關聯的和會處理每一種和約。根據莫洛托夫的定義，在決定對保對匈和約上，甚至在和約的討論上，只能有五國參加，就是三強，南斯拉夫和希臘決定對保和約。捷克取代希臘的位置可以參加對匈和約。對羅和約的決定只能限於三強。對芬和約則限於英蘇兩國。對義和約最多，一共有十二個國家，包括三強，法國、希臘、加拿大、南斯拉夫、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巴西和阿比西尼亞。

很明顯的，這是不能接受的。我就提議我們先談議程上的第二個議題。一直等到第二天，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哈里曼和我舉行私人談話的時候，我才坦白地表示我對蘇聯的提案感到很失望，因為我們的提案，根本是依照史達林向哈里曼所表示的意見擬定的。莫洛托夫答辯說他的提案絕對符合史達林的意旨。於是，哈里曼就把那次談話大略地敘述一番，指出史達林第一天的談話，與蘇聯現在的提案相同。但是，第二天，史達林同意了祇能有一個和會，凡是在參與和會的名單之內的國家，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但規定外長會議的各國保有「決定最後的和約條文」的權利。

莫洛托夫願意同意美國在對芬和約中有發言權，但沒有更大的進展。

當我們十二月十八日開會的時候，我立即根據我們的提案的條款，提出了有資格被邀請參加和會的國家的名單，這名單包括「所有曾經用實際軍事力量對歐洲軸心國家積極作戰的聯合國會員國」，一共是二十一個國家。

「這次大戰是一個戰爭，」我鄭重地說，「在危難時期中，盟國的每一個伙伴都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中國在阻止日本，使美國有更大量的援助運到歐洲的工作上，有着偉大的貢獻。挪威船隻的運輸軍需，幫助了盟國空軍的進擊。這些國家都應該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這對於三強毫無損害，而只有使全世界都對三強的公正更有信心。」

莫文支持我的意見，並且舉例說，像挪威這樣的國家，在大戰中犧牲了他的三分之一約產

員，如果被排斥在和會之外，是不公平的。很久的商談還是談不出結果來。於是我們決定減少出席人數，再舉行非正式的會議。莫洛托夫指着我的名單說，印度必須除外，「它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它沒有自己的外交部」，如果印度允許參加，波羅的海蘇聯的共和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也必須被邀請。貝文自然是不贊成把印度除外的，印度曾經派遣過大量的軍隊到歐洲戰場。

那天晚上，哈里曼，鮑爾和我，到克里姆林宮與史達林作了第一次會談，我希望當着莫洛托夫，把我的意見告訴史達林，好使莫洛托夫難以閃避。我希望與有權力決定的人見面。

克里姆林宮是有名的神祕的地方，像一個欣賞神祕故事的讀者，我注視着我第一次進入它的內部，在到達史達林的辦公室以前，我們被引導穿過三個接連的房間，每間都有幾扇相同的門。我正在忖度着史達林是何等安全地被保衛着。忽然我想到任何一個到過白宮的外國人，也會有同樣的印象的。當一個人去會見杜魯門總統的時候，必須先走過很長一段走廊，再被照料進入西蒙所管理的接待室，然後，還須經過總統秘書康萊利的辦公室，最後才到達總統的橢圓形的辦公室，最主要的顯著區別，是克里姆林宮每一個人都是穿着制服而已。

史太林的歡迎頌詞是公事式的，但是誠懇的。奉上總統的信件之後，我向他保證我們相信美蘇之間沒有甚麼我們不能解決的爭端。

「我們唯一的願望，」我說，「就是和平相處，增進美國人民的安樂，並且幫助我們海外的

友邦重建因戰爭受到的損害。」

史達林回答說，他同樣的具有這個願望。我們同意由於兩國傳統與習慣的不同，彼此對於一個問題有不同的解釋，實在是，可以諒解的事情。他申述他相信我們在化除彼此的歧見上，已經有了很好的成功。

我就簡略地把我與莫洛托夫討論邀請國家名單的事情告訴他，發現他已經有了一張名單在面前，我指出如果印度與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允許參加和會，「那就是說英國將有五個自治領，蘇聯將有五個共和國參加和會。」

「我很難把這種決定向美國人民解釋，」我說，「我只好，在名單上再加上五個國家了，包括我的故鄉南加羅林州在內！」

莫洛托夫插進來說，即使印度除外，英國還是有四個自治領出席和會。

「蘇聯和美國都有足够的力量單身參加，我相信莫洛托夫先生在和會上一定能適當地保護蘇聯三個共和國的權益，」我回答說，「我們在和約方面已經作了重大的讓步，我們要求這個和會名單被通過，一點也不過分。」

史達林說，他看我們並沒讓步，因為名單與哈里曼十月間給他看的相同。我解釋說，對於和約起草及最後通過所作的讓步，比名單的事情大多了。他主張與某一敵國作戰而簽字於停戰協定的各處，才可簽字於和平條約之上。例如：比利時與荷蘭，就沒有對羅馬尼亞和義大利作戰。於

是他又再提及波羅的海國家對於戰爭的貢獻。他說，他相信我們不久會承認這些國家的，但是，他了解如果英蘇都有六票而美國有一票的時候，對於美國，是過意不去的，這種情形，必須解決。一個辦法就是也給美國六票。他追述雅爾達會議時他曾經與羅斯福總統商定，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可以多得兩票，假如我們願意的話。

我親測他那晚不會改變莫洛托夫的決定，但是以後他是可能的，我就請他對這個問題再作考慮，並且希望我們能夠得到一個解決，他贊成了。

第二天下午，莫洛托夫離開會議桌一會兒，當他回來時，他說史達林委員長剛才打電話告訴我，已經決定接受我們的名單。

會議很快的通過了「和平會議遲應於五月一日在巴黎召開」，但是這是費了很久的爭論才決定的。所爭論的是：那幾國應在和約完成後簽字？中國和法國是否應該參與這一項決定或者僅僅通知他們？最後，我們商妥了「既通知而且邀請出席」的決議。

聖誕節的前一天，我們接到了中國的友善的答覆，法國却無回信，我很盼望，作為一個聖誕節的禮物，要讓全世界知道和平會議就要舉行了。我打長途電話給皮杜爾也沒有接通，我知道了他正忙著與他漂亮的妻子結婚。最後，我建議我們先行宣佈我們的協議，並且聲明法國和中國都會被邀出席。我建議過巴黎為和會地點，但是我們沒有提到這一點，因為還在等待著法國的答覆。

於是，一九四五年聖誕節的清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經過五個月的協商，最後已經得到召開和會「重建人類和平」的協議。

這種決定不算是理想的，但是它使小國有了列席和會的機會。同時，大國也並不受我們本身也參加的和會的建議案的限制，棄了全體表決制，能够拒絕接受爲和會建議案所專斷地排斥的最後條約。經驗證實過和平會議的價值，歷史也告訴過我們，實際上和會裏三分之二以上所表決通過的建議案，總是加入在條約之內的。

這個問題解決後，我們又再討論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問題。會議的第三天，我曾經訪晤莫洛托夫，並且送給他一份馬可·伊斯利治的報告（譯者按：伊氏是美國國務院派往保羅兩國的代表），敘述羅、保兩國情勢的報告。我告訴他，我們本來打算把它公開印行的，現在只想把它拿來討論，希望伊斯利治的發現，能够供給一個理解的基礎。

莫洛托夫也不看這個報告，就反對它，說伊斯利治自然知道我是反對承認這些政府的，因此必定影響了他的判斷。

我把這份報告前曾中記述我對伊斯利治的提示指給他看，很清楚的，伊斯利治完全是一個自由的觀察者。我告訴他，在經過獨立的，毫無偏見的觀察之後，伊斯利治發現不但這些政府沒有遵守雅爾達協定，而且都是爲一黨所把持操縱，並且被暴力挾制而不能代表大部分愛好民主的人民。我請他特別注意，在羅馬尼亞，伊斯利治發現親法西斯的人物，甚至親納粹的鐵衛團的人

物，現在都又掌握了政權。

莫洛托夫指出一點事實，保加利亞是經過了選舉的。我要求他注意伊斯利治評述這些選舉完全毫無意義，事實上，伊斯利治在一個月以前，就指出了它的結果會如何。在羅馬尼亞，伊斯利治僅僅只能證實我們所知道的兩件事實，維辛斯基的活動和葛羅契政府就職後的高壓政策。

我要求他對於伊斯利治的建議給予特別的考慮，伊斯利治建議美蘇兩國締結一個類似在東歐的敵國所訂的協定。

讓莫洛托夫對伊斯利治的報告作了兩天的考慮之後，我送給這位外交部長一件公文，建議對這些國家分別採取行動。公文上提議，由於情勢有異而必須改變，三強應該聯合建議改組各該國政府，以容納所有的有領導地位的民主份子。莫洛托夫堅決地反對這個提議，他認為保加利亞經過了蘇聯承認的自由與無限制的選舉之後，已經無須再有改變；在選舉之後的任何干涉，他認為一定要引起保國人民最大的反對。他駁斥批評反對黨無法存在的反對理由，對於羅馬尼亞，他認為羅馬王不會求三強協助建立政府的，除非是受了英美代表的唆使。我告訴他，不是這樣的。但是，他不願相信我。他拒絕了伊斯利治的報告，說這僅僅是重覆述我的見解而已，不去旅行考察也可以寫得出來。

唯一的希望，似乎就是再去直接會見史達林了。當晚我就去見他。約好下午十點鐘見面，這正是我不常上牀睡覺的時間，但是這正是史達林開始辦公的時間。

我們首先討論一切外國軍隊撤出伊朗的問題。後來我就表示我希望討論巴爾幹問題，「因為我和莫洛托夫對這個問題鬧得很僵」。

史達林笑了，說這是料想不到的新聞。

我肯定地說：「解決這個問題和進行和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樣我們就可以對他們作經濟上的幫助。」於是我很快地把情勢敘述了一番，最後我說，如果我們不能成立協定，我就要被迫刊印伊斯利治的報告了。

史達林回答說，如果我覺得必須刊印伊斯利治的報告，他也將求愛倫堡（蘇聯官方記者），也是一個公正而到這道國家的人，發表他的報導。

這將很不幸的了，我告訴他，當這兩個報告會分散而不會溝通我們兩國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我表示我相信靠他的幫助和諒解，我們可以找到對蘇聯表示友好的民主黨派的領袖。

「只要雙方願意解決問題，辦法是可以找到的。」他說。於是他提出美國報紙控訴紅軍施用壓力加於保加利亞選舉的事情。他說這是不真實的。並且指出匈牙利，雖然蘇軍也在場，選舉的結果却並不是共產黨獲勝。這種批評，他強調地說，是侮蔑了蘇聯，蘇聯僅只希望他的鄰國不是敵對而已。他說他要我記住：在大戰期間，匈牙利的軍隊曾經攻到頓河，羅馬尼亞的軍隊也曾經到達伏爾加河。

因為保加利亞已經經過選舉，現在已不可能要它改組，但是，最後他同意了以勸告他們，

讓現在沒有參加政府的兩個重要黨派的兩位真正代表人物加入政府。他鄭重地說，不能強迫，只能勸告。他同意我建議的勸告應由蘇聯擔任。我說明白了我們將保留權利決定正式承認的條件是否已經建立？對於羅馬尼亞，他承認變動大政將沒有大困難。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同意由英、美駐蘇大使會同維辛斯基組織委員會，到羅馬京城與羅政府商討增加他黨人物，並且保證重建和享有人民的自由。史達林要我把他接受這個原先我在倫敦會議時所提出的建議的消息轉告貝文。我答應轉告英國外長，同時開玩笑地說，這好像我們已經成了一個對付英國的集團，因為我還沒有把我向莫洛托夫建議在莫斯科開會的事情告訴貝文，雖然我就要告訴的。

史達林也開玩笑似地說，這很明顯地不過是遮掩一下我們的集團的真相罷了。

第二天，我把史達林同意的建議提到會議上，但是，我們即刻就與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對於勸告羅國的措詞，作了一整天的辯論，當史達林請我們聖誕節晚宴的時候，辯論還在進行。晚宴的時候，我坐在史達林的右邊，貝文坐在他的左邊。我說我們的報紙曾經傳說他病了，現在我很歡欣地發現他很健康。他說他最近的假期是他好多年以來的第一次，經過這次大戰的磨折，已經不像早先那樣的健壯。在假期中，他曾經處理許多重要事情。但是他也得到了休息而且比前幾年更加健康。他說，他決定每年休假一次。

我熱誠地向他舉杯致賀，祝願他今後年年有假期和身體健康。

那晚我和史達林的談話，像前兩次一樣，是在坦白而熱誠的氣氛中舉行。在許多問題中，我

所特別着重的是伊朗問題。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告訴我們對於伊朗問題關切，是因為一九四三年在德黑蘭，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和他曾經簽定保證，在那個保證裏，三強領袖承認「伊朗對抵抗共同的敵人所作的貢獻，特別是在保衛從海外通往蘇聯的交通」。此項保證允許「戰事終了以後，伊朗發生的任何經濟問題，都將得到我們的全盤考慮」，而且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一致努力。並且明白地宣告「一致支持伊朗政府保持伊朗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願望」。

莫斯科會議以前的伊朗情勢，顯示這種保證已經達到將被破壞的險境。伊朗政府抗議：當他們派遣一千五百個士兵，到亞塞爾拜然省去鎮壓被外國勢力所煽動的叛亂時，這支伊朗政府軍隊被蘇聯紅軍阻止在途中而且強迫它退却。伊朗政府因此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完全撤退。我們立即下令留駐伊朗的美軍撤退，同時還分別致函蘇聯和英國，催促他們也採取同樣的行動。

伊朗的抗議還是在等候着答覆，我告訴史達林，除非我們實踐了德黑蘭宣言，伊朗政府就要在即將於倫敦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中提出譴責。作為宣言簽字國之一的美國，有義務支持伊朗列席的權利，我們覺得我們很難解釋，三萬蘇聯軍隊怎麼會受到一千五百個伊朗士兵的威脅。

史達林就把他認為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切要事實大略地敘述一番。蘇聯南部的巴庫油田與伊朗的邊界接近，因此這就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問題。為了防止伊朗可能向蘇聯作戰，為了沒法信任伊朗政府，這些地方就處在嚴密的防衛之中。破壞者還可能潛入巴庫油田縱火，他繼續說。因為條

約上規定，直到三月十五日以前，蘇聯有權在伊朗駐兵，所以並不準備在卅時期以前撤兵。到了那個期限，還必須要審度情勢，看看是否可以撤兵。這種決定主要的將以伊朗政府的行動爲定。他指出一九二一年的條約上，伊朗曾經給予蘇聯駐兵伊朗北部的權利，假如可能有外來的危害的話。

我告訴他，由於讀到德黑蘭宣言，由於讀到美軍駐伊朗總司令康羅利說伊朗政府在運輸供應品到蘇聯的工作上與美蘇兩國合作得到很好的報告，我非常驚異的知道他認爲伊朗政府是敵對的。他雖然有權利在三月以前駐軍伊朗，我指出他實在不必如此。美國，時常認定三月二日，而不認爲史達林所說的三月十五日是最後的一天。

史達林告訴我，蘇聯對於伊朗，沒有領土的或者其他的企圖。只要巴庫油田得到安全，就可很快撤兵。

我愈對於史達林繼續駐兵的理由想得更多，愈覺得我對於蘇聯的立場的信心更少，他的說法是荒唐的，三萬訓練優良，裝備齊全的軍隊，阻止了一千五百訓練很差裝備不全的伊朗士兵，在公路上整隊向亞塞爾拜然省前進，爲的是避免發生騷擾？他所敘述的「恐懼破壞者會從弱小的伊朗潛入蘇聯，縱火破壞巴庫油田」，也同樣的只不過是他在伊朗駐兵的不充分的理由而已。但是，他答應撤兵的問題將在撤兵日期討論，表示他認爲我們對於注意實踐德黑蘭宣言是正當的。因此，我就決定再作努力，使他了解我們對於實踐這種義務的意見。

伊朗問題是我第二次與他見面時首先提題的事情。我告訴他，我極端恐怕着這一個問題將在聯合國第一次會議中討論。我說，大國遵守他對小國所作的保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伊朗在倫敦會議中提出這個問題，那會很不幸的。我提醒他，因為我們了解這種情勢，並且由於我們的神聖的保證，我們將被迫支持伊朗的立場。美國將非常遺憾地在第一次聯合國大會中與蘇聯對立。因此，我希望我們能夠商妥，預先阻止這種可能。

我們討論貝文所提出組織三強委員會前往伊朗尋求一種完整的解決方案的建議。他對貝文的建議不發一言。於是我再表示我希望我們在伊朗的行動，不要造成我們的不一致。對於這點，史達林說：「我們不會做出使你們難堪的事情」。

聖誕節那天，會議重新再辯論巴爾幹和伊朗問題。最後，我們對於羅馬尼亞問題取得真正的協議，但在保加利亞問題上完全是一個僵局。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主張規定內閣只能護忠於現政府的人參加，貝文與我指出這種措詞，除了有利於那些已經宣誓忠於我們正在設法擴大的政府的份子以外，將要排除一切民主份子，而實際上，將使我們的協議毫無內容。貝文指出，他與邱吉爾作了三十年的政治鬥爭，如果在這種規定之下，他今天決不能進入英國政府。

十二月廿五日的下午，我與莫洛托夫有一次私人談話，在其他事情之中，他說他想英國對於伊朗問題的提議，大致是可以接受的。他詢問我的意見，我說我將接受這種建議，特別為的是想設法避免使伊朗把這問題提出於聯合國大會。在當晚的會議上，莫洛托夫提出對貝文建議的幾項

修正，貝文除了把撤兵日期留待討論以外，都接受了。他說撤兵日期在條約上已經訂定，現在的修正是不必要的。

從我們的私人談話看來，我想莫洛托夫最後會接受貝文的條文的。但是，十二月廿六日下午，當我們開會的時候，很明顯的，蘇聯最高當局已經決定改變了他們的態度。莫洛托夫宣佈伊朗問題不在議程之內而且「不能考慮」。貝文抱怨他自己實際上已經接受了蘇聯提出的每一條修正案。他說他知道，在他與史達林談話之後，蘇聯會同意他的建議的。

「很清楚地這種意見已經改變了，」莫洛托夫回答。「沒有任何的決定，這個問題不在議程之內，所以也無須乎在公報中提及。」

「我第二步怎麼辦呢？」貝文問。

「你當然知道囉！」莫洛托夫回答。

貝文激動地說，他想他知道這種情勢，同時覺得非常遺憾。

對於保加利亞和伊朗問題的熱烈的辯論，妨害了我們對其他問題再作協議，因此，我建議我們到倫敦談這些留待解決的問題。代表團人員隨即準備三國外長簽字的公報原稿，清晨兩點半鐘的時候，原稿完成。在一個正式的會議中，用兩種文字寫成的原稿，等待着簽字。那就是說我們每個人一共要簽九份。貝文第一個簽字了以後就輪到我，簽完了，我站起來向靠近我坐位的一位英國代表團人員告別。

忽然，莫洛托夫要他的一位助手讓我回到會議桌上。他說他的人员「誤會了」，把蘇聯關於保加利亞的提議寫在俄文原稿裏了。他問我們：這個是否不能接受？我們立刻說那不能接受。他又提議我們可以併用我的建議的前半部分和他的草案的後半部分，我說我們做事不能只做「半截」，他既然只做了一半，最好就接受美國的建議罷！靠着我這個噱頭，他答應了。

貝文談話要他再看看，是不是可以從口袋裏再找出一個誤會，使我們對於伊朗問題，也得有一個圓滿的解決。莫洛托夫也幽默地說，他很抱歉再也找不到。於是公報原稿經過修正後就簽了字。

那時已經是十二月廿七日上午三點半鐘。我疲倦得要死，我們都是這樣。莫洛托夫，維辛斯基他們比我們好些，因為他們習慣於中午開始工作直至半夜已過才止。

我們的飛機決定七點半鐘起飛，我整理好行李，小睡了一會兒。向美國新聞記者和廣播記者談了話，準時趕到機場，這時候似乎還很早，但是，莫洛托夫辛維斯和基已經到達機場向我們送行了。

三夜以後，坐在華盛頓廣播電台播音機前，向美國人民報告的我，比起十五個星期以前從倫敦回來以後，坐在同一播音機前的我，是快活得多了。召開和會的提案，在倫敦會議沒有接文，現在已經在莫斯科會議中接受了，參加國家也按照着美國所提出的名單。經過了十個月設法促使蘇聯遵守雅爾達會議對於巴爾幹的協定的經驗，我們完全地了解着協議與實踐的區別。但是，哈

里曼、鮑倫和其他幾位處理這些問題的人，感覺到我們已經在比較雅爾達更加特殊的協定上有了進步。

對日政策的問題，曾經在倫敦會議時成爲蘇聯頑強反對的重要項目，現在已經全盤通過杜魯門總統和我在啓程前所擬定的計劃。我們得到了關於美軍留駐中國的協議，同時還鼓勵了史達林重申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的態度。配合着馬歇爾將軍渡海時候正在着手幫助建立統一和民主的中國，這似乎是一項重要的收穫。

原子能的問題，我預料要遭遇困難的，蘇聯已經同意，實質上未經修改，支持英國和加拿大業已贊成的設立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決定。

唯一在會議上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是派遣一個委員會解決我們共同的伊朗問題的建議，所以我很驚奇和失望的發現我們的一部分報紙批評我們的協定是「緩靖政策」，有些批評我認爲是私人的。有些則是因爲人民很明顯的被引入了不正確的想法——大部分是由於蘇聯檢查從莫斯科發出的和會消息。但是，大部的批評，是從人民的欠缺理智的反蘇觀點，他們總認爲任何與蘇聯關於任何問題的協定都是「緩靖政策」。

具有在波茨坦，倫敦和莫斯科會議的經驗的人，無不會懷疑前途仍然有着不少的難受和嘗試的日子。但是由於莫斯科會議的結果，我們在一九四六年的新年，却面對着更大的希望。也許其他的國家也是這樣，我希望如此。

第七章 再至倫敦，重遊巴黎

我自莫斯科回國五天後，又飛至倫敦，參加聯合國第一次大會，主要任務是要使聯大通過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議案。在離華盛頓之前，曾宣稱大會通過此議案後，我立即返美。但至倫敦後，情形並不如此簡單，在莫斯科所討論的一些問題，又追蹤而至。哈里曼大使來報告，關於羅馬尼亞政府改組事，維辛斯基、寇爾和他本人在羅京舉行的會議，毫無進展。保加利亞政府擴大事，亦無頭緒，而伊朗問題更趨尖銳化。

伊朗代表來問我，他是否可以將蘇聯軍隊繼續駐在伊朗及干涉伊朗內政的事提交安理會檢討。他說貝文對此事未發表意見，因此，希望我提出意見，我說我亦無意見可以貢獻，因為安理會剛成立不久，無前例可援，目前似只應以最緊急問題交該會檢討。不過我告訴他，我願意對此事的事實，加以考慮，將意見於翌日告訴他。但他沒有等待我的答覆，即將問題提出，此舉引起蘇聯代表的猜疑，以為是貝文的主意，惹起伊朗代表這樣做的。從伊朗代表所告訴我的話看來，蘇聯代表的猜疑是錯誤的，蘇聯代表既生懷疑之心，於兩天後即提出反對英軍駐希臘的問題，烏克蘭代表亦提出反對英軍駐印度尼西亞的問題，於是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辯。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外次在距大會會址不遠的蘭克斯特大廈內集議起草和約，就在這樣的氣氛中進行着。

大會於一月廿四日一致通過原子能議案，我於是束裝返國，揆諸當時的情形，外次會議必會遭遇九月外長會議所遭遇的同樣阻礙。該會於是接受我們的建議，起草義大利和約，因為義大利不但在波茨坦協約內名列第一，也是因為法國對其他和約的參加權問題尚未解決的緣故。

三月已屆，但外次會議對於賠償，殖民地及義南疆界這三個主要問題，仍是意見紛紜，莫衷一是。關於義南疆界問題，該會決議組織一個專家調查委員會，於劃定疆界時應注意兩點，(甲)義南兩國人民留在外人管制下的數目應儘量減少，(乙)應對當地的地理及經濟因素予以考慮。我們的外次鄧恩，即委派馬斯萊代表我國參加該委會。於三月九日抵特里斯特。

外次會議於是討論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巴爾幹三國和約草案，法外次很機智地未參加，蘇聯所提出的草案很簡短，實際是略將停戰條約加以引伸而已。但對於英、美所提供的補充條款曾據有進展。

我們在莫斯科時，曾同意「在草約完成之後」及「在五月一日之前」應舉行和平會議。時間一天天過去，而外次議決的只有數條，我們如果不顧食言，自應採取非常行動，於是我向安理會其他會員建議，應召集會議，以促進外次會議的工作，並建議在巴黎開會。我們曾同意巴黎將作為召開和會的地址，而我亦懇切希望安理會亦能在該處開會。我認爲法國共黨既在巴黎非常活

躍，莫洛托夫或不致像以前那樣固執反對法國參加一切和約的檢討會議。我們訂於四月廿日開會。

第一次集會，皮杜爾建議四強代表均應參加五國和約的檢討。莫洛托夫雖然數月來極力反對此點，但此次很快地即同意了。不過亦表示這是他讓步的限度。

第一個引起爭辯的即是議事程序表。皮杜爾亟欲討論對德問題，而我提出一個德國發軍廿五年的草案，並建議組織特別外次會議，從事起草對奧和約。莫洛托夫表示願意討論德國問題，但認為我們所提出的和約建議並不充足，並完全拒絕將奧國問題排在議事程序表內。我瞭解如欲會議獲致進展，我和莫洛托夫必須會晤一次。於是我邀請他，維辛斯基及赫羅白夫洛夫，柯亨，波倫一同餐敘。

我們的聚餐是私人間事，但莫洛托夫和史達林那種時刻不離的護衛仍未稍弛。聚餐那天下午，蘇聯安全官員先至孟淵飯店美國代表辦事處視察聚餐地點。我的秘書孔納爾小姐欣然領着他們參觀我太太和我所居的房間。他們並不加以批評，於是我們以為他們對於一切安排表示完全滿意。

晚上貴賓們來了，那位和莫洛托夫形影不離的安全武官也一同來了。大廳的每一端我們都派了一名美國憲兵看守，但莫洛托夫的衛官仍守在大廳內，他可以看到這五間房的每一個出進的門，連我的辦公室也在內。

我太太和孔蕭爾小姐離房到樓下餐廳進餐。那位衛官對於自房間出來的人顯然不予以注意，因為當她回來時我太太擬進臥室，衛官却舉手搖頭。他的動作以任何官語演譯出來，自然是表示她不能進去。我太太即用美國話告訴他這是她的房間，剛離此下樓去的。但這位先生態度堅決，她不能進去。她們終於撤退至辦事室，計劃如何克服臥室的事，於是求援於陸軍，請留守大廳內的一位憲兵馳援。憲兵亦不懂俄語，但他一身戎服却使蘇聯衛官置信她們是可靠的人。無疑他接到的命令是不准人進入屋內。幸得憲兵之助，美俄關係的另一危機因而免避了。

莫洛托夫也許不知道這種護衛的方法。這些安全官員或由一個與我們的特務相似的組織管轄。我想莫洛托夫有時亦與我同感，希望能逃避這種時刻不離的看守。

我在倫敦時，英國警察當局特派一位幹員保護我，他從不准許我一人走出旅館。在巴黎時，是一位能說英語的便衣警哈佛納爾担任此職務，有一次我曾逃過他的看守，那是在和會最令人喪氣的一次集會之後。我太太也抑鬱不安，邀我出去散步。我不但喪氣，也厭憎老是被人看守着。我不願太太的反對，兩人自飯店的側門溜了出去。我以為逃過了安全官員的看守，精神為之一振。我們走了半小時的路，我無意間掉頭回顧，赫然看到哈佛納爾跟在後面。後來知道他是得着旅店一位職員的報告，才跟了過來。在「法律」和我太太反對之下，我只得承認我是錯了，以後不再違犯。

我時常覺得當安全官員與我在一起的時候，危險性更大。每天我們乘車去開會，車前有兩部

機器腳踏車引路，他們口里吹着嘴笛，以每小時五十哩的速度在巴黎街道上疾馳着，很引起行人的反感。我曾請他們將車開得慢一點，但他們不顧，仍瘋狂似地穿過紅燈。我們只得跟着疾馳，雖然速度表每跳動一次，我們的神經亦增加緊張一次。

我的話離題太遠了，再回到聚餐的事。我們尚未走進餐廳時，莫洛托夫即開始對伊朗問題美國所採取的態度，痛加批評。他說我們的行動不友誼，他的政府成爲「反蘇運動中」的受害者，伊朗事件及安理會被利用爲進攻的藉口。我即提出在莫斯科我和他及史達林元帥關於伊朗局勢所作的談話，其用意即在阻止伊朗問題被提交聯合國討論。當時我明白說明，如果一旦提交安全理事會討論，我們即不得不反對蘇聯政府。柯亨和我會將安理會實際情形詳細爲之解釋，並促其注意，如果蘇聯軍隊在和約日期之後仍駐在伊朗，此事即不能私下了結。

此次聚餐開始即缺乏和諧，無怪乎以後談到和約及德奧問題時，意見始終未接近。翌晨我和范登堡及康納利檢討局勢，我們咸認爲：這些問題在安理會中早日獲致解決的希望很少。

可是安理會關於義海軍的限制數額，剩餘軍艦的處置，法義邊界三處的修改，組織委員會檢討法國對鄧達布利格區第四次修正等案，很快地獲致同意。於是我們討論殖民地問題，莫洛托夫提出新建議，即二強托管的里波里泰尼亞，由俄義共同負責行政事宜。英國極力反對此議，貝文提出反建議，應立即予利比亞以獨立，法俄均反對此議，最後莫洛托夫宣稱：他可接受法國所提的義大利托管制度的建議，我們仍堅持集體托管制度的主張，不過後來我們說：如果其他國家稱

意，並應允十年內予殖民地以獨立，那末我們即可接受法國的建議，法方不同意此點，而英國又不贊成法國的建議，我於是宣稱我們堅持集體托管制度的計劃。

關於劃讓多得喀尼斯予希臘的討論，因為莫洛托夫堅持主張此問題應俟殖民地問題解決後再討論，故仍懸而未決。

義南劃界問題的討論，花費時間最多，亦最感棘手。四人委會留駐維尼斯求利亞四星期，各別提出建議，蘇聯建議接近南斯拉夫的要求，而英法美所建議的界綫在北部相同，南部則互異。法建議的界綫介乎美蘇建議之間，對於某些地理及經濟因素未加考慮，但對兩國少數民族有適當處置。當時所有的人口統計表極不可靠，但據我們的估計，法建議的界綫使留在南境的義民只有十三萬名。留在義境的南民計十一萬五千名。只有蘇聯一國建議，義應劃讓特里斯特，該地人口百分之八十是義大利籍。

五月三日，南首相及義首相分別提出意見，大致與吾人在倫敦時所聽到的相同。翌日外長開會討論，僵局亦未打破。莫洛托夫極力支持南國的要求，謂義大利擬利用特里斯特將為軍事根據地，作為伸展勢力侵入鄰邦的跳板，並謂：吾人不可分割特里斯特以懲罰吾人的盟國南斯拉夫，因為該地居民雖多義人，但實如首之與身，不可分離。我即指出將卅萬人口及數千方哩土地讓與南國，決非懲罰的行動，我再讓步，謂為折衷計；可以接受法國建議，如此阿爾沙煤礦區亦劃入南境內。我並建議在該爭執地區內舉行普選，這些建議均未為莫洛托夫所接受，而貝文，皮杜爾

和我亦不願再讓步，於是只好考慮其他和約。

爲作最後努力計，莫洛托夫邀請柯亨，波倫和我至蘇聯大使館餐敘，他說如果我們同意將維尼斯求利亞全區，包括特里斯特在內，讓給南國，他對於殖民地及賠償問題可以改變態度，但他表示他對於後一問題的讓步，將會影響希臘及南國的要求。他坦白宣稱，蘇聯不能放棄一億元的要求，因數目已十分寬容。我們表示無力接受此議，於是他和維辛斯基即發動一連串宣傳，詆毀美國採用「帝國主義擴張」的政策，指出美軍駐在冰島及中國爲例，並謂我們擬在土，埃，伊朗等國設立根據地。我本想以同樣方式答覆他，但隨即改變主意，只指出駐在冰島的人數只有七百廿個空軍地面工作人員，何能指爲是對蘇聯的「帝國主義」威脅，而關於中國局勢，我說明我們曾在莫斯科詳細討論，並聯名發表宣言。至於中東，我們沒有設立任何據點的計劃及慾望。

餐後的討論中，我對他說：「我們的基本政策，是將德日以外的國家內的駐軍早日撤退，因此我們會建議迅速與奧國簽訂和約，以便我軍可以撤退。但蘇聯政府駐軍既多，反對此議。世上無人可以懼怕美國或她的企圖，而我抱歉地指出，蘇聯或不能作到此步」。

莫洛托夫爲支持他的英美帝國主義的說法起見，回溯到一九一一年及美軍於革命後出征西伯利亞的事。翌晨他與貝文亦有相同的談話，聲稱貝文曾說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雖已死去，但廿世紀的帝國主義現正活躍不已，並以英軍駐在希，埃，伊拉克，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各處的據點爲

證。貝文雖極力否認此說，莫洛托夫以後在安理會及聯合國大會中仍作同樣的宣傳。

因爲此種論調之故，我們開始檢討其他和約。以後美國關於多瑙河自由航行及經濟機會均等的建議，莫洛托夫認爲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展及資本家統治，亦不足爲怪。

我和莫洛托夫餐叙的情形告知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他們亦如我一樣，感覺悲觀。在此情形下，爭執問題很少解決的希望。因此五月八日，我建議召集久懸空和會，作爲第一次的勝利慶祝節，並以六月十五日爲慶祝日，以便外次有充分時間，準備已通過的草約報告及對未解決的各條款提出四國代表的意見。

貝文和皮爾均同意我的建議，但莫洛托夫謂依照莫斯科協定，和會應於一切「基本問題」完全獲得一致解決後才能召集。其實，這是給與蘇聯代表一遇到任何爲「基本」問題不能同意時，即可運用否決權的機會。不過，我的建議顯然發生作用，因爲翌日外次的報告於一夜之間通過了十九個條款，以後的一星期，我們繼續努力於和會的召開事宜，但莫洛托夫在和會席上及非正式會議與私人談話中，始終態度堅決不移。他顯然是要延遲撤退他的佔領軍隊。

爲要獲致進展起見，我們建議委派特別副代表，起草對德的和約，但此議亦被拒絕。該星期中唯一的收穫是對義停戰條約的修正，即取消盟國委員會及大半軍事的管制。

五月十六日，我們勉強同意暫時休會，定六月十五日在巴黎再度會談。

我既未能把和會的日期決定在六月十五日，於是又試行提出七月一日和七月十五日，作爲和

會召開的會期，但也未獲成功，我在無線電廣播中說：「像我們在戰爭中採取攻勢一般，我們在和平方面，也應該採取攻勢」。我並且說：世界上沒有任何鐵幕是人類情緒所不能攻破的。

莫洛托夫對此的反應是迅速而猛烈，他說：「貝爾納斯所說的和平攻勢，事實上是一種不顧慮到和平的反蘇攻勢」。

可是，當外長代表在休會期內恢復討論時，蘇聯代表終於同意確確實實談判五項和約中的經濟部份。結果，當我們回到巴黎的時候，已加多了許多項業已同意的條款。

六月十四日，我們啓程赴巴黎，這是一年中，我第十一次橫渡大西洋，美國代表團這次決意要儘全力使和會的請柬發出。在會議開始的時候，照例略有小衝突，美國代表團散發對奧和約草案一份，請求置于議程之內，莫洛托夫先生不願意討論我們的草約，但是接受了皮杜爾先生的建議。按皮杜爾主張把「審查對奧問題」一節，包括在議程之內。以後莫洛托夫先生又提出審查「義大利政局」一項反要求。在此後十一天內，進展是非常的遲緩。可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僵局突然有了打開的徵象。我們對於若干經濟條款的同意，使我用出幽默和有希望的語氣說：「我們應該有一個美滿的下午，解決多得喀尼問題吧！」莫洛托夫先生的答復，很使我驚奇。他說：「蘇聯代表對於這一建議，並不反對」。

貝文聽了還不甚相信，他問道：

「莫洛托夫先生真的說他同意讓希爾收回這些島嶼嗎？」

蘇聯代表立即證實他確已同意，並且查詢下一問題是什麼。

莫洛托夫很鎮靜的說：「讓我們成立其他的協議！」我建議討論殖民地問題。他說：此項問題可以根據美國建議，予以解決，那就是延遲一年再行決定，假使到了一年，還未獲得協議，就懇請聯合國作一次決定。經過外長代表起草之後，終于獲得通過。

但是，賠償與特港這兩問題，都懸而未決。六月十八日，美國重新建議蘇聯可以從四方面獲得一萬萬美元的賠償。這四種來原是：（一）不能立即變為民用的戰時工業設備。（二）義大利在巴爾幹的資產。（三）義大利商船。（四）由英美獲得的其他戰利品。

莫洛托夫辯說：戰利品不能被問作賠償的來源，嚴格地說，他是對的。戰利品屬於獲得它的政府。莫洛托夫又說：對於義大利軍船隻，蘇聯應得到一部份，因為在波茨坦會議中，美英曾同意讓蘇聯獲得德海軍船隻的一部份，而這些船隻是奪來的戰利品。我們告訴莫洛托夫先生說：這些船隻，既是戰利品，蘇聯名份上就不應取得它們。德軍艦的讓給蘇聯，可以說是一種贈品，我們並沒有允許永遠把我們的戰利品繼續不斷的給蘇聯，作為贈品，因為他們也沒有把戰利品分給我們。

至于其他三種來源的賠償，他表示接受，但指出我們的估計是過高。據他的估計，這三種賠償，共僅三千萬美元；其餘的須取自現行生產品。我們保留這一問題的繼續討論，建議觀察各商船，並研究估計其他賠償品的方法。

三天後，皮杜爾提出出特港問題，他建議在該市暫時建立國際政權，其他三外長對此，均未置可否。當晚，莫洛托夫偕同維辛斯基等來訪我們。莫洛托夫主張把特港移交給南斯拉夫，我們答稱決不能同意特港歸南國管理，同時並請雙方都考慮皮杜爾的建議。

翌日，我建議和會在七月十五日召開並發出請柬。同時利用休息時期，解決其餘的問題。至于十五日未能解決的各項，我們將向集會的十七國提供報告。

雖然莫洛托夫依然堅持這種建議尙未成熟，但是貝文和皮杜爾也參加進來，一致敦促立即發出請柬。我們最後決定在廿四日星期一開始檢討有所和約的進展情形，並在下一個星期五重新考慮美國主張召開和會的要求。

星期一早晨，莫洛托夫要求我在那天下午再在我房間內和他會晤一次，繼續商討特里斯特問題。會晤時，他建議特里斯特和它的鄰近地區應該宣布爲自治區，主權屬於南斯拉夫，而由一國際規章加以管制，後者可由四強起草。我們指出這和皮杜爾的意思頗不相同，因爲他是主張由聯合國管理並由聯合國任命一行政長官的，但是我們答應考慮。次日下午，我們去答訪他。

我說：「我們已經分析過你的建議，並且覺得這將造成一種不可設想的局勢，因爲一旦主權屬於南斯拉夫且由一南斯拉夫人担任行政長官之後，四強代表就不能有所作爲，而和聯合國也將毫無關係了。美國不能贊同特里斯特區主權屬於南斯拉夫。我承認蘇聯不能贊成這地區的主權屬於義大利，所以我們願意考慮其他建議，以謀獲一出路——這就是說或者根據皮杜爾的建議由聯

合國家管理，或者讓這個問題留待和會決定。我贊成後者，因為這樣，責任就可以由廿一國來負擔了。」

莫洛托夫於是就問假如特里斯特問題獲得了解決，賠償問題能否以「積極的態度」加以處理。我說我以為這將造成極大的困難。

我繼續說：「美國不願協助他國使其實施賠償，但是假如蘇聯能夠供給義大利若干種原料，由義大利製造蘇聯所需要的貨物作為賠償，這一計劃倒有同意的可能的」。

他於是問，假如協議獲致之後，美國是否將簽署所有和約，包括對保加利亞的和約在內。我告訴他說我認為在這方面不見得有什麼困難，等到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可以加以討論。我於是問他能不能勸誘保加利亞政府實行莫斯科決議。他所能提供的唯一答覆就是他的政府已經嘗試過，但是保加利亞的反對黨已經拒絕，所以失敗的責任應由它們負擔。我們在這樣探測了一番彼此的立場之後，就分別了。

次日下午，皮杜爾建議舉行一次參加人員應加限制的夜會，在這次集會上，每一外長祇能有兩個顧問隨從。

和以前發生這種情形的時候一樣，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和我一起去。莫洛托夫起先重新提出他在我們私人談話中所提出的建議，繼而更進一步提到法國的建議。這次他不再建議一個南斯拉夫行政政府長官，而建議二個行政長官，一個是義大利的，一個是南斯拉夫的，會同管理行政。

這個辦法當然引不起興奮的情緒，最後貝文說會議的程序似乎不能決定任何事情。莫洛托夫強硬地回答說，對於產生這種結果，英國人不應該低估他自己的作爲啊。

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果討論之後，竟能於次日就多得喀尼斯問題和義大利殖民地問題獲致協議，不能不說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但是就在這方面獲得了協議，還是有許多事情要做的，而進展的情形依然非常緩慢和困難。爲了使工作推進起見，我要求將召開和會的建議列入下一次會議的議程中。莫洛托夫表示拒絕，但是我聲明至少我將提出這個問題加以討論。次日，除了蘇聯代表之外，每一個人都同意和會應於七月二十日召開。莫洛托夫堅持這個建議必須延遲幾天再作決定，以便先行討論皮杜爾就特里斯特問題提出的建議。

特里斯特問題於是進入一嚴重階段。我們不喜歡自由領土的見解，但是這既然是解決難題的唯一辦法，我們就決定設立這個政權，以求有發揮作用的機會。莫洛托夫首先建議一個領土的綱要，但是這是不可能實行的：這個建議主張將船塢和港口切斷，它把市區和水源割開，而把電力變壓機置於南斯拉夫範圍之內。他要求四國監督不贊成聯合國監督。我們拒絕讓步，力主監督的責任應歸安理會，不應該歸利害衝突的四國委員會。

七月三日，我們重提和會問題。這一次，莫洛托夫說他不能有所同意，除非先將賠償問題解決，但是他最後被迫建議九月一日爲可能召開和會的日期。其他三國外長拒絕這樣拖延，但是在原則上他已經有所確定。我們在八時半結束會議，心裏覺得七月四日將爲且有決定性的一天。

次日，我們在下午五時開會。一俟各代表提出慣常的報告之後，皮杜爾就建議會議休會半小時，以便四外長在他的辦公室中就召開和會日期問題作一次私人的討論。在他的辦公室中，他說明他所以提出這個建議，目的乃在希望將和會與賠償問題同時加以解決。

我立即說明我們已經屢次表示願意重行檢討賠償問題，但是必先就和會日期問題作一決定。他說美國不願意使召開和會問題協議的獲致，應該受其他問題的約束。莫洛托夫否認他有這種意思。皮杜爾於是重作寬取妥協的努力，此在莫洛托夫，則亦同意在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在那時候，我就插言說，在和會日期決定之前，我們不能討論賠償問題。貝文的說話更尖銳，他說他不能在議會中說和會的召開是用一億美元向蘇聯買來的。

莫洛托夫在考慮之後，就有所決定。他說他並無購買任何東西的意思，他僅要求蘇聯的合法要求能夠得到考慮。所以他就同意在外長會議中先討論和會日期問題，然後再討論賠償問題，希望兩個問題能够在同一天獲得解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回到會議室，而在五分鐘之內即協議在七月廿九日召開和會，並訓令各代表草擬請柬。

美國代表團於是就提出了一個賠償建議，繼即發生六小時的冗長辯論。七月五日上午一時，我們終於勉強同意蘇聯應獲賠償一億美元，這個數目，可從義國和平經濟中不需要的工業設備，義國在巴爾幹各國的財產以及由蘇聯供給原料義國生產貨物的差額中提取。莫洛托夫願意讓其他賠償要求在和會中再行討論。

我們預料請柬可於次日發出，但是我們顯然錯估了莫洛托夫頑強的手段。他拒絕請柬用外長會議的名義發出，因為這樣將使中國成爲邀請國之一。更重要的，他堅持我們必先就和會的程序規則，獲致協議。繼之就發生四天激烈的辯論。莫洛托夫所提的建議將使和會簡直不能有一點作爲，祇能批准四外長的工作而已。我告訴他說美國不能同意將規則使獨立國家的一個會議接受，並且堅持和會應有決定其自己的程序的權利。

根據皮杜爾的建議，我們最後再開了一次私人會議。蘇聯代表接受了一個建議，就是和請柬一同發出的程序規則草案，應該僅僅作爲外長會議的「建議」看待。在這些規則之中，包括一點，就是修正應由三分之二的多數提出。莫洛托夫要求逐點討論草案，但是我表示拒絕，聲明美國不能受這種規則的約束。最後終於獲得了協議，和會的請柬最後在次日即七月九日發出。

第八章 巴黎和會與它的紐約結局

我們準備參加和會，相信我們美國所要說的話能够代表國內各個政黨，也能代表大部份美國人民。這種精神，從美國人民響應華盛頓郵報提議熱烈歡送代表團的情形反映出來。在我們啓程的那天，廣大的羣衆站滿了到「國家機場」的路上，擠滿了機場，來歡送我們。這一種人民渴望和平的動人的表現，在我們十一個星期的會議期中，真是極大的鼓勵的泉源。使得爲召集會議及謀取和平而費去的十二個月的工作以及六千里路的旅程更爲值得。

法國政府與人民都盡他們的力量，安排着一個適宜的求取和平的場所。法國人做主人是卓越的，但即使他們最好的努力，也無法消散自從外長會議結束以來的不和諧的感覺。

社交活動多得使人體力難於忍受，所以除了政府首長及外交部長以外，我不得不拒絕一切邀請；然而我必須承認，在這種和平會議的集會中，社交生活也有其價值，祇要人們如朋友般相會而繼續不斷地討論他們的問題，問題就有解決的機會。這種想法，甚至最高法院也認爲如此，每一個法官在走進會議室後，都與在場的其他各位法官握手，不論前一天法官之間的爭辯是如何熱烈，如果他們用握手及談話來開始這一天，他們或者可能調和他們不同的意見。在我與各國的代

表商討時，我沒有忘記這從法庭上學來的課程，這在和會的緊張的日子中尤其有價值。

我們參加和會的觀點與蘇聯政府完全不同，這一件事實從開始就造成衝突。我們相信討論應該完滿而自由，即所有出力贏得這一次戰爭的國家，都應該有為和平而提出建議與修正的最大權利，他們的提案當受重視。我們相信一種永久的和平必須是人民的和平。

然而，蘇聯的態度，似乎這和會應該簡單而迅速地確認外長會議中的協議，而建立和平，主要的（如果不是絕對的），僅是強國間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信念，我在開幕詞中宣佈美國將支持外長會議中的協議，但是，如我在外長會議中已說過的，我對於每一種提案，不管外長會議所交下的如何，均將另付表決；如果和會中提出任何問題未經外長會議同意，祇要有三分之二多數的通過。我將盡力使外長會議採用這種提議，不管美國自己在和會中是否贊成。莫洛托夫對此立即就指責我們的立場（也就是英國採取的立場），破壞了外長會議中所決定的關於和會程序規則的協議。第一次我不管他的指責，但是當他以顯然反對的目的再提出時，我就宣讀外長會議記錄中六種不同的文件，其中我保留美國贊成任何修改程序的權利，我說我所以常常「保留」，僅僅是因為我知道莫洛托夫的鬼計，「從這記錄來看，」我聲明說：「祇有莫洛托夫會說我已同意贊成這擬定的程序規則。」

我指出，當他演說美國與英國贊成修改表決程序的規則乃是「善變」時，他自己演詞的結尾已經修改了這規則的同一部份了。

「因此，祇有莫洛托夫會得這樣做。」我又說。

程序問題的論爭。冗長又尖銳，差不多有三星期，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用一切精密議院法則者的本領來限制小國與中等國家的參加。這是與那些國家的利益與希望相反的。此外，蘇聯代表如此難堪地用手段詰問與他們意見不同者的動機，以及信口開河地指責我們組織集團。因此，使有些原先以為西方國家外長對蘇聯不懷好意的代表團，觀念大為改變。從那時候起，這些代表對蘇聯就極為非議，一般都投票反對他們。蘇聯代表團又宣稱和約重提到外長會議時，他們對於任何過半數通過的條文，因無前例可援，都將置之不顧，但事實上，蘇聯的提議在表決時大多數總被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所反對。

莫洛托夫以為我們與英國組織了一個集團反對他們，事實上，則我之參加會議，從來想都沒想到這一種力量。後來，在和會中，他甚至指責我們教唆小國來提出修正。其中有許多修改的提案，贊成我們原先對和約的建議，但當時在外長會議中，因為蘇聯的否決權而放棄。莫洛托夫緊緊控制他的贊成者的投票及行動，他認為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如比利時、荷蘭、南非洲、奧地利、紐西蘭，有他們自己的主張，而我們也不願影響他們的觀點，這對於莫洛托夫是無法瞭解的。所以，他指責我們組織「集團」，目的在破壞外長會議的工作。

最後我被追問他：「什麼時候發生這集團之說的？那些一票一票跟着蘇聯投票的有什麼權利稱我們不是常常同意蘇聯的國家為集團？當紐西蘭建議所有提案以過半數表決，結果以十一比九

票不能通過時，沒有一個人抗議說這提案是被蘇聯集團所擴斥的；但是，當蘇聯的關於表決程序的提案經十五比六的絕大多數不通過時，就被指為這是有英美集團而失敗的。這真是多麼放肆而惡毒的話！」

在程序之爭將結束時，我打電報給參議員康納利及范登堡，催促他們來參加代表團。我需要他們來為美國辯護，抵抗那些被蘇聯及其附庸國所發動的對我們的攻訐。如過去一樣，他們立即答應我的請求，他們做了最有效的工作。

康納利在會中担任處理義大利和約政治部份的美國代表，由副國務卿鄧恩(James C. Dunn)與一位出眾的外交官里勃(Sam Reber)協助，范登堡代表我們負責所有和約的經濟問題，以現為副國務卿的桑伯(Willard Thorp)為助。其餘美國代表的任務如下：駐倫敦大使哈里曼參加羅馬尼爾和約委員會，駐巴黎大使卡弗萊(Carter)參加保加利亞和約委員會，駐莫斯科大使史密斯(Smith)參加匈牙利和約委員會，理查·康乃萊，鮑爾麥，柏雷斯(Richard C. Small, Bailey, Price)參加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亦討論海軍問題。

每晨九時，他們幾位和我及各位國務院專家相聚，每一個委員會的代表都做一報告，以使代表團每一份子知道各個委員會的討論情形。並且，如需要的話，可以使代表團全體對某一爭辯的題目，下一決定。這是一個和諧而工作順利的團體，沒有一個國務卿曾經受到更尊重而有能力的支持。

在初期會議中，新民主義義大利的首相羅斯貝里 (Guglielmo) 出席，提出義大利的問題。他與他的代表團仍被視作敵國的代表，除了皮杜爾之外，沒有一個代表團歡迎他。皮杜爾當時是主席，他循禮介紹了加斯貝里，這位義大利首相很老練而莊嚴勇敢地將他的問題提了出來。在他離開演說壇走過會堂的中間走廊，回到指定給他的最後一排坐位時，經過許多認識他的人面前，全場悄然無聲，沒有一個人對他說話，這使我感到真是不必要的殘酷。我像別人一樣，曾在倫敦見過他，所以當他走近美國代表團時，我就站起來和他握手，隨後又送一封信給他，請他在那天下午到我房間裏來，我要鼓勵這一位曾在墨索里尼手中受苦現在又在聯合國手中受苦的人物。

在離華盛頓赴巴黎之前，我曾被授權在對義大利新政府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上幫助他們。我們在法國裝備我們軍隊的費用都付款，但在義大利應得的供應，預算委員會却反對付款。理由因為義大利是敵國！由於這委員會的主張，付款就被財政部擱置。我與肯能 (Cannon) 和坦勃 (Tabor) 兩位代表提及此事，前者是委員會的主席，後者是高級共和黨員，這兩位先生是常常受任意揮霍的官員所攻訐的。以我多年的經驗，我曉得他們祇是想保護納稅人的金錢而已，而且我常見他們對於值得付款的事情甚表同情。當我告訴他們，那些軍隊的供應是義大利站在聯合國這邊作戰以後才供給的，他們立即表示願意撤回反對。

我知道加斯貝里首相在和會中受到屈辱，就乘那天下午告訴他美國政府願意付款的決定。但我警告他，我們的決定將等義大利和約完成以後才能宣布，否則，向義大利要求賠償的國家或者

會增加他們的要求。

有時候，我們以為和會永遠不會結束了，每一項題目稍有爭論時，蘇聯就提出它的意見，然後幾個附庸國發表贊成的演說，每次演說都要譯成三種語言，所以進展很困難。一直等到其他國家的代表，並無任何正式集會或諒解，僅是由於一般的要求，開始抑制發表演說，主張以投票代替時，工作才能開展。

雖然如此，我認為蘇聯代表團及其附庸國的態度尚非完全令人沮喪。在我看來，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在小組委員會前及在大會中，對於提案的討論既如此熱心，則將來當不致於對和會中通過的提案拒絕考慮。

在辯論過程中，極少指控不是對美英而發生的。我們被控與「法西斯蒂」勾結，以「國外投資及卡特爾制度」奴役義大利，用資本征服弱小國家，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可惡而可笑的罪惡。

我們力求盡可能避免捲入這種性質的論辯，但是有時候我們必須答復。其中之一是在戰敗國家提出對和約草案意見之後莫洛托夫發表的演說。這是一篇放肆的演詞，他支持戰敗國對我們的同盟希臘的攻擊。而且，不友好地將義大利與蘇聯統治下的巴爾幹政府比較。他也直接攻擊美國與英國的和平政策。

我答復說：「在這相關的世界中，如果忽視這種對美國的一再的侮蔑與誣捏，和平不能再繼續了。我堅決反對蘇聯政府給予和會這種印象，即是別的戰敗國較之義大利來得民主，僅因為他

們的觀點與蘇聯的相符。美國相信一個國家有其主權，我們反對使小國成爲大國的附庸。」

我提出莫洛托夫所指若干強國已在戰時發財自肥，問他是否指會爲戰爭耗費四千億元，並且會給予蘇聯一百十億元租借物資的美國而言？我指出我們不要領土與賠償，與蘇聯的在和約草案中分配到大量土地和幾萬萬元剛巧相反。

「美國亦必須否認蘇聯代表團所稱：美國所提出的根據平等原則的經濟條款，是爲了美國自私的利益，而想催毀戰敗國家！」

有一次維辛斯基一週又一週地指責美國「伸手」企圖統治世界，我注意到在他的演說結束之時，坐在我們代表團前兩排的捷克代表團熱烈地拍手。我剛巧聽到捷克向我們借到一筆五千萬元的貸款購買剩餘物資，這筆貸款之借與，乃因捷克政府爲復興工作而需要財政援助。我查問後，悉捷克政府已經將這「緊急」貸款中的一千萬元，以百分之六的利息，加百分之七的管理費，訂約轉借給羅馬尼亞。這樣，捷克人賺到一筆大賺頭，因爲他們問我們借的錢，祇要付百分之二·三七五的利息。

我立即打電報給國務院，停止再將借款撥付。幾天以後，那位非常能幹而動人的捷克外長馬莎克(Masaryk)就走來看我了。跟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代表克里門鐵斯(Clementis)，他是捷克政府中的共產黨代表。馬莎克問我，什麼事情在破壞美捷兩國間的友誼？我告訴他：我們間的友誼不需要破壞，但是一個國家的官員聽到別人指斥美國「伸手」統治世界而喝采，對於這個國

家一切救濟措施與貸款都要終止。我確實告訴他，我們希望與捷克友好，但我們不願意再「伸手」來冒犯他們，尤其在看到捷克報紙反對我們的激烈言論以後。我也告訴他捷克與羅馬尼亞的交易如何使我吃驚。並說，我們借款給捷克是相信他們需要貸款，如果羅馬尼亞需要我們援助，他們可以直接請求，捷克不該作爲我們的「僱商」。

馬莎克告訴我——我相信他是誠實的——關於與羅馬尼亞交易一事，他完全不知，他對此事很爲抱歉。他說，他要去查究真相。克里門鐵斯則知曉這件事，但他解釋說交易尙未完成。我告訴他說，交易所以沒有完成，是因爲我發覺而把它阻止了。

此後，我又得到情報，於捷克政府稍爲有利。原來我國財政部有代表訪問捷克，一位捷克官員來見他，那位官員向他請教關於羅馬尼亞交易之事，我們的代表回答說他對此事無權決定，但這提議可以送給美國政府加以考慮。捷克官員後來就引用他的話作爲羅馬尼亞訂約的憑藉，推說他們以爲如果我們反對他們轉借給羅馬尼亞，就不會預付貸款了。

同時期內，我們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也發生危機。南斯拉夫是一個約有紐約與本雲凡尼亞州那樣大小的國家，有一千六百萬人民，曾參加俄國革命戰爭，而是一個澈底的共產黨領袖托元帥在那裏取得了控制。一年以前，南斯拉夫軍隊想以武力佔據奧利亞（Croatia）的時候，我們與他已有困難。後來南斯拉夫軍隊雖然撤退到毛根線（Morian Line），但沿線仍有間續的小衝突。另一種摩擦是關於空中飛行，我們的陸軍空運隊在羅馬與維也納之間飛行，經過北義大利的

烏庭 (Udrine) 至奧地利的克萊根福 (Krautendorf)。這兩地之間直線航程祇六十五公里，但因南斯拉夫的西北角突出在兩地之間，而南斯拉夫抗議我們的飛機不能飛過他們的領土，因此我們無法在兩地間作直線飛行。因為地形如鋸齒，而且有許多航行上的障礙，所以命令常常難於遵守。駕駛員要駛經一個山高九千呎的峽口，四週的山峯高至一萬八千呎，氣候惡劣時極易失事，平時亦有碰撞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一個友好的國家會提出抗議，但南斯拉夫却指我們侵犯他們的邊界一七六次。我們的陸軍否認此種指責。

八月九日，一架軍用運輸機載有七位美國人，一位土耳其人，一位瑞士人，因迷路而盤旋於南斯拉夫領土上空，被兩架南斯拉夫戰鬥機所襲擊，被迫降落於一麥田之中。土耳其軍官受了傷，其餘八人立刻被拘禁於布爾格萊特 (南國京城) 的旅舍中。八月十九日，另一架赴羅馬途中的運輸機，在飛過克萊根福時還拍電到烏庭，但從此就失去聯絡。其後，克萊根福有報告說，它被南斯拉夫戰鬥機所擊毀，五位美國人的屍體在五天以後才找到。

國務院向南斯拉夫查問此事，狄托元帥發表一挑戰性的演說，指責我們派遣「整隊」的軍用機飛過南斯拉夫！我就去請和會中南斯拉夫代表團長亦即南斯拉夫副首相卡台傑 (Kacelj) 來，告訴他我所接到的消息，要求他解釋。他說，除了獲悉我們的飛機常常不遵守通知而幾次飛過他的國土以外，其他一無所知。

我告訴他：「南斯拉夫口口聲聲說是友好的政府，而且你們的飛機可以在任何時間飛過我們

的領土；如果你們的一架飛機飛過加拿大失事，而剛巧飛進美國降落，即使你們並不與我們友好，美國的官員仍將覺得這是他們的責任，來盡一切力量，以求南斯拉夫駕駛員與旅客的安全與舒適。任何官員假使不這樣做，就要受到我們政府的懲戒。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反用美國軍用機來射擊南斯拉夫飛機，殺害其駕駛員與乘客，這種罪行，美國政府決不會做，所以美國人民決不會寬恕南斯拉夫。」

我要求他與他的政府通消息以求解釋，同時我也與代理國務卿艾契遜通消息，艾契遜派了一位官員來從外交途徑交涉，但接到的答復非常不滿意，我就發出指示，警告南斯拉夫，除非我們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得到滿意答復，否則我們將籲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採取適當行動。

美國下院的美教書的消息傳到各國代表團時，會場空氣甚為緊張。我注意到莫洛托夫團體中的一位代表離開他的代表團，走到南斯拉夫桌邊，與卡台傑耳語，然後莫洛托夫與卡台傑兩人先後從不同的門口走出會議室。我們的一位代表看到他們在休息室裏密切談話，大部份都是莫洛托夫講，卡台傑聽。這或者不是有關我們與美教談話，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獲得了滿意的答復。

當時，和會的疲勞工作繼續下去，大會常延長到清晨，在大多數關於經濟條款的爭辯時，我是主席。五種和約的經濟條款幾乎完全相同，當義大利和約的經濟部份點票表決後，我希望其他和約的同一部份不需要再來表決，但蘇聯代表團的想法却不同。

雖然，事實上，每一敵國的和約小組委員會是由所有會與該國作戰的國家所組成，而且在各委員會中，凡遇重要事件都付表決；但大多數在大會中起了爭辯，再付表決。結果雖然極少變化，但莫洛托夫永不放棄嘗試。即使一種小組委員會的決議已在大會中得到三分之二大多數的通過，他仍要求點驗不贊成的少數票數。結果，在五種和約中，每一決議都要兩次點票。莫洛托夫與他的附庸的這種策略，適足以造成他所指摘我們的所謂「西方集團」，如果想產生一個集團，那他的作爲遠較我們有效了。

許多次深夜，我從會場回到旅舍，既沮喪又疲乏。幾星期前，我離華盛頓時，一位記者問我重赴和會有什麼感想？我曾答復他，用古代黑人精神的語來說，我是「站在祈禱者的立場」。有一夜，當和平的希望真正黯淡時，我的太太遞給我一包從華盛頓寄來的信件，大多數來信是那些聽到或讀過我在機場談話的人寫給我的，他們告訴我，他們爲和會的成功及我的努力而祝禱，他們並不是寫信的老手，他們都是些好百姓，渴望和平而相信祈禱的效驗，他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來信給了我多少安慰！

到和會將結束時，莫洛托夫匆匆返莫斯科，我想他是去和他的同僚商量，我很高興他這樣做。在會議中，他與維辛斯基對美國的態度是如此不友好，使我覺得他這次去莫斯科商量後，任何轉變都會是向好的方面轉變，這實在不可能更壞了。

當和約審議完成，南斯拉夫代表在最後一次會議中並未出席。代表團的主席送了一封信給大

會主席，說是因為關於特里斯特的提案未能滿意，所以南斯拉夫不願出席，並且不願在和約上簽字。由於他們不斷威脅，除非大會同意他們對於特里斯特的主張，否則不在和約上簽字。我們代表團就建議，並經過大會過半數通過：任何國家拒絕簽字者不得享受和約產生的利益。後來，在紐約的外長會議中，我堅持此建議，莫洛托夫終於同意，我就相信南斯拉夫不會拒絕簽字了。

大會開始時，除了在外長會議中已經同意的項目以外，尚有二十六條未經同意的項目要討論，而總計起來，約有三百條修正案需要討論，但是大會的真正中心問題在於特里斯特，賠償總數，以及多瑙河管理等三項問題。

外長會議對於特里斯特應該怎樣治理，未獲協議，所以指定一特別委員會來研究。如所預料，委員會擬具了四種不同的建議交給大會，我們在準備我們的草案時，想到前國際聯盟與但澤自由市的不愉快經驗，因為自少數有組織的納粹份子控制了但澤的立法權以後，國際聯盟所指派的最高主席就無力保護該城的完整。所以我們決定應該予特里亞斯特的總督以大權。但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反常的現象，即是西方民主國家主張由安全理事會任命一位幾乎有獨裁權力的總督，而東方獨裁國家反而主張以普選立法來治理。雖然如此，我們決定盡力保護這一區域免得受人置食，免得特里斯特送給南斯拉夫，猶如但澤被送入德國掌握。

蘇聯對這問題的草案，則除給予總督有名無實的地位之外，並將特里斯特附於南斯拉夫，主張特里斯特的鐵道共營，雙方境內並有自由殖民與僱用之權利。最後，大會以十五比六票通過法

國的折衷方案，該方案與英美方案較為接近。

賠償問題的爭論也同樣困難，但大會最後以一九四五年與蘇聯停戰條約中規定的三億元通過芬蘭和約，羅馬尼亞和約，匈牙利和約。我們雖然請大會認識匈牙利境內一般的經濟混亂情形，主張減少賠償三分之一，但未成功。保加利亞對希臘與南斯拉夫的賠償則決定為一億二千五百萬元，雖然此數目曾被斯拉夫集團目為太高而反對。

最大的賠償之爭，當然在於義大利，各小國提出的要求總數達數十億元，因為我們在外長會議中同意以一億元賠償蘇聯，我們當然不能完全拒絕小國的要求。但是我們要想使他們明瞭，如果真正照我們的希望，我們美國也會提出二百億元的要求。英國的要求較小，是一百十億元，但也並無必得的意思。最後，大會決定對蘇聯、南斯拉夫、希臘各賠償一億元，愛沙尼亞二千五百萬元，阿爾巴尼亞的要求則被拒絕。我們祇有設法在和約的其他部份，如聯合國財產賠償，在聯合國中的資產及佔領費用等條款中，減輕義大利的負擔。

當我們與英國提出保證巴爾幹半島國家內的經濟機會均等，及開放多瑙河的提案時，大受攻擊。蘇聯代表團公開說他們相信我們的目的是向蘇聯的控制東歐挑戰。吾們的論據，則說明我們要求：雅爾達會議所協議的原則，應該在條約中實現。但我們被指責為計劃用資本主義「奴役」巴爾幹人民。在大多數爭辯之中，我們由范登堡與桑伯及林斯德三人能幹地辯駁，他們力求在條約中規定每一戰敗國必須對任何聯合國，基於互惠基礎，在貿易上無歧視，在經營商業上與國人

隨等待遇。同時，我們還要求關於經濟機會均等，與在十八個月內訂立民航協定的平等權利。

范登堡領頭，爲多瑙河的自由貿易及自由航行而爭，他與貝文指出：從一八五六年起，多瑙河就由國際管理。但莫洛托夫指那時的協定是「帝國主義條約」，認爲多瑙河的權利值與沿河國家相關。九月三十日，范登堡發表一篇流利的演說，主張採取英美的聯合決議，確定自由貿易與自由航行的原則。在和約生效後六個月內，再召集會議，由四大強國與沿河國家參加，商訂多瑙河的一切新的國際交通計劃。這一決議，略經修改後，爲大會所接納，訂明於和約的最後草案內。

這些是大會中最主要的三項爭執。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困難問題，例如：自第一次大戰以來，一直有糾紛的領土與少數民族問題，其中包括匈牙利割給羅馬尼亞的外錫凡尼（*Megyeri Nyitra*），羅馬尼亞割給蘇聯的波柯維納（*Bukovina*），以及蘇聯從芬蘭得到的泊珊摩（*Petsamo*）與包克拉（*Petaja*）的海軍基地。此外更有各種要求，例如希臘要求南阿爾巴尼亞的北愛奧勒斯（*Epirus*），蘇聯支持保加利亞向希臘索取西雪蘭斯（*Thrace*）的省份。

在這些要求與反要求之中，義大利與奧地利在大會中表現了一次政治家風度，成立一種光明的協定，保證義大利所屬南泰羅爾（*Tyrol*）地方德語民族的基本人權。我們企圖以這種雙方合理訂約的例子去解決其他問題，如捷克希望將它馬格耶（*Moravia*）的少數民族交回匈牙利，但未能成功。

總之，和會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五十三種條款，以過半數通過四十一種條款交給外長會議。十月十五日，和會結束後，很明顯的，外長會議將有更多星期的疲勞工作才能完成和約。

雖然和會並未達到所有我們的希望，我們覺得幾個月的工作消磨得很有意義。我們認為智慧並非四大強國所獨有，所以澈底堅持小國對和約亦可有重要貢獻。他們提案的價值，可由後來和約所包括的條款數目來證明。

外長會議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在紐約重開，這一次對於程序並無爭執，立刻就開始討論和會通過的義大利和約。至於別的方面，則很少不同。事實上，如果會場不在華爾道夫旅館，我或者以爲我已回到一年前的倫敦去了。

以前我從未想到協訂和約尚有許多機械工作。五星期的紐約會議中，八十五萬五千頁的文件，需要複寫。會議的時間及會議中每一種動作，每一種協議，都要用各種文字向各個代表團一遍一遍的校正。

整理文件的工作，實際上在代表們回去以後尚繼續了兩月。語文專家必須校閱三種文字的和約藍本，另外一本譯成各該戰敗國的文字。所以，五個戰敗國家的和約，每一份都要用四種文字。此外，近乎十四萬三千幅地圖，必須繪製插入和約之中。這樣，全部工作須完成二十種不同藍本，總共有四萬四千冊，皆由國務院國際會議部主任凱爾納（Kehner）主持辦理。

這些都是紐約外長會議中新發生的情形，但坐在會議桌上的仍是從前的莫洛托夫先生與蘇菲新基先生，他們完全不顧巴黎和會中通過的條款，仍像過去十三月來一般的喋喋爭論。南斯拉夫代表又來提出治理特里斯特的問題，他們所說的話，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月間在倫敦以及在巴黎所一再發表的主張實質上完全相同。

我承認這真是使人頭痛，當我以國務卿的身份負責商談時，坐在我旁邊的參議員范登堡與康納利，一定更感頭痛。每次我發表演說，必須由鮑倫(Bolton)譯成俄文，由另一位譯員譯成法文。即使是最好的演詞，在譯成三種語言時，也不會令人感到興趣了。常常在翻譯的時間內，我們的代表們會遞給我字條，建議如何應付一個新的提案，或者如何答覆一種爭執。但有時除了等候譯畢以外，別無他事可做，代表們就會塗畫漫畫。他們都有藝術天才，我想如果給藝術家看見了，會稱他們是屬於「未來派」的。彭柯亨(Pan Cohan)畫的是會議桌上的人物，有幾個他畫得真像。

紐約會議中討論了不少和會通過的條文，均無結果，後來，盡了貝文的護步，才得到一次協議，那是關於賠償物資提早償付的問題。在巴黎和會中，英國代表團曾極力反對，但經經大會以十四對七票通過。當我們此次討論到這問題時，貝文說：「這條款既已在和會中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我現在取消反對。」

「那末，我們不可不認為這一條業經大家同意了呢？」在會議中，代表皮杜爾的法國代表摩

維勃（Murville）就問。

貝文答道：「我應當聲明，在巴黎時，我是堅決反對這一條的，但雖然如此，我現在不想阻撓。我承認這將予義大利很大的困難，但我還是取消反對。」

「主席！」我插口說，「我想可以提請注意，這還是第一件經採納的巴黎和會所通過的條文。」貝文又說：「英國倒底仍能領導。」

至此，莫洛托夫第一次發言，他以一種幽默的姿態，轉向貝文說：「我們希望施（譯者按：指英國）將來更能成功。」

我們繼續討論所有和會中通過的條款。蘇聯代表團對於每一項目均拒絕以貝文為例，承認巴黎和會中通過的大多數意見。

雖然如此，我們私人間的關係却大有改善。莫洛托夫自抵美國以來，就避免在會議中攻擊美國，在巴黎和會中，他與我從未像現在那樣在進餐時作私人談話。在紐約交情既改善，我們重新又有愉快的社交往返。會議第四星期中，莫洛托夫到華爾道夫旅舍我的寓所來見我，並問我如何可以使討論有更好的進展。

「我必須很坦白的告訴你，」我回答他說，「你既然對於巴黎和會中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的條文都加以拒絕，看來協議是毫無希望的了。一年多以前自倫敦開始，我即盡我所有的力量，以求達成和約的協議。所以，現在我斷定和約不可能協訂，實在是極不願意這樣說的。既然如此，我

們也不必像巴黎和會時那樣爲「執而互相攻擊了。」

莫洛托夫甚爲吃驚，他沒有準備到爲和約而工作數月不歇的美國代表團，竟會說出這一番話來。他回答說，他並不如此悲觀，他以爲我們能夠獲得協議。

「幾月以來，我都不想悲觀，」我告訴他，「但最後我已明白我們對於和約的期望不相同。如果我們並無共同目標，那末再爭執就毫無目的了，我極望我們不應該以這種方式來宣佈不能取得協議而使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吃驚。但時間是一個偉大的醫生，或者在一年之後，別人能夠找到合作的可能。」

雖：莫洛托夫不願相信我談話的嚴重性，我在談話結束之時，強調由於不可能協訂和約，美國將放棄的表示。

我與莫洛托夫會見後的第二天，南斯拉夫代表，亦即當時南斯拉夫駐美大使蘇密克（Simek）來我處求見。

他開談即提出修正南斯拉夫與特里斯特自由區間的邊界。他說：南斯拉夫願以減少義大利對南國的賠償來交換。很顯然，這僅是莫洛托夫設法來刺探我的立場。假如我表示願意與蘇密克訂約，無異即告訴莫托夫我昨天對他所說準備結束南談的話並非真意。

「大使先生，我們討論你的建議實在毫無用處。」我告訴他，「我們已經得到結論：在目前狀況之下，不可能訂立有益於和平的條約。我已經告訴莫洛托夫說，我認爲我們應該結束我們的

工作，而避免像過去許多次討論時的互相攻訐。所以，即使討論你的建議亦屬無用。」

薛密克表示，幾個月來的工作，一旦拋棄，真是最大的遺憾。我同意他的惋惜，但說，我看來沒有轉寰了。談話中，他幾次企圖再提這問題，但每次我僅說我們已耗盡我們的力量，是否能有更餘地，要看莫洛托夫對和約的要求如何。

我告訴他，如果宣佈我們不獲協議，義大利政府將感到滿意，而對南斯拉夫則並無妨礙。

次日，莫洛托夫與我談話時，問我是否堅持前次私人談話時所表示的意見？我告訴他，我仍堅持。他又說我太悲觀了。

「假如你真的這樣看法，」我答道，「我很願意你說出些你的樂觀希望的根據來。」

莫洛托夫表示他準備同意若干和會所通過的條款。我就告訴他如果他採取這種態度，我或者也會改變我的意見。

下一次集會時，莫洛托夫果然宣佈他同意若干和會通過的條款，對另外幾條則提出修正，他已瞭解我對他所說的意義，知道不能再使我們讓步了。

莫洛托夫既然決定同意。他就做得很爽快。他對幾種條文提出的修正，僅僅是字面的而非實質的變更。我們對於這種保持面子的做法，很願意合作。幾天以來，所有爭執的問題都得到協議了。在會議開始時，莫洛托夫實際上反對所有巴黎和會通過的條款，但最後結果，和會中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五十三條中有四十七條，和會中以半數通過的四十一條中有廿四條都採納於和約

中，莫洛托夫態度的率爾轉變，由此可見。

這些協議獲致之時，正值聯合國大會開會，限制軍備問題激烈爭論，希臘伊朗問題亦在不斷磨擦之中，所以特別值得重視。

外長會議結束後五天，十二月十六日，聯合國大會亦告結束，我們可以回到華盛頓去了。相信我們至少已在和平的長途上走過一個里程碑了。

簽訂的和約，如我在巴黎和會結束時所說，尙非「盡如我意」，但相信已是我們在長期討論後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了。在和約未簽訂以前，停戰條件繼續有效，五個戰敗國家都不能得到安定，國家生命的任何方面都受到妨礙。對於未來，尤其經濟發展方面，更無從計劃。

和約之簽訂，使聯合國軍隊可以從義大利、保加利亞和芬蘭撤退，可以使羅馬尼亞、匈牙利的駐兵減少。特里斯特問題的解決方法可望避免將來嚴重的衝突，義大利已被解除武裝不可能再侵犯該地，南斯拉夫雖然是軍國主義，但想來亦不致侵犯安全理事會的威權。義大利的賠款雖較我們所主張的爲高，但至少我們已設法在付款方法上減輕其負擔了。

最重要的，或者在於和約使這些戰敗國可以加入聯合國，參加各種共享利益與共負責任的國際組織，如國際銀行，貨幣基金，糧食農業組織及國際貿易組織等。這樣，這些國家就可能與其他聯合國會員合作，來穩定和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以及與世界其他各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等

關係。

第九章 中歐——嚴厲的試煉

關於我們有沒有能力製造歐洲和平以至於世界和平的一個問題，我們在德奧方面遇到了嚴厲的試煉。就地理上講，這一個區域是歐洲大陸的心臟；就經濟上講，它有礦產、工業、農業和運輸系統供給歐洲以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再就政治上講，它是二十五年中兩次世界大戰的火藥箱，除非我們有高強的技巧、能耐和政治手腕，也許會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戰。

正直善意的人們都認為德國問題應該首先解決。但是從大戰結束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看起來，我相信先簽訂小國和約較為得計。在迭次會議中，充分顯示了蘇聯代表團為求達到目的而斷斷辯論和互相結托的高明手段，他們爲了某種全不相關的重要問題上取得讓步起見，不屑對一個公認合理的建議橫加阻撓，不使它獲致協議。要是把德奧和約的複雜問題全部列入五小國和約的問題中去，那麼蘇聯的這種策略就可以自由運用，而何論那一處地方的和平的恢復，至少要延誤若干年。

對於歐洲大部分佔領軍隊的撤退，我們已經開闢了一條路徑。這些軍隊撤退以後，那五個國家裏面的八千萬人民，將獲得一個選擇他們所欲的政府的機會。我們已經排除了種種混亂，延宕

和壓迫的因素。我們現在可以更直捷更明瞭地處理德奧的嚴重問題了。

我們應該認清，在各大強國中，獨有蘇聯並不急切要及早成立和約。尤其對於德國問題，蘇聯對於任何延宕政策一概表示滿意，因為這種延宕政策，使他們能够繼續佔領那劃歸他們的肥沃的地區，繼續吸收它的資源，繼續以蘇聯的生活方式訓練佔領地的人民。而且這種延宕政策又能使他們在波蘭繼續駐軍，以達到保護通至德國的交通綫的目的。同樣，蘇聯鑒於在奧國繼續佔領下去，不但可以滿足它的需要，而且使軍隊得以留駐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以保護交通綫，因此也願意把對奧和約延宕下去。

說到對奧和約問題，那正是我們所覺得難於使蘇聯和我們意見一致的一個顯著的例子。一九四三年十月間，美國務卿赫爾曾經在莫斯科得到一次外交上的莫大的成功。靠了他的努力成立了四個協議：三強宣布奧國應恢復為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一九四五年四月紅軍侵入奧國，不久便佔領了維也納，在那裏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當時我們並不承認這個政府，因為它是地方性而不是全國性的。後來在九月間開了一次全國政治領袖會議，結果把共產黨系內政部長權力加以限制，所有選舉、警務、公共安全等管理權，置在三大政黨所合組的五人委員會之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我們承認了奧國臨時政府，十一月廿三日，在盟軍當局的監視下，舉行了一次選舉，當選的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由四個佔領國予以承認。

在沒有成立條約確定奧國的獨立國地位以前，奧國將繼續受制於盟國管制委員會。德國一樣，奧國及其首都維也納，各被分割成四個部分，其中蘇聯佔領區不但區域最大，而且擁有最重要的工業和最優良的耕地。

一九四五年的選舉，使奧國回復到德奧合併以前的政治陣容，社會黨和人民黨佔了優勢，共產黨僅得到全部選票的百分之五。在這次選舉以後，蘇聯對奧政策有着顯著的變動。可是當我們在波茨坦舉行會議時，奧國大選還沒有舉行，那時對奧決議比較容易成立。蘇聯代表團建議奧國臨時政府的權力應當擴張到各佔領區去，我們最後與英人同意，俟軍隊開入各佔領區後，再檢討這個問題。當時英首相邱吉爾曾指責蘇軍遲遲不退出各佔領區。兩天以後，史達林宣布蘇聯軍隊開始撤退到自己的佔領區，後來他又接受邱吉爾的要求，協助供給非蘇軍佔領區中維也納人的食糧，因為維也納的糧食平常是從東部蘇聯佔領區運來的。

這一個問題和平解決以後，我們又轉到賠償問題上去。莫洛托夫建議奧國賠款應規定為二億五千萬美元，以實物付給，為期六年，並指定三強和南斯拉夫為接受賠償的國家。英美兩國非但不提出賠償要求，而且主張遵照一九四三年莫斯科會議宣言，應該把奧國視作解放區，而不應該視作敵國，因此不應向它勒索賠款。

莫洛托夫却答稱：美國沒有被奧軍佔領過，而蘇聯却遭受奧軍極大破壞，因此不能不給他們一些懲罰。我告訴他：我們對蘇聯犧牲了許多生命表示同情，至於損失的財產，那我們也化了很

大的戰費，彼此的損失是一樣的。後來他問我們如果拿奧國和義國的器材和物資作爲賠償，我們是否同意。我回答說：奧國既是一個解放國，就不應負賠償之責，但僅供作戰用的器材，不妨作爲義國的賠償，那是我們可以同意的。

史達林在三強會議議定書中雖曾同意奧國不應負責賠償，但我不久就看出莫洛托夫決定用另一方式獲得同數量的賠償。他藉口議定書中會規定奧境蘇聯佔領區內的「德國資產」可作賠償用。德國佔領奧國七年中，曾用武力擄得大量財產，如油田銀行船隻等。蘇聯堅稱這些財產都是「德國資產」，所以可給蘇聯作爲賠償用的。其他三個佔領國都沒有意料到蘇聯會對波茨坦協定作如此解釋的，當然誰也不能承認它。這顯然與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倫敦會議宣言相衝突，那宣言聲明凡是用武力取得的財產都不加以承認的。如果把蘇聯所要求的資產拆運去，將使奧國經濟陷於破產；如果留在奧國而受蘇聯管轄，那麼將使奧國失去獨立國的地位。

奧政府曾企圖把這些資產收歸國有，以制止蘇聯的攫取，但蘇聯藉口此種辦法違反波茨坦協定，而置之不理。直至著者屬筆時止，由外交途徑以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切努力——無論是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中或在外交會議中——全沒有得到成功。管制委員會美方代表克拉克和本人在歷次外長會議中所獲得的經驗，使我得到一個結論，即蘇聯毫無對奧成立和約的誠意，它需要延長佔領時期，使控制下的奧國經濟和政治機構，牽入東歐集團中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時，我想討論奧國境內德國資產問題，並建議削減佔領

軍，以輕奧國經濟負擔。莫洛托夫始則答應加以考慮，繼而指謫奧人企圖「拉攏」法西斯黨參加政府，後來又指責英人重建奧國陸軍及納粹反共白俄軍隊，顯欲與蘇聯作對。貝文先生當面駁斥，指蘇聯代表輕信無稽謠言，並謂四強委員會正在各佔領區內調查真相。

我們在莫斯科會議中，關於奧國問題就只談到這個地步。

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代表向外長會議其他代表提出，擬在下次巴黎會議中討論對奧和約。四月廿五日舉行首次會議時，我就想把這個問題列入議程，可是莫洛托夫立即加以反對，說蘇聯代表團還沒有機會研究我們所提出的建議。

其後我又一再和莫洛托夫、維辛斯基作私人商談，可是他們對我說，奧國政府還沒有能力肅清納粹勢力，佔領軍隊至少應該再留駐一年。我又建議由四國外次先把對奧和約研究一下，可是我所得到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必須由四國外長加以考慮。在會議將要結束，準備討論下次會議議程時，我又建議把對奧和約問題列入議程，並由四國外次先草擬一和約草案，可是莫洛托夫一再推託，說目前正在討論小國和約，還沒有結束，無暇旁及對奧和約，因此這一個問題又擱置下來。

在休會期間，美國代表將對奧和約草案一件送交其他各國代表，以便在會議重開時作為討論的根據。這回莫洛托夫並不直接反對將此問題列入議程，僅要求暫緩成立決議。後來會議中接受皮杜爾的建議，把「奧國問題之檢討」一議案，列於議程之末。六月廿六日英國代表又提出第二件草案，但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於是我便要求各國實令外長代表研究這兩件草案，以及法蘇代表

國或許提出的其他草案。

這時候莫洛托夫提出一件決議案，包含四點，首先提起盟國管制委員會最近成立的協議，增強奧政府的權力。其次提到西部佔領區中尚有難民四十三萬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法西斯黨」，認為是威脅各民主國家的一個重大威脅，主張「緊急」撤退。第三，該決議案說明此項撤退工作的完成，為恢復奧國完全獨立的必要條件。末了，莫氏主張在其他和約完成以後，各國外長代表方纔可以着手進行對奧和約的議訂。

貝文和我一致反對把難民問題的解決作為開始討論和約的先決問題，並主張必須先行查明事實，然後纔能確認決議案中的種種主張。

奧國問題的討論至此即告停頓。我們在巴黎外長會議中並沒有更多的進展。

在紐約我們預備再嘗試一下。這回莫洛托夫贊同了一個建議，把德奧問題在三月間召開的莫斯科會議中提出討論。貝文和皮杜爾代表蘇維爾附和的主張，從速指定各國外長代表立即開始初步工作。兩天以後即十二月十一日，莫洛托夫同意指派外長代表研討對奧及對德和約，並決定於一月十四日在倫敦開始工作。這時我又提出奧國境內德國資產問題，但莫洛托夫表示不預備討論這一個問題，我因為知道各國外長代表會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也沒有堅持要提出。

對奧和約的着手進行，從二月一直到十二月，快將一年，我知道工作的完成為期尚遠，而對德和約更屬渺茫。於是美國代表團決定把我減歐洲各地盟國佔領軍隊的問題重行提出討論。我們

力陳此一行動足以減輕戰勝國以及戰敗國的負擔。我們建議四國成立協議，在四月一日把奧境內佔領區內的軍隊各裁減一萬人，同日在德國境內的駐軍裁減至如下數目：蘇聯佔領區二十萬人，美國及英國佔領區各為十四萬人，法國佔領區七萬人。這樣，沿交通線的駐軍也可以同樣比例減少。我們建議波蘭的駐軍以二萬人為限，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各以五千人為限。

莫洛托夫說這是一個新問題，他不預備加以考慮。等到貝文問他，如果這問題在莫斯科會議中提出時，他是否願意討論，他才表示了同意。可是國務卿馬歇爾在莫斯科把這建議重行提出時，莫洛托夫却又不同意了。

在莫斯科會議中，馬歇爾雖努力於對奧和約的簽訂，但是沒有得到成功。當時所成立的對奧和約委員會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進展。

我們應該記得，我們目前並非對付一個敵國，對奧和約的目標，無非是要重建奧國的獨立和劃定它的疆界而已。如果到奧國解放三週年，即一九四八年四月那時候，奧國已經恢復了三強在一九四三年所保證的自由和獨立的話，那才真幸運了！

說到德國問題，初步的協議倒很令人滿意，可是後來的發展却不能不使人失望。我們在波茨坦即會對德國問題作過初步的商談。我們一面努力對先訂小國和約一點成立協議，一面率先取得各國同意，確定支配德國佔領區的政治及經濟原則，這些原則可能促成和約的早日成立。

在政治方面，這些原則不但規定一切納粹份子應受懲罰和排斥，並且準備好在民主的基礎上

建設德國政治生命的輪廓。它們依據民主思想指導司法和教育制度的改組，促成自由的地方政府和自由的工會組織，並且在財政、運輸、交通、工業及國外貿易各方面設定中央行政機構。

在經濟方面，這些原則禁止一切軍火製造，限制平時工業的轉變為戰爭工業，消滅中央集權的經濟統制，如卡特兒（同業者的同盟）等。三強同意應把德國視作單純的經濟體系，應着重於農業及平時國內工業的發展。盟國對於工業生產、開礦、運輸及交通、農業、工資及物價、國外貿易、通貨及銀行等問題，應採取一致的政策。

此外，賠償問題亦擬列入表中，但因紅軍於波茨坦會議以前曾搬走大批資產，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全面的計算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採取分區處理賠償的計劃。

在波茨坦成立的賠償協定的另一方面，並沒有受到應受的注意。在雅爾達所提出的建議，即賠償委員會應把「德國勞力的使用」，視作可能的賠償來源，被三強在波茨坦會議中所剔除，在那裏所簽訂的議定書中，並沒有規定勞力的使用可以作為賠償。然而無數的德國人和日本人，仍舊被強迫着作工，違反了莊重的國際誓約。

在對德戰爭的末期，我們收留了許多俘虜，我們無法在後方照顧他們，看管他們需要多數的軍隊，因此艾森豪威爾將軍決定把他們移交各解放國看管。可是這些俘虜向美國陸軍投降，所以我們不得不負起看管的責任來。拘留在美國的俘虜，我們竭力設法使他們即速回國，不顧雇主的阻撓和運輸的困難，最後一批的德義俘虜，終於在一九四六年秋間被遣送回國。

日內瓦戰俘協定規定，在戰爭結束以後，所有戰俘應儘速遣送回國。蘇聯並沒有簽字於該協定，但英國和法國都是簽字國。

鑒於各盟國對該協定所負的義務，我以為各國應同樣努力加速遣送俘虜回國。但是在自己沒有辦到以前，不能去責備他國。英國總算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宣佈了一個計劃，預備把最後一批俘虜於一九四八年十月間遣送回國。同時我對於法國非正式提出了一個遣送俘虜回國的計劃。這時拘留在法國的俘虜還有六十萬人左右，都是艾森豪威爾所移交的，其中有四萬人在煤礦中工作，二十八萬人在農場工作，其餘做着各種雜務。

法國人要求我暫時不要有正式的行動，我答應了。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我要求為我們看管俘虜的三個國家——即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一律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完成遣送工作。我的文書中指出戰爭結束已十八個月，而美國人最恨強迫勞役，所以我們相信這些並非戰犯的俘虜，應該及早遣送回家。法國的回答是，他們雖然知道應該把戰俘送回國，但因為國內缺乏工人，需要較長的時期才能完成遣送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美政府宣佈已與法國簽訂協定，留在法國的俘虜四十五萬人，以每月二萬人的速度予以釋放。這就是說，最後一批的德國戰俘，要到戰爭結束後四年才能遣送回國。該協定並規定，戰俘釋放以後，或則遣送回國，或則留在法國作志願工人，悉聽自便。

關於蘇聯境內戰俘——無論是德國人或日本人——的情形，我們不甚明瞭。史達林元帥曾於

一九四五年六月，告斯霍布金說，蘇聯共有戰俘約二百萬人，其中一百七十萬都是德國人。他們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莫斯科區担任建設工作，或在煤礦和木廠內作工。一九四七年三月，蘇聯政府自稱已經把德國人一百餘萬遣送回國，還有八十九萬留在國內。

關於遣送德國戰俘的問題，在莫斯科外長會議末次會議中獲致了一個全面協定。那協定成立於四月廿三日，規定所有德國戰俘一律應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遣送完畢。我希望這個問題能夠如期解決，須知強迫勞動營是希特勒政體的一個象徵，我們應該儘速消滅它。

我們所認為是一種諒解，最後未必能成立協議，看了上面所講的事實，我們又得到了一個例證。所以我曾經說過，波茨坦會議中對德成立的協定是失敗了。因此失敗便招致了一般人的指責。但過失並不在協定本身。蘇聯拒絕誠意合作，這便是過去以及目前德國問題的癥結所在。然而一直到波茨坦會議以後幾個月我們纔明白了一個事實，因為法國分担了蘇聯所願意分担的許多責任。

法國並未參加波茨坦會議，所以不受該會議所成立協定的拘束，事實上法國對於若干協定反對甚力。在我們從德國返國以後，戴高樂和皮杜爾訪問華府時，就對杜魯門總統和我提出抗議。

他們所擔心的是設置德國中央行政機構的計劃，和萊茵地、魯爾及薩爾的處置辦法。戴高樂深恐這些措置會造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德國政府。他說，在目前促成德國團結，甚至會比過去更加危險，因為德國會受到在東部崛起的一個強有力的斯拉夫集團的控制。他說：唯其因為德國衰

弱，所以更容易變成其他強國的政治工具。波蘭伸張勢力到德國東部以後，把德國的重心向西移轉，因此威脅着法國的安全。他們要求萊茵地脫離德國而由法國管理，薩爾歸併於法國，魯爾則交由國際管理。

杜魯門總統和我竭力解釋運輸和通貨等中央管理機構的設置，並不會造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德國政府。由聯合國來促進法國的安全，比較由分割德國的領土來達到這個目的更為有效。唯有各國行動一致，纔能獲得最大的安全。

我們的努力沒有成功。在倫敦外長會議首次會議中，皮杜爾重新提出他的辯論，繼續反對在德國西部邊疆未獲決定以前設置一個德國中央權力機關。法人深恐德國的勢力伸入魯爾和萊茵地以後，他們將不能在和約中保持他們所需要的控制權。

法國的政黨堅主法政府應採取皮杜爾所聲明的立場，可是這一個立場已經阻礙了健全的經濟復興，同時予蘇聯以延宕的藉口，他們對於這延宕可以不負責任。我明白法人爲什麼要恐懼，但是我覺得他們應該對大局重新觀察一下。他們應該對於經濟團結所必需的中央行政機構不再表示反對。貝文和我好久以前早已提出保證，在簽訂和約時，我們贊成把薩爾割讓給法國，因此法國很少理由再採取那種立場。他們繼續此種立場不能影響蘇聯的立場。蘇聯將繼續反對薩爾的割讓，直到最後幾小時，然後以交換條件要求法國在其他某種問題上予蘇聯以支援。

正如我們所預料的，在倫敦會議以後，「由外交途徑」所獲得的進展極爲有限，所以在我四

月間前往巴黎時，我決定主張先從德國問題着手。因此美國代表團建議委派特別代表擔任兩件工作：（一）對佔領問題編造一件報告，（二）開始討論對德和約。由於德國被分做滴水不入的兩個部份，使得人物和思想不能互相流通交換，美國乃不得不每年耗費二億美元，以供給糧食，這種糧食平常時候是從蘇聯佔領區那裏運來的。爲了償付我們帶進來的糧食，必須增加輸出品生產量。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不能繼續拆除工業設備送給蘇聯作爲賠償。

我們主張四國代表不必等到德國政府成立以後才開始工作，我們對於和平解決的性質和未來德國政府究竟應該是怎麼樣的政府兩點覓取協議，然後佔領國和德國人民才知道今後應走的路綫。

英法兩國都贊同我們的建議，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委派代表，而且他還拒絕我們的附帶建議，即四強簽訂二十五年條約以防止德國黷武主義復活，這使我們更加失望。

九月間在倫敦時，我曾經非正式和莫洛托夫討論到這個建議，那時他似乎很關心。可是後來不再聽見他提到這件事，我就把它列入預備在莫斯科會議時和史達林討論的各項問題內。

在聖誕節前夕，史達林設宴招待我們，宴後我和他在一間會客室裏面作密談，旁邊只有他的翻譯官巴夫洛夫先生。我告訴他，我們在倫敦討論過的和約，莫洛托夫竟一言不提，很覺失望。我說：「這種和約的簽訂，可使歐洲各國相信美國決不再採取孤立政策。我常常想起在雅爾達時對德國又一次侵略行爲表示憂懼的情景。你說唯有四強繼續合作解除德國的武裝，才能够減輕你

的憂懼，或許更會左右你在巴爾幹各國的行動」。後來我又說許多美國朝野重視這種和約的話。史達林回答說，這是一個絕好的建議，他說：「如果你決心爭取這個和約，你可以相信我一定會支持你的」。

我把這段談話記在心裏，當我們回到美國以後，我就開始草擬對德和約。爲減少誤會的可能性起見，我儘量依據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關係佔領期內解除軍備的盟國宣言的條文。我又加添一條規定，即四強在締結對德和約以後，應該保持一監察隊，由具有工程知識和特殊技能的人組織之，目的在防止製造軍器工業的建立，如果這些監察者發覺有破壞條約的情形，應立即報告當局，四強就應該責成德國政府命令製造者停止這些危險的活動。要是遭到拒絕，那麼四強可以採取任何必要的步驟，強迫其服從。

這種辦法可使四強不必在德國維持大量軍隊。被解除軍備的德國，要是它的政府知道了萬一破壞條約，四強任何一國或數國可在數小時內派遣空軍到德國領土上面的話，決不敢違抗盟軍總部所發出的命令。

照我所草擬的條約，得到多數的同意後，即可採取行動。就四強而論，所謂多數當然指三國而言。此項規定的目的顯然是要防止任何一國對於採取行動橫加阻撓。這種不承認否決權的辦法或許就是蘇聯要提出反對的一個理由。

杜魯門總統十分贊成我這個建議，他認爲一定能够得到各方的接受。我又會和參議員康納利

和范登堡討論到它，並且把這個計劃交給其他參議員研究，他們在原則上一致贊同這個計劃。

在獲得各方一致贊同以後，我便在二月初把草約副本送交蘇聯、英國和法國外交當局，請他們把它視作討論的根據，歡迎他們提出修正案或其他草案。貝文和皮杜爾隨後立刻表示贊成，不過還得略加修改。我在離開華盛頓前往巴黎時，接到莫洛托夫的一封信，說他對於那個草案有幾點不能同意。

四月廿八日我和莫洛托夫一同吃飯時，我就問他不同意的地方在那裏。他竟說這個草約好像把解除德國軍備的問題延擱到佔領時期以後了，這很使我吃驚。他說關於德國應該立即解除軍備一點，早已成立協議，他又建議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考核解除軍備實施的情形。他又說，等到這種調查工作完成以後，才可以把未來管制問題加入另外的條約中去。

我竭力向莫洛托夫解釋，我說：「這條約對於防備德國再度侵略可多一重保障，同時可以消除關於美國是否願意分擔保障和平責任的懷疑。我得坦白告訴你，許多美國人不能明白蘇聯的目的究竟何在——是爭取安全還是只圖擴張勢力？像這樣的和約，以及同樣的對日和約，決能有效地解決安全問題的。」

莫氏答稱：蘇聯贊同對德對日簽訂二十五年解除軍備條約，但特別強調關於立即解除德國軍備以前的協議應付諸實施。我和莫洛托夫討論了許多時候，竭力說明我們的草約不會把德國的解除軍備問題延擱下去，反之，它是根據解除軍備應立即完成的假定而擬定的。

第二天我把這問題在會議中提出，莫洛托夫仍舊作同樣的爭辯。他說他願意鄭重考慮我們的建議，但是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完成目前的協議。

爲了應付莫氏關於現行解除軍備協定缺乏行動的辯論，我特地去會晤柏林的克萊將軍。幾天以後，他向盟軍管制委員會建議組織委員會訪問四佔領區，查報解除軍備的進行情形。當我將此一措置向會議提出報告時，莫洛托夫說，他的政府將支持這一種措置。可是他對於和約的見解却並不因此而改變。

當和約再度提出討論時，莫洛托夫採取了攻勢，他說，和約的時期定得不夠長，至少應當定爲四十年。我立即表示同意。他接着又說，那和約「一點也不妥當」，「不能可靠地保障歐洲和全世界的安全」，因爲那解除軍備的條文，不很完備。我告訴他，關於解除軍備的條文，是從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美英法蘇四國政府所公佈的協定中摘錄來的。如果認爲不很完備，儘可加以修正的。

可是莫洛托夫始則謂除非立即採取解除德國軍備的行動，這種和約是沒有用處的，再則又說那和約把德國民主化等問題避而不談。我就說明關於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目的可以在今後和平會議中成立的條約中加以規定。

就這些辯論看起來，足見莫氏並沒有認真討論和約的意思，而一味推三託四，企圖延宕下去。當莫氏繼續下去說：「和約把羅斯福總統曾在雅爾達同意交付蘇聯賠款至少百億美元的一件

「專略而不論」時，我是忍無可忍了。我回答說：「美國自願放棄以往的政策，而提出這一個和約，以便幫助保障歐洲的安全，想不到有人提出毫不相關的賠償問題和有關佔領的次要的困難問題，實可遺憾！」我和莫洛托夫又交換了許多意見，已到吃夜飯時候，最後接受貝文先生的提議，預備在次日繼續討論。

次日早晨，貝文和皮杜爾發表強硬的言論，一致擁護我們的立場。貝文說：英國人認為德國的復興是對於和平的最大威脅，對於那長期解除德國軍備的條約，英政府熱烈表示贊同。他又說：維持歐洲和平有三條路綫；第一、實力相等的各國間保持一種均勢；第二、由一個強國或兩個國家集團來統治歐洲；第三、四強在其盟國合作之下實行聯合管轄。他強調說：英政府相信那最後一條路綫最能够促成歐洲的穩定。

皮杜爾說：德國的「黷武主義的普魯士性格」，我們必須設法摧毀它，美國所簽署的和約不致阻礙賠償、肅清納粹勢力或其他重要的佔領工作，非但如此，並且能加強聯合國的團結，以避免德國復活的危險，且能藉美國的支援以保障歐洲的安全。

這些言論都很深刻動人，可是仍不能左右莫洛托夫的立場。當一九四七年四月，國務卿馬歇爾在莫斯科再度提出討論廿五年或四十年和約時，蘇聯外長又提出新理由來反對那和約。有幾點理由和修正案竟異常荒唐，好像有意那樣使得它們難以接受。

至此，我不得不作如下的結論：在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四日答應支持那和約以後，

蘇聯最高統帥部即政治局，決定不需美國分担維於今後廿五年或四十年中歐洲安全的責任。美國所施的壓力足以礙制蘇聯的行動自由。同樣一種保證，使皮杜爾覺得那和約「深得吾心」，可是莫洛托夫却對它表示異議。莫洛托夫那樣對蘇聯政府負責，很值得佩服。他的冷淡的態度自始就和史達林的熱忱相映成趣。

我們不能說莫洛托夫對那和約將繼續反對到底。他現在應該相信，無論簽訂和約與否，我們無意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利益。當他決定支持它時，他也許要聲明：蘇聯將提出含有若干合理修改的和約草案，他提出這個作為對我們的大讓步，或許會要求我們給他兩件東西以為交換，即賠款一百億美元和參加魯爾的管制。

當我們在巴黎討論和約問題毫無進展時，在七月十日那天重又提到美國的建議，即指派代表研究急切的德國問題及和約草案。

這次意義重大的討論歷時三天之久，皮杜爾先生首先發言。他闡明法國的立場說：在德國的疆界沒有確定以前，任何政策都無從決定。他重新提出法國的要求，即收回薩爾問題，國際共管魯爾問題，以及萊茵地的脫離德國的問題。他的第二個目標是從德國獲得更多的煤斤。

貝文亦同樣指派代表研究這些問題，並請英國願意支持法國對薩爾的要求。他特別強調把德國視作整個經濟體系的核心，並規定應即付諸實施。他說維持英國佔領區要使英國人民每年支出三億二千萬美元，現在已不能再持續下去了。理由是其他佔領區尤其是蘇聯佔領區內的剩餘食糧，

被搬運到德國以外的地方去。

莫洛托夫表示反對，他說在外長尚未解決其他問題時，決不能再指派其他代表。這些問題之一當然是蘇聯所要求的一百億美元賠款，另一問題便是魯爾的管制問題。關於後面一個問題，他指責西部佔領區內並未實行裁軍與解除軍備。

現在這問題已經是耳熟能詳了。蘇聯會議實英人在他們的佔領區內養有納粹殘餘軍隊。英人曾建議由盟國管制委員會派員調查各佔領區，這事因蘇聯代表的反對而作罷。後來英人又向柏林的管制委員會報告，說蘇聯佔領區內仍舊在製造軍用物品，並建議派員調查該國的解除工業武裝的情形。當我們在五月初提出調查的建議時，莫洛托夫曾說他願意加以支持，可是他派在柏林的代表却多方阻撓，使調查工作無法進行。現在蘇聯既然提出實難，我就重新建議：由盟國管制委員會組織調查團調查各區拆除戰具工作和毀滅軍火及遣散軍隊的情形。但莫洛托夫却回答說：在我們沒有決定一個德國經濟裁軍的全面計劃以前，這種調查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這時皮杜爾插入辯論，他說他覺得出席會議的各國代表好像在「兜圈子」。我便接下去說，要避開兜圈子，只要實成各國外長代表把各項問題的範圍縮小一下，那麼下次會議討論時可以更加有結果了。莫洛托夫質問我為什麼不同意在十一月間召集一次特別會議。

我的回答是：「對於這個會議我並不反對，可是為什麼要等到十一月才召開這會議呢？我所恐懼的倒是在十一月裏我們提出這建議時，恐怕蘇聯代表又要建議把這問題交給各國外長代表去

研究，又要經過五個月以後才能開始工作。我覺得倒不如現在馬上着手的好。」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恐懼果然是不出所料。莫洛托夫在紐約外長會議裏把責成四個外長代表研究德國問題的建議延擱到十二月十一日實行。一月間四國外長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議，聽取曾經對德作戰的弱小盟國的意見，並討論草擬德國和約的程序。我們已經明白一九四七年三四月間召開的莫斯科會議，進展的程度是怎樣的遲緩。現在世人正期待着十一月間召開的會議，希望能夠和約問題的解決獲得真正進步的曙光。

第十章 一個行動的路線

德奧和約的早日成立，對於歐洲政治、經濟健康的恢復是必不可少的。軍事佔領的壘壘，佔領費用的負擔，加上將來之不可預料；這些因素使歐洲的「腹地」陷於解體的危境。其損害我們的盟友，好像給德奧兩國以不加區別的懲罰一樣。

在我寫本文的時候，波茨坦和會差不多已經開過了兩年。那時我們在雪林霍夫官裏所圍桌會商的，在當時相信是一個永久和平機構的適當草案，可是這個草案並沒有滿足我們的期望，因此，重新衡量情勢和計劃一個新行動路線，在現在是必要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長會議的聲明，是蘇聯對德政策最富有意義的表示。他對於這篇演說的重視，可以由下列的一個事實上表示出來，就是在演說之先，演稿先交給報界發表，這對於我們是常事，但是對於蘇聯外交家，却是非常的舉動。這個蘇聯對德態度首次而至今尚有權威性的表示，在我們計劃將來的時候，值得特別提出。

莫氏演說辭的開頭，就對德人強烈的呼籲，而批評一切將德國改變為農業國家的所有建議。他說：「採取毀滅德國的方針，或使德國農業化，包括消滅它主要的工業中心在內，都是錯

誤的路線」。他用多種方式，一再強調這個見解：「我們的宗旨不是要毀滅德國，而是在造成一個民主而和平的國家，在它農業之外，有它自己的工業和國際貿易。……消滅德國的國家形式，農業化德國消除德國主要工業等政策，將使德國成爲危險情緒和復仇思想繁育的地區，德國將重入反動份子的掌握中，進而剝奪歐洲的安寧與和平」。

然後他談到魯爾問題，這裏他又設法使其兩方面都講得通。他指出把魯爾與德國分割，「本是導源於毀滅德國和農業化德國的政策，因爲我們很容易明瞭，如果沒有魯爾區，德國不能成爲一個獨立 Völkische 的國家」。不過，莫氏接着說：「魯爾應在四強管制之下，以防止德國戰爭工業的復活」。

德國未來的國家形式，是莫洛托夫第二件關切的事。對於分裂德國爲若干自治邦，與德國聯邦化的類似建議，這些「時尚」的談論，他都大加批評。他說：「西部佔領區內的盟國當局，已經在鼓勵德國實施聯邦制的觀念，而沒有顧到德國人民的願望」。蘇聯的主張是：「對於德國人民自身的問題，強制的提供解決辦法，是不應該的」。這類的行動都不該採取，除了由公民投票決定外，不該分割德國任何領土。當然，莫洛托夫不會提到蘇聯支持波蘭取得西來西亞和奧德河、尼塞河以東全部土地的要求。

他又說：「德國煤鐵產量之提高與和平工業產品增加，我們均不應加以阻礙」，至此他提及盟國管制委員會正在規定未來德國工業水準的行動，接着說：「現在必須承認這點，就是德國的

和平工業必須給它一個機會，作更大範圍的發展……」。可是莫氏竟避承認一個事實，就是在盟國管制委員會規定德國工業水準時，蘇聯代表投票贊成最低的數字，直到英、美代表極度堅持之後，方才規定爲一個較高的數字。

莫洛托夫最後談到對德和約問題，「在談到對德和約之前，必須解決成立德國政府的問題。……但是即使是一個德國成立之後，亦需要若干年去考驗這個新政府究竟代表什麼和是否可信托……未來的德國政府，必須是個民主的政府，能夠肅清在德國的殘餘法西斯力量，而且同時能夠實行德國對於同盟的義務。最重要的一件，是必須能實行對於盟國賠償工作，只有在這個新德國政府能夠應付這些任務，同時真正能誠實的予以執行，而使我們感覺到滿意時，方才能够鄭重的談判締結對德和約」。

在最後一段談話中，證實了我們的恐懼，就是蘇聯除非被世界輿論逼得沒有辦法，否則在若干年之內，它不會同意和德國締結和約。它會利用在盟國管制委員會和外長會議中的否決權，去保障採用他們「民主」政府的觀念，保障參加德國工業的管制，特別是魯爾區的工業，同時保障實行一百億美元的賠償。

這是一篇有效果的演說。這時候德國將在各大城進行選舉，這篇演說恰在此時發表，目的在爭取德國人的好感。德國人對於賠償問題的厭惡，已被反對不經公民投票而割土和瓜分所引起的同情抵消而有餘。演說中最使德國人高興的，是斥責消滅德國工業和「農業化」德國這一點。我

立刻了解這個呼籲的力量，這是清楚的計算好的來利用德國人對於所謂「摩根索計劃」的普遍恐懼。而摩根索計劃已經被美國新聞界廣泛的討論着。

當一九四四年十月，大戰尚在進行，我那時恰在巴黎，在我所在的嘉賓館中，有一個能講德國話的伍長，每一個夜間，他爲我翻譯柏林的廣播，內容是一貫不變的向德國人民呼籲不要去考慮盟國投降的建議。他們提出警告說，投降的意思是實施「摩根索計劃」，將摧毀德國全部的工業，而把德國變成一個農業國，這個計劃被故意誇大，來激勵德國人作殊死戰，不作投降之想。莫洛托夫的演說，是針對着這些收聽無線電廣播的人們而發，他們被教育得只希望由美國得到最粗暴的處分，他是利用德國人民對美國政策的認識不清，而從中漁利。

我不得不承認這種努力的有效，因爲在我們自己國家裏，對於處理德國政策，亦曾經發生過紛亂，事實真相是：在我們內閣中，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更大的紛亂。

我國想到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下半月份，有一次在白宮裏，羅斯福總統亦討論到他建議的對德和平方式，他提到國務院裏有幾位有善意而用得不當的官員，正在計劃他所認爲「軟弱」的對德和平條約。他說他的計劃不是這樣，德國人應該好好的受次教訓，使他們明瞭對於這次大戰所負的責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一日三餐只准吃一隻湯，這些話不像是羅斯福總統說的，原因是他很憤然。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指定了一個內閣委員會去研究對德和平問題，裏面有國務卿赫爾，財

長摩根索，陸長史汀生。但在這個委員會中，彼此意見分歧，在同年九月九日，他們在總統辦公室內開會，霍浦金亦列席，陸長史汀生首先發言，認為他們都在研究一種方式，使德國不致再度嘗試控制世界，但是對於方法一層，彼此意見互異，他辯論着說摩根索計劃將大量的消滅德國的工業，他引一段摩氏計劃中對於魯爾及週圍工業區的處理方法，作為證明：原文：「是這個區域不但要取去現存的所有工業，並且要加以軟化和控制，使它查看得到的將來，不能再成為工業區。所有沒有被戰爭摧毀的工業設備，應當完全的拆卸運走，否則即須全部予以毀滅。所有礦內的機器應全部折運，礦山本身應該澈底的破壞」。史汀生當時提出辯駁，認為這地區的資源是歐洲生產力自然與必需的資產，應當予以保存，用於整個大陸的福利上。他的想法是把魯爾國際化或是托管它的產品，如此的處理辦法，可與全世界的需要和利益相一致。對於摩根索建議中主張主要戰犯由軍方認出，不需審判，即可處決一點，史汀生亦表反對。認為整個程序至少應當包括人權法案的基本要點，他力言假使這些罪人能在文明的莊嚴的情況下予以處罰，對於後世將有更大的影響。

就在這個時期，總統和赫爾國務卿要我考慮美國駐德高級專員的位置，在過去，我已經告訴過總統，在戰事結束後，要離開人力動員局，但是對於這個建議，我並沒有興趣。雖然如此，我仍答允加以考慮，並對於已經提出的估價計劃加以研究。國務院的力特爾倍格先生，他在戰後時期中是很能幹的指導德國事務的，當時把估價德國計劃交給我，並建議願答覆一切我所提出的問

題。這個計劃給我的印象是遵照財長給總統建議的方針，進行一個懲罰的和平，對於總統之反對「軟弱的和平」我有同感，但我認為這個計劃是不必要的粗暴，為歐洲將來着想，更不明智。有一條規定尤其引起我的注意，它的措辭是等於說主要戰犯應當加以審判與絞死，我就問對於無罪釋放一節是否考慮到，力特爾倍格亦同意，條文的措辭有問題，同時他補充說計劃的許多部份包括這節在內，是由財部代表準備的。不久之後，我就報告總統和國務卿不能接受這個任命，因為不能勝任。

內閣委員會中的意見衝突，到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與吉爾在魁北克會議時才發展到頂點。赫爾國務卿沒有參加這會，他告訴我，因為總統說過這次會議中只討論軍事，因為摩根索財長參加這次會議，很明顯的，計劃已有變更。陸長史汀生也沒有去，不過在開會時，他對德國的戰後計劃有意見送陳總統。

事實的發展證明魁北克會議很重要，舉例來說；英、美在德境的佔領區即在會中獲得協議。我們接受了南德的部份，而阿吉爾則同意英軍區內的 *British zone* 港作為美軍佔領區的一部，使我們能夠利用這大港作供應上的用途，在九月十四日又有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在對日作戰期間內，對於英國很慷慨的租借計劃。

到九月十五日，羅斯福准了一個對於戰後德國的備忘錄，以後就被人稱為「摩根索計劃」的，總統是追隨了財長的見解，而沒有接受國務卿和陸長的意見，這個協定中關於「德境冶金化

學電氣工業」的部份，立即引起華府官員的注意。備忘錄裏面指出經驗足以說明這些工業可以由和平性質轉變成爲戰爭性質，在德人手中受到損失的政府，有權去搬走他們所需要的機器，去彌補自己的損失。

備忘錄的原文是：「因此，魯爾與薩爾的工業必需停工和結束，同時感覺到，這兩個區域應由世界組織下的一個團體加以管理，由它來監督工業機器的拆卸，和確切防止用狡猾手段來恢復」。

「消滅魯爾和薩爾區戰爭工業的方案，目的在使德國變成一個以農業及畜牧業爲主的國家」。

「邱吉爾和羅斯福對於這個方案，雙方同意」。

赫爾國務卿沒有批准這個方案，在九月廿五日，他忠告總統就對德政策與英、蘇兩國政策成立一個堅定的協議，並表示這一類的事項，向來是在三強協議的基礎上進行的。同時他補充說：國務院迄無消息，表示英政府會贊成魯爾和薩爾兩區的全部生產力，至於蘇聯的意見，則尙不明瞭。

邱吉爾之肯批准這個備忘錄，實是難於理解，以後在雅爾達時，他慨嘆這個和平充滿了報復氣息。在波茨坦會議時，他主張重工業不應減少到一個水準，使德國的經濟，必須依賴外力來維持。會後加強商洽德國工業水準時，英國政府主張的水準，較其他三國都高。同時，羅斯福總統當時採取的態度，亦難於理解。他於九月廿九日送出一個備忘錄，答覆赫爾國務卿，裏面說明國

務院或其他部份於此時試探英、蘇對於德國工業的意見，並無裨益。總統力言：「時局之真正核心所在，是防止英國在大戰結束之後，完全陷於破產」。總統說有人把這個聲明供給報紙發表，但這聲明是「根本不正確的」。他補充說：「沒有人再要把德國造成一個完全廢棄的國家，但是有人把這消息供給報界，我希望我們能發現他而加以處分」。總統再度陳述，他不能看英國經濟崩潰，而德國在同時重整軍事潛能，可能在二十年內再發動另一次大戰，只是工廠的檢查不足防止此事，可是也沒有人要把魯爾·薩爾的工業生產能力全部摧毀」。

同一天，赫爾在收到備忘錄後，有一封信給總統，赫爾說：「內閣委員會對於戰後處理德國的政策迄未獲得協議，財政部所送出的備忘錄，與國務院內的意見大有出入。同時，我已經收到閣下九月十五日的備忘錄，和魁北克會議中決定的有關魯爾·薩爾與轉變德國成爲農業國家的意見聲明，這個備忘錄好像大部份是反映財長對於處置德國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應該把國務院對於這事的看法貢獻給你」。跟着就是赫爾國務卿的政策聲明，在經濟的部門，他說：我們目標之一，是使德國永不能再度作戰，並永久消滅德國對於歐洲的經濟控制。要達到這兩項目標，有下列各項必要的措施：（一）毀滅所有不能改變成和平用途的戰爭工業，並防止其重建，（二）其他的軍用工廠一律強制其生產民生用品，史汀生陸長在大體上贊同赫爾的意見，在一次與總統的談話中，他表明了他的態度。總統當時說他們之間的看法沒有大出入，他無意使德國變成一個農業國，可是史汀生當時就提醒總統對於魁北克聲明的措辭加以注意。陸長對於總統，平日衷心敬

愛，對於後者在大戰中的作爲，更有很大的欽佩，他表示：希望總統不會贊成一個報復的和平，總統同意史汀生的見解，並說魁北克文告中的幾句特別句子，必是當時不經意所造成。此外，總統並有備忘錄給對外經濟局長克萊萊，對此事有所解釋，綜合言之，魁北克會議中的「德協定」，實給羅斯福總統不少的煩惱。

各部間對於這個問題繼續交換意見，直到三月廿五日，經過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會商之後，產生了一個書面文件，由三部代表簽字，而由羅斯福總統批准。以後助理國務卿克萊萊頗出席波茨坦會議的經濟委員會時，就用過這個備忘錄，這個文件中沒有提到使德國成爲農業國家的話。同時，創意魁北克計劃的邱吉爾首相，在波茨坦時，對杜魯門總統和我亦沒有提到這話。事實上，在波茨坦時沒有一個人向我們提過，而在那裏，我們的建議成爲對德政治、經濟方案的基礎，以後即被各國元首所批准。

當然，莫洛托夫已經從報紙上獲悉由於魁北克協議在我們政府中所造成的紛亂。他很明瞭德國人民如何的恐懼把一個熟練工業技工的國家轉變成爲農夫國家的任何計劃。莫洛托夫成功的利用了這種恐懼，蘇聯佔領區內的報紙，幾乎每天都在曲解我們的意見，在柏林的共產黨領袖們散布謠言，說美國對歐洲情勢感到厭惡，在短期內將撤退在歐陸的軍隊。

在莫洛托夫發表蘇聯對德政策的後一日（七月十一日），我對於美國立場作了一個一般性的聲明，我當時說得很簡短，因爲我要集中注意力在派定代表，並使他們立即工作的緊急目標上。

我想暫不發對德政策的詳細聲明，直等到外長會議預備處理德國問題時為止。後來我改變了主意，由於蘇聯代表強把德國問題的處理拖延到十一月，由於蘇聯在德境的宣傳攻勢繼續不輟，我決定立刻作對德政策的全部聲明。因為巴黎正在開和平會議（按即處理義大利及巴爾幹之和平會），不適宜於發表這個聲明；所以趕往德國，和美軍佔領區的佔領軍和文武官員談話。克萊將軍很鼓勵我如此做，他告訴我如果在德國境內發表一個政策的聲明，對於佔領機構極有幫助，同時他很快的安排斯圖加特的會晤，由於他的請求，我們先到柏林，爲了看看德國和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我們是搭了火車赴斯圖加特，我們乘着納粹政府爲希特勒享受而造的火車旅行，這車子確實是比美國總統的專用車來得奢侈舒適，希特勒的車廂包括兩個房間和一間大的浴室，我的太太和我對於過去希特勒和伊芙勃倫所佔用的房間，略有新奇之感。

我們在九月六日正午之前抵達斯圖加特，在彈痕纍纍的車站上，美軍佔領區內符登堡、巴伐利亞海西各縣的官員都在恭候，我急於和他們見面，因爲他們代表着我們重建德國地方自治政府與民主程序的第一個實驗。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問了他們幾個問題，我們和他們共處了半小時左右，然後一起到符登堡國立劇院，這劇院是斯圖加特僅存的較大集會場所。麥克納利將軍和克萊將軍已經盡最大努力，去安排一個發表美國政策的動人場面，但我確信他們的計劃沒有包括一個小的項目，當我和麥克納利將軍、墨飛大使和兩位議員步上講台的時候，軍樂隊奏着「惡劣的天氣」，我真想問問克萊將軍：是不是他命令軍樂隊奏這個象徵性的音樂。克萊爲了避免出風頭，

竟坐在來賓之中。

演說一開頭，我說美國人民已經明白我們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和平與福利是不可分割，同時，我們的和平福利，不能以犧牲其他人民的和平福利為代價的」。

「我希望德國人民不要再犯這種錯誤，認為美國人因為愛好和平，對於任何國家利用武力和威脅去控制其他民族及政府的行為，竟會袖手不顧。……我們意欲繼續對於歐洲和世界事務的興趣，我們已經協助去組織聯合國。我們相信聯合國將阻止侵略國家發動戰爭，因為我們對聯合國信任，我們將以全部的力量與資源來支持聯合國機構」。

然後我談到美國認為應當在德國實施的和平，我說我們老早已經不談所謂強硬或軟弱的和平，因為我們所要的是永久和平。「我們將反對阻礙有效的和平的一切粗暴及報復性措施，我們亦將反對招致破壞和平的軟弱措施」。

我們首先必須消除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時要給德人以機會，「把他們偉大的精力與技能用在和平的工作上，而在適當的時機，在聯合國中取得一個榮譽的地位」。

「如果德國在東方西方爭霸的軍事鬥爭中，成爲一個工具和夥伴，則決非德國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在一般性聲明之後，我提到需要的特定行動。德國在一代中兩度給予鄰邦的損害，應該盡它補救的責任。美國願意看到波茨坦會議中關於解除武裝和賠償的協定全部實施，如此德國的戰爭

潛能，將因戰時工業的廢除與重工業的減少和遷移而降低。但是，實施的程度，應以不剝奪普通人一般歐洲的生活水準而不致依賴外國援助為限。

我聲明：「在決定工業水準時，沒有允許從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因為自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將與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工業水準完全矛盾」。我接着說：美國不能同意比較波茨坦協定中更大的賠償。我解釋：由於盟國管制委員會未在德國經濟統一的點上獲得協議，因此波茨坦協定未能實施。沒有經濟統一，就無法達到盟國管制委員會所決定的水準。我說，美國的意見主張成立德國的中央行政機構，來發表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和一個全國性的運輸、工業與國際貿易組織。

我繼續說：「德國必須予以輸出商品的機會，使它能夠充分進口而造成經濟的自立，德國是歐洲的一部份，如果擁有巨大煤鐵資源的德國竟成爲一個窮人院的話，歐洲的復興特別是荷、比和接壤國家的復原，將因之而延遲」。

在聲明經濟原則之後，我轉到政治的領域，佔領的目的並不期望一個德國政治經濟生活的「長期外國獨裁」，而是「由下而上」的建立德國的政治民主。我們相信德人應在地方政體的推動中負起主要責任，我們要這樣的治理德國，使他們的政權走向地方分權。我力言：我們不信「大量的外國軍隊和外國官吏，不論他們的動機紀律如何的好，能在長期內成爲其他國家民主政治的最可靠的指導者」。我們要盟國政府確定一般的通則，在這樣規定之下，「德國人民能參

管理自己」，這樣盟國的佔領軍可以限制到「監督實行這些通則的數目」。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建議成立一個和約，包括一個駐德廿五年至四十年爲期的武力，去保證德國不再重新武裝。接着我就發表一個陸軍機關報星條報描寫爲「正像醫生診斷」的聲明：「安全武力可能長期留駐德國，我們不顧有任何誤解，我們不願推諉責任，我們並不預備撤退，我們準備繼續留駐下去，並在安全武力之中，供給我們的部份」。

同時，我們贊成及早成立臨時政府，但這個政府的負責人士不應由其他國家來安排一切，而應包括四個佔領區中各邦各省民主而負責的主要官員。在管制委員會權力之下，這個政府應做到使中央政府正常的進行，同時還要起草一個聯邦憲章。

我接着說：「確定新德國疆界的時機已至，奧地利已被承認爲自由獨立之邦，波茨坦會議，各國元首支持哥尼斯堡劃歸蘇聯的要求，至於西里西亞及東部領土爲行政目的而轉移給波蘭一節，在會議前蘇聯已經提出，但是波茨坦會議的換文中，清楚地指出：「各國元首不同意在和會中支持任何特定領土之割讓」。我們的確在雅爾達會議中同意，寇松線以東的領土——應由波蘭轉移給蘇聯，同時亦相信波蘭的西北疆界應有補償的修正，可是德國領土割讓的範圍，必須在最後解決獲得同意時方能有所決定」。

我指出：我們不能否認法國對於薩爾的權利，但是提到魯爾和萊茵區「美國不能支持對於無可爭議的德國領土的佔領，和不是真正有別人民所要求的領土分割」。我們是決心使這些區域內

的資源，不再用於破壞性的目的，因此我們贊成「如果必要的話，可以管制整個德國，包括魯爾及萊茵區在內」，但是我們不會贊成任何使魯爾及萊茵區落入列強政治控制及利用的管制方式。

我結束我的演講時說：德國人民必須明白，「想統治和屈辱全球」的是德國的武力，「德國人民目前的痛苦，是他們領袖所發動的戰爭所賜予的，美國無法救助」，但是我們想法給德國人民一個機會，「只要他們能够尊重人類自由與世界和平，有一天他們能自重重苦難之中，尋出一條生路」。

演說完畢，樂隊奏美國國歌，所有的聽眾，包括德國領袖在內，都肅立致敬。地點和環境，特別是佔領軍文武當局的出席，造成一個特別感動人的場面。當最後一個節拍沉寂下去的時候，離國好幾個星期的范登堡議員，掉頭對我說：「美國國歌以前從沒有給人如此的感動」。

這個聲明在英、美佔領區均廣為登載，法國佔領區略為登得少一些，除開蘇軍佔領區外，電台均有譯成德文的廣播，但在蘇聯佔領區內，除了一家報紙之外，其餘都把它登在第二版，記載最長的亦僅有一百四十行。而在一個短時期之後，全歐洲共產黨所控制的報紙，發動了一個嚴厲批評的攻勢，在波蘭，波德邊疆的聲明尤其受到攻擊，說美國破壞波茨坦協定，但是事實並不如此，我們當時會指責蘇聯將自己佔領區分一部給波蘭的片面行動，史達林就向美總統說：「波蘭西部邊界問題正待解決，蘇聯沒有任何約束」。最後的換文上說：「三國元首重申他們的意見，波蘭西部邊界應在和會中作最後決定」。史達林當時對總統的聲明是真誠的，但是在波茨坦換文

簽字半月後的八月十六日，蘇聯竟與波蘭締約，承認奧得·尼塞兩河爲波蘭的西疆。

斯圖加特的演說，使蘇聯再不能在波蘭人面前說這一套，而在德國人前講另外一套，他們被迫來作一個選擇，終於正式宣布支持波蘭的領土要求。以後，德國領袖們力言蘇聯這種立場是與他們的諾言相背，因此，德國人對於共產黨的擁護就開始減弱了。我相信，由於我們政策的宣布，蘇聯希望擴展到柏林的勢力範圍，被迫後退到波蘭控制區。

當我們回到巴黎時，好幾個歐洲政府的代表向我表示，他們對於美國對德方案的贊同。貝文先生亦曾深表贊意，他說其中有大部份是英國準備提出的，莫洛托夫沒有提到這件事，不過據他的屬員說，我的演說在蘇聯大使館沒有受到喝采。

邱吉爾從瑞士打來一個賀電，因爲他大約於一週後要路經巴黎回到倫敦，會問起是否可以會晤。我立刻告訴英大使說，我很高興到大使館拜訪邱吉爾先生。英大使很用心的保持邱吉爾在巴黎行蹤的秘密，邱吉爾剛剛在日內瓦和比利時京城受過盛大歡迎，對於保證秘密的種種步驟，反覺有些討厭。我亦感到同樣的煩燥，但是這次保守秘密是個成功，我從旅館赴英使館和邱吉爾談話二小時，竟能跳過絕頂警覺的美國記者的耳目，這件事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星期六下午，美國記者按照法國習慣去休息了。邱吉爾只想表示對於美國立場的贊成，和討論幾個時局問題，他並不批評英政府的任何官員，同時我猜想，因爲他是反對黨領袖，他並沒有得到英國外交的情報，感到不大快樂，我們談到許多事情，在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史末資元帥來訪，我們又繼續討論世

界問題，以後我就向這兩位偉人告辭，希望他們愈老愈健。

對於有幾位法國政治領袖，斯圖加特演說使他們失望，因為反對魯爾·萊茵區的分劃，並堅持德國中央政府的成立，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保證在和會中支持法國對薩爾的要求，並維持在歐洲的佔領軍，因此感到高興。因為幾個法國政治領袖的反響，我接受巴黎美國俱樂部邀請的機會，重申我們維持歐洲安定和平的決心。在這篇十月三日的演辭中，我說：「過去美國已盡力之所能，站在歐戰漩渦之外，所根據的理論是美國應只管自己的事，歐洲的事與他無干，可是這路走不通，美國人民已經發現，當一個歐戰發生在未結束之前，我們自己的安全與和平，已經無可避免的牽涉在裏頭。因此，他們的結論是如果必須要美國協助結束每一次歐戰，還不如盡他們的責任來防止歐戰的發生來得好」。接着我向法人力陳我們建議的四十年和約的價值，我說「美國不但願意看見在約和之前德國被解除武裝，而且願意取得保證在和約締結四十年之後，德國依然沒有武裝，只要這樣的和約被執行，魯爾決不能成爲德國與歐洲的兵工廠，這是我們所建議和約的首要目標」。

「美國是堅決的反對德國軍事力量的復活，我們亦反對控制德國的角逐，這樣會再給德國分化和征服的力量，我們不願意看見在東方西方爭霸戰中，德國成爲工具或伙伴」。我亦解釋，我們在德國正在培養地方責任的意識，使人民注意到各邦，少留心到中政府。「我們願意看到由各邦產生的聯邦政府，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創造的各省」。我這篇演說再度向法國人民保證，美國願

意看見一個新生的德國，能够尊重國內的人民自由，同時不威脅鄰國，尤其法國的安全。

馬歇爾國務卿在一九四七年春季在莫斯科宣稱：斯圖加特演說，繼續代表美國的對德政策。

蘇聯的政策仍如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所透露的一樣，沒有變化，外長會議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莫洛托夫宣布對德政策後二日，我和國務院的兩位高級官員出席蘇外長的宴會：在席終時我對他表示：他既是事先不知道不會同意討論德奧和約，我對於他的不坦白相告深表遺憾。因爲這樣做，可以避免許多一事無成徒傷感情的激辯，他很客氣的承認我的見解正確。我就問：「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對於德國問題的真正意圖？」他說：蘇聯需要在雅爾達會議時的條件——一百億美元的賠償，並「參加魯爾區工業的「四強管理」。從那個時期起，有許多關於蘇聯對德國野心的種種推測，而蘇聯的代表亦可能爲本身及其附庸提出其他的要求，但我深信莫洛托夫那一天晚上的聲明，確可代表紅軍高級指揮的真正願望。

在這兩項條件之內，蘇方對於參與魯爾工業的管理，有着更多的興趣。這個地區煤鐵的蘊藏，使蘇聯把它認爲歐洲的兵工廠。他們要參加決定魯爾區產物的分配。我們在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經驗，證明這個建議之何等不切實際，兩年多來，這個委員會努力爲各佔領區之間取得若干諒解，但是管制委員會各委員之難於取得諒解，一如外長會議中各代表。我們在朝鮮有另一個實例，在那裏我們被假定與蘇聯共同治理，但是直到七月，過去因雙方不協議而於一年前停頓的談判，始告恢復。如果除了空費數月談判之外，在任何方面都無法取得協議，四國共管魯爾的工業

是不切實際的，對於這區的任何工業，他們會有很少的協議。因此，四國共管將有效地摧毀魯爾的工業。反之，如果有適當的監督，它對於歐洲的經濟健康是必不可缺的。

在討論魯爾問題時，法國表示贊成由西歐的盟國政府共管，而不提蘇聯參與的事，至於不包括蘇聯在內的魯爾國際共管，要希望蘇方同意是太不現實的事，沒有那國政府鄭重討論過。

魯爾區的工業，應與德境內的其他工業，在和約中同樣的考慮，一旦和約取得協議，德國工業的管理應發還其所有者負責，我們的利益和責任，是要求這些工業不再製造軍火，要做到這點，可以採用我在四十年和約建議中的聯合監督辦法。我想這是蘇聯反對這和約的理由之一，他們知道有許多人主張國際共管魯爾，如果四十年和約一旦通過，極大多數人將感到滿意，這樣會減少蘇聯取得魯爾區工業的機會。

智慧和正義感均將阻止美國在魯爾問題及賠償問題上，遷就蘇聯的要求。可是莫洛托夫說過，這是任何和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為我們相信，和約及早締結，對於歐洲復興極端重要，我們被迫去考慮必要的措置。

第一個步驟業經採取，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巴黎，我宣布合併各佔領區，不論蘇聯同意與否，這是我們最後一着棋，當時我表示，希望在「這次會議」中，大家能同意建立德國中央行政機構。以謀德國的經濟統一。爲了滿足皮杜爾外長的恐懼心理，我表示我們同意法國繼續管理薩爾，直至德國的西畫決定爲止。如果會中不能同意成立中央機構，美國另有建議。德國沒有一個

佔領區是完全自給的，如果把兩個佔領區作爲一個經濟單位來處理，一定能改善現狀。我指出：英美佔領區內的官吏，近爲交換若干產物，曾經討論過共同的農業政策，當時我宣佈：「四強成立協議實施波茨坦協定，須將德國作爲一個經濟單位治理，美國願與其他佔領國政府合作，將各佔領區作爲一個經濟單位處理」。「現狀之繼續將造成通貨膨脹及經濟癱瘓。如此，將使佔領國費用增加，德國人民亦因此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美國不願意分担這種情勢延長的責任，我深感我們的實職是爲佔領國尋求合作之道，將德國作爲一個經濟單位治理」。

翌晨，貝文外長宣布英政府原則上同意美國的合併建議，以後克萊將軍就和英方代表勞勃生中將在柏林進行談判，直至在紐約舉行外長會議爲止。

在柏林與華府的談判中，所有的問題俱獲得協議，只有每年虧空由各國政府負擔這一點，歷而未決。一九四七年美國佔領區的虧空估計約二億美元，英軍佔領區約四億美元，英美雙方代表都相信虧空額將累進的減少，而合併的佔領區可以在三年之內自足自給。這個問題放在貝文和我的前面，貝文告訴我：英國財政部的官員認爲，英國沒有充分的美元支付未來三年的虧空，因此，希望美國能負擔百分之六十的負擔。我答覆道：因爲英軍佔領區的虧空數字比我們大得多，所以當我們同意平均負擔時，我們已每年多支出一億美元，因此負擔百分之六十的建議，礙難接受。我接着說：我國在德國代表的自信心也許是錯誤的，可是他們堅決的相信，如果由他們管理英軍區內的工業和煤礦，他們將消除大部份，即使不是全部的虧空。於是我十分嚴重的建議：如

果英美交換佔領區的話，我們願負擔百分之六十的虧空額。

貝文笑着回答說：「你知道英國政府不會同意這件事的」。我承認我確懷疑英國會把工業中心區和它豐富的資源，來交換我們以農業及風景爲主的佔領區。可是我又指出，我的建議¹¹以幫他給逼迫他的財部官員一個好答覆，於是貝文才同意平均負擔費用。我是想到把英國當作窮親戚和低級的伙伴，使他們負擔百分之五十以下的費用，不是件聰明的事，因爲他們是一個驕傲的民族，如此會容易引起憤怒，看起來還是從其他方面援助他們比較好。

英國應付虧空的困難不應加以小視，在一九四六年英美借款成立時，他們沒有想到要用美元購糧供給德國，這是一筆沒有預料到的大支出。這件事影響我對於另一點的決定，所以在我們開始合併佔領區內的輸出時，我支持英國的主張，結果省了他們三千萬美元。

我曾經希望法國參加我們的合併計劃，所以我宣布對於薩爾的決定。法國希望蘇聯亦能同意薩爾的建議，但是莫洛托夫一再反對，這是令人失望的，因爲我知道法國聯合政府不願採取得罪國內共產黨的行動，莫洛托夫之拒絕協助一個普遍支持的法國目標，很使法共受窘，他們很願意有另外一個事件來分散對於薩爾問題的注意。最後，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我書面勸告法國政府，並請在和約締結時，我們會支持法國對於這區的要求，英國亦提出同樣的保證。但是，法國政府沒有參加。

我希望法國不久能接受我們的邀請，把他們六百萬人的佔領區與英美佔領區合併，使四千六

百萬人民能在三年中自足自給，這種建議對蘇聯同樣有效。

但是盟國的合作並不是蘇聯計劃的一部份，蘇聯政界對合併這事大聲抗議，在大戰結束之後恐怕沒有一件事受過莫斯科如此嚴厲的攻擊。這表示否決權並不是到處有效，亦表示我們不會一味遷就莫洛托夫的想法，同時可以表示西方強國亦願以行動支持他們的利益，與他們相信是歐洲亦是蘇聯多數人民的利益。

我們的次一行動，必須是和德奧締結和約，而問題的關鍵是德國。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時候，我在準備對德和約事件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協議，是在十二月紐約開會時考慮這個問題的諾言。在紐約，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協議，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莫斯科會議中處理德奧問題。可是在莫斯科經過六星期長談後，德國問題事實上還是和去年七月間一樣，外長們決定休息至本年十一月間，再繼續討論。除非蘇聯在十一月間改變態度，否則又將沒有協議，休會到一九四八年再開會。貝文、皮杜爾、馬歇爾三位，在莫斯科盡力在重大問題上謀致協議，但是因為蘇聯的反對而沒有成功。

我們必須記得莫洛托夫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巴黎的聲明：「即使德國政府成立，亦必須於數年之後與他們締結和約，方是明智的舉動」。我們必須回憶他另外一個聲明，說我們務須着急，「我們應當把明年的光陰，用來想想對德國應該做些什麼工作」。

世界輿論也許逼得外長會議下次在倫敦開會時，對德國問題鄭重考慮，但是我們應該明白，

即使蘇聯會最後同意邀請各國召開和會，事先他必然利用否決權的武備，從英美法三國取得讓步。我們已經有過這類經驗，這個印像會保持得很久。印度人的說法很正確：「欺騙我一次，是你的恥辱，欺騙我兩次，是我的恥辱」。

因為是我首先向杜魯門總統建議，把外長會議成立作為起草所有和約的機構，任何人可以明白當我下這個結論說認為這個機構不能符合設立的本意時，是如何的勉強。我最初建議時，是假定外長會議中各代表都急於取得和平，我們從沒有想到這個有價值的原則，會被一個會員利用來強迫他人接受他的意見。我們之所以沒有想到這點，是由於我們假定大家有早日恢復和平的共同目標。現在我不再確信是如此了。同時，如果蘇聯領袖們繼續用各種方法去阻撓和平的恢復，繼續駐大軍在德、奧及其鄰近國家，我們將尋求其他締造和平的方法。

在德國問題的解決中，可爭議之處較之義大利及巴爾幹和約為多。因此，外長會議中的任何一員，很容易延遲其工作並能提出動聽的理由。即使由於我們的委屈求全，使和會的請求能夠發出，和會的進度亦不會迅速。這次巴黎的和會是從一九四六年的七月廿九日開到十月十五日，所以我們可以有把握的假定，對德和會將開得更長。假使我們採取過去的途徑，和會的建議將先送外長會議，對於是否應包括在和約之內作一最後決定，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在最順利的情形下，歐洲和約締成的展望，是在遙遠的將來。爲了和平與安全的利益，爲了盟國和過去敵國百萬人民的政治、經濟的福利，我們不能允許如此長久的延遲。

馬歇爾國務卿在莫斯科會議時宣布，如奧國和約不能獲得協議，美國將考慮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十四條規定，將此事提交聯合國大會。我了解他的態度，且深表同情。在討論義大利及巴爾幹和約時，我遇到一個相類似的環境，我在用無線電廣播中向美國人民報告時，曾作類似的聲明。可是在再度考慮之下，我覺得這個辦法沒有什麼幫助。聯合國憲章並沒有給全體大會以行動的權力，它只有建議的權力。過去我會經希望大會提出建議後，在建議中反映出來的世界輿論的威力，將誘導蘇聯去接受，現在我是傾向於相信此事不會發生，蘇聯將向全世界辯論說，大會中許多國家根本沒有對德作戰。蘇聯的發言人將指責重要而有爭端問題之決定，例如魯爾區的管制等，將被南美及阿剌伯等國家的投票所決定，而這些小國對於戰敗德國，並無重大軍事貢獻。使聯合國大會成爲這個爭議的中心，將給它一個不願承受的負擔，這類責言將嚴重的損害它的威望，並減少舉世人民對於牠的信心。

我們應該採取另一個行動的途徑，美國應當邀請構成外長會議的國家（當然包括蘇聯在內），同意儘早在一九四八年內舉行和會。

在莫斯科時，馬歇爾國務卿建議下次開和會時，應包括一切參戰的國家，他建議一項決議案之被採用，不但須有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且須有在大戰中作軍事貢獻的國家三分之二多數同意，這項建議符合我們自始主張的目標，就是由共同作戰勝利的聯合國全體參與和平的締造。同時，美國所建議的投票程序，可以阻止僅在戰爭中作經濟貢獻的國家，在和會中不應有的權

力。

假使外長會議一個會員反對我們及早召開和會的建議，其他的份子可以進行召集。召開的方式，是使不同意的會員，如果一旦改變宗旨時，以後仍有機會參加，而成爲發起人之一。舉例來說，法國當初沒有做舊金山會議的發起國家，但，以後成爲安全理事會的永久會員，在上述情形之下，其他國家應盡力催促不同意的國家，來發起並參與和會。

每個發起國家應各自提出和約的草案，無疑的，在和會開幕前，應儘可能先在許多項目取得同意，德國投降到現在，已經快兩年有半，德國問題在這個時期內，已被國強一再討論，在波茨坦會議中，四強中的三強已就政治、經濟和賠償問題有所討論與締結協定，法國最後表明了它的見解，如果在這種努力之後，四強還摸不清楚他們的立場，他們將永遠不會有結果的。在巴黎和會中，我們對於處理草案和其他程序問題，已有充分的前例。像在巴黎和會時一樣，和會應該由它的會員中，任命幾個委員會，來考慮發起國所送來和約草案的各個不同部份。例如一個委員會考慮政治問題，另外一個考慮經濟問題，再有一個研究軍事問題。如果需要的話，各委員會還可設立附屬團體，在職權範圍內，各委員會可就自己的部門準備和約的草案，在這種方式之下，凡是對德作戰的國家，在起草和約時都能參與。假使我們最後終要召開和會，並像巴黎會議時由委員會研究草案，爲什麼不就在今日召開和會？

我們必須鄭重表明，我們並不想嘗試單獨議和或是操縱和約的條款。我們亦並不企圖強要

會接受特別的計劃，而是由我們提出計劃，並催促英法蘇同樣的提出他們的計劃，一切由和會全體來作決定。

鑒於過去的经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可能性，就是蘇聯可能拒絕參加和會，這對於舉世愛好和平的人民，自是深表痛心，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希望此事不致發生，可是不必因這個可能性而致停止我所建議的步驟。

在和會開幕的時候，合併的英美佔領區可能是在成功的進行着。同時，我希望即使蘇聯佔領區不參加我們，擁有六百萬人口的法國佔領區已和四千八百萬人口的英美區能够合而為一。和約可由已合併的佔領區內的政府簽字。事實上，德國批准和約有好幾個方式，馬歇爾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中建議，當德國人民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接受憲法時，將被請同時投票決定成立那一個政府來接受盟國的和約，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如果這點辦不通，我們可能考慮把和約本身交由德人來一次公民投票，那時德國人民將自行決定，還是接受和約？還是無定期的在軍政府和軍事佔領之下生活下去？最後一點也許要造成一個印象，就是這和約本身必需是德人所願意接受的，但這個印像是可以被另一好處所抵償。將來我們所接受的德國政府，可以因為沒有締結大多數德人認為壓迫性的和約，而避免了政治上的困難。而且在現狀繼續之下，我不相信德人會把和約當作壓迫他們的。

在無蘇聯參與而採取行動之前，我們應該再度邀請蘇聯政府一次，和我們共同參加和約的訂立。

這個和約將和義大利巴爾幹和約一樣，規定不簽字的國家不能分享和約中之任何利益。所以如果蘇聯拒絕簽字的話，他們將決不能取得西部佔領區內任何賠償支付，同時，亦不應該接受因和約而必然產生的利益。

如果有人問，假使蘇聯拒簽和約，我們下一行動將如何？

假使蘇軍自德境撤退，其他國家自無採取行動的必要。如果紅軍不撤，我們將被逼採取最後的手段，把此事提交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這問題不再是起草和約事件（這件事不在聯合國職權範圍內），而是我們已經面對一種和平將受危害的局勢，過去聯合國之創造就是爲了要應付這種局勢。

蘇聯已經表示過忠於大西洋憲章，而憲章中載明簽字國不作領土的擴張。在憲章中她莊嚴的保證「不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來危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或是採取任何與聯合國目標相抵觸的態度」。

德國東部，像德國的其他部份一樣，軍事佔領是臨時性的。到和約締結時爲止。如果在盟國訂定和約之後，而蘇聯仍是駐屯大軍，則就是蘇聯要在這些土地上無限期留駐意向的明證。這種行動，將威脅世界和平，聯合國應該要求蘇聯從德國撤退。

第十一章 向亞洲和平邁進

我們必須永遠不要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太平洋爆發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米蘇里艦上閉幕的戲劇，是在一九三一年同月開場於滿洲。繼之而發生的一幕又一幕，是我們在美國的人們所關注的——首先是義大利在一九三五年侵入阿比西尼亞，繼之又有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內戰，一九三七年日本的進攻中國，一九三八年奧地利與捷克的淪陷，以及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進攻波蘭。但是所有這些事件已把我們引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悲慘的珍珠港事件。

假使我們把歐洲視做可能的世界大戰的導火綫，那末我們就必須把亞洲看做一個很大的潛伏着的火種。那里佔着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民，亟待文明的提攜。所不幸的，中國一戰未已一戰又起。我們的熱忱努力，至少在眼前已經失敗。而日本以吸收近代文明佔有先着，進步却很顯著。日本人民從封建和傳統的經濟制度，及宗教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一切革新，無不為民主社會之發軔。凡此進步，要須歸功於麥克阿瑟元帥的指揮有方，而我們維持日皇制度之存在，以執行最高統帥的命令和政策，也是已著成效。

七月十七日，杜魯門總統和史達林元帥初次會面，討論蘇俄向日作戰之舉。史元帥說，他還沒有和中國締約——這是蘇俄對日宣戰的先決條件。在會議結束之後，將和宋子文院長，繼續談判。關於大連港的主權，是一個尙待解決的問題，杜魯門總統宣稱，美國堅決要大連保持爲通商港。史達林回答道，如果蘇俄獲得其管轄權，那末這個狀態是可以實現的。當時我就指出，根據羅斯福總統所參予的雅爾達密約，中國應保持掌握大連的主權。

七月二日，陸軍部長史汀生曾以具有卓見的備忘錄咨呈總統，爲向日提文的張本。總統根據此備忘錄，就起草中、美、英三國的聯合宣言。總統和我曾一再斟酌，邱吉爾首相的若干建議亦經採納。這個邱氏所同意的宣言，除了關於日皇將來的地位問題沒有涉及之外，其綱要即係根據史汀生部長的建議。這個提議式的宣言，就送給蔣介石氏簽署。

未幾邱吉爾，艾德禮二氏返英，杜魯門總統也利用這個機會，往法蘭克福的美軍佔領區總司令部，我也隨着同去。當我們返抵「小白宮」的那一晚，有兩件電訊等着總統。一件是威耐德大使報告邱吉爾競選失敗的驚奇消息，第二件是蔣介石元帥認可那現在稱爲波茨坦的宣言。這宣言就立刻發表公布，並以一份由專差遺送給莫洛托夫先生。

當晚深夜，莫洛托夫氏來電話，要求把這宣言擱置二三天，當告訴他說這宣言已經宣佈時，他似乎煩惱了。第二天，我解釋給他聽，在這宣言發表之前，所以未曾送他過目者，因爲我們不要叫蘇聯由於尙猶未對之作戰的國家，提出宣言，而感覺困難。他沒有說，他希望有所修改，不

過單純地說，我們總得先和他商量一下呢。

兩天之後，七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再來訪晤。原來商決，總統及我將和他並史達林元帥相見，但莫氏告訴我們，史達林那天是病了。他教莫洛托夫先生和我們討論蘇聯參戰的直接動機。莫氏說：蘇聯政府以爲，最好由美、英，和其他聯合國家，向蘇聯提出參戰的正式請求。他補充說，蘇聯政府當然以爲在參戰之前，應先和中國政府締約。

這個請求對我們便是個問題了。蘇聯已與日本締有不侵犯條約。蘇聯政府又曾與希特勒訂有同樣條約，但是破壞這個條約的是納粹黨。我們不信美國政府在沒有良好和充份理由之下，應該要求其他政府去違反協定。蘇聯業已於幾個月前通知日本，對此約不擬續訂，但是有效的期間，還近近乎一年。總統對此覺得煩惱。

我們接獲報告稱，宋氏告知他的政府，蘇聯在雅爾達密約之外，有所要求。由於談判是根據了羅斯福總統的囑咐而進行的，我倒發生了興趣。深恐宋氏受不了蘇聯的壓迫，在沒有明瞭我們的態度之前，也許再有所讓步。因之在獲得總統的認可之後，我就通知中國政府說，我們不勸告中國在雅爾達密約的條件之外，作任何的讓步。

中國和蘇聯後來終於締了約，但是事實所揭示的，我們對於大連所關懷的卻沒有看錯。在日本戰敗後二年，大連仍舊不是一個自由港。在一條船要駛入這港口之前，先要獲得莫斯科方面的准許，不但船隻如此，連船上的人也是如此。

在後來的會議中，史達林對總統和我說，駐莫斯科日本大使曾探詢蘇聯的意思，是不是願意租在結束這次戰爭的居間人。史達林說，這個請求，並不是表示日本，願意像同盟國方面要求的無條件投降；語氣非常籠統，因之莫洛托夫僅僅對日大使說，這件事不久當再和他討論。史達林說，後來日本大使又送來了一件公文。裏面說道，日皇願意遣派近衛往莫斯科，表示日本意欲結束戰爭，假如要求她無條件投降的話，日本一定以全力作戰到底。史達林補充說，因此曾去了一封信給日本大使，說明關於這一點，因為含糊得很，並沒有特殊的建議，無從予以確切的答復。杜魯門總統對於史達林的措置，表示贊同。

此時史汀生部長告訴我們，他已接獲七月十六日在新墨西哥試驗原子彈的報告，這炸彈已經盡如人意，一旦使用的話，定能將早已立腳不定的敵人，一舉殲滅。在沒有試驗之前，我們約定。如能證明成功的話，一定先給日人以最後的嚴厲警告，然後使用。

至於我個人呢，我可以很坦白的說，蘇聯在東部德國的行動，和在波蘭、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違反雅爾達密約。假如蘇聯決心不參戰的話，我真要深覺滿意呢。日本雖則一再堅持不願無條件投降，我却相信原子彈定可成功，而令日本在遵從我們的條件下接受投降。我深恐紅軍進入滿州後將發生怎樣的事態，在他們撤離滿州之前，我的恐懼實現了。

當蘇聯參戰的雅爾達密約成立時，軍事局面完全改觀，羅斯福總統和我們的軍事領袖們，需要蘇聯來作戰。沒有一個想得到雅爾達會議後我們所遭遇的種種困難。無論如何，條約業已締

結，我們只有遵守而已。

總統答復蘇聯的信，由我起草。開頭提起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蘇、美、英、中聯署的莫斯科宣言會規定，為維持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四國間應隨時相互商洽。其次又提到聯合國憲章一百零六條，及一百零三條條文：「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這封信的結語是：「憲章雖然沒有正式批准，但蘇聯代表在舊金山時，却已同意蘇聯政府將為安全理事會會員之一。鄙意在莫斯科宣言與憲章條款之下，蘇聯政府正宜表示其願意與其他強國商洽合作，對日作戰，以期達到維持各國間的和平及安全目的」。總統後來告訴我，史達林元帥對此會表示其很大的感謝。

八月七日下午，我們返抵華盛頓。前一天我們在船上已獲悉第一顆原子彈已經擲在廣島了。我們回來後的翌日，長崎也遭受原子彈轟炸，從八月九日開始，蘇聯向日宣戰。八月十日清晨，瑞士政府轉來日本預備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公文，「具有這宣言並不包含有損及日皇為最高統治者，任何要求的默契」。

這消息來的時候已在夜間，到了翌日一早，才來訪總統和我。我立刻到白宮去，陸海兩部長不久也到了。李轉海軍上將主張應立刻接受日本的提議。我對總統說，容再考慮一下去回答道文書。

我說：「我們爲何要退讓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這要求在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加入作戰之前提出的。如果有什麼條件要接受的話，應該由美國，而不是日本，來提出」。總統同意我的見解，命我起草答復。文中包括三要點：（一）自投降時起，天皇及日本帝國政府統治國家之權限，置於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之下。（二）日皇應命令及確保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爲履行波茨坦宣言，簽證於投降條件，並立刻命令日軍停止作戰。（三）根據波茨坦宣言最後成立日本人民自由意志之政府。

八月十一日送出了這個復牒，我深信日本必能接受的。十四日下午四時後，才接獲我們駐瑞士大使哈立生的電話，通知我日本回文的內容，我就令陸部把通倫敦莫斯科和重慶的無線電路接通，就把哈立生的消息通知三國的外長。五時半，我把會話的經過報告總統。一切措施均經核准。六時，瑞士使館外交代辦葛拉斯里氏來訪，把日本來文讀給我聽。一小時後，杜魯門總統向全世界宣佈，這次最可怕的戰事的結束。

日本在投降之前的一切，將來當有詳細的記載。據向日本高級官吏探詢，和所得的公文材料看來，日本在投降之前五星期，對於史達林的意旨，猶無所知。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中國外長宋子文氏到了莫斯科，日人才疑到蘇聯的意向。那時外相東條曾說：「我們知道宋氏在莫斯科受到優渥招待，並與史達林有所商討……也許有什麼條約要締結」。可見就是在那時候，日本的情報工作效率並不強。

還有從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藤給日外務省的公文看來，他倒是一個實事求是，和有作爲外交人員。他告知日本政府說，他所接到的文書，在性質上過於含混，蘇聯政府決不會加以考慮。

假定只憑美麗的詞句而沒有實質，他們決不會被說服的。除了日本預備投降之外，曠野時日的去試探蘇聯政府的意思想是徒然無益的。蘇聯既力主德國無條件投降在前，她當然順從英美所提的日本無條件投降。佐藤說，他明知他的見解與聖上的懿旨相悖，但是即使「罪該萬死」，「我還是要保留數千百萬，徒死無益的牛靈」。他更加強地說，「日本除了無條件投降之外，不再要有其他選擇」。

如果日本政府真能聽從佐藤之言，而無條件投降的話，投擲原子彈誠非必要。但是軍閥們還夢想着和平談判，置佐藤之忠告於腦後。七月廿一日，日本政府訓令其駐莫斯科外交代表道：「在任何情狀之下我們不能接受無條件投降。即使戰事延長，流血更多，在敵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下，我們要遵從天皇的命令，對敵人作戰至一兵一卒而後已」。

日本政府不再經由瑞士或瑞典，而直接和蘇聯來往，以便通知蘇聯，他們準備全都接受蘇聯在遠東方面的一切要求。他們希望，由於應允蘇聯的要求，可從而在和談中獲得幫助，他們還希望由於這樣的商談，去切實找出蘇聯會不會參加作戰。

直到原子彈擲投於廣島之後，日本內閣才決心投降。據日本外務省的紀錄，八月十日蘇聯駐東京大使若文東條，蘇聯已簽署波茨坦宣言，並與日本成立戰事狀態。東條接着便把請由瑞士轉

交美國，表示日本除了保持日皇統治權之外，願意接受投降的文書副本，給蘇聯大使帶交蘇聯政府。

日本的投降較我們理想中的時間為快，但是我們已早有準備了。國務院、陸、海軍部等合組了一個委員會，準備處理投降及佔領的一般命令。有一件棘手的事情發生了，就是誰配去接受日本的投降呢？諸強都同意麥克阿瑟將軍堪以代表他們和美國去投降。但海軍方面對此表示異議。羅萊斯特海軍部長綜合他們的意見為：太平洋作戰海軍是主幹，海軍士卒從珍珠港起，一直一個島一個島的打到東京；他們把日本的海軍給消滅了。因之麥克阿瑟可為聯合國簽投降書，而尼米茲上將應該代表美國簽字。我同意羅氏的理論，海軍自應參予其盛，並答應他設法一切。當夜，羅萊斯脫從電話中建議，接受日本投降的儀式在「米蘇里」戰艦上舉行。我深切了解，這就是陸軍所謂的「海軍賺頭」了。假使他僅僅的說「一隻戰艦」，這問題辯論之處尚多。但是他既提了米蘇里，我知道這件事獲得解決了。當總統接到這項建議時，自然，他以為這個主意再好沒有了。這樣，一件海陸軍相持的事情，總算順利解決！

可是蘇聯人民也許不會知道羅萊斯特的勝利，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們在莫斯科開會，晝夜前夜，史達林元帥款待我們吃飯之後，放映蘇軍開入滿洲的電影。裏面講到：日軍的輸戰僅僅是針對着蘇聯；滿洲人民熱烈的歡迎紅軍；最後是投降條件的簽訂。根據這張影片，投降典禮中的主要參加者為日本和蘇聯的代表。最高指揮麥克阿瑟將軍倒在後邊。這一個場面的說明為：「在

一艘戰艦上簽降書」。並沒有說明這是「米蘇里號」，甚至連這是一艘美國船也不提。全部的場面，很可以叫蘇聯人相信，這是蘇聯和日本兩國間的戰事結束，而在蘇聯軍艦上簽降書。蘇聯重觀電影宣傳由此可見，而蘇聯政府現在歐洲各國推映蘇聯影片，在我看來亦不足怪了。

我們負扭着擊破日本軍事實量的大部份責任，常以對日作戰即爲對軸心之戰，而希望佔領日本應由聯合國負起責任。早在八月二十二日，我們邀請蘇聯，英國和中國，來和我們共同組織一個十強諮詢委員會，以期實行波茨坦宣言和投降條款的目標。除了英國之外，蘇中兩國很快的接受此議。

九月中外長會議在倫敦舉行之初，我就和貝文商討，以期獲得兩國間的洽協，商談尙在半途之中，却又生出了一個枝節。莫洛托夫奉了莫斯科之命前來看我。他對於投降條款之提出予以責難。尤其對於日軍的復員指摘更甚。他說僅僅把日軍解除武裝而遣送他們回國，是危險的；日軍應該作爲戰俘。我們應該效法紅軍在滿洲對付日軍的方法，就是叫他們做工。我會向莫氏說，波茨坦宣言中規定，「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沒有人可以正確的說，蘇聯方面的日本戰俘究竟有多少。一九四七年中，最接近的猜測大約還有五十萬人。運輸上的困難雖然遲緩了日俘的遣送，可是他們總是返國的呀。

但是在倫敦之時，當莫洛托夫講到日軍應該當作戰俘時，他甚至表示，我們的政策有使日本恢復其侵略的危險。副部長鄧恩氏當即指出，我們提議所組織的遠東委員會，可以使莫氏所代表

的政府，有機會表示對日政策的意見，包括戰俘的解除武裝問題在內。我說，我們應該與對付德人一樣，對日本也來一個非軍事化條約。

兩天之後，莫洛托夫主持開會時，提議成立一個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由美、英、蘇、中四國組織，以美國代表為主席，其權限較貝文君所建議的要大得多。其後又經兩次會議，我總以討論組織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為不當，其他會員因為急於要進行歐洲條約，支持我的主張，這時候莫洛托夫君的要求，又是他緩兵之計中的一着而已。

九月廿六日，我發起和貝文、莫洛托夫兩位會談，尋求解決關於法國和中國參加會議的權利，我們所持的不同見解，但是莫氏立刻又回復到蘇聯主張成立管制日本委員會的建議。麥克阿瑟將軍所計擬中的各種政策，使他發生「蘇聯代表繼續留駐東京，是不是對蘇聯有用處」的疑問。這次會議既以締結歐洲條約為前提，我不擬再討論日本問題。我對莫氏担保，回國之後，一定澈底辦理此事，並與他保持聯絡。

他說蘇聯代表團不明白，為什麼在目前的會議中不能討論這個問題，他更要問一問，報載美國人在日本所找到的二十億金元是否屬實，而與目下的局面有沒有關連。要是英、法、或中國的外長有此聲明，不無叫人要想到有侮辱的意味上去。但是，由於表示的方法，更其以蘇聯在任何地方行動的見解來看，我的結論是，莫洛托夫並無侮辱之意。

在波茨坦的時候，莫洛托夫承認紅軍確實搬運過大量的財產，並曾建議不妨在他所要求的時

債中減去十億元。雖則莫洛托夫在波茨坦，對於這件事似乎不無感到偏促之處，數星期之後，紅軍又在滿州把德國所做的事如法泡製了一下。蘇軍在他們盟國中國的領土上，把可以移動的東西，囊括而去。因之這是很可以了解的，當莫洛托夫看到美軍找到二十億金元，後來證明為不確的消息時，他以紅軍在這種情況下所做之事，我們也必能同樣的做之心理來測度我們。就是說在資財沒有藏到美國去之前，只管搬運金子，而拒絕討論日本事件。

在倫敦我再想法子和莫洛托夫作私人談話，力言設立遠東諮詢委員會，為考慮如何管理佔領日本之第一步。但是我的努力，未獲成效。同時我力促貝文，同意八月二十二日我們的建議設立遠東諮詢委員會。我非正式同意，開會時我們將擁護在東京及華盛頓兩地開會，印度又應加入為會員。英國議會授權貝文接受我們的建議，於是我希望莫氏放棄新建議，仍舊回復到他所同意的八月二十二日我們的建議。我立刻寫信給他，內稱：四強既已同意，委會應於十月三十日舉行會議，我希望蘇聯能派遣代表參加。他的回答是：自蘇聯同意我們八月二十二日的提議以來，情勢業已變更，他所代表的政府，現在請求成立一管制委員會。當我回返華盛頓時，還不能決定在委會首次集會時，蘇聯是否有代表來參加。

這局勢是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們和蘇聯關係的一班，使我真有不勝其煩惱之感。我覺得雙方若能對此問題繼續磋商的話，當可有調和之望，但是在這幾個星期中，雙方並未交談。

為促進和平工作之得以順利進行，打開倫敦會議的僵局起見，我們只得遲就地把締結歐洲和

約會議的提案加以修改，由總統出面，以措詞十分婉轉的信致史達林。

十月二十五日，哈里曼大使在加格里以總統的信面呈史達林，當他看到這封已經譯為俄文的信件時，開口就說：「日本問題並沒有提到」。我們於接獲哈里曼的報告後，立刻覺得在倫敦的估計錯誤了。當時我們想莫·托夫的延宕政策由於和平會議而起，現在史達林的問題，却證明他們對於日本格外的惱怒。

哈里曼同樣的感覺驚異，所幸我們在倫敦時，他也同在，得以八月二十二日的提議從詳告訴史達林。他聲明他並未受權磋商日本問題。他更說明，他知道我非常關心地在計劃一種方法，以便對於日本的政策，隨時得以通知蘇聯及其他同盟國家並互相商討，假定美國在執行佔領政策時，不受任何牽制的話。

雖則哈里曼力把這談話挽回和平會議的問題上，史達林的心目中却仍以日本問題應佔先着。翌日，他和我們的大使繼續談話時，一開始又談到這件事了。

他說，他不願意在遠東諮詢委會開會時派遣代表，誠如莫洛托夫已在倫敦說過，自從接受我們的邀請以來，局勢已經改變了。事實上，史達林已把他在東京的代表德拉夫揚科將軍召回，他說，這是因為他的代表既無人去通知，也從未參加商討，在此種情況之下，麥克阿瑟以盟國名義所有的舉動，他自無從接受其責任了。

史達林宣稱，蘇聯被看待為一個附庸的國家，而不像聯合國之一，這對於他的國家，未免有

擾感信。他指摘日本的報紙和無線電廣播，已容許對蘇聯加以擄掇；政府的改組也未會通知他或和他商量；日本政府封存他們的存款時，並未有所聲明。

哈里曼解釋道，麥克阿瑟將軍執行的投降條件，係蘇聯所同意者，所有財產暫加封存，以待將來聯合國方面的處分。他指出在投降條件沒有簽訂之前，我們早已提議組織諮詢委員會，以考慮像元帥所提到的事件，他力促蘇聯派遣代表，出席將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以免隔膜。

史達林並不滿意，他說，他在東京的代表，被視做爲「一件傢俱」，他恐怕如果再派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的話，爭執勢必重起。他極力主張，要是美國希望與蘇聯成立協定，除了兩國間從長磋商之外，別無他途。他對於戰事期中，蘇聯在滿洲邊界駐軍三十師，以牽制日軍七十師的事實，提出來叫我們注意，假定他們的建議得以接受，這些軍隊隨時可以協助佔領日本的工作。

因爲這個聲明，在討論日本和約時，無疑地將一再的聽到，這里倒不得不記下一筆，就是史達林元帥的聲明固然沒有錯，而日本財策在滿洲邊界三十或四十師的兵力，沒有嚴重地影響到他們的作戰能力，也是事實。由於美國海軍作戰的成功，日人在作戰早期間，已缺乏船隻運轉兵力和給養到太平洋各戰場去。爲了兵力無法活動的緣故，日本儘可把兵留駐在滿洲邊界或任何地方。日本可能把這些兵運往中國在陸上作戰，但是我們現在曉得，即使如此，也不致根本改變戰場戰事的結局。

我們接到哈里曼關於這場談話的報告之後，遠東諮詢委員會首次會恰好也就開幕，選舉了美

國代表麥克萊埃將軍爲主席。其後休會一星期，以便蘇聯有機會重派代表參加。事實上，運會開幕之始，並不能多所活動，英國和澳洲雖經同意合作，而對於總統所批准的遠東委員會，和聯合國會議提案，中間又經多次的同意爭執。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運新的遠東委員會在華盛頓開始發生作用。這會有權決定管制日本的原則，由美國政府根據本會的決議，指令最高聯合國統帥執行。這作用就是在未經我們同意之前，不能採取任何基本政策，而在委員會同意之前，所有緊急事件的發號施令，我們又能自由先爲處置。

遠東委員會接續的向東京最高統帥建議和商酌一切。當委員會和管制委員會成立之初，我會說明麥克阿瑟將軍的權力，不應由於委員會在決策和施政方面的無能，而有所削弱。兩年以來這兩個團體，由於事實的證明，並未牽制麥帥的行政權。麥氏和他的部下實施各種困難的工作，獲得美國以外的各聯合國方面的稱譽。

在莫斯科，莫洛托夫的心上，還有不少關於日本的問題。第一，他問到處置日本海軍的計劃，第二，關於日本的各島嶼。莫斯科會議前兩個月，我們已經建議所有日本剩下來的海軍船隻，應該一起擊沉。中、英兩國同意此議，但是莫洛托夫却回答道，他的政府需要四分之一留剩着的船隻，自驅逐艦以至較小噸位的船舶。他又曾問到商輪。海軍部長福萊斯特曾說過，他們所要求的海軍船舶，實際上的價值甚小，我們於其他和他爭論，例不如順從着莫洛托夫的論點爲得計。我對莫氏說，日本的商輪現正用之於遣送日人，似應暫緩提及。

除了他要我在其他外長之前，重行申述我們的立場之外，我不明白莫洛托夫爲何再度要在會議中提出此議。這是顯然的，他沒有知道，我已把送給他的公文，同時也送給他們了。莫氏另一動議爲參加處分日本的漁船，貝文立即指出，爲維持日本人食品的供給，漁船是少不得的。他說，日本縱已戰敗，生活無論如何總是需要的呀。莫洛托夫於是轉到日本託管島的問題上面去。

我回答說，美國對此尙無具體意見，除了下面兩點之外，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涉及太平洋日本各島的協議。即（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應該放棄以武力得來的領土。（二）雅爾達密約中曾涉及庫頁島和千島羣島。莫斯科會議之後，一九四六年的大部份時間中，我們對於國聯託交日本代管各島的問題，曾經深切研究。國務院和陸軍部方面的意見，這些島嶼既是國際委託日本管理，而我們的權限並不超過國聯，因之，如果必要的話，聯合國應該於託管協定之下，聲明這些島嶼在軍事上的重要而託由我們管理。我們既堅持着託管制度的設立，自不能出以不信任的態度。

海軍部長不要我們做對於聯合國有所不信任的事，但他又感到這些島嶼是由美軍的血肉所換來的，如有洽協，應以海軍獲得充份的基地爲原則，他深恐談判一經開始，折衝其事者對這主張未能貫徹到底。我力言美國的提議，假如有所更動，必先得總統和國務卿的核准。他對於託管制度的建議，深爲滿意。我們聯合國代表奧司汀氏終於把這個提議交與安全委員會。

紐約外長會議舉行時，聯合國正在開大會，若干未決定的託管制度的提議，尙待核准，並希

聯合國託管制度會議得以成立。

關於託管制度爭論點中所稱直接有關國家一點，聯合國大會託管委會我國杜爾氏主張，應待託管會議成立之後決定，蘇聯大使諾維果夫，又加以反對。

莫洛托夫希望我同意，就是安全理事會中五個永久會員國，應視為直接有關國家。他又建議五強應交換原文，承認這個默契。我回答，所謂直接有關國家的定義，乃是聯合國憲章中本身的解說。不應視為我們兩者間協定的題目。我又稱，在最後處置千島和庫頁島南部時，我一定對他的見地予以注意。這句話立刻得到很快的反響，他說，蘇聯並不想像對於庫頁及千島等成立託管協定；這些事件早經在雅爾達會議時決定。我指出，羅斯福氏在雅爾達會議時，一再說明，只有在和平會議時，可以決定領土的割讓，他又同意僅在和會席上支持蘇聯的要求。我接着說，我們在和會時當可支持羅斯福氏的諾言，反轉來，我們倒要知道，蘇聯對於我們提議把日本委治各島置於我們託管之下的態度如何。莫洛托夫氏很快的瞭解了這弦外之音，當安全理事會席上對於美國託管協定投票時，我很高興，但並不奇怪，蘇聯贊成我們的提議。

莫斯科會議時，朝鮮問題也是其他遠東領土爭執中的一個顯著題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美、英、中三國在開羅協定，朝鮮應該獲得自由和獨立。雅爾達會議時，羅斯福總統和史達林元帥又曾非正式協議，朝鮮應當予以獨立，假定在過渡時期必要的話，應組織託管政府。

當我們前往莫斯科時，朝鮮已分裂為二。日本投降之頃，軍事領袖同意，在緯線三十八度之

北的日軍向蘇投降，在隸北的向歸順我軍。

我們建議成立一個蘇美聯合委會，以求幣制商業運輸等的統一管理，又提議建立四強管託制度，使朝鮮得以組織獨立和有效率的政府。數天之後，莫洛托夫提出蘇聯方面的建議，爲求最緊要的經濟問題的統一成立聯合委員會，以及組織臨時政府，和一個期限四軍的國強託管委會。我們於原議上稍加修改之後，同意蘇聯的建議。

一九四六年一月，蘇美委員會開會，執行莫斯科會議的訓令，但是由於文字上的差歧，又起爭執。至今一年又半，朝鮮分裂如故，即臨時政府的組織，也是同樣的失望。蘇聯管理區中紅軍所訓練的朝鮮軍隊，人數在十萬至四十萬間。一俟聯合委員會，和蘇美佔領軍撤退，這些蘇聯訓練的軍隊，勢必左右政府，因之假定委會要撤消，這些軍隊也須解散，朝鮮不需要蘇聯或美國訓練的軍隊，她所急需的爲經濟上的幫助。

其他一個主要步驟就是早日締結日本和約。根據兩年以來的佔領經驗，我們已獲得了正確判斷。在麥帥管理之下，一切進步均極迅速。現在時機已到，對日締結和約，使日本人民知道他們的將來，在聯合國指示之下，恢復日本的復興工作。

我不以爲外長會議應起草日本和約，這理由是和對德國的相同。蘇聯在日本投降前數小時對日宣戰，不應堅持着和平手段，而獲得否決權。我們認爲和平會議應早日舉行，十一國委員國家，應以確實對日作戰者爲限，起草和約。凡和日本作戰之國家，應全部包括在內。

起草和約時，對於領土問題，不應多數爭論。關於庫頁及千島，美國自當支持羅斯福總統的協定。沖繩島以南的羣島，希望能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為情緒上的理由起見，美國應獲得託管沖繩的利益。

賠償問題將為爭論之焦點自是不可避免。蘇聯以從滿州移去的資產，視為「戰利品」，堅持須從賠償數目中除去。一位蘇聯代表估計所撥動的資產值九七億元，賠償委員鮑萊氏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估計，直接損失即為八五八億元，若包括毀損和復置在內，數逾二萬億元。

當然蘇聯不能自圓其說，這些實業工具決不能視之為戰利品，既不能原物歸還滿洲，只好在賠償條款中剔除。

在舉行和平會議時，應提出四十年條約，確保日本之脫離日本軍國主義，而於解除日人心理上的武裝，尤較其形體上的為更重要。總之無論是和平條約，解除軍國主義條約，我們必須以長時間專注於日本事件。

我對於中國似乎講得尙少。最大的原因是，我們在那裏努力的經過已為人所盡知，所惜成功殊為微妙。中國離開和平還很遙遠。對於這樣一個數百萬萬人民的國家將來的前途如何，還不是僅僅一個希望而已。一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因內戰而弄得四分五裂，真是近代最大悲劇中的一齣了。

對於中國可下的一個穩妥的概論，就是她現在正開始在改變。必要時，我們應該予以鼓勵並

協助，中國需要我們在物質的和人的方面熟練技術的幫助，這種幫助如果用之得法並假以時日，當可使中國不致以變爲社會革命而危及世界和平。不過中國如果要引用這種幫助的話，其初步步驟由她自己發動哩。

感覺中國問題重要的決非僅限於美國一國。我個人的經驗和事實所昭示的，蘇聯對於她東部接壤的這個廣大地區，寄予莫大興趣。外蒙古實際上已成爲蘇聯的保護國。雅爾太會議時，史達林很成功地以共同管理滿洲兩條鐵路，開放大連爲自由港，和旅順築軍港等條件，作爲她對日宣戰的代價。又當我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時，由於莫洛托夫氏的一再探詢美國的對華目的何在，更足證他對於中國是怎樣的重視了。

所幸我到莫斯科時，對於對付莫氏已胸有成竹。在漢萊使辭職之前，國務院已草就了對華政策的宣言，這宣言的初稿，由我交給漢氏看過。當杜魯門總統委任馬歇爾元帥爲他訪華的私人代表時，我又曾請馬帥對此草稿加以研究，以便對於這最後呈送總統簽檢的宣言，予以協助。

在我離開美國往莫斯科的前一天的星期日，艾契遜副部長，馬歇爾元帥和他的部屬，在我辦公室中會談。這天早會告畢時，我們對於對華政策一切商協妥貼，終於十二月十五日由總統核准公佈。因之除了馬帥的建議之外，總統對此政策無所改變。

我和莫洛托夫氏首次在司畢烈杜諾夫加大廈初次會談時，他提出要商討關於美軍駐在華北的問題。我予以同意並提出早經預備好的一個聲明，對於華北美軍的確實人數，說得很清楚。我解

釋美軍之駐在那裏係應中國政府之請求，協助解除三十二萬五千日軍的武裝。我向蘇聯政府担保，一待此舉完成，美軍立即撤退；並指出馬歇爾元帥業已代表總統赴華，協助終止中國內爭，完成停戰協定，俾得解除日軍之武裝。

翌日我把總統的美國對華政策宣言，在會議席上提出。重申美軍駐紮華北係在解除日軍武裝，並深信中國兩反對派應立即停戰，參加各黨各派的國民會議，以期鞏固國家的團結。

這宣言，莫洛托夫氏並不認為滿意，兩天之後，他又始開質問了。這一次我詳細的解釋道：我們在同盟國方面的責任，係在確保華北日軍之解除武裝；這件工作本來指定中國國民黨軍去做的；由於共產軍橫隔在國軍與日軍中間，致原定工作無從實施；由於解除日軍武裝係最高統帥指令國民政府所做的工作，因之我們自己對於這件工作之進行，未免就緩慢了；我們既然承認這國民政府，我們自應予以相應的機會，使她能完成這個責任。我向莫氏担保，如果這是必要的話，我們願意置身其間，去解除日軍的武裝，然後令我們的軍隊返回本國。

莫洛托夫說，他覺得蔣氏領導的政府，其力量遠過於共軍。他的看法是，中國人從不願自己去作戰，而希望別人去替他們打。日本軍隊長期的存在那裏，真叫人一不耐煩，一他於是又夷然地說，經過了八年的作戰，蔣介石氏應該知道怎樣去對付日軍了，何況他們又是投降的軍隊呢。事隔數天，莫洛托夫恢復他的進攻，他建議應該規定一個日子，使駐在中國的美軍和蘇軍同時撤退，我又解釋道，解除日軍武裝，和蘇軍之在滿洲係截然兩事。但是不消幾分鐘，他又發

出同樣的問題，這種問法，自從開會的第一天以來，一直沒有變更過。

我說：「莫洛托夫先生，足下之所以發出此項問題者，也許是你歡喜我的嗓子罷，我所能給你的回答，就是和你每次問我時所答復的一樣。我不妨預先給你一些線索，要是足下明天再有同樣的問題，你所得到的還是同樣的答復呀。」

那一晚，我往訪史達林元帥。我老是和莫洛托夫談着刻板文章的話，未免發生厭倦，因之把這問題，加入了所要討論的項目裏。

我告訴史達林氏和莫洛托夫談商的經過，莫氏這時也在着，我又提歷史氏，他如何在波茨坦會議時宣稱，蔣介石氏所領導的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政府，而中國的共產黨完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他當即回答說，蘇聯早經締約承認蔣氏領導的政府。他對於我們的軍隊在那裏並不表示反對，他僅僅希望關於這件事能給他知道而已。史達林又說，要是中國的老百姓確信蔣介石氏依靠外國軍隊的話，他的號召力就要削弱了。

當時我就拿了些火柴放在桌子上，排成華北沿鐵路日軍，共軍和國軍的位置。史達林非常的感着興味，旋問起天津區域中究有多少共軍的兵力。我答復道，據共軍首領毛澤東所宣稱，那裏約有六千萬人，史達林一聽此話，不禁發笑。我指着代表在華北國軍的火柴，說到約有四萬人的數目時，他問道，蔣氏號稱擁有一百五十萬軍隊到那裏去了呢？我說，我們的海陸軍都沒有看見到。史達林呵呵大笑地說，所有的中國人都喜誇大口，各自說對方的軍隊，和自己方面的一

樣，如何如何的多。他對於馬歇爾元帥嘗以敬意，並說假定任何人能解決中國的局勢，他當然也能夠。

由於和史達林談話的結果，翌日會議議程中所規定的討論宣言一節，便獲得了協洽，三國政府重申在國民政府之下，中國應實現民主和團結一致的必要，並稱，美蘇兩國外長已「完全協洽一致，希望他們完成了責任之時，美蘇兩國在華的軍隊，就從中國撤退。」

一九四六年九月，馬歇爾元帥報告總統說，他因為無能為力，似乎不必再滯留在中國了。杜魯門總統訓令馬帥，當他認為使命結束之時，就可啓程返國。我在巴黎把我們的決定告訴中國王外長時，他立刻表示，恐怕馬帥離華，可能引起中國人民以為美國對於中國事件業已消失興趣的感想。我担保着友誼興趣的存在，但是力量在雙方都不願接受馬帥的建議時，徒留也是無益的。

希望馬帥使命的得以成功，差不多無所不用其極了。除了馬帥本人的聲望之外，又加上了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地位和權力。在莫斯科時，我們又得到蘇聯重申支持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式認可，此外總統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政策聲明中，他給中國以如下動人的諾言：「一俟中國情狀得有進步，我人即將考慮援助。實行……不涉內爭之各種計劃，諸如促進中國經濟之復興及改革，並使中美兩國商人間的貿易關係得以恢復。」

馬歇爾元帥一直努力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但是作戰雙方對解決之途毫不見接近。我們於是要考慮決定，是不是司徒雷登大使應該繼續努力使雙方和協。遠東司司長文森氏，以有經驗的外交

官員資格，認為可以不必；既然馬歇爾元帥無法使之實現團結，如再叫其他官員促使雙方同意我們的見解，實為不智。我對於文生氏的主張表示同意。

我們對於調解夫婦間的爭噪，而得到不愉快的經驗者，當不在少數。我們深知在任何方面都不願接受居間人的忠告時，唯一的好方法就是告退。夫婦間如此，國家也是如此。在這兩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動機總是由友誼中發生的，要是我們對於這對夫婦繼續保持着友誼的話，總得要等待着，直等到兩造間之一，厭倦於爭噪為止。國家大事和家庭間一樣，有一個時間最好要做的——就是不去做。

在我們面對着亞洲無數的困難時，我們應該常常記到，當我們開始着手時，就抱着無限量的好意。對於菲律賓實踐獨立的諾言，和對於暹羅王國獨立的友誼協助等，給數千萬渴望獲得政務和經濟自由的亞洲人，以一個標炳千秋的火炬，在無可避免的亞洲所有的改變中，我們必定要把握住我們的動作，不使我們所抱持的好意枯竭。我們自己的安全和穩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都繫於我們幫助亞洲進步之成功而定。

第十二章 確立國民外交政策

這一代的美國人，已經知道了美國是世界和平與自由的主要負責人。美國的一言一動，足以影響到世界最僻遠的一角的人民生活。這一點，甚至在史達林跟霍浦金的最後一次談話中也完全承認美國對世界的關懷和責任，並且說美國比任何國家更有成爲列強的理由。

我們勉爲其難的接受了領導權和固有的責任感——因爲兩次代價巨大的戰爭之餘，元氣尙未完全恢復，只能說是勉爲其難。如果我們不發動，則聯合國這一個機構也許就不會形成，以保持並促進國際的和平與安全。如果沒有我們堅決的努力，則戰爭的殘毒是否能加以肅清而很迅速地給聯合國以工作的機會，依然是一個疑問。只要我們在國際上發揮我們民意所表現的政策，則我們的責任一定會在今後的年頭中予以完成。我相信，要確立國民外交政策，我們必須達到三項目標：

第一，我們必須具有一種兩黨一致的外交對策，必須具有在行動上與性質上是民族的而不是政治的外交對策，而在結果上，它又必須是值得其他信賴的永久的政策。

第二，我們必須具有一種適應民意的機構，使我們的政策化爲實際的行動。

第三，我們必須拋棄「祕密外交」。我們應該讓人民知道外交家所遭遇的問題，並且使他們能夠適當地判斷外交家所擬議的解決辦法。「民可使知之」的權利，乃是國際外交政策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

這三項目標，據我的經驗看來，是並不難達到的。不過，在我追求這些目標之中，我所碰到的情形，也許倒對於未來的工作頗有裨助。

在離開雅爾達之前，羅斯福便指示史退了紐斯提名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二人為聯合國會議的出席代表。此後，他們二人與史運了紐斯合作得十分密切，而他們的聯誼合作，大部分是屬於參議院差不多一致表決的忠於聯合國的決議案所激發出來的。

在第一次外長會議之前，我決定要邀請一位著名的國際關係專家和外交家，來和我們合作。經過登堡商量的結果，他介紹了多年來關心國際關係問題而且極有資望的勃勒士。當時，勃勒士雖有商務纏身，然而毅然答應了，終於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此後，我把他推薦給杜魯門總統，勃勒士乃開始擔任聯合國大會第一次大會的代表團之一員。他完成了很大的任務，一直在紐約舉行的大會中繼續著工作。

我們是以兩黨一致的姿態不斷地參加着聯合國工作，大會開會期間，我們的代表團，除杜魯士之外，還包括着參議員康納利與范登堡，眾議員勃洛姆與伊頓，這些都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節一流人材，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在倫敦首次會議中，代表之一，是我的朋友湯森德，他

是前任參議員，是共和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是為全體參議員所尊重的人物。

史退丁紐斯辭去聯合國代表團職務的時候，我向總統推薦了參議員奧斯丁（共和黨人）以繼任其遺缺，這個建議博得了總統的高興。他們本來在參議院裏有過密切的關係，那時奧斯丁已表現出富於外交關係的專門知識的。事實上，從一九三四年以來，無論在戰爭的苦難時期，或是在爭取和平的準備工作中，兩人始終是精誠合作的。

當我們在莫斯科同意於準備巴黎和會工作之際，我邀請康納利和范登堡以顧問的名義和我同去，他們都慨然應允了，在會議中出力很大。對於我們外交關係的每個問題，我都跟他們商量決定。一九四六這一年內，有二百十三天，他們都不在華盛頓，而是在出席國際會議。要比這兩位立法者對美國更忠誠更努力地獻身於會議場中的簡直再也提不出來。

外長會議開會時，各國代表得佔坐一桌，我的一桌，坐的是這兩位參議員，以及起草和約的代表和翻譯官。每一位外長可以約定八人至十人的僚屬在會議室裏工作。會議期間，我總是邀請康納利與范登堡做我的同伴。我喜歡聽取他們的見解，勝於國務院技術專家的協助。同時，我也希望同僚們能親自體驗到訂立和約的全體過程。

參議員康納利與范登堡的參與外長會議，和平會議以及聯合國會議，給世人認識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乃是一種一貫的政策，決不因某一政黨的失敗而終止。當我將捨飛機出席和會之前，我在華盛頓機場上就向全世界作了這麼一篇聲明，其中說：

「目前的形勢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完全不同了，在那時，我們是派別紛歧的，但現在對於締造和平，是不分什麼白宮派或國會派了。而且，也沒有什麼大政黨之間的紛歧了。我們並不是以任何政黨或政府任何支派的姿態而是以兩黨一致的姿態去參加工作；我們是以美國人民的姿態去參加工作。……我們深切地意識着，如果我們這個國家要對全世界的大局發生我們的影響，則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但當我們勾留在巴黎的時候，我却又經驗着兩黨一致並不一定就保證統一。對於倫敦外長會議中不能取得協議的問題，我受到了批評，這是我意料中的事。但是對於莫斯科會議中我們取得協議的問題，我也受到了某些批評，却是始料所不及的。

我獨自飛回國務院。一間什麼時候可以進謁總統，白宮的雇員告訴我：總統遊河去了，數日後才回來。我便轉請他呈報一下，我已經回國，準備述職，同時希望能在次日晚上作一次關於這次會議經過情形的廣播演說。

接着，當天下午，我就奉召飛謁總統。我把會議情形向他報告，他對於我的言行表示着由衷的滿意。

當我們進餐的時候，總統囑我再向席上的各位報告會議情形，我就照樣講述了一遍。海軍上將李希說，聽了我的報告，感覺到形勢雖然大大的好轉了，但是他並不贊同於羅馬尼亞條約的草率決定。我就對他說明，莫斯科協定僅僅是完成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的目標而作再一次的努

力。在莫斯科，我們獲得了蘇聯前此所反對的協定，這才派遣了哈里曼，寇爾和維辛斯基到羅馬尼亞設法實施協定中的事項。這種工作也許並不能算是成功，但是，我說，其後果是不會遜於過去的情勢。當時我就請教他，照他的意思，應該如何辦，他却沒有給我以答復。

餐後因為我不得不飛回華盛頓，外交問題也就不再討論下去了。總統約我於元旦前夕再來，在艇上度夜，我也就答應了。這時，我發現，雨雪紛紛，飛機不能開，只能駕汽車。在從莫斯科歸來的長途行程之後，接着又是汽車的旅途，那自然是怪不舒服的。幸而，一到家裏，我的太太還給我一封信，是維爾寄來的，可以算是還不舒服的日子的一個舒服的結束。信中這樣寫着：

「親愛的吉姆：我由衷地慶賀你在莫斯科會議中所表現的尤榮的進步！瞭解，信賴，友誼，以及國際合作的整個精神，都由這次會議而獲得大量的增進。」

次日晚上，我發表了一次廣播演說。我解釋莫斯科協定「將給世界各地倦於戰爭的人民帶來希望」，並且表示我的信念，「莫斯科會議，的確產生了美好的瞭解。」

當我重新總統於艇上時，他祝賀我，說我的一篇報告很好。他說，艇上的同志們在日前傾聽過我，一致認為它是一篇足以令人信賴的報告。

總統於莫斯科會議前寫給史迪林的信中，對後來在莫斯科取得協議的各項建議都提到過他的認可。莫斯科會議的進展告訴我，一個人實施真正的外交政策，就必須準備接受左右雙方的批評。

許多人繼續不斷地誣傳着總統與我的意見不合。至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總統聽了話，說我們的意見並無不合，然而謠言依然如故。辦公事的人往往會把別人的誤解不問不聞，可是我國爲這種謠言確是在一九四六年春天使我怪不舒服的。

我原是希望我們的外交政策能獲得一致的擁護，而結果却遭遇了一連串的挫折。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那時我正在巴黎，商務部長塞萊士於麥透遜廣場上發表演說，略謂總統所屬可而由我執行的政策，未免對蘇聯太苛，他又認爲採取較妥協，較接近的政策，是必要的。商務部長的論調，在我並不感到什麼驚異。以前，我也傾軋過了，他在紐約泰晤士報也會揮筆我們飛騰飛騰的冰島協定，對國務院爲了防衛西半球而訂立該項協定的活動會增加阻撓。

新聞記者引了杜魯門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說全部贊同塞萊士的論調一語，驚動了各國代表們的注意，也引起了他們的廣泛討論。國內的議員們也紛紛提出質詢。各國外交部長們對於我的言論是否真正反映美國政策的這一點，也表示懷疑起來了。

我的結論是：我不必作公開的聲明。這問題要向杜魯門總統尋求解答。

自然，做代表的身分是很不幸的。只要可能的話，我復想避免這種身分，因爲我寧願充當僑關於我們政府的政策是否已有變更的問題。我們的困難是只增而不減的，塞萊士在白宮中宣稱，他已經跟總統商定暫時不再發表演說，一切都到了和會完畢以後再說，這意思是承認總統並不反對他今後對我們的外交政策發動新的攻勢。

我跟白宮並無直接的溝通，我只從報界和助理國務卿羅塞爾那裏知道一點消息。結果，到了九月十八日，我向總統送上了一個簽呈，我說明，我會於四月間從從醫生之職，呈請辭職，現在，應請在和會完成後准予辭職等等。該項呈文的末段，指出：「您和我化了十五個月的工夫建立了兩黨一致的政策，我們一向在努力促使全世界相信：它是全世界值得信賴的一種永久的政策，然而，它已被華萊士毀於一旦了。」

我不必在這裏引用總統的言詞。但我想可以這樣說，這次杜魯門總統約我談話的結果，我知道他不想改變他的政策，也並不對自己的見解發生什麼懷疑。他也不會告訴我，他所要採取的下一行動是什麼。然而，到了第二天，總統立即解決了一個足使美國絕大多數國民滿意的重大問題。這就是：商務部長華萊士的去職。

華萊士辭職後，美國政策的信心便恢復了。康納利和范登堡繼續擁護着我們的外交政策，自懷着不屈不撓的忠誠。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投票表決時，參議院批准了五大和約，這顯然表示了堅持兩黨一致外交政策的工作效果。當我接到投票消息的時候，我禁不住回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不幸的數月間當威爾遜總統向着一個破壞他的和平工作的可惡的參議院鬥爭的一幕。可是我的希望還存在着，我們的政策建設者不會重蹈威爾遜的覆轍，並願兩黨的領導者澈底明瞭我們的政策的來龍和去脈。

保持並發展國民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因素，是負責處理我們外交事務的機構，普通總是運用國務院作爲我們的觀察者，以對付外交上的弱職行爲。

國務院的組織與工作，迄今沒需要繼續的研究。這一個機構，從戰前的九百個人，發展到差不多三千人光景，遍佈在全個華府的十八個建築物裏面。復員後幾個月內，國務院的公務員差不多已增至一倍光景，因爲許多的戰時機構，如戰術署，戰爭情報署，國外經濟管理局，剩餘物資管理局等等，都已歸併到國務院。最有能力的人往往迫切地要離開垂死的機構，去追求永久的工作及其生動的機構。而現在，風紀是衰落了，問題日益增多了。同時，最重要的，我根本不贊成把這些行政機關似的各部門都歸入國務院。

國務院必須是一個建立政策的機構。它決不能當做行使各種軍事工作的地方。許多時候，國務院既須致力於軍事活動的策劃，則必然再也顧不到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問題。

正因爲我認定國務院永遠視爲建立政策的機構，我就反對陸軍部把我們在歐洲及太平洋上佔領區機構都歸入國務院管理的那種辦法。國務院是不適宜於處理這種工作的。我們必須保留國外的機構：例如在德國的麥克拿尼與克雷二將軍的，在奧國的克拉克將軍的，以及在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的各種有效的機構便是。

當然，國務院和陸軍部、海軍部，必須隨時密切聯繫。沒有強大後盾支持的政策，在今日的世界，是算不得政策的。自大戰開始後，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不僅有頻繁的協商，而且由

這三個部門派定了代表，組織了協力委員會，經常召集會議，研討一般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贊同聯合參謀部的提議，設立國民軍事學院，作為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高級官員的聯合訓練之所。同年七月一日，國民軍事學院便宣告成立。外交官員紛紛報名加入，這個新機構開始舉辦一種最有效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曾經建議，請總統頒佈設立國防委員會的命令，這一委員會，對於國防部、陸軍部長、海軍部長，使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獲得充分的協作。該項命令草案中指明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參謀總長担任該委員會的軍事顧問。除各自設置秘書之外，該委員會之下特設置統一情報處。此一建議雖然未蒙核准施行，可是這些目標都已變成法令，將陸海軍歸併入國防部。等到這個法令見諸實施的時候，我們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的聯繫問題，尚須予以繼續不斷的研討。

一個做了五百六十二天的國務卿的我，其中三百五十天化費在國際會議席上，是不可能把國務院這樣一個機構實行許多重大變更的。事實上，在我初期的任內，我會經過幾努力，使國務院克服「改組恐怖狂」的襲擊。我只革新了一樁事，但這並不會引起大眾的注意，我個人却認為這是我們外交事業上一件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當我就任國務卿職的時候，我竭力要把我們的政策加以廣泛的說明。我認為這是關於現實外交政策的一種基本的工作指導。這樣的一種文件，從來不曾被人們草擬過。國務院的官員們也許

官，都是些有才識、有良心、刻苦耐勞的人，要是不幹外交工作，他們很可以賺到比政府所給予他們的低微薪水不知高多少倍的薪水呢。

在另一方面，國務院對於輿論的警覺性也逐漸提高。每天，權威報紙的社論，以及廣播批評家的意見，都安置在國務院官員們的辦公桌上，並且寄遞給海外的使館，供其參考。個人及社團機關的信函和呈文，也都作為輿論趨勢的表現而一一加以分析。舉個例子來說，雷通師團，它就跟全國的各種志願軍團體保持着經常的接觸，這不僅給他們以外交上的知識，而且取得了關於未決問題的批評和暗示。工作的背後，是堅定的現實，那就是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適應於美國人民的需要，而且必須獲得他們堅強的擁護。

國門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前提條件，當然是需要有知識的人民大眾。由於國際協定都出於統治者的秘密的私訂，國際關係迄今還在遭受着倒懸的苦難。但是我們美國至少是很迅速的拋除了那時代的惡習了。

戰爭解除了秘密外交。在當時，軍事政治的協定，是往往具有相互關係的，嚴守秘密在戰爭的利益上，是必要的。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史達林元帥都會在秘密中舉行會談，連新聞記者也在被拒之列。即使不少新聞記者間接地獲得了會談的內容，但他們爲了遵守戰時檢閱制度，也往往不能公開發表。

但在波茨坦，那時太平洋戰爭尚在繼續展開，新聞界爲了不獲發表該會議的消息而不提起

來。許多美國新聞界與無線電廣播方面的記者們齊集柏林，滿佈在會議的周圍。然而波茨坦是位於蘇聯佔領區內，他們是不許前往的。新聞界大發怨言，終於還是得不到什麼詳細的報道，直到後來羅斯福回到美國向國會作報告之後才知道。這些協定，因與對日戰爭有關，所以某些秘密是應該嚴守的。從那時起，我常常希望能有更多的報道，盡量把歐洲問題的消息提供給我們的國民。

召開倫敦外長會議的時候，嚴守秘密，在軍事上是無理由的。可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是發布關於討論的問題與達成的協議的公報。這似乎是波茨坦會議以前的一種進步，可是它終於變得毫無進步。各外長指派一個代表參加起草公報的編輯工作。然而公報，與其他的公事一樣，正需要全體一致的協調。委員會本身所完成的協議太少，除了嚴禁發表的辯論以外簡直無可報告。在這種環境之下，新聞記者就做了唯一的事情，就是從某些與代表團有相當關係的人那邊獲取消息，其實，這些人也是早被授意不准透露消息的。其結果，會議的消息都變得不盡不實了。

我斷定凡是適用於安全理事會的，一定也適用於外長會議。我深感到我不能單靠自己做事，我正需要一個跟我十分接近而又熟悉國際關係的助手，把有價值的消息作適當的解釋。我竭力勸鮑倫接受此項工作。契普不但是個老外交官，而且曾在莫斯科居留過許多年，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也會替羅斯福與杜魯門兩總統担任國際會議的翻譯工作。契普與麥德摩脫兩人，在國務院担任過對新聞界的聯絡工作，已有很多年頭，組成了一個有效的團體。

巴黎外長會議舉行時，我對各國外長表示，我不能苟同於過去的新聞作風。我堅決主張我們

有權向新聞界說明美國對每個建議所持的觀點。如果外長會議能順利展開，能圓滿結束，那麼就美國代表團而論，我決意不願把這會議變成秘密式的會議。

每次會議舉行後，契普與麥德摩脫離是跟新聞記者碰面，把各種重要的議題作簡明的報道。新聞記者固然喜歡列席大會，但他們不久就明白他們雖未到會參加，却也已經獲得了客觀的，正確的，積極的消息。他們也認識了機密的會議往往有助於協定的訂立。許多記者，自從知道我們是在拿行動促使別國代表團採取同一行動以後，都願意不進會議場中去了。

在巴黎閉會期間，外長會議曾舉行過不少次數私人性質的會議，陪伴着外長的，除他的舌人以外，只有兩個顧問。在最初的會議舉行之際，有人提議不許記者採訪會議中的一切消息。我表示了反對的意見。我說，「第一，我認為這是錯誤的。第二，協定是無法守密的。到會的人自然會把謠言傳給其他代表們，由此將洩漏到新聞界。」

倫敦會議的經驗，給我實在太多了，我告訴了我的僚屬，我此後不願參加那種試圖阻止我把美國情勢發表的任何一個會議。

從此，新聞界將站在美國觀點上把會議的進步或不進步，向民衆作正確的報導。這就刺激了別人發表各自的觀點。我樂於觀察這種發展，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各國的情勢揭露於輿論之

幕。
終於，莫洛托夫也受到了我們的影響。七月，當他發表關於蘇聯所採對德步驟的重要演說的

時候，他採取了我們的習慣。他在祕密會議中發表的演說稿，即以謄寫版預先分發給新聞界。我知道了這個消息，我便向他致賀。自此以後，莫洛托夫和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工作中，就常常採取這種作風。我知道，在目前葛羅米柯常常招待各報記者，向他們解釋蘇聯對於聯合國當前各項問題的看法，作為參攷。

和會在巴黎舉行的時候，我提議新聞記者及無線電廣播記者應該讓他們參加一切會議。我的提議得到了莫洛托夫的附議，他說他是由衷地表示贊同。我覺得我對於掃除和平範圍會議黑幕的一項工作，是終於成功了。我並不因蘇聯代表團及其隨員們利用開會程序以達其宣傳目的那種無賴狀態而減少了我的滿足之感。

在莫洛托夫的宣傳攻勢中，有一次，他竟指摘美國和英國擁護引用某項會議程序法規，而且稱之為破壞穩定。這是無稽之談，因此，我就用十分嚴厲的演說答覆了他，在這個答覆之中，我再三地援引實例，證明他的論斷是全無根據的。每當我援引一個實例，我就說：「只有莫洛托夫先生纔會發出這樣的抨擊」。在我的演說最後一段，我提及我們的自由新聞政策，並且老實告訴莫洛托夫，他指摘美國動機的那種論調是要公開發表出來的。我又說：

「我要求莫洛托夫容許我在所作的聲明也在蘇聯發表出來。……今日之下，蘇聯人民對我們只有欽羨和尊重，我們決不容許這種欽羨和尊重因莫洛托夫的任何抨擊而減退。」

我的演說，終於在四十八小時內處理於蘇聯報紙上了。據我所知，這是最初一篇也就是最後

一篇被遺棄的演說了。我唯一的遺憾是，它是一篇反駁莫洛托夫的演說。

在紐約，莫洛托夫邀請我們前往莫斯科。只要新聞能獲得報道的自由，像巴黎和紐約會議時的情形，我當然同意。他說莫斯科的屋荒，才是唯一的限制。在一次私人談話中，我要他担保無線電廣播記者也一併參加在內。他回答說，無線電，那是另一問題，他準備跟蘇聯政府當局商量一下。後來，他說廣播記者可以准許在莫斯科拍發新聞。記者們都說，莫洛托夫對於他們拍發的新聞不予檢查的諾言也實現了。

倫敦會議結束以前，爲了配合當時的情勢，我不得不在廣播演說中把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形勢出來。我在那時只講一部分，並不像現在這樣和盤托出，因爲我還希望着，願意相信着，美蘇之間，抱着同一的目的，同一的心願——早日爭取和平。無論什麼時期，凡是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或是代表他們政府的利益者齊集在一個會議上而抱着同一目的，最好的辦法，是把方法上的分歧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樣就易於調解那些分歧。這是羅斯福臨死以前的金玉良言，那時他曾經勸告邱吉爾，在公開演說中要盡量把我們對蘇聯的困難減少到最低限度。

在莫斯科的時候，我還希望美蘇之間抱着同一的目的。然而，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杪，不管蘇聯有什麼長期計劃之類，許多的事實都證明着他們的當前的目的是延宕歐洲方面和太平洋方面的和平。

史達林在他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演說中，宣佈了新五年計劃，並強調着重整軍備的問題。

題，以代替蘇聯人民迫切需要的消費品的生產，對於我這倒是一個大驚駭。尤其可怕的是蘇聯對伊朗的態度，那簡直暴露了他們破壞弱小鄰國主權的意嚮，同時也證實了莫洛托夫曾向希特勒表示過的管轄巴庫以南的土地的野心。這一切激起了我在一九四六年首次的演說，演說中反映了我對蘇聯的更堅定的態度。爲了及早爭取和平的共通目的所鼓舞的信心，在現在是再也沒有了，因此，把美蘇之間的分歧減少到最低限度的那種認識也隨着不再存在了。

同時，在我們的武力條件之下，我們的分歧再也沒有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必要了。一九四五年秋天，美國軍隊以最大的速度實行復員，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退伍上的積點制度，給我們留下了基本的師團。我以動員指導者的資格，贊同這一制度，因爲我認爲這是公道的，同時我又認爲全世界正迫切地永久地需要着和平。然而，這樣一來，最有經驗的將首先解除職務，而基本的幹份子也差不多就在同時引退。那些嘩啦嘩啦對我高喊着對蘇聯採取堅定態度的人們，甚至在同時也高喊着軍隊的迅速復員。羅斯福有一次曾很賢明地說過：「山姆叔叔應該喊得輕而帶的是鞭子杖」。我的批評家們却硬要我喊得響而帶的是樹枝。

年底又到了，軍隊的整編又進行起來，我們再也沒有理由不使人民理解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分歧了。

懷着這種決心，我們的宣傳政策也不得不加以改變。我們必須讓國民們知道大局的演進，否則我們就不能希望獲取他們的擁護。於是，演說，鮑倫，麥德摩脫和記者的日常的會談，我和記

者們的經常的聚會，使我們對蘇聯的關係問題與當前的情形充分地傳達給人民。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們需要獲得一種持久的和平，那就必須是人民的和平。只要他們多多瞭解外交的知識，人民就能够在外交上發生更充分的影響。

基本的民權，人民的「知」的權利，必須與日俱增地應用到外交活動上。如果那權利是對於國內的民主發生着基本作用的話（我相信是如此），那麼它至少在外交活動上是同樣地必要的，而對於知識與理解的需要，尤深且鉅。要使這個政策見諸行動，就得打破過去的外交舊習慣。但是舊習慣是不易打破的。時間，精力，人民對於世界情勢的認識的需要，都是少不了的。

如果人民只陷在黑暗中不瞭解一切重大事件對美蘇關係所生的影響，他們就不可能產生實質的行動。

但願多一點光——越多越好！

第十三章 原子能的管制

我記不起什麼時候羅斯福總統告訴我關於這原子彈，祇記得是一個夏天的下午，我們兩人在他辦公室裏討論戰時動員程序某項問題時，他告訴了我這可怕的計劃。

我承認我以為這計劃是幻想的，他發覺我的驚異，繼續欣喜的把科學家關於原子能的預測來使我驚奇。他說：一九三九年以前，德人已試驗得有進步，現在還在繼續努力，這就是我們的競賽，看誰能製造第一顆原子彈。

那時候，記得是一九四三年夏天，總統以為德人已趕在我們前面，但是他根據的情報是辯論戰爭事實。大戰之後，我們發覺總統把德人的進步，估計得太高，無論如何，那時候的報告，刺激我們對這計劃格外努力。

自從這第一次討論後，總統與我兩人間，有好幾個月不提起這原子能計劃，事實上沒人講到這事情，除非是必要的。記得有一次在親自監督這計劃的陸軍部長史汀生前提起，他從蘇聯的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事。

即使總統沒有告訴我，在我戰時動員局局長的地位，這如此龐大計劃的許多數款，當然要動

具許多人力物力，無論如何是瞞不了我的。尤其在我們人力嚴重缺少的時候，一個需要十二萬五千人的計劃，是逃不了我的注意，尤其需要的是高級技術精深的專家。

但是我也沒有功夫來注意這事情，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因爲一個勞工問題，使我知道我們已經確實獲得很大的進步。

被廢的工人，組織工會的管轄問題引起了爭執，提到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來解決，因爲軍部的請求，公開的訊問已改期了四次，而無可再改了。

陸軍次長柏德遜及格洛夫斯少將到白宮來和我商量這問題，格洛夫斯少將指出，公開的訊問，就需要提出各項證據，如已經雇用的工人人數，需要雇用的工人人數，以及某一特殊機關和這計劃的關係等等。這樣一透譯，就會使這計劃的安全發生嚴重的危險，他們想在白宮裏，我們三人和有關工會的領袖，召集一會議，如此比較好，這提議經我同意了。

在我們討論中，柏德遜先生說，二九四五年四月，軍部可以知道我們是否可以造成這原子彈。他們相信這努力會成功，到那天就可以知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冒險的來指定一個日期。

會議預定在十二月五日上午舉行，工會方面的職員是救火人員和油工國際聯誼會的克拉克與電氣工人國際聯誼會的惠格納。我們信託他們，告訴他們很少人知道這計劃，在這時候，我相信祇有四個國會議員得到具體的情報，我們要求工會方面放棄在惠格納法律下的權利，與格洛夫斯

將軍合作，來保護這計劃的安全，他們愛國，立刻應允的去了，其他工會領袖也答應完全合作。使我驚異的，這計劃並不使更多人知道，國會方面同意撥用約計二十億元，而不要求追問他的用途。有幾位國會領袖約略知道這計劃，而不告訴他們的同僚，來共同負擔這責任，是應當表示敬仰的。

四月一日的期限到了，這龐大計劃的成就還成疑問，但是陸長史汀生抱着成功的信心，並向總統表示，遺憾的是羅斯福總統逝世了，並沒有知道這計劃的成功。

羅斯福總統逝世後，陸長史汀生告訴社魯門總統，在他指揮正在工作的許多科學家，相信在很短時期內，可以造成一顆原子彈。他主張委派一個臨時委員會來考慮，並向總統建議，這許多政策上的重要問題，如原子彈的試驗，在戰爭中的使用，和戰後原子能的應用。

社魯門總統批准他的建議，請他為委員會主席，總統要我做他的代表。這委員會包括：海軍次長巴德，副國務卿克萊頓，科學研究會主任勃許，哈佛大學校長康納脫博士，麻省理工大學校長康普登博士，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總理哈理遜。我們並且得到與這計劃有關的一羣科學家的幫忙，他們是：康潑頓博士，弗米博士，勞倫斯博士與奧本漢墨博士。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這時全國的視線，集中在歐洲戰事的結束和舊金山會議，這委員會在華盛頓靜悄悄的加緊工作。有幾位新聞記者發覺我在華盛頓而不在南加洛林那休息，就奇怪我的活動，我不能告訴他們，所以他們想法探測，他們有幾位以爲我與政府新任命中有關係。

在這時期中，我好幾次到曼麗蘭倍斯達的海軍醫院，去和前任國務卿赫爾先生商量，請教關於國務院方面的工作，那是在幾星期後要担任負責的。

在第一次臨時委員會會議中，勃許，康納脫，康普頓幾位博士說明原子彈的破壞能力，我聽了，相信成功之後，可使太平洋戰事很快的結束。我問這許多科學有什麼防禦原子彈的方法，但他們想不出來。他們預料更大，破壞更強烈的炸彈會造出來，我問他們是不是我應該相信唯一的防禦方法是殺盡天下的科學家。

聽了這許多科學家討論這計劃的進展之後，我們化一天功夫，和建築泰尼西和華盛頓的大工廠來製造這原子彈的實業家和工程師在一起，我問他們別的國家製造原子彈要化多少時間，這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物理學問題，而包括原料物力，工程技術，專門知識和其他的要素。從我們所得到的情報，我得到結論，任何其他國家，要製造一顆原子彈，至少需要七年。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臨時委員會一致決議向總統建議，這原子彈儘速先用來對付日本，並應該祇用在有兵工廠和軍事設備的所在，除了巴特先生之外，委員會全體同意建議事先不加警告的使用，這最後問題曾經謹慎的考慮。

如果事先告訴日本人，在某一指定地點要投這炸彈，恐怕他們會把我國的人民戰俘移到這地方去。同時，專家警告我們，即使在新墨西哥的試驗成功，並不能證明這炸彈從飛機上投下來，一定會爆炸的。如果我們事先警告日本人這新破壞武器的厲害，而希望他們有所感覺，倘若那時

這炸彈並不爆炸，豈非使日本的軍閥更得到安慰。此後勸告他們投降的任何文告，會毫無作用。

在新墨西哥籌備的試驗，也是委員會的一個問題，沒有人會確切知道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結果如何，如果需要，先要把全區的人民先行撤退，我們知道在最佳的情形下，這爆炸會有反射作用的，這秘密就難以保守。發布的新聞，以及預測得到的可能偶然發生的事故的記載，都已預備好，環境需要時，就向公眾宣布。

以委員會中總統代表的地位，我要向他報告我們種種建議的理由，我告訴他，在我們全部機密的討論中，是完全以聯合參謀首長所提供的軍事形勢預測為依據。他們計劃在十一月一日在日本本島最南端的九州登陸，繼續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在本州本島登陸。聯合參謀部預計需要五百萬軍隊參加作戰，這時候的估計，日本軍隊大約有五百萬人，事後我們發覺這估計是對的，福萊斯特海長告訴我，日本的空軍自殺進攻，增加我們的船舶和生命損失，登陸部隊當然會受到更猛烈的進攻。軍事專家告訴我們，從他們得到的事實來看，單單我們軍隊登陸進攻，會有百萬人的死傷。

我把這許多結論向總統報告，也告訴他科學家，工程師以及實業家向委員會所說的話。他表示他的意見，無論如何的遺憾，他所能看到的，唯一合理的結論，就是使用這原子彈。

我們坐着奧格斯特軍艦到波茨坦去的時候，在新墨西哥的重大試驗，正進行着最後的準備。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大爆炸的一天，總統，李海上將和我正在柏林。試驗的報告，用最嚴密的電碼

來傳達，幾天之後才得到，那時會議正在全面緊張的進行，我是很忙，陸長史汀生送來的消息，使我受到很小的印象，因為我在臨時委員會中的工作，早已使我相信這炸彈是會成功的，試驗的報告，不過是來證實一下而已。

邱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的合作，使這大賭博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和杜魯門總統長時間的討論這計劃，他急於要知道臨時委員會的工作。除了對原子彈在對日戰爭中會發生的結果表示重大的興趣外，他也看到原子彈的投放，會產生其他許多可能的事情。

我們面臨着重大的決定。我們不能依靠日本向蘇聯探詢和平談判，而表示可以不投原子彈，日本會來無條件投降，史達林報告說，他得到的最後消息，是日本表示與其無條件投降，寧願作戰到底。在這種情形下，和平談判不過是假的希望，於是我們就靠托波茨坦的宣言。

我們研究了新墨西哥報告之後，總統和我決定告訴史達林允帥我們已經達成這炸彈，除非日本立刻接受我們的條件投降，我們準備要使用這炸彈。蘇聯並未對日作戰，他告訴我們準備加入戰爭，所以我們覺得史達林應該知道這事。

三強會議閉幕後，七月廿四日下午，總統繞着園徑一面走一面與史達林談話。小談後，與我開車回至「小白宮」。他說他告訴了史達林我們造成了一個比任何破壞力更強的炸彈，除非日本投降，我們準備使用他。史達林的回答不過是說，他很歡喜知道這事，希望我們用他。我奇怪史達林的不感興趣，我以為他沒有抓住這新發明的重要性，第二天他會來詢問更詳細的情

那，結果，他並沒有如此。之後，我知道蘇聯對他的武器發明守秘密，所以他也不要來問我們的。

和史達林談話後過了二夜，波茨坦宣言發表，我們希望日本能接受我們的警告，但是七月廿八日，日本首相發表文告，稱這宣言不值一顧，失望之餘，惟有使用這原子彈，史汀生選擇了重要軍事目標，總統批准，不久他返美國。

雖然日首相文告如此，我仍盼日政府能改變其意旨，八月一日離開波茨坦，到美後仍無消息，我認爲避免使用這炸彈的希望沒有了。

總統接受英王喬治邀請赴橫濱享宴小遊，在此搭奧格斯特軍艦返國，我們分別乘機飛往，李濟上將與我伴同總統在英艦尤榮號上承英王歡宴，英王已從邱吉爾那裏知道這炸彈試驗的成功，而急於知道全部的情形。席間的談話，大半都集中在這炸彈上，下午英王蒞奧格斯特答訪，去後，我們的軍艦啓程返國。

八月六日，總統與我，正與海軍人員進餐，中午十二時方過，格雷漢艦長忽促入內，將海軍部一簡短消息送呈總統，內稱廣島已在數小時前被炸，十分鐘後，格雷漢又送來第二消息，是史汀生的，內說這炸彈的成功較我們希望者更大。總統高聲讀給我聽，並讀給水兵們聽。總統離去時，鼓掌歡呼聲大起，總統又往軍官堂向艦上軍官宣讀，全體歡呼。數分鐘後，艦上的播音機，開始廣播華盛頓發表的布告，報告這炸彈的消息及其發展。

我聽廣島——日本國內陸軍南方的大本營——的廣播，一定會使日本相信波茨坦宣言中所表明的意義。同時，投下數百萬的傳單，警告日本人，所列十大城市的一個，將為第二個目標。我們沒有得到他們的答覆。八月八日，第二顆炸彈向長崎投下。

和廣島一樣，長崎的損壞同樣的慘烈，日皇不等我們再作進一步行動，他打破日內閣的堅持，在八月十日，提出投降。沒有人會懷疑這是原子彈的破壞力，影響到日皇和內閣的行動，戰事的結束，這原子彈救了不少我們戰士的生命。

無論參加造成這炸彈的，或決定使用的人，沒有一個感覺到快樂，要執行一件任務，實犧牲許多人的生命，大半多是不民。日本投降後不久，許多人要求我們立即告訴全世界我們所有的原子彈科學上和工程方面的智識。有識之士主張國際管制原子能，也有人並不知何種意思多須要的保障來防止國際協定的破壞者，我同意科學家們的意見，別的國家會製造成一顆原子彈，是無可避免的。但除非我們盡得充分的保障，吾人不能讓他們能把製造的時間縮短。任何國家反對在安全保障下將原子能完全交給一個國際機構來管制，我們不能讓這顆炸彈落在他們手裏，這時間愈久，世界人民愈幸福。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艾德禮首相借加拿大總理金氏來華盛頓，與杜魯門總統商討未來原子能的政策，到後，總統邀請他的賓客，在星期日坐了他的總統艇惠康斯倍雷在波多瑪克河上遊覽，這聚會中還有哈里法克斯大臣，安特遜爵士，李海上將和我。下午談話開始，晚間又繼續。

後又連續了幾天。十一月十五日，總統，艾德禮，金氏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三國政府願意在國際行動的需要下，受聯合國的監督，對原子能加以管制，保障僅使用於和平用途，宣告原子能武器及其他可能大規模破壞的武器為非法，在檢查制度下規定有效的保障。

歷史上沒有像我們國家如此寬大慷慨的貢獻，我們化了如此鉅款，與盟國英國，加拿大合作，造成了如此可怕的武器，我們可以保守起來，作為威脅其他國家進步的武器，但是，這三個國家急切的願意把他貢獻給一個國際機關，作為和平的用途。

我預定次日在南加洛林那州却爾斯敦演講國際貿易，自從這歷史性的協定公布後，我重寫了第一段演說詞，我不願意失去一個叫人民注意管制原子能的重要性的機會。「如此，原子能可以不用作戰爭和破壞，而可以為世界製造和平與幸福。願我們的思想勇敢些」。同時我警告他們說：「我們不能憑自己的理想，以為過了一夜，一個健全的世界政府會建立起來，民主，實明，有能力保護我們。如果我們要使文明生活繼續保存下去，我們必須利用手頭的物件，來增強現有的機構，使他們能忍受我們嚴重的試驗」。對於華盛頓公布的計劃，我解釋說：「這是漫漫艱難旅途中的第一步，建立保障使我們不受無可形容的破壞，是全世界各國的責任，若非急會與各國的合作，沒有對付原子彈有效的方法」。

一個月後，我借貝文外相往莫斯科，攜去了根據十一月十五日華盛頓協定的國際建議，主要聯合國成立一委員會，來商討原子能和其他有集團破壞力的武器。

我建議把原子能的議案放在議程之首，莫洛托夫反對，要求放在最末。雖然我奇惱他的主張，我是同意了。最初，我以為因為蘇聯一位最有名的科學家，據說是一位原子物理學的專家，現在巴黎，莫洛托夫希望他來參加討論，所以把議程改過。後來知道這理想是並不成立，這科學家回到了莫斯科後，却並不參加會議，我才知道莫洛托夫的要求，是要叫我們感覺蘇聯對原子能問題並不重視。

在莫斯科和在波茨坦一樣，此後在倫敦外長會議中，沒有一個蘇聯代表表示他對於原子能的奇異。在波茨坦，總統和史達林談話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不再提這事。在倫敦，莫洛托夫就表示不感興趣，我決定我當時在波茨坦的斷定是對的，就是蘇聯永遠不對任何人透露他們的新發明，所以對人家的發明表示好奇心也認為是不對的。

原子能問題的展緩，却使哈佛大學校長康納脫博士大為煩惱，他是伴我到莫斯科作我的顧問的，他希望在務完畢，原子能議案通過後，趕返美國料理許多等着他來的事情。豈知，他連坐了十天，討論和他無關的事情。他坐在我邊上有一天斜過來對我說：「我想美國全國各大學的校長應該參加一次外長會議，他們才會感覺需要極大的忍耐，來和我們的蘇聯朋友得到一個協定」。康納脫博士在莫斯科，常常引起莫斯科報紙的注意。他與我都希望有幾位蘇聯的科學家會來訪問他，結果他們並不來。

一天下午，莫洛托夫招待三個代表團，他和康納脫博士談話，莫洛托夫表示，美國像哈佛的

如此一個大學的校長來到了莫斯科，應該對莫斯科大學演講一次關於原子能的問題。晚上博士告訴我莫洛托夫的話，他表示願意去演講，如此可以揭破這層「鐵幕」，來說明我們對原子能的意見。不過他不能決定莫洛托夫是真有這意思，第二天我對莫洛托夫提起這事，說如果你真意如此，康納脫博士很願意去演講，但是莫洛托夫他說他無權代表學校邀請，不過說說而已。

最後我們討論到這原子能問題的時候，莫洛托夫對我們的提議，不過修正了幾點，加以修正後，我們接受了蘇聯的建議。一點是提議設立的原子能委員會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關係，看到安全理事會最主要的責任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修正的決議案中規定，有關安全的事件，安全理事會應該指導這原子能委員會。安全理事會是在經常會議，有權力可以採取行動。聯合國大會並不在經常會議，會議中也不過能通過建議而已。

聖誕前夕，史達林邀宴，我告訴他康納脫博士是一位卓著的教育家，更其是一位使原子能計劃成功最有貢獻中的一位。史達林不像莫洛托夫的漠不關心，他說，雖然他不完全懂得科學家的術語，他的確做了偉大的工作，發明原子能的美國科學家，尤其應該向其慶賀。

幾分鐘後，莫洛托夫代表主人向康納脫博士舉杯，在玩笑中表示，希望博士的衣袋中不會有一顆原子彈。康納脫博士也以玩笑的樣子來致答，坐在我邊上的史達林元帥起立致詞稱，對康納脫博士的工作，如此不重視，表示不滿。他說康納脫博士和他的同工者已有偉大的貢獻，對他們的成功，他要表示慶賀。

自莫斯科返國後，在赴倫敦出席聯合國大會前的幾天，我照我們的提案預料可以通過的辦法進行，我委派了一個委員會，開始工作設計，預備原子能委員會成立後，把計劃提出去。這委員會包括副國務卿艾契生（主席），前陸次麥克勞埃，勃許博士，康納脫博士及格洛夫斯將軍。

在倫敦，英政府以在莫斯科起草的提案，代表安全理事會五個永久會員及加拿大，提交聯合國大會。一月廿四日，在全體一致不加修改的通過這提案之前，我向大會發表一篇短詞，說明管理原子能共同責任的重要。

聯合國大會通過這提案的前一天，我在華盛頓委派的委員會又委派一個諮詢委員會，以李林泰爾為主席，其他委員是紐傑賽電話公司總經理巴那特，洛斯阿拉摩斯原子廠主任奧本漢墨博士，孟山都化學工廠副總理湯姆森博士，以及通用電氣公司副總理惠尼。

所謂「艾契生李林泰爾報告」，就是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的工作，這報告通過後，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八日向大眾公布。公布的原因是要引起全國的熱烈討論，結果是成功了，報告中所列的幾項目的，也得到普遍的贊同。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副國務卿艾契生把報告書摘要向全國廣播。他說：「這報告書擬定一計劃，任何國家不得製造原子彈，或者原子彈的材料……今日美國所保有的原子器械的絕對優勢是暫時的。我們必須利用目前的優勢，來增進國際安全，並實施我們經過國際協議來建立永久和平的政策」。

因為要把艾契生李林泰爾報告書中的建議製成可以實施的計劃，我介紹巴魯樞給總統。第一次，第二次大戰，巴魯樞都有特殊的勳績。我在戰時動員局局長時，他是我的顧問，也曾擔任總統的非正式顧問，和好幾個軍事機關的首長。他已經退休休養。因為鑒於這工作的重要，他同意重舊下來。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總統把委任送參院，很快就通過，他的委任很得到大眾的擁戴。

法律上規定，聯合國中我們的代表和各項委員，必須遵從經過國務院發出來的總統決定的政策。關於原子能管制，巴魯樞請求指示美國的政策，我就請他起草，巴魯樞，漢柯克，艾契生和我，經過好幾次會議，議定了一篇包括廣泛共十一頁的政策聲明書，呈送總統後，總統，巴魯樞和我三人再經過一次檢討，修正了幾點，總統就交給巴魯樞作為他的指示，總統也告訴巴魯樞，為要達到政策上的目的，在方法上有時可用自己的判斷。

這美國的政策，在這指示中所說明的，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提交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主張成立一個國際全權處理原子能發展委員會，把各種原子能發展，用途，製造原料都包括他的範圍。包括下列幾項：

- 一、管制危害世界安全的各種原子能發展。
- 二、管制，檢查及發給原子能許可證的權力。
- 三、培養原子能作為有益用途的責任。

四、負責研討發展原子能知識，使當局明瞭進而檢查原子能的發展。

巴魯樞說，在一個有效管制制度，包括廢除原子彈作為武器，同意成立實行後，違反管制規則的處罰也加以規定，原子彈的製造，應該停止，現存的原子彈，應該依照條約的規定處理，委員會應該完全明瞭製造原子能的情形。

這政策中也規定違反下列者應加以處罰：●非法的持有或使用原子彈及其製造原料；●製造工廠及其產業的充分沒收。

從開始起，他就堅決主張條約經核准後，任何國家違反條約，製造或使用原子能應該規定立刻迅速加以切實的處罰。在這種違反條約的情形中，安全理事會的任何永久會員國，不得對委員會的處罰使用否決權。我們主張，永久會員國在這種特殊情形下，應該先行放棄否決權。

從六月到十一月間，委員會的一切動作，隨時向大眾公布，外長會議在紐約舉行的時候，巴魯樞和他的同事討論，商定請原子能委員會立刻通過美國的提案。

巴魯樞幾位先生把這問題研究了六個月，深知美國的提案除了蘇聯和波蘭外，可以為每個會員國所接受。蘇聯代表葛羅米柯還是一年來我在外長會議中所遭遇到的拖宕政策。他們叫我注意到委員會中有二個委員在十二月卅一日任期屆滿，如在那時候還沒有行動，明年一月中葛羅米柯一定要提議展期，說是讓這二位委員有充份時間可以研究這問題。他們的意見是對的，我同意他們應該立刻採取行動。

十二月五日，巴魯樞向委員會申請立刻行動，並根據美國的方案，提出許多材料和建議。他說明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開七十次以上的會議，應該採取進一步驟，委員會除了蘇聯和波蘭外，同意採取行動。最後，十二月三十日，委員會投票決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成立一個包括一切的國際管制檢查制度，聯合國全體國家簽訂條約來規定這制度的職權，投票的結果是十對零，蘇聯、波蘭除外。

報告書中建議成立一國際機構來提倡國際間交換把原子能作為和平用途的科學知識，防止把原子能作為破壞目的的用途，並實施職權來保證僅僅作為和平之用。這機構要負責研討發展最前進的原子能知識，而付以特權可作原子能充破壞目的的研究。

這機構的代表付以不受阻礙的權力，可以進出每一參加國家的境土，並在國境內實施檢查。這機構有權力可禁止原子武器的製造，保存及使用，處理現存的原子武器，並確實保證製造原子武器的材料，祇充正當的用途。

委員會說明這條約中應明白規定如何才是違反條文，並規定足以造成國際罪惡的範圍。還規定如何實施如何處罰違犯者，嚴重的違法應該立刻向簽字國家，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報告。

委員會並贊同，一旦這法事實成立，處罰方法決定，違犯的國家應放棄否決權的法律保障，如果這法事實十分嚴重，聯合國公約五十一條所承認的自衛權可以實施。

最後，報告書中規定，條約中應該包括使這管制檢查的國際機構得見實效的全部程序，並應

規定逐步工作的程序。委員會得以決定某項階段工作已變成，而開始其第二步。

在巴魯福要求原子能行動的時候，同時莫洛托夫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一個普通軍縮的議案。我對之並不以為嚴重，蘇聯代表是想把原子能委員會和普通軍縮委員會合併起來。

如果這次努力成功的話，自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後，成績將大有可觀。安全理事會這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成立一個軍事部歸來實施聯合國的決議都不能得到協議。如果要把普通軍縮的程序包括海陸空軍的減縮在內，要得到一個協議，所費時間之長，可想而知。如果把附委員會合併，想得到一個管制原子能的協議，那末會有更多的推諉與延宕。

雖然原子能的管制是很明白的需要，除了蘇聯及其衛星，管制的計劃也得到了各方的贊同，要成立一個協議，還是遙遙無期。管制這主要武器不能得到一協定，其他軍縮更不可能。蘇聯並不考慮巴魯福提供的美國議案，却提了一個管制其他武器的議案。蘇聯的意圖是非常漂亮，「武器」二字對厭戰的世界是如何的中聽。這是如何的愚笨，火藥已經發明了，還要開始限制制弓箭的使用。聯合國大會堅持兩委員會的工作，加以分開，蘇聯代表還是要把他們合併。

我想我明白了他們的目的。經過這兩委員會的合併，他們可以從在莫斯科議定經聯合國通過的原子能決議案中逃避出來。這決議案中規定保障和充份的檢查。委員會必須第一期工作完成後，再開始第二期。莫洛托夫反對這一點最烈，結果是接受了。我想他事後懊悔，這一條規定檢查管制實行有效後，然後交換情報。如此，這國際機構中的別國委員，可以檢查蘇聯工廠，這真

他們保守秘密的制度衝突的。

所以這原子能決議案，蘇聯希望世界上把他忘了，而很想把他廢棄的，他們阻止有效管理的原因是同樣的明白。葛羅米柯表示，照美國的提議，「成立一無限權力的檢查制度，是可能會干涉別國的國內經濟生活」。蘇聯在想，資本主義的干涉比原子彈還要可怕，保護蘇聯的經濟制度，比較保護人類避免原子彈戰爭還更重要。

這種恐懼說明了蘇聯對原子能問題實施否決權的態度。葛羅米柯說，蘇聯不願意把他國內的經濟命運交給一個多數票。他辯稱，否決權是保護國家主權所必需的。

無人想干涉別國的國內經濟生活，但是蘇聯的猜忌太深，他們以為國際機構的代表們，是會干涉他們國內事件。葛羅米柯每次對軍縮及原子能管制所發表的言論，完全是在這一方面，也是蘇聯在戰後數年所進行的，但是美國不能同意一種可以使任何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避免有效檢查的方案。

倘使美國毀滅了他的原子彈，同意不再製造，日後又違反協定再度製造，我們自由的新聞報紙就會立刻發覺而公布。在蘇聯就不可能。如果蘇聯得到別國的科學情報和製造方法，決定設立工廠，製造炸彈，蘇聯以外，沒有人會知道。到紅軍預備使用他的時候，那已經太遲了。

我知道蘇聯政府的官員會說他們是很謹慎的遵守協定，我也並不說他們違反協議，但是他們

自有一種特別解釋的方法。

如果蘇聯拒絕參加在莫斯科與倫敦原則上同意接受的保障安全的條約，這是有效管制原子能所必需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該如何對付？這回答是，我想沒有別的，一個不快樂的回答，我們祈禱蘇聯領袖能改變他們的意旨。同時，我們要用我們的全力，來製造更好更多的原子炸彈。爲了保護我們自己，我們要繼續推廣我們科學知識的疆界。這是一個殘酷的論斷，不過武器的性質如此，需要我們顧算到事實。

我們並沒有，相信將來也不會，使用「原子彈」政策犯了罪。有人或者會疑心我們如此，因爲在同樣環境下，他們會如此的。但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在南加洛杉郡州却爾斯敦說過，猜疑我們用原子彈來作爲外交或軍事上來威脅別國的工具是非特不對，而且是對美國政府和人民一種完全毫無證據的責難。

這是我們傳統的民主主義，我們作戰，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沒有國會通過宣戰，總統無權命令使用原子彈，否則有受彈劫的危險。深知我國人民愛好和平的人，不會相信國會會貿然宣戰違反聯合國公約下我們神聖的責任。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就可證明國會宣戰的如此緩慢。沒有理由可相信，會歡喜參加未來空前酷烈的戰爭。

我們在等着原子時代的實質，侵入蘇聯領袖的恐懼和猜忌裏面去，我們不能讓廣大的美國首先在人民的心目中起了誤解。事實證明我們不願意繼續製造原子炸彈。

自從原子能力之後，在這一年中，我們已做了下列幾項事情：

一、獲得我們共同合作發明原子能的國家的同意，把原子能置於國際管理之下。

二、獲得五強的合作，發起組織一個機構，來計劃國際管制。

三、獲得聯合國一致同意，通過這提案。

四、製成一詳細計劃，設置代表全體聯合國的原子能發展委員會，來管制世界原子能。

五、經國會的通過，成立一平民委員會：來嚴密管理所有含有分裂性的原料。

六、開放有電子活動性的原料，供醫學，生物學及科學的研討。

七、提供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我們的國際管制原子能的詳細計劃。戰後一年的幾個月之內，我們的計劃，除了二個委員之外，獲得全體委員的通過。

我不同意有人預料蘇聯如果繼續阻撓這工作的進展，集團的毀滅在數年內會隨之而來。在這次大戰中，德國、日本和我們同蘇聯、英國一樣，都保有毒氣彈和致人於死的細菌彈。戰爭並非像舉行一個茶會，這是殘酷的，結果沒有國家敢用，他們知道人家也會同樣用來對付他們自己的。

我說這話，並非減低危險程度。如果戰爭的國家持有原子彈，這是何等的不幸。但是，如果把我們的炸彈拋棄，把我們的情報供給任何國際機關，而沒有充份實施有效管制的權力，卒使別國政府在我們不知不覺之中，製造原子彈，這更是何等的不幸。

未來的歲月，沒有比這更重大的來向人類挑戰。在我們目前，盼望恐懼和猜疑會向智慧屈服，保障原子能用作爲人類謀福利，而不是供恐怖性的戰爭。

第十四章 俄國人以後如何

在他們熱切而渴求的和平願望中，美國人民腦海裏對於蘇聯看法，總是存着許多不安之感。而我所時常接觸到的有二個問題，那是：

他們喜歡什麼？

此後他們如何？

這二個問題都問得很得體，爲了要尋求蘇聯領袖與人民若干諒解，又爲要明瞭他們計劃方面的若干意見，因之使我們的能力，對於可以促進和平而擬訂政策的成就，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對於第一個問題，我所能做到的最好方法，乃是超乎我個人經驗之上的。不過，第一個問題的結論，憑那種經驗已明白指出：俄國領袖們是意志堅決而又機警善變的談判老手。

我之與人交接，已具深刻經驗。當我實習做律師時，已有此種經驗，在衆參兩議院服務時，又與二千個以上衆議員及近二百個參議員週旋過。其後又擔任過最高法院法官，經濟平衡局局長及戰事動員局局長，在那個時候，我爲許多公務上關係遇到許多人，並且解決許多案件。但，在這許多年之間，我却不會有過準備與莫洛托夫談判的經驗。

記得有一次我在倫敦，有一個新聞記者不大相信莫洛托夫會不願與我們交換意見而甯願讓會議破裂的事，他以懷疑的口吻問我：

「但你是否可以肯定說，你已經探求出可以解決此項問題的每一條路徑呢？」

我回答說：「朋友，我不但已經探明每條路徑，而且我還走踏遍每一條巷弄，小街以及大道哩。我把昔日在衆參兩院學來的一切方法都已試驗過，可是我在衆參兩院那裏是以服從多數爲守則，但這裏却像在開一個陪審委員會。假如你們之間有一位固執成見的陪審官，那末，你們全體所能希望到的，只是一件誤審案件而已」。

我常常這樣想：與莫洛托夫談判，倒能給予律師以最深博的經驗。對莫洛托夫的戰略，我曾經申述過，那是在會議草約業經簽字我已離開了莫斯科會議那時的一件事，莫洛托夫會在第十一个小時的最後時刻中，經過考慮以後，於是宣布他已經決定接受上。日下午巴爾幹一案的美國建議。從那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莫洛托夫寬闊的胸襟與忍耐力來。假如史達林的耐力是被人說不錯的話，那末，我可以說，莫洛托夫實是他的入門弟子之一。他有無窮的耐力，又有很精密的頭腦，而且更具堅強的毅力。任何人加於他身上的狂暴或是壞脾氣，在他看來倒反成爲一種娛樂。

一九四五年九月，倫敦召開第一次外長會議時，其他會員國都認爲多得喀尼斯以島應該從義大利移讓給希臘，並且應該解除武裝的；但是莫洛托夫却故取反對態度。他說他雖然到了末了或會變成移讓辦法，可是他却反對解除武裝的提議。就當時蘇聯對希臘的明顯態度上看來，我們可

以肯定地說，他是不願希臘現政府有武裝多得喀尼斯羣島之權的。原因是他要保留着行動權，希望共產黨控制希臘以後，可以來武裝該島，或者他在以後提出領土要求的談判時，來作討價還價之用。我們每天想把問題付諸實踐，但他每次總是推諉說，他要請示政府後，再作決定。我們假如要他立即請示政府聽取訓令時，他却又說：政府要考慮之後才能答覆。一月過去了，他還是沒有接到政府的訓令，而我們只得散會了。第二年四月，我們在巴黎相遇時，他那時不能自知獲得同樣諒解，於是提出一個新的答覆，說他之所以不贊成，乃是因為希臘從來不曾向蘇聯提出過接收該島的要求過，我們最後指出事實，並且經過幾次激烈的爭辯，說明有許多領土的轉移，從沒有經過請求一舉，至此，他又說任何事件，應該視作與其他領土問題的解決有着其連帶關係的。

在巴黎舉行第二次外長會議不久之後，我們又談到了多得喀尼斯羣島問題。莫洛托夫說，他希望能討論這個問題，但是那天早晨他接到報告，說是因為希臘大使往訪維辛斯基，所以必須等候那次會議的結果。我們一批人對於他這個最新異而又最露馬腳的把戲，均報之以一笑。當時甚至連莫洛托夫自己也笑出來了。一直等到許多問題的解決使他滿意以後，才建議多得喀尼斯羣島應該割讓給希臘，而且不准該島武裝。

莫洛托夫還喜歡討論議程問題，他爲了什麼問題應該排在議事日程上，可以與人爭辯幾小時之久。你不但應該有耐性，而且必須小心注意到你自己提出建議時的態度。假如你不預備做，

那末，將來你在大會討論之前，會費去你幾小時口舌，來報告你全部的提案。那時莫洛托夫的答覆會用俄文說「否」字。這是我所常聽到的。他能說英語的「我贊成」幾個字，他贊成的事極少，他的拼音也不很正確。

在任何會議中，不論是否在和諧空氣裏，他會運用他的延宕戰略中的機智，來贏取你冤強的欽佩。他端坐席中，泰然自若，用手撫摸着短髭，或是按動擺動他的夾鼻眼鏡，來等候他人翻譯，一邊吸着俄國捲烟，那捲烟好像是一串鏈條，莫洛托夫可說是所有蘇聯代表中的典型人物。他的另一熱練的戰略是反攻。任何時候，莫洛托夫總是抱着懷疑態度，認為美國或其他國家總是打算對蘇聯的失敗提出一種理由來說服他，以期取得如雅爾達會議的新聞自由，選舉自由等等的同意。他有時自己挺身而出來，擔任進攻任務，有時則改由衛星國家來出場。而且這些攻擊時常為對付希臘而發的。他譴責希臘的腐敗，抨擊希臘對蘇聯和平的鄰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諸國有侵襲意圖及不正當的攻擊，他大聲疾呼地反對不列顛帝國主義者對於希臘人民的統治，說是不列顛帝國主義者之駐軍希臘，全為抑壓希臘人民的自由，並且是在支援希臘法西斯主義者。他常常表示着深切的遺憾，認為美國政府不應該援助英國，而英國之處理失當，美國是應該負其責任的。他一再責難希臘，其後已變成爲家常便飯，我奇怪他自己已經變成相信自己鬼話的人了。

凡是莫洛托夫所不贊成的人，就時常被稱之爲「法西斯主義者」。所有共產主義者及同情

共產主義者的人，他都稱之曰「民主力量」。這是一個簡單的分析。康納萊及范登堡倒從來不會有直接被莫洛托夫稱之爲法西斯主義者，但是共產黨報紙却是這樣錯看了。他們兩人都被稱之爲「大資本集團」的代表，那時巴黎共產黨目參議員范登堡爲法西斯的真正代表人，但是參議員康納萊在那個時期負着領導責任，在特里斯特的和平會議上，代表着美國地位。共產黨報紙對這些事實，知道得非常清楚，認爲假如當時祇有我一個人的話，我或許會做得不錯，可是有了這兩位「法西斯」參議員在我身邊，使我受了影響，成爲反對「民主」的力量了。

當我離開華盛頓去參加和平會議時，這兩位參議員因爲參議院中有若干重要事件不能動身，因此留在華盛頓，但他們同意過了若干時日再來巴黎。那時我對他們取笑說，我可以不再受他們「壞影響」了。大會開幕後的一個星期光景，莫洛托夫譴責美國及聯合國違反協定，說是我們兩個國家違反了外長會議所決定的一關於和平會議的議程。那時我已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而我早已料到他会提出此項譴責的，因而在會議之中耗費了很多時間才算製成了記錄。在那個記錄中，我們保留着隨時可以對議程問題的我們見解有投票權。因爲他們這個不守信義的譴責，對我實是說得太過分了。我宣讀記錄後，又對莫洛托夫發表了若干意見，這些意見實是我所極不願意發表的。這可說是我對他從來不會有過的最嚴厲的批評。我們代表團向我建議，我應該送這篇演說詞給二個「法西斯主義者」一讀，因爲他們也是與我相似的和平人物了。

某天下午，在巴黎會議終了之後，契柏·波倫依舊與一位蘇聯代表談起了此事。這位蘇聯代

表說：要他瞭解美國人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具有貿易老手的聲望，而貝爾納斯國務卿卻重則一連演說了二天，真好似一位大學教授。「他爲什麼不停止談原則問題，走下台來開始談生意經呢？」這位蘇聯代表詢契柏時倒是完全出於至誠的。契柏解釋說，在美國人意見中這是有問題的，因爲關於原則問題是無法用討價還價方式來解決的。

我與史達林元帥及莫洛托夫談話，所得經驗完全不同。莫洛托夫迂迴曲折，而史達林是直接的。但在我與史達林所有接談之中，我不會忘記一段故事，那是羅斯福總統所告訴我的戰爭初起時他與史達林來往信札的事。他說有一天他收到史達林一封信，信內措詞，十分粗野無禮。他口授秘書以同樣語氣來覆史達林，但是決定將此信壓着幾天發出。果然，第二天早晨，當我遇到總統時，他收到史達林的第二封信，信內措辭非常謙恭尊敬，涵蘊着偉大的個人友情的保證。羅斯福對於此種極端相反的舉止，真是覺得無法理解，但是此類事情，發生却不止一次。

我在雅爾達初次觀察史達林時，我也不能瞭解總統所得的經驗。史達林對總統平時總是缺少謙恭懇懇的態度，通常處處顯露出不耐煩與羅斯福成立協議。總統却時常以適當的幽默態度處之，又以嬉謔態度怡娛着自己。我所得的深刻印象，並不因此而有所減損，比如我有一天下午在會議之中，親眼看見他向坐在他背後的一位紅軍將領招手，請他出去倒一杯茶來。我是知道許多小兵的脾氣，他們往往願意支付鉅額金錢去請人能命令一位將軍來等候他若干時間。

不管蘇聯人物之間有什麼不同，不過可以肯定的說，凡是莫洛托夫所尋求的目的，多是經過

史達林元帥核准了的。只有在波茨坦談判到賠償問題及蘇聯反對訂立四十年協定的一次，我覺得這倒是莫洛托夫使史達林受了他的支配。至於其他地處，這是很顯明的，史達林在唱戲——而莫洛托夫無論演得多久，只都是一套替裝而已。至於政治局究竟能影響史達林多少，無從知道。我的精度是史達林採納政治局建議，只有在他對這件事情無特別興趣或是沒有堅強信念的時候才是如此。他與每一個成功的領袖相同，他明瞭應該把握着他的僚屬的協助，乃是事實上所必需的。不過，遇到史達林有堅強信念而要反映到任何與外交有關的事件上時，我可以斷定，政治局總是支撐史達林的。我目擊他曾經對許多事件能很快地當機立斷，這使我想到他對政治局有着控制權力而不必有所顧慮。史達林與政治局的委員們自然也瞭解他們不能盲目地去服從他們的決議案的，除非他們能够給黨的工作人員及其人民對於一切重要事件應有團結一致的印象，而後纔可以如此做法。

我想，我已經說得夠了，不過，我還得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即我們必須記住蘇聯每一行動的目的，事實是他們到了極極時任何目的總要明白的。因此，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須要提出的，就是蘇聯領袖所想的終極目的究竟是什麼，換言之，即是俄國人以後如何？

我的經驗證明了只有一個答覆，這個答覆可以從俄國歷史中尋求到的。充分熟知俄國歷史的美國人不多。我並不自承為熟悉俄國歷史的人。可是，我所知道的已經足夠來推斷，今日使我們撲朔迷離的如許問題倒已經可以來作那歷史的註腳了。我們不必管到俄國革命的暴力如何，其實

布爾什維克外交的目的，比之沙皇時代的政策並沒有多大區別。史達林與莫洛托夫的目的，自戰事終結以來其所追求者，實際與希特勒所提出的要求可說並無二致。

在戰後幾年，俄國的拓展主義已使我們的關切深刻到如此程度，此種主義早已暴露無遺，且爲舉世所驚駭。此在共產革命的鼻祖馬克斯於一八五三年由倫敦致函紐約論壇報的關於領土要求問題的文件中，已經說得十分明白。時至今日，馬克斯的話與現今蘇聯政府的所作所爲，可說完全一樣。

一八五二年之後，俄國繼續不斷要求領土權，這樣一直到了第一次

八五

三至一九一四年的沙皇時代爲止，俄國一共得到九七一、三七七平方哩的領土，使戰前的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增至八、六四五、〇〇〇平方哩之大。

隨着蘇維埃政權之降臨，使俄國喪失了近五十萬平方哩的領土。新的蘇維埃聯邦使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都成爲獨立國，脫離了俄國的版圖。此外喀爾斯給了土耳其，比塞拉比亞退給了羅馬尼亞，還有一大塊土地喪失在新的波蘭手裏。

在蘇維埃政權下最初二十年之間，唯一的領土擴展是在一九二六年併吞了北極的若干島嶼，但到一九三九年蘇聯進入活躍的拓展政策時期。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至一九四五年年底止，蘇聯兼併了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比塞拉比亞，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波蘭及芬蘭之一部，東普魯士之科尼斯堡區，橫巴爾汗島蘭克及丹奴圖佛這許多地方。此外又拿到旅順港，該港

的領土權雖未包含在內，但與中國共同掌握了三十年此一軍港的保有權。總括起來，自一九三九年後，蘇聯得到的領土將近三十萬平方哩，使蘇聯的領土面積增致八、四五五、九三九平方哩，與俄國沙皇時代的最大版圖已屬相差無幾了。

至此，事實已很顯明，這種拓展主義早已不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計劃了。此種意念係模種在俄國歷史上，其所不同者祇是人物與戰略的變化而已。

蘇聯的當代領袖們已經給了我們一個明白表示，透露出他們是十分願意獲得他們終極的目的。這可以從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協定以及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不侵犯協定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進攻蘇聯的一段時期中，看得明明白白。

在雅爾達的一個餐後會談中，史達林說明蘇聯政府從來沒有真正與德國進入於不侵犯協定狀態之下，所以；在慕尼黑的目的，並不是在討好希特勒。誠然，這是真實的，慕尼黑協定之後，蘇聯報紙開始向德國減少抨擊運動。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蘇德兩國重訂貿易協定，蘇聯報紙覺得有自由可以歡呼，祝賀蘇德關係已邁了一步。不久之後，史達林在共產黨大會發表演說，謂德蘇之間唯一不同之點為觀念問題，而這些不同之點却被他國故意渲染，這是因為他們希望別人認為他們「火中取栗」之故。及一九三九年春，史達林對蘇聯與法英之間談判的不滿意度已為舉世皆知，而素稱熟悉「西歐」情勢的外長李維諾夫致被罷職，起用了莫洛托夫。

希特勒對這些談判，好似漠然置之，這種態度，一直等到那年夏天，希特勒明白決定他需要

蘇聯的支援來實現他的有計劃的進攻波蘭時才有了改變。接着華羅是發展得這樣快，他們便全世界各國覺得迷惑難解，同時也使我們爲之震驚，因爲我們依舊期望戰爭能夠避免啊。

那些談判的經過情形，始終真相莫明，直待那些記錄從盧獲的納粹政府檔案中發現之後，才知道其真相。那些檔案使我們對於蘇聯究竟在尋求些什麼的瞭解上，可說是有極重要的幫助。一部份史料中包括莫斯科德國大使館參贊希爾格爾所報告的參與談判的主角。在談判中希爾格爾所担任的是舌人工作。他的報告是根據當時的筆錄寫成，那時他不至有存心，即有意把它寫得不真實或是假造的。至於其餘的史實，是以德國外交部卷宗中的正式文件作爲根據的。

這些記錄全是德國的，因此，不會得到蘇方的證實。不過，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其真實性，其中，關於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前的決定命運之年所遭遇到的一切都有記述。同時也沒有人可以忽視這一事實，即是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尋出資料去瞭解今日那些坐在克里姆林宮內那些權貴在尋求些什麼。是否他們只求安全呢？他們除了尋求安全之外，是否也企圖擴展他們對其他國家及人民的統治呢？這可說是一種常例，要說出一個人頭腦中在轉些什麼念頭，很可能從他以往同一文件中所實所行的事實，來窺見其梗概。那末，讓我們來看這些記錄。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德國駐莫斯科大使斯基倫堡奉令通知莫洛托夫：（一）觀念的不同，不一定能使邦交發生阻礙，而且德蘇兩國之間，沒有真正利益衝突的事實。（二）德國對蘇聯沒有侵略的意圖，相信此類像波羅的海國家的問題，可以在互相滿意之下來求得解決；（三）表

本主義西方民主國家在企圖拖拉蘇聯對德作戰，而這個戰爭只是對資本主義國家有利而已；（四）英國熱中於戰爭者爲了要阻止德蘇友誼的增進及使解決東歐領土問題成爲不可能，必欲澄清蘇德邦交；（五）所以外長里賓特洛甫甚欲至蘇一行，向史達林說明希特勒的見解。

當德國大使呈遞此一諜文時，莫洛托夫表示極感興趣，不過，認爲舉行此類會談當應有所準備。他想知道德國政府對於兩國訂立不侵犯協定意見如何，還有德國是否可以用它的關係對日本改善日蘇之間的關係。他還主張確切決定在建議的會議中應該討論波羅的海國家問題。他立刻得到肯定的答覆。

莫洛托夫對於德國政府願派外交部長來莫斯科談判，深表滿意；這和英國恰成一個對比，因爲英國政府只派了一位文官史屈朗子爵前往。他建議雙方政府即日準備起草互不侵略協定。至八月九日，德蘇商務貿易協定即在柏林簽字。在同一天，莫洛托夫把一份互不侵犯協定的草約交給德國大使。

希特勒已感到不耐。明顯的，他是準備進攻波蘭，但是他急於先與史達林訂約。他於是給一個私人電報給史達林，表示他願意接受莫洛托夫的不侵犯協定的草案。他說：德國對於波羅的海灣和芬蘭愛拉立等國家均無興趣，而這個保證可以放在附屬於不侵犯協定的秘密換文中。同時他建議：這個秘密換文可以定出德蘇兩國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希特勒最後在電文中說：波蘭天天在增加挑釁的行動，任何時候可能發生危機；因此希望史達林在八月廿三日之前能接見里賓特洛

甫外長，後者有權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和祕密換文。

莫洛托夫立刻明白希特勒聲明的重要性。在收到電文半小時之後，立即請德大使轉告德政府說：蘇聯準備即刻接見德國外長，並根據希特勒電文的建議進行談判。

現在有充分理由去相信：史達林對於局勢意外的轉變，深感愉快。他正因為英法之不能參加他所要求的保證而惱怒。他需要蘇聯不被希特勒進攻的保證，他亦知道德蘇戰爭近眼前。他一定會推想過，假如互不侵犯協定使英法不能援助波蘭，則歐洲全面大戰可以避免，而蘇聯則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發展軍事實力。在另一方面，即使西方強國參加大戰，亦將造成均勢，使蘇聯還有時間進行整軍工作。此外，這個協定使他能不冒險爭風險而攫取波羅的海的小國。

里賓特洛甫於八月廿三日抵達莫斯科，當時參加會議者，有史達林、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舒倫堡大使和海爾格。會中史達林堅持在祕密換文內應包括蘇聯在巴薩拉比亞有特殊權益的聲明，並規定立陶宛的北部邊境為德蘇勢力範圍的分界線。這項要求常被接受。協定和換文立被批准，在簽字之後，雙方共飲香檳，史達林還提議為希特勒乾杯。里賓特洛甫於後一天即飛返柏林。

從斯堪倫堡大使作初步試探到協定成立，只費了九天的光陰！他們獲得同意的速率，于我的印象極深，因為我曾經化十五個月的時間，來取得蘇聯對於五個次要條約的同意。在第一種情形下，他們是願意協議；在後一種情形下，他們實在是不願同意。

雖然兩國的宣傳機構，早已在使人民準備這個政策上的大轉變，但是德蘇人民一定爲了這個突變，而感到神祕莫測。我這個假定證明不錯；在這個氣氛中的德蘇人民，包括共產黨黨報在內，都對局勢的變化難於理解。

我覺得這個互不侵犯協定，是條約無效的典型實例。史達林在雅爾達的聲明，正符合蘇聯代表經常採取的路線：條約簽訂的目的在爭取時間，來應付一個蘇聯認爲不能避免的衝突。現在可以清楚的看出，條約訂立的時候，就完全準備將它撕毀。這裏雖然沒有希特勒意圖的聲明，但是却有破壞條約的行爲。在德蘇協定中，史達林與希特勒的誠意都是有疑問的。

希特勒之席捲波蘭，比史達林預期的來得快；而在追逐退却的波軍時，德軍進入了蘇聯勢力範圍。因此史達林要求里賓特洛甫再到莫斯科一次，在瓜分波蘭上再作一次新的協定。

德外長於九月廿七日抵達莫斯科。這次德國同意蘇聯接收立陶宛。瓜分波蘭的兩國疆界已經劃定，蘇聯想設立自治共和國的計劃亦被贊同。德國允許蘇聯接收特洛查比茨與巴列斯勞的油田，而由蘇聯按照契約供給納粹三十萬噸原油。在九月卅日莫洛托夫設宴慶祝新的邊界與友誼協定的成立。

從這天以後，在莫斯科可以聽到華格納的音樂。德軍的戰報亦在蘇聯政府報紙上的第一版上顯著的登載着。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卅一日的演講裏說：「德國目前的處境，是在力求戰爭早日結束與和平恢復；而英法兩國則是贊成延長戰爭，反對和平」。同時，希特勒亦告訴他的

朋友：德蘇友好協定將有效多年。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更入於蘇聯勢力圈內，他們被迫割讓基地予紅軍。然而，芬蘭却拒絕這種要求。於是，未經正式宣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就被紅軍侵入，而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國家的初期讓步實在僅是蘇聯再進一步的踏脚石罷了。不久，他們就被迫成爲蘇維埃聯邦的一份子。由於此事，希特勒、史達林的合作開始發生了裂痕。

早期的土地分割中立陶宛西南角一小塊土地分予德國，但紅軍進駐該國的時候，把那塊土地佔領了。於是德國提出抗議。蘇聯雖表示德國是對的，但推說要把這塊地方劃出頗爲困難。這問題遷延了幾個月，蘇聯最後同意付出三千一百五十萬馬克，作爲償還那塊土地的代價。

一九四〇年六月，蘇聯又要求羅馬尼亞割讓比薩拉比亞。德國對此不能反對，因爲希特勒曾經說過對此區域並無興趣，接着蘇聯又要求布科維納的北部，這區域事前未曾和德國商定過，所以德國反對了。莫洛托夫簡單地答復說，那區域是烏克蘭人所居住，所以他看起來沒有反對的理由，他又溫和地說，蘇聯不懂希望德國贊成這一要求，並且更希望贊成蘇聯不久以後，對布科維納南部的要求。

希特勒發怒了，他想德國會爲獲得土地流過血，如今蘇聯却兵不血刃地坐享其成。德國駐莫斯科大使接到政府的訓令，通知莫洛托夫說德國對於保證羅馬尼亞的領土甚爲關切，德國需要羅馬尼亞的糧食和汽油，同時德國對匈牙利也是如此。大使又說，在不侵犯條約中，關於該相互的

利益，理應先大家商量一下，然而蘇聯在對其鄰國行動時，却並未與德國商量，他舉出蘇聯併立陶宛和比薩拉比亞、布科維納的事。

莫洛托夫則堅稱（我差不多還能聽到他所說的話！）德國的反對行動，乃不遵守協定。德國應該知道蘇聯對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很有意思。

雙方因此發生了猜忌。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三日，里賓特洛甫以十九頁的長信，送交史達林，說明在前數月中德國所取的步驟，和它的理由。他請莫洛托夫到柏林去。史達林的回答，甚為曖昧，但他同意改善雙方關係，並說，莫洛托夫將在十一月十二日來柏林。

莫洛托夫和希特勒會晤兩次，一次在十月十二日，另一次在十三日，每次都在三小時以上，討論經過，由斯基米德大使紀錄。在我看來，這是戰事轉變的關鍵，事實上，我相信這一次乃是歷史上決定性的會晤。因為莫洛托夫太過於玩弄手段，特別是十三日和希特勒的會晤，是外交上重大的錯誤。

希特勒是一個誇大狂的典型。他肯定納粹可以獲勝，所以聲稱德蘇兩國應該協商，如何來分割即將崩潰的大英帝國。他想，德國着眼於西歐，蘇聯則可取東歐，蘇聯渴望的不凍港可以經伊期至波斯灣和紅海。希特勒的如意算盤是德蘇兩國平分世界。

莫洛托夫精細的，循規蹈矩的頭腦，對於希特勒的狂妄計劃並無反應，他同意希特勒提出的是一個有趣的長期計劃，但他說蘇聯所希望討論的是目前的問題。顯然目前雙方間的協議，一不

能使德國滿意」，因為協議上很清楚地把芬蘭劃給蘇聯的勢力範圍，但德國軍隊却駐紮在那裏，他們應該立刻撤退。此外蘇聯對於德國所提保證羅馬尼亞疆界一點必須提出抗議，他很奇怪，德國所請保證，是對誰而發的？

希特勒這種戰爭的幻想怎樣會不失敗呢！他解釋德軍在芬蘭乃為保護交通線，使瑞典的礦砂和石油可以源源而來，那是對德國戰爭力量極為重要的。但軍將儘早的撤退。德國所以干涉羅馬尼亞，因為否則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就會有公開衝突，而這對於德國在羅馬尼亞的經濟利益大有損害。希特勒又說羅馬尼亞已割讓土地與蘇聯和匈牙利，因此疆界的保證對於羅馬尼亞的和平與秩序極為必要。德國祇有一個軍事訪問團在羅馬尼亞，那是應羅馬尼亞政府之請求而設置的。他竭力表明，德國對於巴爾幹各國，祇有經濟的利益，並沒有政治野心，他要保護羅馬尼亞的油田以免被人搶奪。

莫洛托夫率直地說，他對於希特勒的答覆很不滿意。他說，蘇聯還要和保加利亞保持更密切的關係，可能與它簽訂一張互助約定，因為保加利亞的地位，和羅曼尼亞海峽有關。最後，他又提出關於羅曼尼亞海峽的非僅紙面而有實際保證的新方案。

希特勒答稱，在未與保加利亞和墨索里尼商量以前，他對此問題不能答覆。

莫洛托夫最大的錯誤就在這裏，他堅持要立刻肯定地答覆，據當時譯員的報告，希特勒對此大為不滿。

我簡直能夠繪出當時的情景來，希特勒剛剛說過他的信念，他肯定能獲勝利，他想他已統治世界，他正描繪了一幅分配世界的圖畫將一塊龐大的土地配給不傷一人不費一錢的蘇聯。但莫洛托夫却僅僅說這不過是「有趣」而堅欲希特勒立刻答覆在他認為祇是些微小的問題——即羅馬尼亞的疆界，與保加利亞的互助協定。這是不難想像的，易怒而暴躁的希特勒，對於莫洛托夫的大胆很為奇怪，他相信蘇聯政府對戰爭毫無準備，而莫洛托夫竟敢不滿意他的答覆。

歷史學家或能發現，希特勒於何時決定進攻蘇聯。或者他以前已大致考慮過，但除非我看到別的證據，我將相信這一次與莫洛托夫的會晤乃是決定之點。當然從遭政命的十一月十三以後，蘇德的關係就急轉直下了。

當天後來，里賓特洛甫將一份協議草案與兩份密約讀給莫洛托夫聽，他建議蘇聯簽字加入軸心國。顯然這些是在莫洛托夫到達柏林會晤希特勒以前就預備好的。草約中說明蘇聯與三軸心國合作，均分世界利益，並決不參加任何反對四國中任何一國的集團。第一份密約中規定希特勒所設想的四國對於土地分配的希望：德取非洲中部，意取非洲北部及東北部，日本佔領本土以南的亞洲區域，蘇聯則得國境以南直至印度的洋所有區域。第二份密約是推翻蒙特惠會議對於黑海海峽的協定，使蘇聯可以無限制地利用海峽；除黑海沿岸國家外，其他強國放棄戰艦通過韃靼尼爾海峽的權利。此外，里賓特洛甫並願在日蘇間作中間人，以獲致雙方永久的友誼。

莫洛托夫對此建議的反應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他的反應當從近代歷史的角度來觀察。

日本已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莫洛托夫說，蘇聯尚在等候幾個問題的答覆。關於伊朗必須有「具體」的討論，對於韃靼尼爾海峽，蘇聯並將堅持獲得切實保證。莫洛托夫然後又提到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的將來以及瑞典的中立等問題。他結論說，將來的問題固然重大，但對於目前的問題亦不能完全忽視。

莫洛托夫在他的訪問柏林期中，除這肯定的答覆以外，再無其他了。但在十一月廿五日，他請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到克里姆宮來，將一份答覆里賓特洛甫十一月十三日建議的全文交給大使。這一份覆文，由它此後所發生的事件來看，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莫洛托夫告訴德大使說：蘇聯政府準備在四種條件之下接受里賓特洛甫所草擬的簽訂四強協定，即：（一）德國軍隊立即自芬蘭撤退；（二）蘇聯與保加利亞訂立互助公約並在韃靼尼爾海峽建立海陸軍基地，以保證蘇聯在該海峽的安全；（三）承認蘇聯對於巴庫與巴頓以南至伊朗與波斯灣間區域的要求；（四）日本放棄在北庫頁島開採煤礦和石油的特權。

莫洛托夫顯然沒有明瞭他在柏林所玩弄的手段是何等愚蠢，也沒有曉得希特勒發怒的程度。蘇聯永遠沒有接到德國對於這一牒文的答覆。

希特勒的機噐，使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開始憂慮了。一九四一年一月，他們派代表簽訂了第二次經濟協定。蘇聯謹慎地履行了第一次協定中規定的交貨，現在又同意增加互相交換的貨物。在這一月內，後來莫洛托夫因為希特勒對他的建議置之不答，他就提出再與希特勒會談。德國政

府簡單地告訴他說，他的建議已經收到，並已通知意大利和日本，希望能在最近期內再來討論，這種在蘇聯提出建議兩個月以後才來的答覆，很清楚地表示希特勒對此已不感興趣了。所以再度
的會談從未實現。

代替來的，是德國在巴爾幹大量增加軍隊。他們將這行動通知蘇聯。二月二十八日，斯達林
堡大使告訴莫洛托夫說保加利亞已贊成三國軸心協定，將在三月一日簽訂同盟條約。莫洛托夫
接到這消息極為關心。他知道保加利亞局勢的發展，與十一月廿五日蘇聯提出建議時的情形已完
全不同。顯然，莫洛托夫尚未明瞭他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天的提議已判定了希特勒史達林間「奇怪
婚姻」的最後分離的命運了。

三月一日，斯達林堡通知莫洛托夫德國將派軍隊進入保加利亞。莫洛托夫立刻當着德國大使
面前寫了一張字條表示對於德國以這種軍事佔領來破壞蘇聯的安全極為遺憾。

四月五日，蘇聯差不多在德國進攻南斯拉夫的同時，與南斯拉夫簽訂友好及互不侵犯協定。
史達林採取此一步驟的動機不明，當時的說法，則說蘇聯支持南斯拉夫可以使德國牽涉在巴爾幹
戰爭內而減少進攻蘇聯的危險。然而，幾星期之內，事實證明史達林對於南斯拉夫的實力估計太
高了。

此後，蘇聯政府力求避免引起德國不快之事。原料交付得很迅速。當外國報紙刊載德國軍隊
在蘇聯邊界集中的報導時，蘇聯政府以塔斯社的官方消息，宣稱這是戰爭販子鼓動的謠言，並說

德蘇兩國關係甚為融洽，現有的條約更可說明蘇聯並未受威脅云云。當然他們說的並非真話。

斯基倫堡大使也不相信蘇聯的話。他極為關心，在四月底親自帶一份備忘錄到柏林提對蘇聯有戰爭發生的危險。我不知道說一份備忘錄有沒有送達希特勒。希特勒與斯基倫堡的談話中有沒有提及這事無從查考，但據大使說希特勒與他分別的時候曾說不對蘇開戰。

隨後幾星期事情懸而不決。莫洛托夫與斯基倫堡不再會晤。最後在六月中，德國大使接到指示，將蘇聯境內所有德國婦孺悄悄地遣送回國。

六月廿二日，莫洛托夫請斯基倫堡來見他，他說德國飛機一再的未同意飛過蘇聯領土，顯屬破壞主權，德國應着手制止此類事件再有發生。斯基倫堡允諾將此事轉告政府。莫洛托夫又說全世界正譏傳德蘇之間將有戰爭，而現在他又聽到德國大使館人員的眷屬婦孺正在撤離蘇聯。他希望德國大使加以解釋。斯基倫堡甚為窘迫，他說對於謠言一無所知，婦孺的離蘇，無非是因為暑假的關係。莫洛托夫當然曉得斯基倫堡說的並非真話。

次日，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三日，斯基倫堡接到柏林的訓令去見莫洛托夫，發表如下的聲明：「蘇聯軍隊在德國邊界的大量集中，已達到使德國政府不能忍受的地步。因此德國政府已決定採取應付措置」。

「這是否即係宣戰呢？」莫洛托夫就問。

大使以手勢表示出莫可奈何的姿勢。

莫洛托夫說他認為這公文除宣戰外再無旁的意義，因為德國軍隊已越過蘇聯邊界而納粹飛機對幾個蘇聯城市已轟炸了一小時以上。他說德國對於訂有友好與互不侵犯條約的國家進攻，真乃世所未見的毀信背約。他又說德國的所謂蘇聯軍隊集中僅是一種藉口，因為蘇聯軍隊僅是例行的演習而已，如果德國政府先來質問，蘇聯可以提出適當的解釋。

斯基倫堡對此並沒有指出所謂「例行演習」乃是「例行的」解釋，他僅僅說他對於情形不能再有所論述。

這樣就結束了德蘇間所謂「永久的」——實際僅有二十一個月的友好與互不侵犯條約，展開了納粹與蘇聯間的戰爭。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給予我們什麼指示。我想這樣假定是對的，即蘇聯現在的野心仍想獲得當時莫洛托夫送給希特勒的咨文中所要求的領土。其中有幾種要求已得如願。然而勝利的來臨，使使蘇聯政府的野心更為擴張了。

在北方，蘇聯對芬蘭的要求如願以償，在大戰期間莫洛托夫設法使挪威讓步以擴展蘇聯的權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要求挪威允許蘇聯在斯畢茲伯根羣島有更大的經濟權利，他要求立即佔有熊島以及在別的島嶼上建立基地的權利。

莫洛托夫提出這要求，不管一九二〇年由三十四個國家包括蘇聯在內簽字公認挪威在這些島嶼上有統治權的條約中有一個附帶條件，即挪威在島上不能建設堡壘，且「永遠不能用作類似戰

爭的目的」。挪威政府對於蘇聯的兩種要求，起先都允予討論，後來宣稱，僅能考慮經濟問題，軍事性的要求必須經過多國的同意。

在東方，蘇聯現在已佔有全部庫頁島，此外，並獲得了千島及在旅順大連和東北鐵道的特權。史達林對於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東北的成功，是否將繼續不受誘惑截至此時仍為疑問。

蘇聯對巴頓與巴庫以南土地的希望並未實現，但是它曾努力過。它向土耳其要求割讓巴頓以南的卡斯和阿丹汗兩省份。它想擴展巴庫以南而達伊朗領土的行動，則被安全會議所阻止。

蘇聯又想用老手段來建立一紅軍保護下之傀儡政府。紅軍干涉伊朗的軍隊，蘇聯鼓動亞塞爾拜然建立獨立政府。這案件經提到安全會議來。當蘇聯在條約過期後仍在伊朗駐兵時，安全會議由於伊朗的控訴而加以壓力。會議中除蘇聯與波蘭外，每一會員都贊成保障伊朗的完整。蘇聯因為眼前還不準備也不願意在世界上孤立，所以對於安全會議的決議總算遵守。

現在，讓我們將一九四〇年時莫洛托夫的要求與今日歐洲的形勢來比較一番。

紅軍所扶植而羽翼下的保加利亞政府，已不需要訂立條約了。這樣，莫洛托夫所要求的蘇聯與海峽間的「安全線」，已經達到目的。在羅馬尼亞也已被蘇聯用我以前所敘述的策略扶植了一個同樣的政權。蘇聯在匈牙利野心的活動還是最近的事，但其方式則仍與以前相同。

波蘭被置於附庸國的地位。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被緊逼於蘇聯統治的斯拉夫集團中。捷克斯拉夫則可說是這集團的俘虜。所有莫洛托夫曾表示關注的歐洲地區中，僅希臘與土耳其仍屬自

由，但蘇聯正在進行想獲取他們。

我們的一位幹練的觀察家馬克愛斯列治的報告中已說明：如果沒有兩種因素，則少數有組織的共產黨，以蘇聯所支配下的希臘的鄰國為基地並受其接濟，老早就奪得希臘政權了。那兩種因素是：（一）聯合國的行動，（二）蘇聯明白：如果他們奪得希臘，則美國與英國將要求聯合國對這種侵略行為加以制裁。

安全會議的巴爾幹調查委員會工作延遲而努力，但混亂仍極普遍，美國派代表團去希臘，以格里斯華為團長，設法促進其經濟與政治的健全，以壓制由於共產黨煽惑而發生的騷動，希臘的命運仍在未定之數。

提及土耳其，我們應當記得在波茨坦會議時，史達林聲明蘇聯對海峽始終關注，所以要求在該區建立陸海軍基地的權利。我們會努力想獲得集體的保證，以維持韃靼尼爾海峽的自由，但未成功。我們現在已用其他方法保障土耳其的主權。

卡爾馬克斯與別的幾位歷史家已很明白說明蘇維埃的願望與沙皇的願望絕少不同。而必然的，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的要求，正是蘇聯在最近將來的動向的一般標記。

關於蘇聯究竟是求安全呢還是求擴張？我想即使蘇聯自己在分析其動機時，也難於正確說出安全與擴張的界限。如果他們曉得這界限在那裏，亦必不會承認。在談到這問題時，我就想到這正為有種人為求保障而買進與他們毗連的房屋與農田。蘇聯也以為為安全起見，其鄰國與附庸國

必須是「友好的政府」。所不同者，蘇聯對其鄰土並不出錢購買，而毫無顧忌地破壞法律與約束，以求獲得安全所需的財產。

常常有人問：蘇聯是否以安全為名，意欲統治整個歐洲大陸？我想他們要在所有歐洲國家內安置充足的有組織的共產黨徒而使他們能够指導這些國家的政策。我並不認為他們現在即想奪取所有歐洲政府。他們恐怕西歐人民不願接受現有蘇聯式的政府形式。他們也明瞭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內他們尚未訓練出足能組成此種形式的政府領袖，如貿然行動而失敗，將使他們在全世界的威望大為減損。所以截至目前，他們僅止於培植當地領袖，待時而動，用罷工的威脅以及鼓動憤懣的情緒，他們可以在若干國家內施展其力量而毫無責任。希臘顯然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他們似乎尚在用一貫的「滲入」方法，尋求第二個目標來控制意大利政府。我相信他們的最後目的，在以某種方式或其他方式來統治整個歐洲。

在決定我們應該採取何種行動時，卡爾馬克斯大有幫助，一八五三年關於沙皇對土耳其提出要求時他寫道：

「在一連串的大勝以後，俄國已不可能對土耳其提出更廣大的要求了……。如果其他強國堅持不讓，俄國一定會非常識相地退讓了」。

所以如果蘇聯感到美國與別的聯合國僅將口頭上提出抗議而一無實際作為，則蘇聯將繼續追求這些歷史性的目標，猶如在雅爾達會議後不久對羅馬尼亞的行動；它奪取了一個政府，然後說

事情已經解決，沒有再討論的餘地了。

但是，反過來講，如果現在使蘇聯明白：如果它有一種侵略行爲，我們將立刻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訴；如果使蘇聯明白，它在安全理事會中施用否決權，則將造成聯合國集體來支持而強迫實行大憲章的原則——假使能够這樣，我不相信蘇聯還會破壞伊朗、土耳其、希臘、義大利或任何別的國家的完整。

有許多理由蘇聯不願在現在作戰。我相信他們將「非常謙相的退讓」。但假如其他強國不來「堅持不讓」，那末，如馬克斯關於沙皇時代的警告，蘇聯就要「一再無厭的想征服與併吞了」。我們不能再耽溺於無用的威嚇，我們必須不再從事我們不想完成的工作。我們必須以堅決的反抗來應付侵略與壓力。同時，我們在分析每種形勢時，必須公正而有目標。我們必須常常伸出友誼之手，我們必須不斷的表明我們切望與鄰國和平相處。

蘇聯今日所取的政策，在我所引證的歷史記載中已揭露無遺，我還願意指出另一個指證。那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蘇聯戰後第一次大選時，史達林對其共產黨同志發表的演說。我相信，在這種情形下，對這些聽衆所發表的演說，遠較對於去訪問的美國人與外國記者所發表的言論來得可信。在那篇演詞中史達林這樣的說到將來：

「我毫不懷疑：如果給予我們的科學家必需的協助，他們不僅能够趕上並且在不久的將來，必能超過我們以外的國家的成就。提及較長期的計劃，黨方預備發動一個偉大的發展國家經濟運

動，使我們能够增加生產水準，達到戰前水準三倍的程度。

完成這計劃，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工業每年生產五千萬噸的生鐵，六千萬噸的鋼，五億噸的煤和六千萬噸的石油。

唯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國家才能保證應付意外事件。這或者需要三個新的五年計劃才能完成，但這是能够完成的也是我們必須完成的。

時間並不完全偏於蘇聯方面。

在回答「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物？」這問題時，我沒有提到蘇聯的人民。我祇說了蘇聯的領袖，他們是我懂有的認識的蘇聯人。很少美國人能够真正懂得蘇聯人民。

在估計蘇聯現在的政策時，我們可以不必顧到俄國人民，他們對於蘇聯外交政策並不較之沙皇時代更有影響。但在考慮將來的政策時，我們不能忽視他們。我相信，他們才是我們的希望所寄。我不能相信那些會為防衛其家國而英勇作戰的俄國農夫們真的想使別的與他們相似的人民受外人的統治。我不能相信那些幾年以前剛從近於奴隸的狀況下解放出來的俄國工人們會有意來剝奪別的國家的工人們的自由。

我曾經說過：「沒有一種鐵幕不能以人類的累積情感來刺破」。我相信這道理，我也相信有一種合理的機會，我們可以有充分時間來將這種情感帶給蘇聯的人民與領袖。

我也說過「我們不應有這種信念，即以為我們在實現和平目標時的遲延與後退會使得武力衝突不可避免。」這是蘇聯領袖所持的一種信念使我們的工作大為困難。但如果我們自己也是這樣想法，那末我們就永遠不能使他們和世界其他國家消除這種念頭了。

第十五章 我們往何處去？

在前數章內，我已經說明我們目前的情形是怎樣，以及如何有這種情形的原因，希望藉此說明可以幫助我們決定今後的步驟。行文至此，我覺得我應該以我的經驗來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是：我們現在往何處去？

答覆這樣一個問題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醫治戰後的世界，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無萬靈藥可以應用。但是我相信人類可以建立一個永久公正的和平，不過我們不要太樂觀，以為這件事只要出之以信心即可做到，也不要太悲觀，以為非再來一次戰爭不可。

指津領路的事，往往是一件冒險的工作，尤其是我這份草稿交給出版商是在七月一日，而書却要到十月中旬才能出版。在今日時事像萬花筒似的在變動着，那麼在這三個月中有何變動，恐怕只有先知占卜者之流的人才敢預言。我既非先知，也非占卜之人，不過我深知每天可以發生新的危機，而今天的危機常常是在明天即被人遺忘了。因此很明顯的，今日根據目前事實及環境所發表的意見，三個月後因為事實及環境改變了的原故，須予以廣汎的修改，甚至完全不適用。有了這樣一個前提，我願意提供我們在建立和平方面應採取的幾個步驟。

我以為我們應立即與奧，德，日早日訂立和約。在前數章內，關於和約的締結我已經指出一條道路；我懇切希望蘇聯能踴躍參加，以促其實現。其他各國亦瞭解這是重新建立世界的一條不可少的正當路徑，雖有蘇聯的反對，決不能阻止他們走上這條路徑。採取這條路走，需要勇氣，需要集體行動。它前途目標的重要，即足以證明行動的必要，因為戰爭狀態的繼續存在，如軍人政府及大量佔領軍的繼續保持，對於和平及安全是個永久的威脅，它不但危害同盟國人民的經濟政治的幸福，也同樣危害戰敗國人民的幸福。

就在我們計劃和平解決辦法的時候，時局的演變使我們對於和平的永久性亦發生疑問。自歐洲戰事結束以來，我們很關心蘇聯對於希臘及土耳其所抱的態度。英勇的希臘人，他們先與義軍奮戰，繼而抵抗德軍的侵略，深獲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的稱讚。不幸敵軍的撤退，不能結束他們的困難及痛苦，而內戰隨即發生了。希政府認為蘇聯附庸有鼓勵內戰的嫌疑。

英軍終於出面干涉，以期恢復秩序。希臘自一九四五年夏季以來，即不安甯，與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等國接壤的區域內，遊擊不斷發生，希政府從事清剿，因而不克分身去恢復崩潰中的經濟。希政府認為在阿，南，保等國內訓練的遊擊隊，侵入界內，搶掠掠奪後又逃回外國，聯合國巴爾幹調查委員會認為此事至少有一部份是事實。遊擊隊獲有希臘共黨的援助。去年該區域內人民沒有種稻耕地，因為他們知道秋收無望。百姓離開田地，逃至城市避難。政府為要保護人民的安全，抵抗遊擊隊的侵襲，不得不採用抵抗的步驟，而許多人認為這些步驟是壓

迫的方法。

一九四六年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時常與希首相沙達利斯及希政府其他官員把酒，作深切的談話。我們如果沒有看到關於希臘軍民被殺害的每日報道，一定會批評希首相所實施的措施是壓迫的，不過對於一個原有希臘土地完整維護責任的人，這實在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去年夏天希臘選舉，人民都投票贊成國王復位。當時在希臘的外國觀察者，認為希臘人民對於皇位並無好感，因為反對共黨的原故，只得投票贊成皇位復位。選舉之後，首相對我說，國王和他都懇切希望民主派人士能參加政府。我極力勸他繼續做，但事與願違，他沒有成功。

十月一日和會閉會時期，希首相對我說，希臘國庫收入一大部份須用在軍費方面，這就更加使經濟的崩潰，希臘需要經濟援助，軍隊需要增添配備。他又回答我說，英國已以軍用品供給他們，並同意繼續供給。我告訴他，我們只能在歐的剩餘軍用品供給他們。我已經請總理該項軍用品的官員盡量援助希臘。我並且告訴希首相，國會並沒有撥發一筆款項救濟希臘，因此我不能應允予以經濟援助，不過國會如果通過我們所請求的三億五千萬元的救濟費，希臘必可得到一筆相當大的數目。我也告訴他，我可以請求進出口銀行對於希臘借款作有利的行動，並且如他之所要求，可以委派調查團到希臘作實地之調查。此事業已實現，該調查團由包特爾頓爵士，到希臘去調查該地的經濟狀況。

希首相去年十二月調紐約，又和我商討希臘問題。我請他到華盛頓，與進出口銀行當局及制

國務卿克萊頓商量援助的事。在他去之前，杜魯門總統和我與出口銀行理事們共同商酌希臘局勢。他們認為照該行規章，除非有「借款償還的相當保證」，不能借出款項，以希臘局勢不增而論，希臘是否合乎此條件頗有疑問。他們說可以予以考慮，不過我知道希臘借款的實現希望很少，除非規則有了改變。

當希首相在紐約的時候，我會和貝文討論希臘局勢。貝文說，英國已在經濟及軍事兩方面援助希臘，並繼續以軍用品供給希臘，但他希望我們能以經濟援助。他說只要可能的話，英國願將軍隊自希臘及其他地區撤退。但他從沒有表示不問希臘情形如何，英軍將於三月卅一日或任何規定日期撤退。

土耳其的情形亦相同，她的經濟狀況雖比希臘略勝一籌，但她的主權亦日在動搖之中。蘇聯對於希臘的企圖或有可辯駁的地方，但她對土的企圖却彰彰明顯，毫無可疑之處。

下面的一些事實，如（一）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南請希特勒同意蘇聯在土國海峽建立海軍根據地，（二）史達林在波茨坦會議中重申此請，（三）蘇聯政府直接向土要求有建立海軍根據地的權利，並要求土割讓卡爾及阿達漢兩省。這種神經戰使土不得不經常武裝七十萬到九十萬軍隊，而軍費之浩大，使土無餘力去從事經濟建設。

去年秋季，我對於土的態度亦如對希臘的態度一樣，即是盡力作經濟上的援助，而不能予以軍用裝配品的供給，我告訴土國代表，如國會批准三億五千萬元的救濟費，他們可以得到一份，

並且促使國人考慮予以借款，以應建設之用。

就在此事同時，土政府通知我們，蘇聯致文土政府，重申在海峽建立海軍根據地的要求，我們立即通知土政府，堅持我們在前年十一月所採取的立場，即是蒙德婁會議所通過議案如有任何修改，應召集國際會議討論之。土海峽的管治，決不只是黑海各國的事，也不是蘇土兩國的事。該海峽的防守，應依照聯合國所訂的原則及目標辦理。我們將堅持這個主張。

這是今年一月廿日我離開國務院時的情形。三月一日左右，英政府通知美國，三月卅一日以後，英國不能繼續對希土兩國作經濟或軍事上的援助。

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親臨國會宣稱，美國接到希臘緊急懇求，遂即予以經濟及軍事上的援助，否則希臘無法維持其自由國家的地位。總統並宣稱，英國已不克再予希臘以必須的援助，「我們必須援助自由民族，依照他們自己的方法，從事建立他們自己的命運。」總統請國會撥出四億元援助希土，並予以供給品及軍用配備，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卅日為止。除此之外，總統並擬委派軍事人員至希土，訓練該兩國軍隊。

我雖然沒有得到可靠情報，但我以為英國去冬受天災，罷工，尤其美元缺乏的影響，英財政當局不免神經緊張，因而影響政府政策，於是通知我們擬於三月三十一日停止土希的援助。英政府財政困難，不得不停止土希兩國的經濟援助，我政府中亦有人具此見解，但我却斷然知道英軍決不會於三月三十一日或在我國未決定行動之前自希土撤退。我的判斷沒有錯誤，英軍直至今日

(七月一日)仍駐在希臘境內，據云約有八千餘兵士駐在希境內。我國擬派七十五名海陸軍官查希，此數固不足以代替八千餘英軍去援助希臘抵抗侵略，不過此舉可以證明我國極願援助希臘，這樣可以給希臘人民一些安慰，而對於侵略者却是一個警告。

英政府宣稱停止援助希土，我說她是神經過敏，其實我們對於此事的反應亦不究神經過敏，不過也是正當的。我說正當，因為在此局面下，吾人不得不予以援手。我說神經過敏，是指予以援助的某些理由而言，這些理由似乎暗示，任何國家的共黨如果獲得政權，不問他們是否由外力援助或是由人民自願投票贊成的，美國都一律反對。我政府決不能採取這種態度。以誠實的投票導致政權，與以武力或外力的威脅導致政權，這兩者之間分別甚大。不過像我國的政府，不同的理由可以啓發國會及行政機關中不同的人，而可以達到相同的行動。這事最重要的一點，即是我們對此事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確的，即是我們不得予以援助。

我們供給土希以軍用品，這是正當的行動，我們沒有干涉這兩國的內政，他們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希臘曾向安全理事會申訴，她的國境被南，保，阿國籍的份子所侵犯。如果此事屬實，如果這些國家願意其人民去侵犯希臘，這對於世界的和平即是一個威脅。

當希臘第一次請求調查這種威脅和平的事件時，蘇聯起而反對。其時外長會議適在紐約開會，莫洛托夫在某些問題上曾和我的意見一致，因此鼓勵我請求他和我們合作。我對莫洛托夫說，蘇聯和美國負有維持和平的共同責任，如果他能運用他對於南，阿，保三國的勢力，決可使

希臘的局勢好轉。他說這三國無疵可擊，只是希政府貪污腐敗，不為人民所信任。我不同意他的說法，並舉出我的理由。我們第二次會晤時，我提出一個意見，既然我們兩人所得的情報如此不同，最妥當的辦法即是吾人先找出事實，然後再討論善治的方法。最後使我驚異的是：他竟命他在安理會的代表支持組織調查團的議案。此議案被通過，我於是委派伊斯利支先生代表美國，參加調查團的工作。該調查團自開始即遭遇了困難及稽延，我國代表認為這是要希臘的那邦負責。

就在這種情形下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演講。他並未宣稱任何自由國家的獨立過着威脅時，美國即應單獨行動，如屬必要，應應用武力去阻止侵略的主張，這是聯合國應做的工作。美國無意欲撇開聯合國而單獨行動，亦無意欲傷害或推毀聯合國。總統的演講辭不能作如此解釋。

參議員范登堡提議補充該項援助決議案，即聯合國如認為希土局勢需要仲裁時，有權實施其對希土之裁判權。此提議為參議院所採納，而美國的立場因之更為顯明。

現在聯合國沒有軍力可資調遣，這又是因為蘇聯代表在安理會的軍事委員會中所採用的拖延政策所致。美國為聯合國發起人之一，不得不向蘇聯及世界說明，即當安理會調查希臘事件時，在該會未達到結論或無軍力控制局勢之前，美國決維持現狀。此係幫助聯合國而不是傷害她的進行。關於土耳其，吾人亦決維持其現狀，直到她有維持的力量為止。

堅決可以結出果實，我這個主張在伊朗事件上又得到證實。在該處如在土希相同，蘇聯無完成其歷史上的目的。她所採用方法亦相同，即在紅軍掩護下，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我們這次警

告蘇聯，美蘇對德黑蘭宣言負有遵守責任，該宣言係羅斯福、史達林及邱吉爾所簽訂，保證伊朗主權獨立。我親自向史達林說明，如果伊朗向聯合國控訴，吾人即支持伊朗。但是我們一切努力均歸失敗，不能使蘇聯政府置信我們將實施我們對德黑蘭宣言的責任。因此，當伊朗向安理會申訴時，我們即出之以行動。

一件事情發生，其主要的爭辯往往落在它的枝節上。伊朗問題即如此，爭辯的焦點成爲伊朗是否有權向安理會控訴。我認爲任何國家如果不能享有迅速與安理會接觸的權利，此例一開，聯合國的生存必被摧毀。我對於伊朗的主權及其迅速與安理會接觸這兩點，深爲關切，因此親向安理會伸張吾人之主張。蘇聯極力反對，葛羅米柯甚至在安理會集會爭辯時退席。但是堅決及聯合國終獲勝利。

史達林致電其通訊社社長，宣稱蘇軍撤退，此電未致安理會。於是在去年十二月內，該傀儡政權崩潰。伊朗人民未受蘇聯宣傳的愚弄，聯合國觀察團與伊朗當局進入傀儡政權所在地時，該地人民歡呼迎接，他們大聲歡呼「聯合國萬歲」。這種歡呼聲吾人永不能遺忘。

安理會從來沒有採取正式的行動；而是她的裁判力量使伊朗能夠向世界控訴。蘇聯也許會重新努力，以貫徹其對伊朗的目的，不過這次吾人在聯合國機構之內採取堅決及積極行動，有此例證，吾人精神亦可爲之一振矣。

關於匈牙利問題，亦需要同樣的堅決行動。蘇聯曾深思遠慮，使獲得百分之五十七選票的匈

政府官員去職，而此選舉曾被史達林及莫洛托夫譽爲是自由選舉。匈首相被逐去職；由共黨代著其執行職務。匈首相宣稱，此舉係受蘇聯政府所指使，並有證據。如果匈首相的話確實，則蘇聯在匈國的措施實違犯她在雅爾達會議向同盟國所作的保證。我現在還不知道美英對此事將有何行動，但我知道她們應該如何行動。她們應該向安理會申請調查，是否有侵略的事實存在，如果調查屬實，應將政權歸還給擁有百分之五十七選票的政黨執掌，或者採取類似行動，保證匈牙利人民有獨立生存之權，不受蘇聯政府的壓迫。

士希如被侵略，我們必以行動應付之。現在已有證據，證明蘇聯已在匈牙利實施吾人所謂對士希應該採取行動的同樣舉動，吾人如何不出之以行動呢？我國政府因爲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業已取消約計一千五百萬元的購買我國剩餘物資的借款。如果我們有理由取消借款及提出抗議，我們自亦有充份理由請求調查事實。

我們不能因爲蘇匈間沒有正式簽訂條約就袖手不動。其實該條約係由蘇外長莫洛托夫同意而由英、美、法所批准者。吾人不能讓蘇聯實施拖延政策而獲利，如果將來蘇聯用同樣手段而控制義大利政府，即使義和約未批准，吾人自必用較抗議更強硬的方法應付之。我認爲匈牙利問題實在是在杜魯門總統在議會中所宣布士希政策的精神範圍之內。因此，吾人不可成立一個不行動的前例。

這一切有關世界和平的問題，如伊蘭，希臘，土耳其，匈牙利及其他巴爾幹半島國家，蘇聯

或可以其涉及蘇聯國家利益爲藉口，或可因恐懼及猜疑而促其行動。這可能是事實，但片面地謀求自國的利益，加上恐懼及猜疑，可以引起爭鬪，而爭鬪是與全世界各民族的利益相抵觸的。

國與國之間強富的變動，往往造成世界的不安定。蘇聯久已是一個重要的強國，但她在歐洲大陸上從來沒有像她現在這樣明顯地處在主要地位上。每當一國國力劇烈增強的時候，自然而然有人要關心到她是否再行擴展，尤其是當這國的領袖們具有侵略的觀念時，人們對之更爲關心。當一個強國，像蘇聯一樣，雖然與其他國家間的關係是處在一個強有力者的地位上，但是她國內的生活水準實較其他各國爲低，在此種情形下，世界更爲之惶惑不安。

除蘇聯之外，其他國家也有要求領土的慾望，如法國要求薩爾區，蘇聯曾表示欲歸併伊皮拉斯，荷蘭擬將接近邊區的一小塊德國領土歸併其國土內，比利時也有合併那接邊區的德國土地的意思。不過不同的地方，是這些國家係通過國際機構如和平會議或外長會議而申請其要求，而蘇聯顯然是出之以片面行動。這種行動又往往是以政治侵入的方法實現的。

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會員國「不得以威脅或運用武力侵害任何國家領土的完整及政治的獨立」。此定義不限於武力侵略，其他如壓迫，強制，或用政治的狡猾方法而侵略，均在此定義範圍之內。

這種政治侵入的威脅，施之於那些政治經濟均被戰火所毀的國家，情形更爲嚴重，因爲這種受威脅的國家必將採用報復的行動。雙方均認爲是自衛，各不相讓，結果互相爭辯，星星之火，

不久即成燎原之勢，蔓延至全世界。

如果我們有意於防止此種災難的發生，我們不但要阻止侵略的行動，更要剷除這種行動的根源。有些國家爲戰爭的原故，人民無衣無食，吃不飽，居不安，因而易爲侵略觀念所誘惑，使他們自每日現實生活中逃避至一個幻想境界裏去。我們如欲這些人民重視自由，遵守法律，我們至少應該使他們有衣食住的機會，使他們得以安居樂業，遵守秩序。我們應該使他們感覺到不必做蘇聯，美國，或任何其他強國的附庸而仍可獨立生活。

我們予人以經濟援助，決不可有意要管治其人民，而寧可是要使他們獲得自由。我們必須要使他們瞭解，我們給他們以自由的機會，不是要他們依賴我們。如果在自由不得伸張的地方上，我們應該確實知道我們所給予的經濟援助，不致於成爲反抗我們自己的工具。

我們必須要十分解釋明白，我們不是與蘇聯爭奪管制他國的權利，而是歡迎蘇聯的真誠的合作，共同再建並保護政治及經濟的獨立。

我如果不再說明，我們想和蘇聯合作，在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迄今毫無效果，那麼我所說的話就缺少直率性。我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前數章內業已說明。貝文和皮杜爾依照馬歇爾國務卿於六月五日提出的意見所寫成的計劃，現在我們又接到了莫洛托夫的反對公文。馬歇爾國務卿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曾請求歐洲各國「同意局勢的需要及他們應採取的步驟，以便本國如有任何行動時可予以相當的影響。」

馬歇爾國務卿並未說明，美國將於此計劃將供給任何規定數目的款項，以促其實現。他只是說「吾人將視力之所能去支持這一計劃」。但政府中有其他官員，曾估計此計劃將使吾人每年担负五億至六億元，以四年或五年為限。國外已有人引證此說。此估計甚至是在歐洲國家集議之前即有，這就是說，我國官員在事前似已知道計劃內容如何。顯然地，此一估計已激起若干歐洲國家官員的興趣。

貝文和皮杜爾兩位先生的創舉，我國表歡迎，但自政治的現實性而言，吾人於歡迎此一援助復興歐洲經濟計劃之餘，似宜略表幾句忠告之言。吾人應說明，美國爲了經濟來源的關係，對於援助的數目，應付給何處及在如何條件之下方可動用款項等問題，應有決定的權利。

若干歐洲國家的政府及人民不明瞭我國的情形，即除非國會確實批准，我政府行政機關的官員無權締結經濟的合約。我們應說明，不要以爲他們所已同意的計劃我們即非照付不可。任何經濟計劃，事先必須有國會的批准，否則國會如果拒絕付款，豈不要引起誤會及失望，因而傷害吾人與歐洲國家間的關係。

國會究竟如何行動，我們可以由最近的措置而略窺一二。吾人對於聯總的生命無意欲延長之，因爲依照當時的規定，我們所批准的救濟款項，其他國家不分派時，美國即分派之。當國會批准三億五千萬元救濟費的時候，並未將支配該款的決定權授與行政機關。國會規定該款的三億三千五百萬元應用於奧，希，匈，義，波蘭，特斯地及中國之內，其餘一千五百萬元方用爲救濟

其他國家。國會並規定，所分派各國的救濟費，其用途應由美國籍人民所組織的團體監視及管理。

又如最近議院通過希土軍事經濟援助費四億元，已為國會通過，由總統所批准，規定該款應組織一個美國委員會監視其用途，該委員會主席應由參議院委派。

巴黎經濟委員會於六月下旬開會時，莫洛托夫宣稱，美國應先公布在如何情形及條件之下，方供給經濟援助，並對於受援助國家的主權應予以相當保障，否則即拒絕出席。莫氏如此行動，使所有熱望世界合作的人們俱感失望。若于官員及主筆認為這種拒絕行動，即為蘇聯需要歐洲的混亂情形繼續存在的具體明證，我對此說不表贊同。

以蘇聯在其他問題上拒絕合作的事實而論，他們也許不反對歐洲不安定情形的繼續存在，這是很可能的事。雖然如此，莫洛托夫在這件事上所採取的行動，應予以不同的解釋。英法的邀請，使他處在一個困難的地位上。他的附庸國，像一切感受經濟困苦的民族一樣，必然歡迎這種邀請，將他們所需要的經濟援助情形通知美國，尤其自新聞報道內得知這種援助係以贈予的方式出之，而不是以借款的方式出之。如果蘇聯現在對這些國家施以壓力，使他們拒絕美國的經濟援助，則蘇聯本身即應在經濟上幫助這些附庸國，這樣一來，他自身的建設計劃必受阻礙。

我認為莫洛托夫的拒絕參加會議，是受了如他拒絕與我們在原子能建議及若干其他建議上合作的同樣恐懼心理所影響，他們恐懼一旦合作，即不得不准許我國代表至蘇聯境內自由旅行，以

便調查。

任何建議，只要涉及外國代表至蘇聯管治區域內作調查的旅行，無不為莫洛托夫所反對。莫氏的意見，以為我國現在予友誼國家如希土兩國以經濟援助，附有監視用途及調查事實的條件，即援助其他國家時自必附有相同的條件。我的猜測是，除非蘇聯獲得保證，美代表不至蘇聯境內或其控制下的區域內調查，亦不監視其用途，蘇聯必繼續拒絕參加巴黎會議。

莫洛托夫拒絕合作，我在今天（七月一日）對此事的看法是，莫氏在無意間替美國政府解決了一個困難問題，因為如果蘇聯和他的附庸國參加巴黎會議，那麼英法既然為自己請求援助，自必亦為蘇聯及其附庸國請求巨大數目的建設費，這樣一來，國會即遭遇一個困難問題，正如英法邀請對於莫洛托夫一樣的困難。這個援助一切歐洲極需援手的國家的建議，在未被提出之前，自然先已呈送民主及共和兩黨領袖過目。即使如此，我們也只能在如此環境之下猜測國會的行動。

如果國會需要監視用途，正如希土援助條件一樣，蘇聯及其附庸國自必拒絕援助，他們必須要求先知道援助的條件如何。另一方面，如果蘇聯及其附庸國要求不可附有任何監視的條件，則唯一的結論即是國會不致批准用款。因此莫洛托夫拒絕參加巴黎會議，實替國會解決了這個難題。莫氏已負起了分裂歐洲成為兩個政治及經濟勢力圈的重担。

美國人民及國會深切瞭解，吾人必須處置世界不安定的病源，而不只是它的病狀。需要援助的急切，比吾人所想像的更嚴重。美國物價自戰事以後，業已增高，因此吾人所給予的借款亦必

視前爲大。雖然如此，我深信他們將爲建立和平而作必要的犧牲。不過所提出的計劃必須是合理的計劃，如不合理，我恐怕國會不致批准足敷應用的數目，那麼又何須乎提出援助的建議呢？

恢復歐洲經濟第一步應做的事是，我們應集中精力於剷除經濟上的基本困難點，這些困難使各別國家不能增加生產及貿易。此事無須歐洲所有國家的贊同，也無須作廣泛的調查才能決定。我們已知道這些困難是什麼。

第一，吾人不但須利用我們的金錢，並且須要利用我們的腦力，去設法增加歐洲的煤的出產量。煤的需要，幾乎是每個歐洲國家經濟問題的重心，而歐洲的煤問題的中心是在魯爾區。

一九三九年以前的和平歲月中，魯爾區每天可出產約四十四萬噸的硬煤。一九四七年五月，即是歐洲戰事結束後兩年，該區每日只出產廿一萬四千噸，短少的噸量，有若干是由美國購煤來抵補，但是魯爾區出產的煤，成本每噸合拾元，而佛基尼亞西部出產的煤運到納波斯，每噸須合廿二元。今年歐洲國家須向美國付出約六億元的煤費，其中一部份的錢須由美國的貸款中支付。這是不經濟的辦法，也是一種浪費，應及早予以糾正。

魯爾煤產量不能增加，組織不健全及管理不善是一原因，良好機械的缺少是另一原因，但另有其主原因。一個鑛工每星期只須工作兩天，即可獲有購置配給品所必需的錢，因爲魯爾區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購買，國家的前途既不安定，所以也無意儲蓄，對於錢亦無信仰。如果改進魯爾鑛工的生活，那麼那些要懲罰德國的人們必紛起提出抗議。但是不予改善，不但德人受其痛

否，即全歐洲的人民亦受其痛苦。

關於此問題，我們現在即可開始行動，無須等待別國的同意。只須切實增加魯爾礦工的配給量，將良好的機械自美運去，並供給礦工和他們家庭以更多的消耗品，這樣立刻可以自煤的出產量增加上得到反應。

上西利西亞也是一個重要的產煤區域，我們也應該考慮如何增加它的產量，不過我們的援助須附有一個條件，即是該區出產的煤，其中一部份應供給那些在戰前即依賴該區產煤的西歐國家。即使波蘭沒有參加巴黎的經濟會議，我們也應和他的代表商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是我們應考慮如何增加電力的產量及其運用的裨益。我和羅斯福總統最末次會晤時，曾介紹克雷將軍與之會面。其時克雷即將動身去德。我告訴總統，克雷是一位工程師，曾在特克薩斯州建立了一個偉大的電力工程。總統立即將他的計劃告訴我們，擬在中歐建立一個電力工程。當時他即預知歐洲的主要問題將是燃料。

我們必須注意，不可只顧慮歐洲的經濟問題，其實亞洲經濟的重新建立，對於世界的安定也很重要。在亞洲如在歐洲一樣，我們所要援助的國家，必定是那些努力於重新建立已被毀壞的生活，以及有希望與自力更生的國家。科學的進步，已可以使所有的國家保持及增高他們的生活水準，只要他們彼此合作，出產他們所缺少及需要的東西。

只須約略說明，即可知此問題所包含的性質是如何的浩大。我們在美國所能做的事，必須是

在我們財源範圍之內，如果爲了應付目前緊急狀態之故，而使我們的經濟泉源枯竭，這對於世界安定這樣一個遠距離目標的完成，亦無補於事。

繁榮像自由一樣，必須是共同享受的東西，不是以「袖手不顧」爲根據，而是以互相公平真誠的交換出產品爲其基礎。我們給人以幫助，如欲報酬，我們必須願意接受貨物及服務爲一部份的報酬。但是在歐洲經濟未至自足自給的階段時，我們不能實際地希望有此報酬。

一個豐衣足食，有學校及其他必需品的世界，遠比一個一無所有的世界易於應付。不過在我們從事於經濟復興的工作時，仍應繼續在其他方面工作，即如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其重要性亦相等。

吾人曾以集體行動將德日擊敗。現在德日兩國均無力發動戰事，除非同盟國擬利用其充當兵卒，或邀之作爭奪權力的伙伴，准其重新建立軍力，德日決不能在短時期內有力再從事戰爭。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吾人已有充足經驗，如欲更動和平條件，最好是吾人自行修改之，如讓敵人獲致武力，以之作爲修改和約的工具，則結果必爲不利。

爲要具體表示吾人須要這些國家永遠解除武裝起見，我曾建議，由四強簽訂一個四十年期的協約，防止德日再威脅世界和平。該協約規定凡違反其條款者，立即予以懲罰，並規定爲實施若干懲罰計，四強中之任何一強有取消其否決權之權力。

此協約的接受，可以表現該國願意使德日解除武裝的誠意。英法美已接受該協約而簽字，史

達林在原則上雖已同意，但彼莫洛托夫所極力反對。吾人再繼續簽訂此協約，如蘇聯再拒絕簽字，則吾人對於前途惶惶不安，亦理所當然也。

我現在仍希望蘇聯能接受這個協約。我深信如果蘇聯能明瞭美國駐在德國的軍隊，只要該處駐有佔領軍，是不會撤退的，那麼蘇聯也許將接受這個協約。當勝利的時候，蘇聯以為美軍將自歐洲撤退，由慾望所產生的結論，一旦欲使其變更，固不易一時即可辦到，但蘇聯這個結論，無論他的領袖們喜歡與否，或遲或早，終將要改變的。如我在斯德高特所說的一句話：「我們要駐留在歐洲」。

這個四十年期的協約，正可以表明我們對於集體安全的主義是如何地支持着，這個主義在聯合國憲章內已達到它的高度表現。有人以為蘇聯的不合作，已使聯合國發生動搖，這種說法我不表贊同。我仍認為我們對於和平最大的希望，是在支持及發展聯合國這件事上，因為聯合國所具有的潛勢力，實在比吾人所想像的大，她給予我們以推行集體行動的機會，而和平亦只有用集體行動才可以獲致。

有人說，聯合國的成功是有賴於強國的合作。這種說法，只說出一部份的真理。強國合作去維護和平，固然能使任何一國不能單獨去破壞和平，但是合作並不是非要所有的強國都同意不可，雖然這是我們所努力從事及熱烈希望的目標。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彼此間的紛爭，除非為防衛憲章的主義起見，不可藉用武力。這個憲章決不能由安理會常務理事

的一票否決權所打消。

安理會在未有該會常務理事一致同意之前，不能要求會員國採取行動，這固然是事實，但決不能作這樣的解釋，即如果有人明顯地違犯了憲章的時候，會員因為有這條規定的原故即不能自由行動，或不以為道義上自己有採取行動的義務。

如果一國對於違犯憲章的事懷有真誠的疑義時，自然可以採取行動。但是憲章內所包含的法律精神應為一切國家所遵守。如果我們和聯合國所有其他會員國能明白表示，遇有必要，我們將以武力維護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的話，那麼這種精神即可成為所有國家的法律。

如果我們和其他強國能够準備以武力維護法律，則聯合國即有阻止戰爭發生的能力，我們也必須說明，我們決不以武力作任何其他的事。

但是接着而來的問題，即是如果我們有意維護主義，我們必須先具備這種力量。我們不應再減少海陸軍費，我們必須鼓勵及促進科學的檢討，我們應採用一個國民軍事訓練的計劃。吾人在國際會議中的折衝爭辯的力量，不能因為國內軍力的存在而減弱。

吾人必須說明，我們維護憲章，並不是對任何國家的一種威脅行動或敵對行動，而是使法治在國際間發生力量及作用的一種精神。吾人對待法律的態度必須明白，然後法律方可為人所遵守。

我不相信蘇聯是需要戰爭的國家，不過蘇聯政治家似乎以為他們的責任是在以奮鬥去提高他

們的權力及利益，以期達到最高的地位。我們必須透澈地說明，如果我們的奮鬥越出一定限度的時候，吾人必將實施法律以對付之，否則他們違犯那些限度的時候，還以為我們將聽任之而不予以反擊。

可是我們應承認，許多問題也須容納不同的意見。我們不可而且亦不能說，我們所決定的政策即是毫無錯誤的。我們在國會，議院及市政廳爭辯時的那種熱烈，在聯合國中決不會減少。

思想上的不同及主義的爭辯，如果我們能遵守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即是尊重那些與我們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的意見及其觀念，亦可促成進步及和平。其他的人們也必須尊重我們的意見及觀念。

不同的觀念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這世界上可以有並存的餘地，蘇聯有蘇聯的生活方式，美國亦有美國的生活方式。有人以為觀念之間必存在着衝突，這種看法只能引起衝突，而不能將某一觀念或生活方式掩藏起來。甚至歐洲不幸分裂成爲兩國經濟及政治的勢力圍，亦不能證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說法。談戰爭的人太多，而談和平的人則太少。如果我們能利用我們的力量，我們就不必怕其結果是如何，而應該懼怕的都是我們的力量利用得不必要。如果我們對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告失敗，我們應切記着，這失敗不是我們的過錯。

即使在這個戰後紊亂的時期內，聯合國仍已成爲和平的一個有力工具。

聯合國憲章，當我擔任國務卿職務的時候，公布批准該憲章的國家已足法定數目時，即于一

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發生效力，成爲了世界各民族的基本律法。當我回憶聯合國自該日起所經過的一連貫的事件時，我想到國際聯盟在成立已有十一個月之後，才召集第一次大會的事，反之，聯合國大會即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倫敦召開第一次大會，後又于同年十月召開一次，今年五月又開了一次特別大會。

在第一次大會中，成立了安全理事會，經濟社會理事會，國際法庭，並選出一位秘書長，開始組織秘書處。

聯合國的安理會，不像國聯的理事會每年只集會四次，前者幾乎是繼續在召開會議中。該會的常務理事會間的利益衝突，雖然影響了它的效率，但決沒有摧毀它的活力。安理會對於以和平方法調整局勢的力量，如伊朗事件，希臘事件的調查團，英法軍依照安理會大多數決定自塞維亞及黎巴嫩撤退，法緬領土爭執以談判方式解決，南斯拉夫射擊美國飛機案所作的讓步，這一些例子均可作爲明證。

我們對於安理會附屬機構，如原子能委會，軍用品委會及軍事人員委會的工作缺少進步，固感覺失望。但上舉的一些具有建設性的例子，吾人亦不可忽視之。世界各民族將建立集體安全制及發展與實施法治精神的重任，付予這些機構去担任。他們沒有進步的基本原因，是因爲蘇聯堅決拒絕接受國際管制及國家主權代表的主張，而這些主張是在世界極大多數國家一致公認是必需的。

美國是第一個國家，準備將原子能及其他大規模殘殺人類的武器給予國際共管。這種計畫，我們應支持之。國際共管制如能成立，我們才能予世界在解除武裝後以安全保障。非作到這一步，我不能也不應懈下我們的武裝。

同時我們仍應不斷努力，促使軍事人員委員會計劃特別辦法，使安理會有充分軍力去實施它的決議案。

其他業已獲有基礎的機構，我們也應繼續使其堅強，如食品農業會，國際勞工會，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會，國際民用航空會，國際建設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難民組織及建議中的世界健康會，國際貿易會等。按之實際情形，在過去兩年內，凡有關世界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活動，幾乎均有國際性的合作組織以促其前進。

至一九四七年夏季止，只有美、英、加拿大三國加入所有特別機構為會員。反之，蘇聯迄今只宣布願加入一種機構內為會員：即是世界健康會。

雖然我說了不少關於與蘇聯代表共事的困難情形，但是我仍堅決主張，我們仍應繼續我們的努力，以促世界合作的實現。我們這樣做，應該十分明白，即蘇聯也許不會與我們合作。假使我們的努力失敗，我們應使世界知道誰應負失敗的責任。經驗告訴我們，蘇聯的政策具有韌性，蘇聯發言人隨時可以改變他們的觀點。我們必須使之明瞭，即是我們十分需要他們的合作，不過如果得不到他們的合作，我們仍堅決地與那些願意合作的國家向前邁進。

在爭取世界合作的努力時，我們應注意，我們向他人提出的罪行，我們自己不可違犯。在國際會議中，我們足以平等地位集聚一堂，不可有「取之否則遺之」的態度。在過去兩年中，我們的忍耐已給予那些態度公正的觀察家以好的印象。我們如不忍耐，局勢將不堪設想。與蘇聯交涉談判，也許可以影響幾位政治家的神經，但是如果再發生一次大戰，則千百萬人民的生命必將受嚴重的影響。我們應繼續努力，通過聯合國，發展一個各國共同的律法，以確定行動的標準。這一個行動標準不只是依賴律法，力量及恐懼，而是以共同的友誼，共同的利益及共同的觀念使之生長。

「我們現在往何處去？」這個問題的答覆可能有多方面，但我認為有一個最重要的道路可走，即是強化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國家。世界需要我們的領導，而我們應自國內堅強的基礎做起。我們應以堅定而謙虛的態度走入國際會議，而這種態度的形成必須是我們先對自己及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了完全的信仰而後可。

我如果從政治生活中學習了一些什麼的話，那即是我認為傑克遜和林肯的學說比馬克斯和列寧的學說更給予大多數民族以更大的快樂及滿足。沒有一個觀念比下面引證的話所包含的觀念更能為一切人民所接受：

「我們以這些真理以明自己的心跡，即是一切人類是生來即平等的，他們的創造者付予他們以若干不可轉移的權利，這些權利中有生存、自由及追求快樂的權利。」

「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種崇高的觀念，再沒有任何政體可以超過它。

這些觀念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如果我們能不斷努力去實現它，不難獲致美好的結果。我們是世界最大的工業國，我們如將國內秩序做好，向世界說明我們已自過去的錯誤中學習，我們並不是一個輕率浮躁的國家，我們將發展自由及增加幸福的機會給予我們的人民，這樣，我們對於建立一個政治自由及經濟穩定的世界是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過去兩年內，我有許多次感到極度的灰心。我們不斷的努力，想在和平世界內獲致合作，但一切反應總是不利。雖然如此，我們堅持我們的努力，忍耐地堅持着。我沒有失望，今天我要大聲地說，我們的政策是堅定及忍耐的政策。

我仍然相信，只要我們「以上帝賜給我們的辨別是非的力量，作正義的堅持」，我們決可以合作的努力獲致公平的和平。

自由的經驗啓示我們，自由的前途召喚我們，向公正的和平目標邁進。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上海

○九五三一話電 號八三一路西江 處公辦一第
 ○二五二一話電 號〇三一路口漢 處公辦二第：司公總
 ○七三四三話電 號一三九路寧江 處公辦三第

部市門二第
售 銷

布	棉
疋	紗

號五二五路東陵金：址地

八五八八八：話電
三八九八八

◀間時業營▶

時五午下至時九午上日每
息休日期星

部市門一第
售 銷

百 綢 呢 布
貨 緞 絨 疋

號三九九路西京南：址地

六〇三六三
一七八三三：話電
二二四二六

日期星逢每
品價特售供

◀間時業營▶

時五午下至時九午上日每
業營常照日期星
息休日全一期星

四强外交秘密
(SPEAKING FRANKLY)

著者 貝爾納斯

譯者 歐陽君珊

出版者 新聞天地社

上海(18)湯石路南華新村
二十號 電話七九七〇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號初版三千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九號再版二千册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天新地聞"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天新地聞

